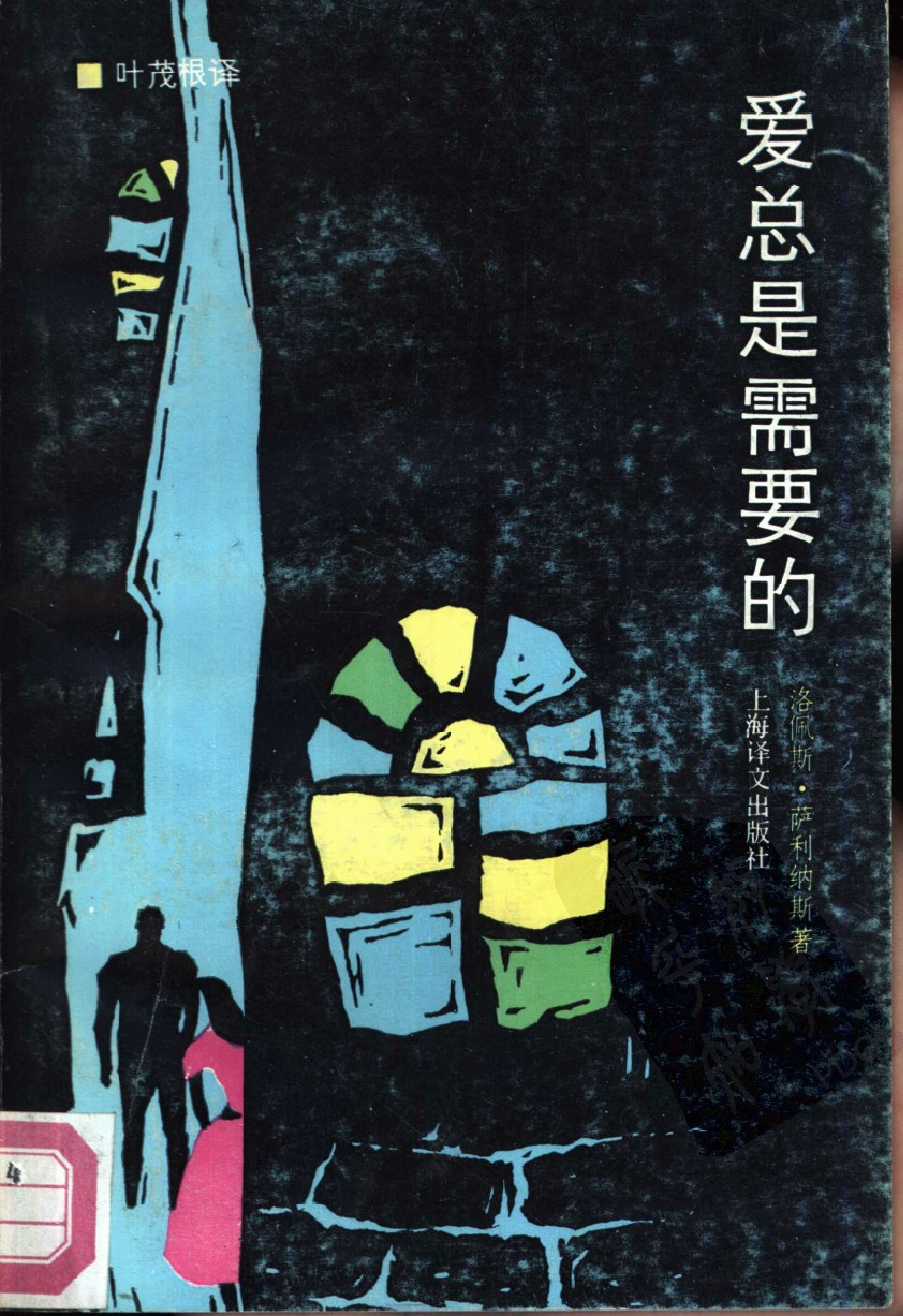


■ 叶茂根译

爱总是需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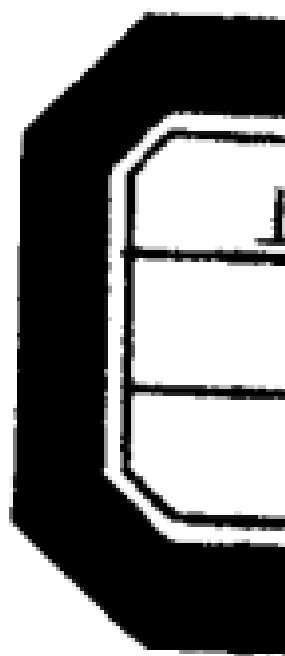
洛佩斯·萨利纳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7-5327-0593-5/I · 268

定 价: 5.30 元



爱总是需要的

〔西班牙〕洛佩斯·萨利纳斯著
□ 叶茂根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学社
PDG

Armando López Salinas
AÑO TRAS AÑO

本书根据Ruedo ibérico, Paris, 1962年版译出

爱总是需要的

〔西班牙〕洛佩斯·萨利纳斯 著

叶茂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50,000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7-5327-0593-5/I·268

定价: 5.30 元

献给我的父亲，

工人运动的老战士。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西班牙当代著名作家洛佩斯·萨利纳斯的一部获奖小说。它以本世纪西班牙内战结束前后为背景，描写了青年华金在前共和国军官恩里克的影响下，逐步成为一个反抗黑暗势力的斗士。他与在面包店工作的姑娘佩比塔一见钟情，深深相爱。此外，它还生动地描写了另外几对青年人的爱情生活，讴歌了他们对祖国、对家庭、对生活、对爱情的无限热爱。小说文笔细腻，含义深刻，在艺术技巧上也堪称佳作。

早晨，一个民兵来到村里，带来了这样一个消息：最迟在今天傍晚，摩尔人和军团的士兵就要进村了。没过多久，其他一些民兵到了，他们把若干支步枪和猎枪分给了年轻人。

“来骑兵了，”有人说道。

农民们整天关心来自前方的消息。战斗的枪声越来越紧、越来越近了。中午时分，飞机第一次出现，它们轰炸和扫射公路及村里的街道，傍晚时，战斗已打到了公墓附近。

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家庭的人朝山里逃去，也有其他一些家庭的人沿着马德里的公路前进。一些人遗弃所有的东西，只身仓皇逃走，还有一些人用自己的车子、牲口，把所有能带的用具、甚至农具都统统运走。

弗朗西斯科一家一直等到最后一刻，看看战斗的命运是否会有好转。他们一连几小时藏身在靠着房子山墙的马厩里。弗朗西斯科不时地跑到设在市政府大楼里的指挥所去了解战况。

“我们必须撤离了，”弗朗西斯科从指挥所回来时说道。

母亲赶紧给孩子们穿衣服，他们中有一个是姑娘，还有一个是她的弟弟，孩子们什么也不明白，只是感到害怕。害怕使孩子们喉咙哽住、肚子难受，睡意蒙眬的双眼在哭泣。

“我们走吧，走吧，”父亲说道，同时解开系住母骡的绳子，放出羊群。

“敌人马上就要到了，你抱住孩子，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丢了，

我带女孩。”

飞机又开始轰炸了，人们可以听到大炮发出有节奏的炮声。机关枪的嗒嗒射击声、密集的步枪射击声犹如秋天鸟儿的啁啾。

“房子怎么办？家什怎么办？”母亲问道。

他们来到大街上。起初他们看着一条条路，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好。后来他们朝橄榄园跑去。

母亲不停地跑，祈求所有的神灵保佑。

“上帝，您别抛弃我们，别抛弃我们。”

他们弯腰曲背，身体紧贴着房子分界的围墙跑着。有几条狗在果园内狂吠。邻近教堂围墙的大路后面，有一个男人在地界处向他们大喝一声：

“站住！”

民兵开枪射击的时候，他们马上趴在地上，子弹打在教堂的围墙上。一小股民兵向弗朗西斯科一家人待的地方靠近。

“你们是什么人？”民兵们问道。

“我是弗朗西斯科，国王大街人，”他回答说。

“我看他们一定是军团的人，”有一个民兵反驳说，“因此我要枪毙他们。”

“你别紧张，他们还没有上年纪。请把子弹放好，会使你很快减少几发子弹的，”另一个回答说。

全家人站着。

“走，走吧，”民兵们对他们说道。

弗朗西斯科一家人继续朝橄榄园走去，与此同时，民兵们靠着房子的正面墙壁进入村里的街道。

“我们休息一会儿，”母亲说。“我们坐一会儿，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帕科，我们会马上继续赶路的。”

“我们必须继续赶路，到了橄榄园时我们再休息。这儿我们

不能停留。”

“到胡安大叔的家还有很多路吗？”妻子问道，“胡安大叔是个好人。”

“没有多少路了，我们必须上公路。大概再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我们走那儿行吗？”

“不，走那儿不行。走公路比较好，可以拦截一辆卡车。”

在橄榄园里躲藏着其他一些邻居，他们是自己人。可以听到他们的说话声，有一批民兵在和他们说话。

“他们有大炮和机关枪。不能有更多的作为，我打了那么多枪，把猎枪管都震裂了。我的双手烫伤了，”其中有一个农民这样说道。他坐在一棵橄榄树边，给猎枪擦油。

“这又是另一支，”他指了一下靠在双腿上的武器说道，“这是属于伊格纳西奥的，当他的脑袋被他们搬家时，我就拿了这支枪。”

当弗朗西斯科一家人来到公路时，天就亮了。村庄另一侧的山冈从夜幕中显露出来。天边的群山徐缓地变了色彩。一条玫瑰色的光带划破长空，使熠熠的群星暗了下来。夜色掠过小山和邻近大道上的树木，慢慢地退去。光亮洒到了田野，小河沟边的低洼地触目可见。太阳在托莱多的群山之巅升起来了。

村里大街上的步枪发出犹如寒冬的雨水打在玻璃窗上的响声。

他们在公路的高处停下来休息，回过头来看看后面。远处，共和国士兵的步枪打得发亮，可以看到摩尔人来回跑动的骑兵，他们企图迂回包抄义勇军。

那儿有一个村庄。大路上的低洼处留下车辙的痕迹。

这时刮起一阵微风，烽烟缭绕偏向西去，在空中绘出各种图画。

“水渠边的小麦给烧着了，”父亲说道，声音嘶哑，严肃而痛苦。

然而这风也带来了夏天的气味，带来了岩蔷薇和小麦的味儿、松树林的气息和鸟儿的叫声。接着，空中只留下了弗朗西斯科的痛苦的话声。

“土地，孩子的妈，我们的土地。”

他凝视着田野。凝视着金黄色的、高高的、袅婷的麦穗，小麦只盼着庄稼汉的手来收割。农民的心迫使自己停住话头。

“当我们返回家园时，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收割庄稼。平整土地，重建家园。”

他们站着，相互靠得紧。全家人紧紧挨在一起，眼睛都望着大地。

“我们的东西呢？”母亲重复道。

飞机第三次出现了，飞得那么低，灰色的机腹掠过橄榄树的树梢。四周再次响起嘈杂的声音，引起人们的恐惧。逃亡者的长长队伍紧贴在地上，犹如成熟的庄稼倒伏于地。

有些人跳到路旁的排水沟里，用身子护住自己的子女。飞机向公路扫射，民兵们用步枪还击。载着逃亡者的马车、卡车摇摇摆摆地向前行进。在飞机一次次飞过的间隙中，逃亡者重新赶路。被飞机炸死的人就留在那儿。尸体被移开放在公路旁边，以免卡车和马车压着他们。

拉车的牲口发出像人一样的嘶叫声。它们不顾眼前的一切，不顾男女老少，马车和别的牲口，奔驰而过。

一头载物品的骡子，身上积满尘土，腹部被划破了，一个小女孩跪在它的身旁，抚摩着它的那双耳朵，喊道：

“爸爸，爸爸，您看，卢塞罗①的肠子露出来了。”

父亲在儿子的身旁跪下，用手帕擦去小孩手上的血，然后，举起孩子，让他坐在自己的双肩上。

“我们会再有一个卢塞罗的，孩子。”

逃亡者的队伍走得非常缓慢，像条虫似的。傍晚时分，队伍抵达一个村庄。

“你们不要担心，很快会来卡车把大家送走的。请你们耐心点儿。”有人对他们这样说道。

这时，民兵和农民在村外挖战壕，妇女和小孩在空旷的场地上等候着卡车的到来。

“只来了两辆卡车，只能让孩子们先上车，”有一个男人这么说道。

“孩子们必须马上上车，法西斯分子很快就要到了。”

已经没有时间道别了，远处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了。

“我们走！快走！”一个歼敌指挥官喊道，“摩尔人已经很近了。”

“孩子，拿住，这儿有奥雷阿姨妈的地址，”母亲对姑娘说道，同时在一张纸片上潦潦草草地写了一个地址。

“我们马上会去的，你们放心好了。你们已经是大人了，别哭了。”父亲补充说。

“我们走，快走！”一位指挥官重复道。

两辆卡车出发了，人们跟在车子后面，摇动着双手喊着。

接着，汽车出了村口便开快了，而人们默默地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大炮声隆隆地响了。

① 系骡子的名字。

在马德里周围的战场上出现了一片寂静。共和国的军队三年里保卫了这座城市，现在他们慢慢地离开了自己的战壕。

在哈拉马河的桥上，在比利亚维德、拉卡萨·德·坎波，洛斯·卡拉班切莱斯和大学城，听不到一声枪声。

敌对双方被打死的人，有的挂在铁丝网上，有的摊在地上，一半陷在土里。

共和派的战士当放下手中的武器时，心中有一种无防卫之感。他们瞧着眼前的战壕，手中拿着子弹上膛的武器，默默地一动也不动，佛朗哥的军队盼着新的一天的到来。

像部队的其他战士一样，反坦克班长恩里克·加西亚披好了斗篷，开始向乌塞拉街区走去。

军队很快就占领了马德里工人在很早以前修筑起来的第一批街垒。马德里显得很平静，所有的灯都熄了。卡萨多上校的几支巡逻队戴着国防洪达①的白色袖章在大街上和郊外巡逻，搜寻着不肯投降的一批共产党分子。

“喂，出示你们的身分证，”巡逻队对他们说道。

恩里克和其他战友在离开战壕之前他们的证件已经破了。他们只带着通行证。他们在巡逻队的办公室里出示了通行证。巡逻队对他们进行了搜身之后，便放他们走了。

“卡萨多的人正在逮捕共产党分子，”这批共产党分子中有个成员在离开洪达的巡逻队时说道。

在马德里郊区的那片地方，几乎没有一座房子是完好的，因为机关枪的扫射和“容克②”、“萨沃依③”的炸弹对街区进行了

① 洪达：西班牙当时的执行委员会。

② 德国的一种飞机名称。

③ 意大利的一种飞机名称。

狂轰烂炸。

当抵达阿托查广场时，恩里克和自己班里的一个战士继续在普拉多的林荫大道上走着，班里其余的人上了巴列卡斯桥。

“恩里克，你真是一个单身汉吗？”

“是的。”

“我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唯一使我感到高兴的事是我能和他们在—起生活。”

“你的两个孩子长得挺讨人喜欢，你把照片拿来给我看看。”

“是的，他们挺讨人喜欢。”

“奥古斯托，对于你来说，至少有人在等着你。”

“我不知道有人等我们是福还是祸，现在处境开始困难了。”

“一切困难我们都会有的；不要忘记，我们已经打了败仗。”

“对，这是事实。”

“不管怎么样，你应该幸福，他们在等待你。”

“你去哪儿？”

“到我弟弟家去。”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点着了一支美洲的雪茄。路上寥无人迹，只是不时地开过一辆快速的汽车。

“是逃难的人，”恩里克议论道。

在月光下可以看到战争的宣传标语。这些标语贴在左侧人行道的楼房的正面墙上。

“你们必败！”恩里克念道，“现在念这些标语，真让人有点难受。”

“打赢这场战争是不可能了。无能为力。”

“这些标语对敌人帮助很大，可对我们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他们不会打败。”

“这我不知道，”恩里克答道，“我心里乱得很厉害，有时我

想，我们应该多坚持一下，因为我们还拥有十个省份。世界大战就要发生，我认为卡萨多的人无理。”

“你认为世界大战会给我们带来点好处吗？”

“这我确实不知道，不过，我认为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应该正视现实。”

“我也不知道，有人说手里没有血债的人就不必害怕。”

“他们是这么说的，但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们还有性命。我们将看到适合做的事情，我们现在还不必胆战心惊。”

他们已经来到植物园的大门口。铁栅栏另一侧，树冠在风中摆动。

“晚上天气不坏。”

“不坏，天气不坏。”

“好吧，你留在这儿。要是不发生意外，我们还是有机会见面的。你真的有我的地址吗？”奥古斯托问道。

“是的。”

现在恩里克只剩下自己一人了。随着新的一天的到来，他开始担心命运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他急忙赶路，心里想着刚刚和奥古斯托的谈话。“很多男人将谈论同样的话题。大家盼望着明天，有些人感到害怕，还有些人感到高兴。今天有许多人不会睡觉。”他自言道。

恩里克感到很热，解开斗篷，看了一下天空，夜晚寂静、美丽。

“明天将是个好天气，天空布满繁星，”他不假思索地喃喃说道。

恩里克几乎整整有一天没有想念他的弟弟了。现在他大概到了巴勃罗家，他想和自己的弟弟，以及特雷莎说说话。弟弟他

们可能会说，他们给恩里克留着一个住惯的房间，这房间有一个朝街开的窗户，从那儿可以看到修女公园。

巴勃罗的房子是一座五层楼的楼房，座落在大街的尽头。这房子有几扇百叶窗紧关着，不让阳光射进屋来。房子的对面耸立着一座修道院，修道院的围墙已有些损坏。

当恩里克到达修道院钟楼的大门口时，晨钟打三点。

他敲了一下有金属门环的大门，身体感到很疲乏，便坐在台阶上等待来人开门。

过了几分钟之后，大门打开了，出来一个男人，他正系着裤子，一头蓬乱的头发。

“你想干吗？现在不是叫门的时候！”他说道。

“请原谅，”恩里克回答说。他从台阶上立起身来。

“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我的弟弟在家吗？”

“你弟弟是谁？”看门人问道。

“他叫巴勃罗。”

“中尉昨天出门了。”

恩里克取出他的雪茄烟盒，递过去一支雪茄烟。

“喜欢抽吗？”

“谢谢，老兄。已有好长时间没有抽烟了，那是我最想念的东西。”

“特雷莎呢？她也走了吗？”

“他们两人都走了。是一辆汽车来把他们接走的。”

“你不知道他们去哪儿吗？”

看门人翻起上衣领子，点着这支雪茄烟。

“我有好长时间不抽烟了，几乎不知道烟草味了。一个人吸惯了干橘子皮，他就不知道烟草味了。”

他又强调说了一遍。这时已听不到第二方济各会钟楼响出有节奏的钟声了。

“他们去哪儿，没有给你留下话吗？”

“没有，尽管我认为他们去巴伦西亚乘船。我好像听他们说起过这件事。”

看门人把双手插入裤袋里，呆呆地望着他，深深地吸了口雪茄烟。

恩里克不再问什么。他披好斗篷，拖着缓慢而疲乏的脚步，向市中心走去。

黎明的寒峭降临了。

马蒂亚斯到了四路街心花园，便下了电车。接着，他继续大步沿布拉沃·穆里略大街而上，进入一条横向的胡同里，最下面的地方便是胡同的尽头，有一辆大车在几头母骡的牵引下，慢慢地行进。一条狗懒洋洋地穿过马路中央，躺在对面人行道的边石上面。一伙男人坐在凳子上，肩背靠在一座楼房的墙壁上，舒展着双腿，在一家酒店旁默默地抽着烟。

在这幢楼房的门廊里，放满了一桶桶垃圾，一群小孩正玩着纸牌。房子里面有一个大院子，一群妇女拥挤在公用的水池边用水桶打水。

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妇女从木板小屋的简陋小窗里探出头来，小屋的底层是楼梯口。人们只能看到她的脸。

“克萨达先生在家吗？”

“您找他有什么事？”

“我是他的朋友，为了工作上的事情。”

这位妇女打开小屋的门。她是个胖女人，双臂满是红斑。妇

女叫孩子们别说话。

“如果你们要那样大叫大嚷，那你们就到大街上或回家去。”她转过身来朝那男人做了个手势，“这些孩子只会捣蛋。”

孩子们很快就停止了玩纸牌。

“请你上二楼，他住在第七号门。最碰巧的是他在家里，今天我没有看见他出去。你要顺着这过道走一会儿，你会马上看到他的门房号码的。”

木板扶梯既破旧又肮脏，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从过道上传来了深沉的、半睡眠状态的声音，有尖叫声或闷住的笑声。

上了二楼，走了长长一段过道，来到了七号门。在叫开门之前，马蒂亚斯在上衣的几个口袋里摸索了一阵，取出一包烟丝，慢慢地用烟纸卷着香烟。

门铃响了，他在门边等着开门。他不得不等候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正在睡觉，现在只不过是早晨九点钟，”他自言自语说道。接着，他透过那薄窗帘的小洞，又叫开门了。

一个妇女——身穿退了色的紫色便服，头发披在肩上——打开了过道尽头的一扇门，朝这男人看了一眼，重又关上了门。

“您是谁？”在门的另一侧，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门上的窥视孔内问道。

“马诺洛在家吗？我是马蒂亚斯，是他的朋友。”

门被小心翼翼地慢慢打开了。

“您是克萨达的夫人吗？我是他的朋友，同事。我来看看克萨达，问他是否知道点什么。”

“请进，”女人说道，“一切都凌乱不堪，您知道吗？可是我没有心思收拾这座房子。”

“请别担心。”

客厅里几乎一片黑暗；有一股潮湿的气味，熟的蔬菜的气味

儿。墙角落里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有一件男人的衣服，还有一把椅子上放着有皱纹的床单。

“请坐，”女人边说边拿走了椅子上的床单，“马诺洛还没有起床，因为他没有什么事可做……”

一道阳光从朝街开的窗户外射了进来，使得接待客人的房间里的印花窗帘布染上一层金黄色彩。

马蒂亚斯坐等着，直到看见他的朋友从门帘中探出头来。

“你等一会儿，现在我就去，”朋友说道。

马蒂亚斯走近窗口。一辆汽车徐徐开过，卷起一团尘土。街上空荡荡的，寥无人迹。只是可以看到酒店附近的那一伙男人，正在默默地抽烟。从某个地方传来了一台收音机的音乐声，这嗡嗡的声音缓慢而乏味。

“喂，马蒂亚斯，到房间里来待一会儿。”

他的卧室里塞满了家具杂物。在一个角落处，有一个小孩睡在自己的摇篮里。

“好吧，事情进展如何？”

“马诺洛，这我要问你。你是否知道点什么。”

“昨天我在办公室里，有人说，从现在起四五个月内要进行履历检查。他们说到时候我们会知道的。”

“如果我们能搞到一个拥护现政权的证明书，那他们就会马上来唤我们的。对于莱安德罗，他有一个表弟会来作证的，这个人和国民派的人站在一起，头脑简单。他正在工作。”

“由于这场清洗要历时很久，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办才好，”马诺洛的妻子从门口这么说道。

“我认为这次旅行缺鞋、缺粮，你去避一下清洗的风头，”马诺洛说道。

马诺洛坐在床沿上系鞋带。这时睡在摇篮里的小孩哭了起

来。

“我们走吧，利托，看在上帝的份上。只是缺少一张证明书，使得你哭了，”母亲说道。

“必须找一个让我们有工作做的地方。”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妻子边说边摇晃着孩子，“马诺洛随便找到一个什么工作做，我也就满意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亲爱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丈夫重复道。

“没有担保证书去找工作，只有傻瓜才干得出来。起码要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才不会向你要求证件。”

“对，这倒是真话。”

马诺洛的妻子用手理了一下头发，重又摇着孩子的摇篮，为他低声哼起了歌谣。

“我们处境很糟，让孩子这样哭泣，小孩已哭了三个小时。”

“家里现在该是领日工资的时候了，”马诺洛喃喃地说道。

“有人一定会把钱送来的，”她答道。

克萨达已穿好衣服。他透过玻璃窗向街上看了一眼。

“今天的天气好吗？”

“今天也是一个热天，”马蒂亚斯回答道，从窗边转过身来。

“我们去吗？”丈夫问道。

“你愿意就去，”马蒂亚斯回答道。

孩子们在门廊里继续玩着纸牌。阳光已晒在街上的石子路上。

“我们去买几支雪茄烟，妻子给我一比塞塔，”克萨达说道。

“我现在没有雪茄烟，身无分文，”马蒂亚斯回答说。

“我们去喝杯酒去，买几支雪茄烟。喝杯酒总有些好处的，它可以给人提精神，给人前进的勇气。我会帐。”

酒店里散发着醋和潮湿的锯屑气味。

“你好吗？”

马蒂亚斯靠在用锌制成的柜台上，端起酒杯呷过一口酒后，便用衣袖擦了一下上衣前襟。

“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该做的事是到别处去找工作。在这儿会安排我们做什么呢？开电车不是事儿，至少不是我所喜爱的生活。我喜欢在口袋里有五个杜罗^①可以交际一下。”

“那么你的妻子怎么办？”

“她可以用客人来保护自己；我们出租了两个房间，每月收三十杜罗作为付房租和电灯费，再也没有什么进项了，但减轻了一部分负担。”

“我不相信你们处在享受的时代。如果明天这个时候公司有人来叫我，我就可能在牙缝中哼出一支歌来。一个人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主人，相信自己会比一个部长挣更多钱的时代过去了。我希望自己工作进展顺利，希望妻子不是非去替别人擦屁股不可。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妻子为大家挣钱使我难堪，而是因为另一回事。”

“如果我的妻子像你的夫人那样，我的情况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如果妻子干得不顺利，那么我的衣袋里连一分钱也不会有，”马蒂亚斯回答说。

两位同事沉默了一段时间。早晨阳光普照，光线从酒店的大门口照了进来。坐在大街上的男人们好像是睡着了。

“马诺洛，要抽支雪茄烟吗？”

酒店老板向他们俩递过烟来，两个朋友把一支雪茄分成了对半。

^① 西班牙银币，一杜罗等于五个比塞塔。

“从今天早晨起，我还没有吸过一支像样的香烟。我抽的是一些烟蒂。”马蒂亚斯评说道。

这时有两个姑娘穿过大街。

“几个女的走了，”酒店老板说道，“因为那是医生劝我切忌的人。”

两个朋友回过头朝酒店老板看的地方看了一眼。

“对，”马蒂亚斯补充说，“可以一本正经地挤她们一下。她们有两条非常诱人的大腿。”

“今天天气很热，对吧？”马诺洛说道。

马蒂亚斯喝完了杯里的酒。

“好吧，我要回家了，”他说道。

“改天见。”

“好。”

“如果我不在家里，我将待在这儿。这是我打发时光的唯一方式。”

“有几个下午我们要出去，”酒店老板说道。

马蒂亚斯上街去了。一辆小汽车在石子路上像一只蚱蜢那样跳动。一群小伙子在一盏路灯下聊天。汽车在一座房子的门厅前停下，车上跳下三个男人。

没过多久，一批人拥到了门厅前。人群间有一个男人拔腿便跑，此人就是从小汽车上下来的三个人所追捕的那个人。

“他是个政治犯，”有一个人低声说道。

马蒂亚斯在大街中央停了下来，与那个逃跑的男人迎面相遇。

逃跑的人是个青年，脸色由于害怕显得紧张。他跑得满头大汗，身着一件很短的黑色上衣，下身穿一条技工那样的蓝色裤子，脚穿一双麻鞋。他很快在大街的尽头消失了，紧随的三个人

向这一街区慢慢搜寻着。

马蒂亚斯在人群中冲出一条道路，很快悄悄地躲进自己的家里。街上马上变成空荡荡的，仿佛没有什么人住在那儿。甚至在酒店附近睡觉的人群也很快散得无影无踪了。

看门人耸耸肩膀。他的声音比妻子的还高。妻子低声说话，一字一句声音拖得很长。她的双手在围裙口袋里掏着。

“你瞧，这么点钱要用三个月时光。”

妻子垂下脑袋，继续低声说着话。接着，她抬起脸来望看门人。

“你知道，现在情况对我们来说并不很妙，我们将会付给你房钱的，他们很快会给马蒂亚斯安排工作的，他们已答应给他安排了，所以请稍微耐心一点儿。”

看门人又耸了耸肩，双手握住自己制服上的皮带。

“你们该付三个月的房钱了，经管人说，要么你们付房钱，要么将房间让给别人，两者选一。”

汗水从那位女人的脸上和双手上往下淌，她把身子靠在过道的墙壁上，取出围裙口袋里的手帕擦脸上的汗水。接着，目光又落到了看门人那油光锃亮的长统皮靴上。

“你知道这些事的情况，我们希望结束对马蒂亚斯的清查。”

“这个我可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你们付给房租。我再也不能等下去了。我给经管人一张收条，事情到此为止。你也不要向我苦苦哀求了，我知道你的丈夫不是个伪善者，他为赤色分子筑过战壕，像你那位丈夫，我倒很乐意在我的办公室里见到几个，让他们变得聪明起来。”

马蒂亚斯的妻子重又沉默了，垂下眼睛，看着看门人的长统靴子旁的地上。在家里，在大街上，在商店里，人们窃窃私议着周围发生的事情。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有关逮捕人的新消息，不

捕人的日子非常罕见。

“明天我把房租付给你，堂多罗特奥。”

“我什么时候来取钱？”

女人考虑了一会儿。

“我必须把收音机卖掉，”女人咕哝道。

“上午还是下午？”看门人仍然问道。

“下午比较妥当。”

“那好，不过，你要明白，如果你们明天不付钱，那就得在法庭上领收条了。”

她关上了大门，有好长一阵子，她抓住门上的插销，将自己的脸紧贴在门上小窗的玻璃上面，一动也不动。

看门人踏着坚定、有力的脚步，在过道上渐渐远去。

她终于从门边走开，穿过住宅的过道，走进餐厅。

“你听见了吧，华金，”她说道。

“听见了，这样只好去死啦。看来，看门人的言语真是折磨人的。”

“马蒂亚斯可能知道一些工作情况。他去朋友那儿了解一下。”

“可能是这样。”

“我们必须把收音机卖掉；把收音机或者钟卖掉。”

“他们会给我们三个夸尔托^①。因为现在所有的人在卖东西，他们就乘此机会少付钱。”

“要是你父亲能很快解决……”

“谁都明白，我们不能老是这样地生活下去。”

“可我不知道向谁去提要求，我在店里已赊欠了三十杜罗。”

① 西班牙古铜币名称。

今天我甚至连吃晚饭的钱也没有了。”

“我有两个杜罗，”华金说道。

华金站起来，在裤子袋里摸了一下，然后，把手中的钱放在餐桌上。

“这儿有一张杜罗的钞票，你已经知道我有钱。”

“那你什么钱也没有了。”

“我有点钱乘电车就足够了。明天，我会要求预支一笔钱，我们将看看他们是否会给我钱。”

华金重又坐到椅子上看报，玛丽娅到厨房里去继续做饭。在另一个房间里住着几个转租住房的人，一个像是四十岁左右的妇女，两个孩子，一个男的和一個女的。他们围坐在一只大木板箱的四周吃饭。

马蒂亚斯将烟蒂扔在地上，面有愠色，用鞋底把烟蒂碾碎。街道在中午的炎热阳光下发亮。一队“神箭手”合着鼓的伴奏声走步。孩子们有节奏地挥着手臂。“神箭手”武装带的搭扣和刀柄在蓝色上衣和黑色的裤子上闪闪发光。擦过鞋油的长统皮靴、鞋包头上油光锃亮。

散步的或工作下班的人群停下脚步，他们待在那儿，举起手臂，向在面前经过的军旗和孩子们的队伍致意。这些孩子肩上荷着木头做的步枪，昂首挺胸，雄赳赳地列队行进，唱着军人进行曲。两个男人，一个背着一张扶梯，还有一个在腋下夹着一叠标语，在房子的正面墙上贴着政治宣传品。

有一些人高声念着这些宣传品上的标题，马蒂亚斯等候最后一个“神箭手”过去后再穿过马路。

马蒂亚斯拖着徐缓、疲乏的脚步在人行道上走着。他的身影

有节奏地摇晃着。有时他以想着自己身影的大小来自我解闷。后来，他就在街角一家酒吧间前面停下来，看了看手表。当时的时间是两点缺十分。

马蒂亚斯继续赶路。在他家的门厅边挤着一群妇女，排从另一个街角的煤球店门前排起的买煤队伍的末端。她们中有些人坐在凳子上缝衣服或者织背心。

“马蒂亚斯先生，请告诉玛丽娅，叫她安心吃饭好了，我饭已经吃过了。今天早上她邀请过我一次。”

女邻居从椅子上立起身来，她原来是坐在椅子上观看着由上百名妇女排成的长长队伍。

“到五点钟也不会轮到我们，请告诉玛丽娅，他们还卖木柴。”

马蒂亚斯点头表示同意。妇女们腾出一条路让他进入门厅。透过敞开的门窗可以见到溢出的灯光。

他走进电梯，对着门挂的镜子照出了他的身影。他是一个中等身材、身体结实，肩宽的男子汉。

他打量了一下自己的面孔，没有刮过脸。

“我必须每天刮脸，黑色的胡子会立即引起注意，它给一个人留下奇特的外观。克萨达说得在理，一个人穿着不好，又没留胡子，他就不能提出要求工作。至少乍一看，不该像个工人，必须要有少爷的派头。”

底层是门房。看门人的脸庞、双眼有点像雕鹗，他的脸总是贴着门窗的玻璃。

马蒂亚斯向看门人致意，嘴角上挂了一丝微笑，讲了一句对方不能听见的话。

“早晨好，堂多罗特奥。”

看门人没有丝毫的表情，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在家里，在

大街上，由于政治上的事情，人们对多罗特奥恨之入骨。大家都希望他早点死掉。不过，人们怕他，只求他抱冷淡态度或友好态度。谁也不想和他作对。有人说由于他的缘故，这幢房子里至少有三个邻居被关进了监狱。据说他宣布这几个被关的人是“赤色分子”。

多罗特奥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时而和某个和他意见一致的邻居举行一次茶会。

多罗特奥已结过婚，而且有两个小女孩。他的妻子——有人说比她丈夫还坏——利用对其丈夫的害怕和他的一套制服，在院子里高声辱骂邻居。

马蒂亚斯来到门口，用手指头在门上的小窗玻璃上接连敲了几下。

屋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她开电灯时电变换器所发出的响声。

“你是马蒂亚斯吗？”

马蒂亚斯在过道的暗处待了一会儿，眼睛眨巴了几次。

“马蒂亚斯，”妻子说，“我正等着你，看门人来催过房租钱了。他说，假如我们明天不付房钱，他们就不让我们住了。”

马蒂亚斯没有回答。他依然站在门口，两手插在裤袋里。他看着妻子，仿佛没有听见似的。

玛丽娅是个皮肤黝黑的女人，宽宽的脸盘，颧骨隆起。

“我在盼你到来，有什么新消息？你知道自己工作有了着落？”

“不，什么消息也没有。”马蒂亚斯终于说道。

对玛丽娅来说，她看到自己的男人时，他嘴角上的一丝微笑也会使她感到害怕。她作了个怪相，耸了耸肩，然后用双手搂住了他的身体。

“有什么办法呢？”马蒂亚斯说道。

他感到妻子的重量落在自己的脖子上，感觉到了妻子那热乎乎的胸脯和圆鼓鼓的肚子，也感觉到了妻子皮肤粗糙的双手，以及她热情而短促的呼吸。

“玛丽娅，放开我。我没有心思对任何人表示亲热。”

马蒂亚斯离开自己的妻子，顺着过道走去，坐到餐桌边上。

“路易莎夫人对我说，你可以安心吃饭，甚至到下午五点，煤炭店买煤也还轮不到我们，”马蒂亚斯说道。

在两个房间里，可以听到转租屋的人的脚步声。那女人奥雷阿的声音像唱民歌那样的刺耳和单调。马蒂亚斯想要止住她说话，但又马上用粗短的手指头在餐桌上轻轻地敲着，自找乐趣。

“你别这样，你使我感到紧张不安。”

华金停住看报，和自己的父亲说起话来。

“你走运吗？”

“还不知道。有人说，我们几百人的清查工作还要拖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将有人找不到工作。”

“不过，他们会给你安排工作的。在履历中你没有什么政治问题。”

“看门人说我们活该，你为赤色分子修筑过战壕，”玛丽娅说道。

“你，你必须做的是别让自己的舌头说话。对看门人要小心，说不定有一天他会来找我的麻烦的。”

“我什么也没有说，他说的不合时宜。”

“你瞧，我并不想弄懂什么政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想弄懂政治。每个人有面包吃就可以了。我曾是劳工总联合会的成员，就是那么一点问题；可现在我要代人受过。”

“喂，父亲，”华金以一种说秘密话的口气说，“昨天我去英国大使馆取新闻简报……”

马蒂亚斯看了他儿子一眼。当听儿子讲这番话时，他就变了脸色。

“我不许你去，你知道吗？我不许你去。现在你们都来找我的麻烦。如果你要找事，那你就到英国使馆去好了。不过，我不想知道什么。我有我的事情，如关心战事就足够了。我不是个党派分子，既不参加这一派，也不参加那一派，我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懂吗？没有钱。”

“这很好，父亲，”华金站起来。“你甭担心，你去挣钱。我去工作了。”

“这儿缺少的就是钱，但愿你什么也不过问，你就把钱带回家来。”

马蒂亚斯仍然坐着，他的妻子在桌上摆饭菜。他对华金讲的话感到烦恼。他的目光不带任何好奇，扫视着餐厅的墙壁。餐厅的正面墙上挂着他和第一个妻子的结婚照。镜框的一个角落放了一张他儿子华金刚出生时的相片。玛丽娅是他的第二个妻子，她没有生育子女。

餐厅很大，它有一扇窗户，三个门。窗户朝院而开，可以看到对面邻居们的厨房。三个门中有一个也敞开着，它通往夫妇的卧室。有一个门是关着的，那是奥雷阿和她的两个外甥住的房间。第三个门一直敞开着，并且紧贴着墙壁，门口朝着进出的过道。另一个住转租房屋的人是堂娜普鲁登西娅，她住在一间由过道上进入的很小的房间里，小房间的旁边有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

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华金的床上遮着一条巴斯克产的床罩，当家里接待来客时，这张床便成了坐椅。

马蒂亚斯把椅子向后仰了一下，以便让自己的双腿伸到桌子下面，把脚搁在桌子的横档上面。

在马蒂亚斯的背后，有一座用镀金的包角作为装饰的台钟放在碗柜上面，钟在一点十分时不走了，马蒂亚斯发现台钟没有声音，便转过身去拿起钟，给钟上了发条。他凝视秒针的走动，整整看了一分钟。

“有什么可吃的吗？”他高声问道。

“圣安东尼奥菜泥和鲑，”玛丽娅在厨房里答道。

“那么面包呢？”

“我把买面包的钱去买了鲑。”

“你给我买来雪茄烟了吗？”

“我没有买。”

“克萨达的妻子给她丈夫一个比塞塔，让他去买烟。”

马蒂亚斯交叉着双腿，身子靠在椅子上。玛丽娅从厨房里出来，开了收音机。

“喂，给我拿吃的来。”

玛丽娅端来了菜泥。盘底有一层黄色的、很稠的面糊。

“要当或卖掉点东西。明天必须付房租，房租几乎要付三百比塞塔。”

“唉！收音机不能卖。”马蒂亚斯说，“你知道我爱听收音机，这是我唯一的消遣。”

“因为除了钟和床褥以外，唯有卖掉收音机我们才会有三百比塞塔。”

“我告诉你，收音机不能卖。”

“不卖收音机可以，不过，如果人家把我们撵到大街上，我们去吃收音机是不是？”

“克萨达的妻子比你会安排。今天早上她给了丈夫一个比

塞塔买烟钱。”

“我虽然不知道克萨达妻子做的事情，可我不能创造奇迹。我能省钱做饭已相当不错了。”

“我们可以去借钱。”

“向谁去借？”

“华金在他的工作中可能会借到钱。”

“你的儿子已经做得够了。你看我们这星期吃什么？那是华金星期一要求预支的工钱。”

马蒂亚斯没有答话。他吃完了菜泥，用小刀把鲑分割成小块。

“你去电话局瞧瞧你那位朋友。他有一份好差使，不是吗？”马蒂亚斯说道。

玛丽娅看了一下自己的丈夫。

“你不想去求他。”

“对于你去求他的那个人，我不想说什么，因为我们什么都缺。”

玛丽娅看了一下朝院子的那扇窗户。

“你知道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他想要我跟他走。”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你不想去看他，你不想我成为一个妓女。”

马蒂亚斯又沉默了。玛丽娅站起来。

“你是想叫我当妓女吗？”

马蒂亚斯不喜欢妻子对他这样的诘问，他无法忍受妻子说这样的话。

“喂，让我安静点，你恐怕不会当，也不是那种人。”

餐厅的另一侧，关着门的背后。转租房屋的人听着他们俩的谈话。

奥雷阿继续躺在床上。安东尼娅弯着腰，在卧室墙角落里给炉子点火。

炊烟像黑色的弯曲柱子直冲屋顶，接着在卧室里弥漫开来，污染着周围四壁。

姑娘被烟熏得不时地咳嗽。烟灰粘在她的脸上，前额上冒出的汗珠，顺着脖子一直淌到胸脯才消失。

“姨妈，”姑娘说，“请你把窗户和门打开，闻这股烟味谁也受不了。”

奥雷阿勉强地起来打开窗户和房门。然后，她在床上站了起来，把胳膊肘撑在散水上，热切地吸着院子里清静的空气。

庭院小而方正。往高空看——从安东尼娅的房间里必须要探出半个身子——可以看到一小块蓝天。

院子里传来一片喧闹声。可以听到马蒂亚斯和看门人的收音机声。楼上的一个女邻居在晾晒这一周换洗的衣服。一个小孩哭得连声音也嘶哑了。有个地方还传来了一位妇女的歌声。还可以听到盘子的碰撞声和踏缝纫机的声音。

那个妇女拧出的床单的水顺着院子墙壁往下流。看门人的妻子走出她的厨房，在一堆放在小院子角落里的家什中来回翻动。

“你这位大婶看见了吧，请你在晾衣服之前，把衣服上的水拧干！我对你说，欧拉利娅夫人，你别躲起来。”看门人的妻子大声嚷道。

姑娘依然蜷缩在炉子边上。突然冒出球形火花的欧石南炭发出劈啪声。

“你快点，安东尼娅。今天佩德罗要来，可你还没有把饭做

好。”

安东尼娅立起来，去找放在床下的做饭的器具。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房子，你会认为这是我在撒谎？”她说道。

她像一尊半身雕像，没有梳理的栗色头发垂在两肩，下身只穿了一条衬裙，因为卧室里很热。她脚上穿着拖鞋，这是一双用淡红色呢绒做的便鞋。

“你不要再嘀咕了，姨妈。从今天早晨八点起，我还没有停过呢。假如佩德罗来了，可以让他等一会儿。”

“你不像你母亲那样爱劳动，也没有你母亲那样斯文。”

安东尼娅看着姨妈，目光顺着面前这位妇女的脸移动。她马上就发现这位亲戚有点不一样，她像别的女人那样不讨人喜欢。

“你不要再嘀咕了，你说话总是像吵架似的，”姑娘说道。

“在这方面你很像你母亲，说话没有分寸。”

安东尼娅没有答理。“母亲与她相处不好，她说奥雷阿姨妈很自私。”姑娘心里说道。

“和你们在一起，奥雷阿把鸡毛蒜皮的事儿也要交给我干。”

安东尼娅记起了自己和佩德罗来到奥雷阿姨妈家那一天的情景。那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她，只是在照片上认识她。那是逃难的那天。

孩子们哭着上了卡车。男男女女摇晃着手帕奔跑。一个唱机播放着《列戈^①的颂歌》。炸弹落在奥罗佩萨的公路上，在烽

① 拉斐尔·德·尔·列戈(1785—1823)，西班牙革命家，一八二〇年武装起义的领导者。《列戈的颂歌》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首部队进行曲，一九三一年被宣布为正式国歌。

烟弥漫中，佩德罗和她见了自己父母最后的一面。

两辆汽车一口气开到了马德里。马德里城给这姐弟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从未出过村子，他们走得最远，也只是到胡安的农庄里去吃葡萄。

她清楚地记得，那是在下午，在人们下班后，在大街上步行的时候。

穿着各种不同衣服的民兵在大街上巡逻。两辆卡车停放在城外的一个广场上。孩子们从汽车上跳下来，坐在人行道的长条边石上。她还记得广场上的树是一些开满了花朵的金合欢树。

“荠菜。”小孩子们说道，他们吃起花来。

一批男男女女在接受军训，学习使用武器的本领。还有一些人那是另一种状况，他们把空地上的土装进麻袋。然后，将麻袋运给另一批男人——他们正在那儿挖起路面石头，用路面石筑起街垒。

“孩子们，你们好，”其中有辆卡车上的一个司机对佩德罗和安东尼娅说，“过来，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叫安东尼娅，这位是我的弟弟，名叫佩德罗。”

“我从奥罗佩萨附近把他们带到这里的。”司机向站在两个孩子身边的卡宾枪队中尉说。

“你们在马德里有亲属吗？”中尉向孩子们问道。

“有一个姨妈，她叫奥雷阿。”

“孩子的父母，”司机低声说，“今天在公路上被飞机的机枪打死了。”

“明白了。”

“我们把你们带到你们的姨妈家去。”

这个中尉军官从正在训练民兵的卡宾枪队中叫了一名卡宾

枪手。说：

“你把这两个孩子带到他们的亲属家里去。”

卡宾枪手把孩子们带到了奥雷阿姨妈住的家中。在路上两个小孩没完没了地向他提问，所有的一切都使孩子们感到好奇，把他们从回忆中拉出来：高楼、街上的热闹声，小汽车，大楼里的电梯……

卡宾枪手敲了一下门，从里面传来了奥雷阿姨妈的答话声。

“谁在叫门？”

“您好，奥雷阿·洛佩斯住在这儿吗？”

“对，您有什么事？”

“我给你带来两个外甥。”

“我的外甥？”

奥雷阿姨妈一直在回忆，直到自己穿好了衣服。她穿了一件蓝色的紧身衣，系了一条白色的围巾。

“我的天哪！”她只是喊了一声，“帕科和我的妹妹在哪儿？他们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

安东尼娅和佩德罗都没有说什么，他们又哭了。

没有过很久，他们就习惯了新的生活。马德里遭到轰炸以前，姨妈把他们送到市政府的一所学校去读书，后来，只有佩德罗能继续上学，因为奥雷阿姨妈必须工作，安东尼娅留在家做饭和料理家务。奥雷阿姨妈是单身生活的，她回来睡觉很晚，很少在家里吃饭。佩德罗放了学后，就上街去和他的那帮朋友玩耍，当飞机来轰炸的时候，他和其他邻居的孩子躲进了地下室。

安东尼娅继续保持沉默，她不想打破这种沉默。现在她十八岁，在这整个人生的路途中，她的所有希望正面临着被扼杀的

威胁。然而，她起来反抗，想要过青年人的生活。她时时刻刻在揭示生活。

一天下午——只有她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她在镜子前脱光了衣服，以一种新奇之感看着自己。

六个月前，她在一家理发店找到了工作。起初，理发店里的人让她做清洁工，扫扫地。后来，他们让她当助理，学习女理发师工作。在休息时，理发店里的女友们谈论她们的爱情，谈论她们和男人之间的小问题。安东尼娅还没有什么可讲的，她只是面带苦笑地听着。有一次她心想，我也必须讲点东西才好。

一天，安东尼娅和一个女同事去看电影。离开电影院的时候，有两个小伙子跟着她们。女同事见过他们其中的一个，他们停下来说话。

“喂，你好吗？”他们中有一个人说道。

“我们陪你们一会儿是否可以，”另一个小伙子补充道。

这个人名叫路易斯，从他们停下来攀谈起，他只是一个劲儿地看安东尼娅。

“我们要回家去啦。”安东尼娅回答说。

当到了毕尔巴鄂街心花园时，她和女同事分手了。两个男朋友也分手了，各自陪伴刚才和自己成对走的姑娘。

“我可以改天来找你吗？”小伙子向安东尼娅问道。

他使她心里感到震惊。

“如果你喜欢，”她说道。

第二天在理发店里，她可有点东西讲讲了。但是在家里，情况就糟了。安东尼娅一到家门，就变了。她的笑声，那天期待和路易斯出去约会的时刻来临的热情，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姨妈的脾气变得更坏了。有时为一点小事，她们便会争执不休。佩德罗每个星期把钱交给她，姨妈尽

管脸色好一些，但仍愁眉不展。有时姨妈显得和蔼，把一叠自战争以来保存的信件念给安东尼娅听。

“这些是埃米略写给我的信，他们把我那可怜的男人在埃布罗河杀害了。”

“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安东尼娅问道。

“他有一头金发，身材匀称，风度翩翩。”

当奥雷阿叙述自己的爱情经历时，安东尼娅为她的姨妈感到十分痛苦。

有一个人，奥雷阿姨妈从未和他发生过争执，那就是佩德罗。这个小伙子过着一种非常独立的生活。他几乎从来不在家里一连待过三天。有几天他只是去睡觉。她们给他在地板上铺一条毯子，就铺在两个女人睡的床的脚边。佩德罗不脱光衣服睡觉，他只是脱去一件上衣当枕头用。

佩德罗手头时常握有相当多的钱。安东尼娅不知道自己的弟弟从哪儿挣来的钱，但又不想去问他。只知道弟弟在一家啤酒酒店的柜台边当服务员。

“把房间打扫一下，”姨妈说道。“我会去抹灰尘。今天在办公室里，他们让我拚命干活儿，我只得老老实实地干，累得我腰都痛了。”

安东尼娅开始扫房间。她用扫帚在床和墙壁的狭窄的空间扫地。她挪了一下椅子和一只收藏着盘子的箱子。然后重新打开房门，让灰尘跑出去。

女房东玛丽娅正在唱歌。她反反复复地咏唱着同一句歌词。她的嗓音浑厚、感情愉快。她在厨房里唱，歌声一直传到了院子里。

“她准是要喝酒了，”安东尼娅心里想。已有好多日子她除了这个，喝酒，不干别的。

“她要喝酒了，”奥雷阿喃喃地说道。

“这我不觉得奇怪。马蒂亚斯先生只是打她，从他失业以来，他只是把各种过错推到他妻子身上，甚至还拿她的钱去买香烟。

“她就是这样没有用。要是我，一定去揍马蒂亚斯先生一顿！转过脸反手打他一记耳光。昨天在过道上，马蒂亚斯对她推来搡去。玛丽娅——吵架时的高嗓音传入我的耳际——到蒙特去当了一点东西，他们只给了她五个杜罗。”

“马蒂亚斯先生喜欢干的事，就是在她的钱包里经常取走两个杜罗，除此之外，马蒂亚斯什么也不关心。”安东尼娅说。

门铃响了，那是佩德罗回来了。

“甘薯准备好了，我们去吃饭。”

佩德罗是个个子高高的结实小伙子，蓝色的双眼，金黄色的头发。

“有什么好吃的？”他进房间时问道。

“和往常一样，”他的姐姐答道。

他们坐在木板箱的四周。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不是眼睁睁地看着锅子，姨妈分面包汤。三个人的目光从锅子上移到了盘子上面，数着勺数。

佩德罗一面凉着汤，一面剥去甘薯的皮。然后，就把甘薯吃了。

四月一日，他们逮捕了恩里克。因为他没有穿便服，而是穿了一套共和国军队的制服，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隐藏。他是在大街上被捕的，恩里克和数百名士兵一起被带到了巴列卡斯桥的足球场上，因为那儿已被用作集中营了。

每天都有新的成批囚犯来到足球场上。虽然白天不大冷，但到了夜间，男囚犯相互紧紧地挨在一起取暖。足球场的所有台阶都成了这些男犯的床铺，他们挤得满满的。只是那些最高的台阶上，看守的士兵不允许任何人躺在那儿。因为不久以前，其中有个犯人从足球场的最高处头向下跳下去自杀了。

过了不多几天，这些囚犯被编成队调走了。恩里克也在其中。他们被锁在囚车里押到火车站，在那儿上了一列货车。火车——停靠了许多站头——开了三天。在这段时间里，车厢大部分时间是封闭的，囚犯几乎见不到白天的阳光，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躺下休息。车厢里稀薄的空气让人透不过气来，肮脏的身子，散发出一股潮气。尿在地板上流过形成了许多水坑。

在新的集中营里待着几千左右的囚犯，他们被铁丝网围着。这个用两道铁丝网围成的空间是正方形的。集中营的四个角上耸立着小岗楼，上面架有瞄准正方形集中营的机枪。

恩里克到了这个集中营不久，一位军官给他填了卡片。囚犯被分成四队，以便在四张木板桌前提供供词，坐在木板桌后面的是一些进行审问的人。

第一张桌子边坐着的是一个西班牙长枪党军官，第二张桌边坐的是义勇军军官，第三张桌边坐的是随军神父，第四张桌边是一个军队掌旗官。他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有一叠用打字机打的名单。

“你站到义勇军士兵那一队，”他们对恩里克说道。

“他像是个好人。”另一个人说道。

当轮到审问恩里克的时候，当官的朝他脸上看了一眼。

“你叫什么名字？”

“恩里克·加西亚。”

这位军官看了一下自己手上拿着的名单，然后将名单放在

桌上。

“这儿没有你的名字，”军官说道。

旁边那一队人可以听到这位军官的说话声音。

“好吧，我们来看看这是否是确实的。对你们中的任何人我都一点也不相信。有那么一天，来了一个人也这样撒了谎，结果后来发现他是一个赤色分子。最后这位大叔被判了刑，他甚至在行刑队前面喊了几声万岁。”

这个义勇军的军官点着了一支香烟，又看了一下恩里克。

“你为什么在这儿？”

“他们在马德里把我抓来的。”

“战争期间你干了些什么？”

“在中心战线我是反坦克的班长。”

“你有什么政治职务？”

“什么也没有。”

“你是属于哪个师的？”

这位军官重又看了一下名单。

“你可以走了，名单里都没有你，”他说道。

恩里克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同伴中间。在集中营里，由于囚犯的人数增加，几乎容纳不下全部囚犯。每次新来一批囚犯，他们招供以后，就被分到一个固定的地点。他们不能离开那儿，因为可能再叫他们去提供证词。

共和派的战士用斗篷裹住身体在露天过夜。他们谁也不洗脸，没有一个人有更换的衣服，过着漫长的、痛苦的日子。他们总是期待着点什么，害怕听到高声叫去棚屋里招供。对痛苦与饥饿是所有人都经受的一种折磨。对于虱子已没有人去理睬了，人们搔痒直至引起溃烂已习以为常。

在公共厕所里，粪坑里的粪便满了出来，恶臭真叫人无法忍

受。

和恩里克睡在一起的有两个囚犯，他们睡在恩里克的两旁。这两个人是在巴伦西亚公路上回家的时候被捕的。其中有一个囚犯非常年轻，只不过十七岁，另一个，岁数大一点，他躺在地上，双眼望着天空打发时光。

“喂，别想了，”比较年轻的囚犯对躺在地上那个人说，“如果你不停地想，那你准会发疯和生病的。重要的是不要泄气。”

“你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请你起来，去和同伴们说说话，如果你继续这样，你就滚开。”

集中营里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了。

“昨天从曼查的一个村里来了一批犯人。他们带来了一些消息。据说在村里，他们被捉住后，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被枪决。”

“他们会把犯罪较轻的人释放；他们是这么说的。”

黎明时分，号声把他们唤醒了。一个班长在两个士兵的帮助下，给每五个人一听沙丁鱼和一块意大利的硬面包干。

“我三天没有大便了。一个人的体内甚至连一点粪便也没有。我不能大便，我什么也拉不出。”

“如果你愿意，我给你将大便挖出来。”

“好吧！”

士兵们一批接一批地去用打开沙丁鱼罐头的扳手挖出粪便。

有好几个晚上，成群的囚犯企图逃跑。有的人获得了成功，也有的人失败了。被抓住的犯人在黎明时分被枪杀。看守的士兵让所有这些犯人排成队，将他们处死。

恩里克在集中营里待了三个月，手和腿都肿了，几乎不能站

起身来。每天都有士兵死去。疾病像扑在死人身上的麻蝇一样摧残他们。

有一天，恩里克听到有人高声叫他的名字，叫他到棚屋里去。当他走进审讯室的时候，双腿直发抖。在集中营里流传着许多说法，就是说被叫去招供的人别再想活着回来。

审讯室有一种让人恶心的闷热，尽管很热，可是他还是不停地哆嗦。

“你是不是就叫恩里克·加西亚？”

“是的。”

“那么你在这儿签字。你已经可以走了，你自由了。半个月內，你必须到马德里的连队报到。”

恩里克取过文件，便来到警卫的门房。一个勤务官又读了一下文件，然后命令给他打开铁丝网大门。

恩里克在集中营外面往后看了一下。小岗楼的士兵仍然坐在机关枪旁边。恩里克没有受到阻拦，接着，他便开始朝马德里的大路走去。

火车几乎不能通行。所有的火车站都挤满了逃兵荒的人，他们都要回自己的家去。谁也不知道列车何时发车或何时到达目的地。一连几个小时车厢没有挂上火车头，乘客从货运列车上跳下来溜达溜达，并且在火车停靠的小镇寻找点食物。

不久，当火车头重新挂上钩时，人们就急忙跳上车厢，去乘车旅行，他们能坐在哪儿就坐在那儿，坐在车厢的缓冲器上，车顶上，以及能坐人的一切地方。

恩里克坐在货运列车车厢的地板上。坐在他身旁的是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组成的一家子。车厢的另一头睡着其他人。

那女人把一个盛满小扁豆的平底锅放在一个小煤炉上加

热。

“把金属板放在炉子底下，你别让火星跳出来，”男人说道。

恩里克从前一天起一直没有吃过饭。他的双眼盯在烧热的豆上。

“不，”男人说，“我们不是木尔西亚人。战争刚开始不久，我们才去木尔西亚的。我在做辅助性服务工作。我的右手缺了三个指头，”他仿佛为自己辩解说道。

“你别说了，老兄，你就不让人睡觉，你以后给我们讲你的经历，”从车厢的尽头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已经十一点钟了，我不知道您在发什么怨言？”在照看烧小扁豆的女人这么说道。

车厢里散发出汗臭和水蒸汽的味儿。

“把门开一会儿，透透空气。”

“好的，”恩里克答道。尽管他双腿痛得很厉害，但还是起来想打开车厢的活动门。

“请等一下，”来自木尔西亚的男人说道。

火车缓慢地穿过一片不毛之地。吹来了一阵凉风，恩里克放下军上衣的两只袖筒，然后他又坐在斗篷上面。

一对夫妇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谈论着自己的私事，孩子们蹦蹦跳跳地玩着。

“小心，安塞尔莫。你们别在过道上摔倒了，”母亲说道。

“刚才我看见一只老鼠，”其中一个小孩对恩里克说。

“是一只很小的老鼠，不过，它有一条很长的尾巴，”另一个小孩说道。

“现在它在哪儿？”恩里克抓住最小的那个孩子的胳膊问道。

“它跑了。”

“在村里我们有母鸡和兔子，”大孩子说。

“还有一匹马。”

“那些马长得非常漂亮，战争初期，我有一匹马。”

“莫罗，我们的那匹马叫什么名字？”

“叫科尔多维斯。”

“我叫安东尼奥。”

“而我叫埃米林。”

“你也参加战争？”

“对。”

“一天，我们在马德里的房子里有一颗炸弹掉下来。”

这时母亲走近恩里克和孩子们。

“他们给您添麻烦了。”母亲说道。

“没什么，他们非常热情。”

“真的只有你一个人旅行吗？”

“是的，太太。”

“我丈夫说，您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吃。只有一点东西，一些小扁豆。”

“内格林大夫的药丸^①。”

“我觉得这扁豆很好吃。”

“非常感谢，我从昨天起什么也没有吃过。”

“我的天啊！从昨天起！来，来，和我们一起吃。你不知道我看见战士时心里的痛苦。这些可怜的人没有任何过错。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我有儿子的缘故，不过我经历了做母亲的许多痛苦，上帝不愿让我的儿子走同样的道路。”

“这么说你是刚从集中营出来的啰，”那位女人的丈夫说道。

“我在集中营待了三个多月，”恩里克回答说。

^① 系指小扁豆。

“他们释放你，那是很罕见的。你要明白，所有从集中营出来的人都要去强迫劳动营的。”

“我不明白，不过我不去问。除了他们放了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也许是因为被关的人很多，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可能如此，”恩里克说道。

恩里克吃进去的食物慢慢地在起作用。他渐渐感到非常安宁。两条腿也似乎不再那么厉害地找自己的麻烦了。

“四肢不能活动，肿了快一个月了。”恩里克解释说。

“这是由饥饿和不吃蔬菜引起的，”另一个男人回答说。

“可能是这样，或许是关节炎引起的。”

恩里克抽完那位男人给的一支雪茄后，在列车缓慢的隆隆声中摇摇晃晃地入睡了。他睡了半个下午才醒过来。

“我们到了哪儿了？”恩里克问道。

“到马德里了，我们运气好，一直没有停过，”一个女人回答说。这个女人曾在早晨反对过恩里克和另一个男人说话。

火车进站了，火车在停下来之前拉了两次汽笛，在月台上有一个军士长和两个士兵负责检查。

“喂，朋友，你去哪儿？”军士长问恩里克。

恩里克出示在集中营发给他的那个证件。军士长仔细地看了一下证件，把它还给了恩里克，然后对他说，可以继续往前走。

他上了大街，一时不知往哪个方向走，停下来看了一下长街上过往的有轨电车。一阵微风袭来，双膝开始颤抖。他把双手放进斗篷的口袋里，开始走上斜坡。

恩里克回到一家酒吧间门前停了下来。进入酒店之前，他透过门上的玻璃瞧了一下。酒吧间几乎空无一人。两个姑娘，一副妓女神态，她们在店门的另一侧，坐在对着柜台的几张摆成一

排的凳子上等客。恩里克把手伸进裤袋里掏出几枚小面额的硬币，放在右手掌上数了一下。

“给我一杯咖啡，”恩里克说道。

“要加牛奶吗？”柜台后面的男人问道，并急忙取出几个杯子。

“你说了什么？”恩里克吃了一惊问道。他刚才看着那两个姑娘，对服务员的话几乎没有注意。

“你是否喜欢咖啡加牛奶，或是单单喝……”

“加牛奶。”

其中一位姑娘回过头来看了一下刚来的客人。她的一只黑色的袋子放在柜台上，她从袋中取出一个香粉盒和一支唇膏。

“你的模样不大好，”她向恩里克说。

“我就是这个样。”

“如果能告诉我的话，请问您从哪儿来？”

“我从集中营来。”

妓女的目光从恩里克的脸上移到他那双长统靴的鞋尖，打量了一番。没有说一句话，开始往自己的脸上搽香粉。

恩里克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喝着咖啡。

“我该付多少钱？”恩里克问道。

“二十五分。”

他在柜台上数了一下钱。还余下二十分，他想买烟抽。

“买一支卷烟要多少钱？”

“细烟丝的烟，十分一支，”柜台上的人回答说。

“给我两支，请给我个火。”

掌柜拿香烟的同时，又看了一下恩里克从衣袋里取出来的那张弄皱的纸币。

“奥古斯托·佩雷斯、圣佩德罗第三，”恩里克搓着双手，考

虑奥古斯托的命运。他唯一的希望是能够见到奥古斯托。

“请用火，”有个妓女把火递给他。

“谢谢，”恩里克笑着回答说。

“您别担心，不管怎样，大家进展顺利。”

恩里克走出酒吧间，使劲地呼吸着从江面升起的空气，尽管他的双腿依然痛得很厉害，但开始以较快的速度赶路。

他到了阿托查街时，在一个报亭前面停住，看看报纸上的标题。有一个男人也站在那儿看报。

“奥古斯托！”恩里克喊道。

“妈的，加西亚，”对方吃了一惊，答道。

两个男人相互看了一会儿。

“你这身打扮，到这里来干吗？”

“我刚到，”恩里克笑着说，“我刚从集中营里被放出来。”

“您不知道人家要抓您，别的人是会干的。”

他们又默默地相互看了一下。

“恩里克，你好像长了好几岁。”

“可能是这样。有时短短的一段时间抵得上好多年。”

“你不知道他们会把你关进监狱。”

“好了，我现在已经出来啦。”

“他们不会捉我，我运气好。”

“奥古斯托，我很愉快。生活确实进展不顺利。”

“他们抓走了社会主义者希门尼斯，抓走了鲁伊斯。当 they 被关进监狱时，我什么也不能干了。偶尔，我去鲁伊斯家，给他妻子送些小物品。鲁伊斯住在圣里塔街。”奥古斯托的目光看着地板。

“可是希门尼斯已经不会回来了，他是一个好同伴。”

恩里克没有答话。

“你的弟弟呢？”

“我对他一无所知。仅仅知道看门人对我说的，他去巴伦西亚乘船了。”

“他会去墨西哥。”

“准没有错。”

“你有地方去吗？”

“没有，”恩里克回答说，“我没有地方安身，我去看你。我们能在此会面那真是凑巧。”

“我每天这个时候从这里经过，在这里碰见我是很容易的。”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我在一个机械车间做包装工人。”

“我为你感到高兴。”

他们俩重又沉默了一会儿，奥古斯托看了一下自己这位朋友的衣服。

“走，我们到家里去，”奥古斯托说，“在那儿我们可以更加无所顾忌地说话了。虽然家不远，可我们还是乘出租汽车去吧。你这身衣服会引起别人注意，你不知道事态是怎么发展的。”

出租汽车上了阿托查街，接着在一个街口拐弯，在一所乱七八糟的房子的门厅前停下。

“这儿就是我的家，”奥古斯托下车时说，“你从来还没有到过我的家吧？”

“没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有一个你来过一次的印象。”

他顺着楼梯直走到二楼。奥古斯托打开走廊上的一个门。他们摸索着走，直到找到电灯开关。

恩里克打量了一下房间，四周的墙壁是用石灰粉刷的。在

入口的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房间的尽头可以看到厨房的炉子和另外一间房间。

“你家不错嘛。”

“好吧，恩里克。首先必须做的是给你找一件别的衣服。你穿这身衣服不能上街去。”

奥古斯托进入另一个卧室，他在翻一个衣柜。

“上衣的胳膊肘有一点破，不过，你还可以穿。糟糕的是裤子，太旧了。”

恩里克脱下他的军衣，穿起自己朋友给他的衣服。裤子显得有点肥大。

“你可以待在家中，直到你找到了工作。你得睡在地板上，下面垫一条褥子。”

“真的，奥古斯托，我开诚布公地说这件事。你以为我不会待在你家吗？首先你必须和你的妻子商议一下。至于我，请注意，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可我知道事情会怎么进行的，我甚至连五分钱也没有。增加一张嘴吃饭，负担也就更重。”

奥古斯托在回答之前，在他朋友的背上拍了一下。

“老兄，就这么决定了。生活我们会想办法安排的。目前你就待在家里，不要再说什么了。难道你不理解我吗？在所有顺利和逆境的场合，同志终究是同志嘛。此外，你不要以为我会免费招待的，一旦你开始有了工作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你就拿出你的一部分钱来生活。”

“我认为我们应该等你夫人说了话后再来决定。”

“她不会说什么的，我的妻子跟我们一样。在这种事情上她是一位最热情的同志。她知道你的名字。我对她讲起过你好几次。”

“她在哪儿？”

“她带着孩子出去散步了。”

恩里克挪开了放在桌子旁的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天色暗了下来，阿托查大街上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你是怎么想方设法回来的？”奥古斯托问道。

“我把一只手表卖给了一个摩尔人，他给了我十杜罗。”

“内战前，你是技工，真的吗？”奥古斯托从厨房里问道。他听到了恩里克拨弄电灯开关的声音。

“是的，怎么啦？”

“那你可能在我们厂里设法找到一个工作了，那儿缺一个懂发动机的人。”

“我对发动机懂一点。在这方面我工作了六年多。”

“这是一个大厂，你别不相信。”

“你是否可以和老板说说。”

“我将去和师傅或工程师说说。不过我要提醒你，工钱给的不多。你知道，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特权。”

“对，我已猜想到了。做任何一件事情，我都不会提出要过分的报酬。我好长时间没有摸工具了。”

奥古斯托从厨房里出来开门。

“是我的妻子回来了，我听出她在叫门，”他说道。

妻子吻了一下奥古斯托，并从丈夫的肩上观察恩里克。

“这是加西亚，一位我给你讲起过的朋友。”

奥古斯托的妻子的目光慢慢地打量着恩里克，发现在地板上有一套士兵的服装。

“她就是埃伦娜，我的妻子。”

恩里克看了一下埃伦娜。这是一个个子瘦高的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她有一张十分讨人喜欢的脸庞，绿色的眼睛和大大的嘴巴，皮肤像一个裂开的番茄那样滋润。

父亲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他把孩子举到空中左右摇晃。这两个小孩与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他们长得活像你，”恩里克评论说。

“你别说这个，孩子的父亲听得入迷了，”埃伦娜笑道。

“他是谁？”其中有个孩子问父亲。

“他是恩里克，你的伯父，”奥古斯托说了句谎话。

“您好吗？”另一个小孩问道。

“恩里克伯父要在家里待几天，”奥古斯托对孩子说道，可是目光看着妻子。

埃伦娜没有说什么，重又看了一下恩里克，看到那个男人穿着她丈夫的上衣和裤子。

妻子与两个男人相互看了一会儿，然后，埃伦娜问道：

“待很长时间？”

“如果不妨碍的话，我就待几天，”恩里克插嘴说道。

“加西亚在家里一直待到找到工作。”

“奥古斯托，是你说的。”

妻子进入房间让孩子们躺下睡觉。可以听到她给他们讲故事的声音。后来，当孩子们停止了问那有关小精灵的问题时，埃伦娜便将晚餐放到了餐桌上面。

“我们在集中营里的人很多，”恩里克说。“有一半时间我们没有饭吃，他们用棍棒对待我们。一天天，一夜夜，我们过得和猪狗一样。谁也不知道一个人能忍受多久。”

“很少有人能从集中营逃出来。我是那些很少能跑出来的人中的一个。”

“古斯^①，”妻子紧握他的双手说。

① 系对奥古斯托的一种昵称。

“至于我，我不知道是由于冷呢还是由于贫血，我双腿肿胀，我还好像是穿了一双长统靴，”恩里克说道。

“至少你性命保住了，那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古斯，讲话小声一点。这些隔墙是卷烟纸做的，很难知道那些房间里是否有人在偷听，”埃伦娜走到她的丈夫跟前说道。

“昨天从工厂里带走了两个人。”

“你见到是谁吗？”

“没有看见，动作很快。不管怎样，现在要过一段倒霉的时光。”

恩里克看着他朋友和埃伦娜的脸色。房间里其中有一个小孩高声说着梦话。

“我觉得这事在此还是一个谎言，没有什么可怕的。”

“如果有人问恩里克，你就说他是你的哥哥，他来家里住一个时期。”

埃伦娜点头同意，说：

“您真的感到很累吗？我去给您铺褥子。”

“不，你别麻烦了。我一个人会铺的。”

“去吧，”奥古斯托对埃伦娜说，“你去铺吧。他一定精疲力竭了。”

他们给恩里克的褥子铺在靠近窗户的地方。可以听到房间里夫妻说话的声音。月光从窗户外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了乳白色的、方方正正的一片光斑。

“加西亚，你好吗？”奥古斯托说话的声音传到了餐厅里。

“他会感到有点冷，”妻子说道，“明天我们给他安排得好一些。”

“我很好，”恩里克答道。

之后，他困倦了，侧过身来睡觉。此时，从一个地方传来了收音机的声音。

“如果邻居有人问起他，你就说是你的哥哥，这样回答好，知道吗？”奥古斯托对他的妻子重复道。

佩德罗已不在啤酒店工作了。

另一个小伙子坐在佩德罗的身旁，他刚喝完一杯酒说。

“我们去跳舞吗？”

佩德罗透过酒吧的窗户看了下。

“我们去吗？”另一个小伙子坚持问道。

“必须等佩克，”站在酒吧门口的小伙子说。

“喂，卢卡斯。佩克不会相信我们会等他整整一个晚上的，他这个人非常自信。”

站在门口的小伙子的眼睛看着佩德罗的目光。

“我们再等一会儿，”佩德罗答道。

门边的小伙子在佩德罗讲了这句话后，走向放在柜台上的收音机。

“我想听一会儿音乐，你把这插头插上。”

掌柜就插上了收音机的插头。

“你们需要咖啡或糖时，我卖给你们，”他说道。

“怎么买法？”

“按最近的价格，咖啡要四十杜罗。”

“最近价格上涨了。”佩德罗在他的座位上说。

“我们可以打个电话给佩克。”

“干吗？我们又不知道他在哪儿。”

“他会去找多洛雷斯玩的。你要知道，他在跟她玩时，不喜

欢人家去打扰他。”

“在我看来，这两个人……你已经知道……”

“胡安，你是个笨蛋。我说，你是个笨蛋，”佩德罗插嘴说。

“好吧。不过，我们不要等他整整一个下午，因为佩克和多洛雷斯一时兴来，到床上干他们的东西去了。”

“你是个笨蛋，是个多嘴多舌的人。在佩克面前你就不敢放肆了。”

“你以后会发现的。”

卢卡斯继续站在柜台边听音乐，两个胳膊肘支在柜台的黄铜包皮上，两只手托住脑袋，腰部合着音乐节奏扭动。

不时地可以听到有轨电车的声音，那些小汽车的车灯照亮了大街。

“喂，埃米利亚诺，给我来一小杯茴芹酒。”

“要好的还是瓶装的？”掌柜的问道。

“要好的。”

“一杯酒要三个比塞塔。”

“你给我倒酒，不要对我说酒的价钱。我看你是不会给我付酒钱的。”

玻璃窗外面有一辆出租汽车停下了。

“他来了，”佩德罗高声说道。

“来了，和多洛雷斯一起来了。我不是对你们说了吗？我们在等一个拉皮条的人。”

卢卡斯在柜台边直起身子，胡安也不再在椅子中间走动了。

“喂，”刚到的人打招呼道。他是一个年轻人。“我们来瞧瞧埃米利亚诺是否愿意给这位小姐和我喝一杯。”

“喂，佩克，你喜欢闻闻我们的嘴巴吗？我们为了等你已喝

了三杯了。”

“好的，这不是坏事。我希望你们能快活一下。”

“你们别生气，迟到的过错全是我造成的，”和佩克一起刚到的那位姑娘说道。

佩克闭上眼睛，坦然地饮了一杯掌柜给他倒的杜松子酒。接着，他照了一下装饰客厅正面的酒吧间的镜子。镜子映出了这条街的另一条人行道上的一片光明的色彩。

“如果我和你睡在床上，我可以肯定你不会使我感到厌烦，肯定不会使我厌烦，”胡安对多洛雷斯重复说道。

“胡安，你不要痴心妄想打我这个主意。这我不会容忍的，甚至我父亲，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也不会容忍的。”

“别再喝牛奶了，我们谈重要的事。在这件事上我们还有什么要做的吗？”佩德罗问道。

“在这几天里没有什么事要办。因为我们商定好了，我已去看过那个家伙，他说这几天里没有什么要做。”

“什么时候可以通知你？”

“下个星期一，在莱加斯皮市场我和他有个约会。”

“信得过吗？”卢卡斯问道。

“对他有什么办法呢。我知道他还陷在一些别的事情里。”

姑娘坐在一张椅子上，用一个火柴盒里的刮刀修整指甲。

“埃米利亚诺，要杯橘子汁，”她要求道。

当她坐下时，双膝从裙子里露了出来，她没有穿长统袜子。

“佩克，我已身无分文，你给我留下五个杜罗。”

胡安卷了一支多洛雷斯的未婚夫刚给的烟。

“好啊，你总是激怒我，可是你没有钱时，总是来向我要。”

“你总是拿走比我们更多的部分。”

“由于某种缘故，我的费尔南多是个有头脑的人，他有头脑

又有朋友。你说，你想干什么？除了做准备，首先冒风险以外，他自己得到了什么呢？”

“小伙子，你一定知道，对大家来说缺少头脑，而我呢具有头脑。你一定知道，老奶奶缺了牙齿，就只能喝汤；要吃肉，必须要有牙齿。他们会给你装牙齿的。”

“你认为自己很聪明，因为你学过了。佩克，你别以为我是个傻瓜。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你就是自欺。说真的，我几乎不会读书写字，但这不是我的过错，我从来没有像你一样上过学校。我是一个无知的人，这是真的，可我不是一个供大家看的大傻瓜。”

“那么你认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上学，”多洛雷斯说。

“你，给我住嘴，”佩克说道。“你知道，我是不喜欢女人干预我的事情的。这件事这人和我能一下子就彻底解决的。好吧，胡安，如果你不同意我的意见，那你就太太平平地走吧。”

两个小伙子相互盯住对方。另外两个小伙子在等待胡安作出回答。多洛雷斯笑着，继续用火柴盒中的刮刀修指甲。

“喂，胡安，如果你走，那就请便。如果你愿意，你就去你以前的老地方，去走街串巷，拣废纸卖好了。可是在这儿我是指挥，因为我最强。你听明白没有？我知道怎么和人打交道，知道怎么应付任何事物。”

“佩克，你也拣过。因此你就别嘲笑我。”

卢卡斯和佩德罗看了一下佩克。佩克从来不说自己拣过废纸。

佩克过了很久才咬文嚼字地回答。

“我还没有忘掉，所以我在这儿。我之所以投入这个工作是因为我说过，作为一个贼活着要比不像一个男子汉，而像一堆粪土那样饿死强。我把一切都抛掉了。于是我想离开这个世界，

离开这个西班牙妓女，到进步的人类中去。现在……”

“我同意，”胡安终于说道。

“小伙子，这个比较好。如果你继续和我在一起，你就会见到钞票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如果有一天有人招募你，你就带着钱去，它给了你舒适的生活。”

“我们去‘精华’舞场，我想跳舞，”卢卡斯在柜台的收音机旁不停地扭动着身子。

“把五个杜罗拿去，加上这些，你就欠我三十只火鸡的钱。”佩克还没有平静下来，把一张钞票递给胡安。

胡安不想拿钱，还可以看到他面有愠色。

“我们不要再争吵一次，把钱拿住。钱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在西班牙我们有一百万人为钱而死，你看看钱是不是重要。”

“我们可以叫佩帕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去，”卢卡斯说道。

“她们不在店里，太晚了，”多洛雷斯说。

“在‘精华’舞场里，你们会有女人的。”

“一个叫人睡不着觉的淫荡的女人。”

多洛雷斯笑了。佩克搂住她的腰，使她紧靠着柜台。

“你不要无礼，你伤害了我。”

“刚才你没有说这个。”

“刚才是刚才。”

“你过来还是回家去？”佩克问多洛雷斯。

“我要回家去。”

“你过来……”佩克坚持说道。

“我不能去，总有一天他们会在家里发现的。今天我也迟到了。这样会使我的父亲对我起疑心的。他说我在吃饭的时候从不呆在家里。”

“你就说去看电影耽搁了。”

“如果你们喜欢，你们就去望弥撒。我受罪已经受够了，我要快活一下。你会看到，总有一天我会脱离他们，和你一起去的。”

“胡安，你瞧见了把？你现在缺的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佩克开玩笑说道。

“如果你们听任嘲弄，那我们走了，”佩德罗说道。

“该付多少钱？”佩克问道。

“全部吗？”

“是的，全部。”

“三杯茴芹酒，三杯白兰地，二杯红葡萄酒，一杯橘子汁，一杯杜松子酒。”

“这些需要多少钱？”

“你等一下，我把帐算好，”埃米利亚诺在柜台的大理石石板上潦草地写了几个数字。

“不多不少，你该付我二十七比塞塔。”

佩克将六个杜罗放在柜台上。

“找头你留下，”他说道。

他们上了弗恩卡拉尔大街。傍晚的空气是那么闷热。一辆黄色的有轨电车停在车站上，车后面的平台上候车的人排成了一条长长的队伍。

“我们乘到格兰维亚^①下车吗？”胡安问道。

“我们走着去，就在附近。再说，我排在末尾，见到一位大叔出示警察身份证或者退伍军人不候车就上车，我会恼火，”多洛雷斯答道。

有轨电车开动了。在大街的另一侧，一家门第的围墙上，有

^① 西班牙语中“格兰维亚”(Gran Via)意为“大马路”。

人写了几个大字：

西班牙的阿尔及尔与奥兰^①。

“那是德国人快要获胜的标志。德国佬在吃奶时，连蚊子也不放过。”

“你对政治感兴趣吗？”佩德罗对佩克问道。

“老兄，我不怎么感兴趣，不过，我希望德国人打败仗。我在前线只不过待了几天，可我就感到恶心。”

多洛雷斯和佩克两人非常亲热地在前面走，佩德罗和其他人走在后面。

华金的母亲去世后不久，小家庭差一点毁了。再也没有人坐在厨房的炉灶边、母亲埋头于针线篮干活的场景了，家庭显得一片冷清和凄楚。

母亲是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去世的。她像一颗燃烧时飞起的火星慢慢地熄灭了；母亲好像从来没有死去似的。她是一个安详而又温和的女人。她像晚秋悄然离去一样，带着笑容死去。安详、温柔的母亲就这样一直印在华金的记忆之中。

马蒂亚斯在妻子去世后的几个月里，几乎没在家里待过。他四十二岁，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男子汉。华金心里清楚，他的父亲跟一个女人走了。华金这小伙子——已有十五岁，不能照料父亲——到自己的那些伯伯叔叔家里去暂住一个时期。

“你的父亲缺的就是结婚。有他那种血液的人，如果不结

^① 奥兰，阿尔及利亚第二大港口城市，一五〇九年曾被西班牙占领。

婚，将会更加恶化，”有一次他的婶婶这么说道。

过了没有几天，父亲寻找华金，要他回旧居去。

“喂，华金，玛丽娅将要成为你新的母亲。我们缺少的就是一个能照料我们的女人。”

结婚几天之后，他的父亲要华金叫继母。她是一个年纪还轻的、性情愉快的女人。马蒂亚斯上夜班，不能待在家里，她待在床上。

在有些情况下，一个男人，一个小伙子会痛哭一场而不感到羞耻。这个女人看到小伙子竭力忍住他的泪水时，她便从床上起来。

“你别这样看待事物，我们能解决好两人之间的事，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华金没有说什么，他望着自己的继母。她穿了一件很短的睡衣，可以看到她的大腿根。

“亲爱的，”她说道，“我可以肯定，我们三人可以相处得很好。”

“我的父亲可能已经等了一会儿。”

“你别这样，所有的人都会失去自己的母亲的，那是生活的规律。”

她从一开始就非常关心那个小伙子。然而，家里的平静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日子。马蒂亚斯是一个很快对所有的一切感到厌烦的男人，尤其是对女人更容易感到厌烦。他总是卷入某种纠葛。玛丽娅和她丈夫发生争吵，这在大街上是人所共知的。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他们夫妻之间的吵嘴。

后来，战争结束的时候，事情闹得越发糟了。玛丽娅开始喝酒了。起初，她在家里喝酒，在没人看见时喝了酒以后，她躺在床上解闷。以后，她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在买了东西回家时，走

进伊拉里奥酒店，买两杯葡萄酒喝喝。

马蒂亚斯依旧没有找到工作，脾气暴躁。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每天上午他去电车公司的办公室，了解自己档案处理的进展情况。可是每天上午回来时都没得到任何新的消息。

“你可以去电话局找一下你那位男朋友，他可能会给我做担保人，或者借给我们一点钱。”

玛丽娅总是拒绝他的要求，而且拒绝时越来越软弱无力了。于是他终于侮辱她了。

华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几次争吵，他觉得这整个爱情史有点肮脏和令人不快。

父子之间已议论过好几次了，在夫妻最近发生的争吵中，他们重又商议了一番。

“好了，父亲，你随她去吧。”

玛丽娅缩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斜眼看着前妻儿子的面庞。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动物的奇怪光芒。她和马蒂亚斯中间隔着一张床，玛丽娅躲到了床的另一侧。

她将双臂轻轻地放在前面，好像准备挡住握在男人右手里要抽打的皮带。

“你是个酒鬼！”马蒂亚斯大声吼道。

朝汽车库的窗户正敞开着，阳光透过玻璃窗，然后穿过窗帘上的无数小孔射了进来。

“我会教训你的！臭婊子！”

华金的继母蹲伏在地上，她对马蒂亚斯以辱骂进行还击，玛丽娅对他也怀恨在心。

“你要我去看他，然后你再借此来打我。乌龟！你是个乌龟，吃屎馒头的乌龟。”

皮带呼的一下从空中落到了妻子的背上和手臂上。玛丽娅疼痛而又无可奈何，便嗥叫起来。

“……乌龟。”

马蒂亚斯对妻子又是一阵皮鞭，在妻子的右臂上出现了鲜红色的血痕。

“……吃屎馒头的乌龟。”

她依然伏在地上，尽管被打得很痛，但并不因此就不说话。

“是你要我到他那儿去要钱的。”

“你放开她吧，我对你说够了。”

华金抓住自己父亲的双臂。马蒂亚斯涨红着脸，满头大汗，两鬓的血管好像要爆炸似的，胀得如同绳子一样的粗。

“你不要插手这件事，”他大声对儿子说道。

华金还是抓住父亲的双臂，没有理睬他说的话。地板上响起了继母的控诉声。

“华金，总有一天他会杀我的。总有一天他会杀死我的。”

“你怎么敢违抗？”马蒂亚斯对他儿子问道。

“你饶了她吧。”

“小畜生，你怎么能这样对你父亲说话？”

“喂，”华金说，“我们认真地谈一下。过去的事是你没有勇气面对生活。一旦你缺少两个杜罗，你就成了落水人，不管你妻子为了解决问题向谁要钱，你都觉得无关紧要。然后，钱到了手中，你就进行侮辱。总得对事情作个估价。有许多人的处境比你更糟。你只是没有工作。你还没有到了没有吃的地步。可是别人被关在监狱里。”

“有朝一日，”马蒂亚斯低着头说，“有朝一日，无论是她还是你，会转过身来连我的一根头发都看不到。”

“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感到不满的是，”马蒂亚斯嘟哝说，“我的儿子站在她一边，这是我感到唯一的不满。我对你们讲清楚，有朝一日，你们会转过身来连我的一根头发都看不到。”

马蒂亚斯与自己的儿子说了几句话后，用力把门一关，便上街去了。

华金是一个瘦瘦的小伙子，但个子长得很高。他十四岁时在一家机械厂当学徒工。每天挣五十比塞塔，他把手中挣来的钱用来读书。当他母亲去世的时候——那是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华金才十五岁，他对一切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他看到了火光怎样将黑夜照得通亮，在大街上听子弹的呼啸声。他懂得了饥饿与惧怕。他在地区所有街垒的机枪掩蔽体中玩耍过。他第一次陪伴一个女孩子。华金考进了中等学校，并且还进了学生会。

当佛朗哥的军队进入马德里快满十七年的时候，华金又一次懂得了饥饿与惧怕，是巨大的饥饿与明显的恐惧。为了在地区一家糕点铺的炉灶前工作，他不再上学了。老板让他把作坊里刚做出来的热面团全部尝一下。尽管华金不喜欢这种职业，但还是觉得高兴。这样他就可以给家里节省一餐饭了。

一天烧炉工人对他这么说：

“你别以为老板会让你这样吃，他留神看着呢。对所有新来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在这一行中这是个习惯。热面团让你填饱肚子，然后，你就会连最贵的糕点也不想吃了。”

华金与烧炉匠之间刚不久就建立起友谊。

“胡安先生，做糕点不是我的行业。我的行业是机械工。”

有许多次，他们在一起讨论任何一个问题。胡安先生善于听，然后，对绝大部分的问题，胡安给这位小伙子说出一个通常

是击中要害的意见。

“你要看到，你和我，以及所有的劳动者组成一个阶级。只要我们没有自身的觉悟，只要我们不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对于另一个阶级是如此简单的事——，那我们将什么也做不成。我要对你重复说一遍，我们是属于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是推动世界的杠杆。在生产的时候，我们站在第一线，我们做面包，办事情，制造马达；我们制造的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可是在分配和指挥的时候，却没有人来叫我们。他们付给我们的工资，只够我们吃饭，保持气力继续干活。”

有时候，华金对胡安先生说一些自己的特别问题，讲一些自己家中发生的事情，以寻求朋友的劝告。

“劝解是难的。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一个考验人们的时代。你的父亲以及其他许多像你父亲那样的人——你不要以为是单单一个人——，他们不懂得教育，当然，判断一个人，还需要知道别的情况，知道他现在如何生活，过去如何生活……”

另一天，胡安对华金说道：

“你知道吗？他缺乏的是对事情作个估价，估价或……昨天我去车站送别一个亲属，我看见两列载满油和大米的火车车皮贴着几副标语。我走近一看，你知道上面写些什么吗？西班牙运往德国的余粮。真叫人恼火，余粮……”

“据说我们正在偿付战争债务，”华金说道。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余粮……”

华金在糕点铺待了很短一段时间。他到市郊的一家工厂里去工作。有时，他去看望胡安先生。

“小伙子，你好吗？”

“我正在学习，我想成为车间师傅。”

“这很好。有朝一日会需要懂得技术的工人的。”

然后，华金结束拜访，对他的朋友说：学习和工作占据了自己许多时间。

玛丽娅在吃，直到吃完最后一粒面包屑。厨房里很暗，但她并不感到需要灯光。

她坐在一张矮凳上休息。凳子的脚是用车床加工过的铁条制作的，座子是香蒲草编织而成的，凳子放在瓷砖餐具架下面、灭了火的炉灶旁边。她身子向前倾，双手的手掌托着脑袋，两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面。

她的目光从膝部上抬起来移向窗户，她对朝院子开的窗户几乎没有兴趣。窗外又一个夜晚降临了。月亮非常之圆，它突然出现了，仿佛是挂在附近的屋顶上。接着，她的目光转而凝视着桌子上那块蓝色的油布。油布上有几块地方的油漆已经剥落，可以看到其纬线。

她考虑着各种事情。一些几乎是乱七八糟的想法在她的脑袋中出现和反复折腾，这些想法不可能组成一种形式。她嘴中哼着一支小曲，有人正在院子的另一层楼里大声唱着这支曲子。

她重又喝了一口酒。

这个时候，歌曲正好唱完。她停了一会儿，细心听着，希望那人重新唱起来。不过，她只听到院子里嘈杂声和水池中水龙头滴水的嘀嗒声。

她觉得好一点。要是没有酒喝，她会感到很难受的。她所遭受的一切痛苦都会在身上反应出来的，使她的嗓子哽得好像被钳住了似的。

她又喝了一口。

奥雷阿走进厨房。玛丽娅本能地将一瓶酒藏到了椅子底下。

奥雷阿在开灯的时候态度生硬地问了这么一句：

“玛丽娅太太，你在暗处干吗？你吓了我一大跳。”

“我不知道，我觉得关着灯比较好。再说，我只有一个人，这样就不会浪费电了。月初电费会很快涨上去的。”

奥雷阿的到来，打扰了玛丽娅。她一来就打破了玛丽娅藏身其间的一切安静。

“每天有许多东西涨价，这种生活实在令人感到恶心，”奥雷阿评论道。

她从炉灶边走到水池边，每走一步都好像鞋要从脚上掉下来似的。

“人们已经知道事态发展的结果。我已把它记在本子上了。我们无路可走了。你知道我买两个长面包花了多少钱吗？每个面包要三个比塞塔，而面包却至多一百克重。”

奥雷阿洗着放在水池里的盆盆罐罐，尔后把它们放入清水中冲洗干净。她的双手沾满了砂石掉下的细沙。

“干吗我们不会一下子就结束，而让我一个人呆着。”玛丽娅在回忆认识马蒂亚斯的第一天时，她的思绪像一只蚱蜢跳动一样，一下子跳到了过去。

这个有轨电车驾驶员真是一表人材，他年轻，皮肤黝黑，而且脸上带有一种非常讨人喜欢的微笑。玛丽娅很高兴。她站在车子后部的平台上，肩膀靠在玻璃门上，右手伸进一只小的盛沙的器皿，把沙一点一点地从通铁轨的小孔里扔出去。她是在凝视着立着开有轨电车的那个男人的背影时无意识地这样做的。

玛丽娅从乘客中横穿过去。其中有个乘客在她穿过去的时候，瞧了她一眼，并且说了她几句。可是她没有理睬他，她抓住了电车平台上的铁杆子，关上了木门。木门没有关好，必须敲它一

下才行。马蒂亚斯回过头来，然后，缓缓地刹住了车。他们到了另一个车站。

“工作好吗？”马蒂亚斯问道。

“我认为越来越不妙。”

“你知道吗？你穿这件女上衣非常合身。”

她当然知道。这是件漂亮的红色女上衣，穿在身上非常合身。

“你叫什么名字？”电车驾驶员问道。

“玛丽娅。”

“有一次我认识一个姑娘，她也叫玛丽娅。”

“是吗？”她反问说，“那个姑娘长得怎么样？”

“她不像你，她没有这么漂亮的上衣。”

玛丽娅笑了。她知道自己有两个诱人的大乳房。乳房犹如罗马的梨子那样挺立和坚实，在紧紧的上衣内抖动了一会儿。

一个乘客响了一下铃。马蒂亚斯开动了车子。车子穿过了西贝莱斯广场。

喷水池由装满泥土的麻袋保护着，飞机或加拉维塔斯的大炮经常对马德里狂轰滥炸。

“好吧，我去收刚上车的人的车钱。看来他们都急于付钱，”马蒂亚斯说道。

奥雷阿的声音又一次打断了玛丽娅的回忆。她用一块有蓝色条纹的白布来擦干盆盆罐罐。

“当时，我对我的外甥女讲：安东尼娅，你会是一个好姑娘；不过，如果我看到你和男人在一起，我就打断你的脊梁骨。你必须干的事情是工作，别再犯傻。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

邻居的钟指针指着晚上八点钟。玛丽娅看到挂在餐厅里的

钟。那是一只挂在墙上的、带有金黄色长钟摆的钟。

“八点钟，”奥雷阿数了一下敲钟的次数。“玛丽娅太太，你别让我起来。从中午起我这个部位就痛得叫我发疯，那全是堂娜普鲁登西娅这个巫婆造成的。我对你说，她是一个爱管闲事的老太婆。谁让她拿我的口粮？那些鹰嘴豆把我害苦了，我无法用牙齿咬碎将它吞下去。不能每天吃鹰嘴豆。每公斤鹰嘴豆我要付三个杜罗。倘若堂娜普鲁登西娅不是一个老太婆，我会朝她的脸狠狠地打上一拳。”

玛丽娅点头同意。当然那个会喝酒的老太婆是个存心不良的人，可是奥雷阿不该在背后谈论她。再说，对于奥雷阿来说在这种时刻，她什么都不关心。她只是希望进行转租住房，给她留下一个安静的环境。

奥雷阿为了让腿能够伸直，挪动了一下双腿。用拇指在双腿上划了一个十字，因为双腿有些麻木。

“我马上就走，”奥雷阿说，“如果我的外甥女来，叫她别上街去。我到赫苏斯的店里去拿点食油和配给的土豆。你看报了吗？报上说，每人可以得十六分之一升油，好像有了这点儿油，可以让一个家庭维持十多天……”

玛丽娅又剩下独自一人了。她重新喝起了酒。伊拉里奥的酒如果不掺那么多水，就不可能是劣酒。这种酒每升要四个比塞塔。这个伊拉里奥是个卑鄙的家伙，是个最无耻的好色的老光棍，对女人，不管是姑娘还是老太婆，他总要讲一二句话。

“你对女人能抱什么希望呢？这些女人极爱打扮，嘴唇上涂了很多唇膏，走起路来像发情的母马一样歪歪扭扭。对男人又必须抱什么希望呢？和女人们在一起会使我们失去理智的，更何况年轻的姑娘或老太太又都有自己的男人。当然，如果是小姑

娘……”酒店老板是这样认为的。

伊拉里奥是一个瘦弱的小矮个子，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上衣很短，几乎连他的裤子臀部的补丁也没有遮住。真该看看伊拉里奥在用眼睛迷恋地盯着照明公司职工的女儿时的模样。他流着汗，仿佛自己长高了两拃。姑娘个子高高的，胖胖的。酒店老板用眼神与她说话。姑娘毫不客气地接受了爱情，离开酒店的时候，臀部扭动得比往常还要厉害。

姑娘的臀部受到了伊拉里奥老顾客们的赞颂。

照明公司职工的女儿有自己的怪想法。伊拉里奥把她抱起对她说，见到你“我不知怎么”时，她这样回答他：

“不知怎么？如果这能养活你……基督教徒就可以发现蛆虫要吃的东西。”

玛丽娅又喝酒了。

她感到嘴巴干燥，仿佛嘴里没有唾液。她还感到很热。赤裸的双臂上的血管有点轻微的肿胀。血液在所有那些在光滑的皮肤下显露出来的蓝色小管道里，仿佛流得慢多了，或者凝住了似的。

她开始出汗了。

她想起了自己开始当电车售票员后与马蒂亚斯一起出去的日子。

那天是星期六，他们去领日工资。他们靠在小窗户前面，等了许久。他们和同事们开着玩笑，同事们问她有关巴黎的事情。

“我在法国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有个姐姐在波尔多。”

“人们议论法国女人的事是真的吗？”

“这个嘛，我认为到处都一样。女人，我觉得在各地都一样。不过，那儿更有自由。”

当同事们问起在法国有关爱情方面的事，玛丽娅总是挺高兴的。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说，一个生活在巴黎的女人，一个单身女人，仿佛是那些不可想象的愉快爱情的一个许诺，很容易为对方所得到。

“好了，玛丽娅，在出口处我们等你去喝几杯酒。”

“好的，”她回答道，“只要你们不使我感到讨厌，我会去的。”

当他们上街去的时候，马蒂亚斯挨着玛丽娅走着。下午天色灰蒙蒙的，有几片云挂在天空。早晨天下过雨，落下来的雨水把酒吧间门上的油漆也冲刷掉了。

街道上有些地方的石块被人们挖去了。工人们用马德里所有街道的方石在战壕阵地附近筑起了一座座街垒。

“来，喝上一巡习惯的酒。”

马蒂亚斯是个慷慨大方的人。不管怎样，总是他上前掏钱。他要了几份吃的东西。

“只有一些刺山柑了。”

“如果没有别的东西……”

“没有。”

在酒吧间的一面墙上，有一幅用图钉钉住的战争宣传广告。广告上画了一只很大的耳朵，写着一句警告：

你说话要很小心，

第五纵队^①在偷听。

玛丽娅一直想着那整句话。她不知道为什么，不过，那个时候的回忆在自己的脑海里明显地出现。甚至连最后一个具体细

^① 西班牙内战(1936—1939)期间在共和国后方活动的叛徒、间谍和破坏分子等反革命分子的总称。

节，都不可怀疑地历历在目。

他们在柜台边嬉闹着。马蒂亚斯能说会道，他像天使一样唱起了霍塔^①。在那片歌声、谈话声、掌声及争论声的大杂烩中，他握住玛丽娅的一只手，甜蜜而亲热地抱住了她的身子。

自从加拉维塔斯被围以来，敌人用炮轰，人们可以听到爆炸声。那是一次有步骤的轰炸，敌人总是同时进行轰炸的。

“敌人已经开始轰炸。你们看‘祖父’在对他们还击。”

“祖父”就是在整个马德里出名的那门大炮。人们之所以这样来称呼，是因为这门大炮有着与别的大炮不同的特别响声。

“‘祖父’在还击了。”

“马蒂亚斯，那么你的孩子呢？”

他不久前成了鳏夫。他的妻子给他留下了一个头发有点鬈的黑皮男孩。玛丽娅在照片上认出了这个小孩。

“他正在读书。他在读中学二年级。”

“他将成为一个男子汉。”

“他长得比我还高。”

马蒂亚斯和罗德里格斯说话。罗德里格斯是一个老驾驶员，按照他同事的说法，“肚子挺得比怀孕八个月的妇女的肚子还要大”。玛丽娅想起了他看手表的那种特别的方式。他皱起眉头，极其小心地从西装背心的口袋里取出罗斯科普。他看了一阵子表后，把它放进口袋。他时常看手表。玛丽娅认为，尽管这样看手表，罗德里格斯还是不知道钟点。

“你的手表呢，罗德里格斯？”

“可以肯定在巴伦西亚。现在我不戴手表了。”

罗德里格斯用右手的拇指指着在城市上空落下的大暴雨，

① 西班牙的一种民间歌谣。

接着，他继续说道。

“大部分人去瓜达拉哈拉了。昨天我收到了一个人的来信。在瓜达拉哈拉，他们狠狠地打了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们。我相信有些人已跑到萨拉戈萨去了。”

玛丽娅继续回忆那段经历。窗户已变成了一个黑的窟窿，从那儿重新传来了院子里许多乱七八糟的声音。

水池的水龙头仍然在滴水。“华金你是否能一下子把它修好。我已经对你说过十遍了。”

堂娜普鲁登西娅在她的房间内折腾着。底楼的那些小孩子继续在哭泣。母亲在责骂他们，因为孩子们不爱吃面粉做的菜泥汤。

“面糊，草香豌豆面。这种草香豌豆面有毒素。吃了会使一个人的手脚发肿。可是一个人能吃什么呢？那种草香豌豆面是食物中最便宜的东西。牛奶面臭面，还有什么生活比这更糟的！大家都为了吃奔走，活命的牛奶面，活命的臭面，”玛丽娅听着那位母亲的怒骂，心里这样想。

玛丽娅又把酒瓶盖打开了，酒瓶里只有半瓶酒了，而且酒有点发酸。

对面厨房里的一盏电灯亮了。“佩特拉太太是多么瘦，多么丑啊！”玛丽娅心想，“现在他们这些人生活可好了。她的丈夫是个军士长，有后勤部队提供给养。她在热咖啡。是好的咖啡，不是店里那种麦芽酒，”她自言自语道。她几乎是敌视那个邻居，因为她知道他们吃得好。

玛丽娅注意凝视那个妇女如何用过滤袋过滤咖啡。她在暗处记起了过滤袋原是一只山羊的乳房。玛丽娅想想也觉得好笑。女邻居用手指捏紧过滤袋，以便更好地过滤咖啡，她把过滤袋的

顶端捏成一个奶头。她从一个大的口袋里取出糖块。玛丽娅像入了迷一样，看着那位女人的所有行动。玛丽娅想，那个星期他们没有给定量食糖。她必须到黑市去买糖。玛丽娅又狠狠地看了一眼。

开门的响声分散了她的注意力。玛丽娅听出了那是华金和安东尼娅的脚步声。他们在谈论什么事，接着笑了起来。玛丽娅开亮了厨房里的灯，并且假装在餐具架上的盆盆罐罐中间东翻翻西翻翻。

“安东尼娅，”玛丽娅对姑娘说，“你姨妈说过，要你们等她，她马上会回来的。她去店里买配给粮了。”

“谢谢，”姑娘回答道。

华金再次出去了。他只是去拿几本书。不过，他在出门之前，放水冲了一下身体。

玛丽娅重又喝酒了。汗水一直从她的背上流下来。她甚至连眼睛里都感到发热。但是她还没有喝醉。她又听到沿街大门的声音。接着，听到奥雷阿和她的外甥女在谈话。

“正如你所见到的那样，我没让你外甥女出去。”玛丽娅心想。

“你是九点半到家，”奥雷阿说道。

“姨妈，如果现在是九点钟。那么你只给了我半个小时。”

那天晚上，也是九点钟。马蒂亚斯与同事们待了一会儿之后，和玛丽娅挽着胳膊走了。他们走进了区里的一家电影院，看连场电影。

电影院放了两部片子。当每部影片放完的时候，人们立起来，高举拳头或者把双手相接放过头顶表示祝贺放映成功。现在，玛丽娅想，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也想祝贺，但松开了手臂。

马蒂亚斯在放电影过程中，对玛丽娅非常亲热，无数次地爱抚她，向她献殷勤。

“玛丽娅，”马蒂亚斯爱慕地说，“我相信我是个任何女人都不能使我丧失理智的人，但是你使我入迷了。你使我变成个疯子，我只好承认。为什么你不喜欢我一会儿呢？你和我在一起一定会很好的，即使仅仅是一次……”

电影放映结束之前，他们走出了电影院。夜晚在天空停住了。尽管是晚上，人们依然在大街上来来往往。有几个探照灯在察看天空，它们射出的光束交叉在一起。防空的白色探照灯光布满了天空，周围很快寂静无声，只是在大学城的战场附近还可以听到嘈杂的声音。

“在诊所里人们在吵骂，”马蒂亚斯说道。

他们默默地走着，过了几分钟之后，马蒂亚斯又坚决认为：

“家里没有什么人；小孩在几个叔叔的家里。”

玛丽娅看了他一眼。马蒂亚斯情激如焚，抚摩着她。

“我没有找到门廊的锁。”

“你让我来，”她说道。

玛丽娅，她坐在椅子上，微笑着回忆那个战争之夜。她又一次举起酒瓶，那是第八次喝酒了。

仅仅留下一口酒了。

她的丈夫、房子、客人，一切都远远离去了直至遥远的天际。

她开始低声地唱歌。

她的脑袋里觉得有点什么东西，压在她的两边的太阳穴上。

她站起时，身子摇晃，于是又坐下了。

她喝完了最后一口酒。

酒瓶空了，落到了地上，滚到了桌子底下藏了起来。院子里

邻居的窗户已亮出了灯光，她感到高兴，感到非常高兴。然后，她又悲哀起来。

在另一间房间——从街上进来，过道上的第一间——里，居住着一个卖糖果的老太婆。

她总是穿着一件溅满污渍的黑色工作服，头上蒙了一块头巾，工作服外面系一条围裙。

这个老太婆几乎从来没有过笑容。要听她讲一句客气话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她总是一本正经，坐在摊子后面卖糖果的座位上搔着双手。

她从早上十点一直要工作到黄昏才结束。早晨起来的时候，她把配给面包吃掉半个，面包加了一点煮过的麦芽。在吃午饭的时候，她不回家，吃剩下的半个面包，加一块榅桲。

她这个摊子就设在克维多地铁的出口处。她除了卖好吃的糖果以外，还卖面包和香烟。面包和香烟是市政府的警卫提供给她的，警卫只负责收取流动女商贩的税金。

每天晚上，这个老太婆一回到家中，便总是坐在餐室角落里的那张椅子上，瞧着这一家人吃晚饭。嘴里不说一句话，听听收音机便心满意足了。

华金每当那个女人在场，他就神经紧张，因为她总是一声不吭，看着他们。

“还有一点火，你可以用嘛，”玛丽娅说道。

堂娜普鲁登西娅于是从椅子上起来，到厨房里去热一碗麦芽，做一个法国式的煎蛋饼。

吃过晚饭，她回到餐室听收音机，一直要听到躺下睡觉为止。

有几个晚上，在洗刷盆盆罐罐的时候，家里三个女人也聊聊天。

“至少您在货摊上挣的钱够维持生活了，”玛丽娅对堂娜普鲁登西娅说道。

“您马上就有积蓄了，”奥雷阿插话说。

“我？有积蓄？”女商贩问道。

“你别说没有积蓄，我不止一次见你去当铺。我可以肯定，你的存折已填写得满满的了，”奥雷阿评论说。

“我只挣了你看到的那点儿钱。我在当铺里的钱是要用来给我自己买一块墓地，给我的亡夫安息以及为我本人准备一个永久的墓穴。”

“有用的东西才是永久的，”奥雷阿为了惹恼卖糖果的老太婆争辩说，“您不点灯，也不是偶然的。您用的煤炭还不及底比斯^①人中的一个瞎子用的多。”

“你们说话总是带着嘲弄，”玛丽娅插嘴说。

“奥雷阿，非常饶舌，”老太婆嘟嘟哝哝说道。

“你这位老太太比一个喜欢收藏破烂东西的人还要吝啬，”奥雷阿生气地说道。

“您要做的事情是过安逸的生活，您不喜欢看电影，不需要穿衣服，不要给任何人留下东西。您可以过美好的生活，吃得像一位贵夫人那样好。”玛丽娅劝两个转租屋子住的女人停止争吵。

“请留下圣母埋在地下的珍宝吧。如果您不想花钱，那您一定会倒大霉的。钱每天在贬值。事情是明摆着的。”奥雷阿说，“昨天每公斤土豆只要花四个比塞塔，今天就要贵两个雷阿尔，

① 古希腊城名。

明天又谁知道要多少钱呢？一年之内会变得像钻石一样贵了。”

“如果您不花钱，以后那些神父或政府会把钱拿走的。”

有几个晚上，当大家都心情愉快的时候，堂娜普鲁登西娅坐在厨房里的一张椅子上，讲自己过舒适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一些经历。

两位妇女津津有味地听着堂娜普鲁登西娅讲她的生活。

看来，这个卖糖果的女人在她美好的岁月中，有过一个时期过着舒适的生活。

“我的丈夫，”她说，“他叫堂佩德罗，是个美男子，个子长得比华金高，整个体形都很美。我们在圣塞瓦斯提安待了一年。”

“这么说，您以前是个富人啰？”

“是啊！根据可以称作富人的标准，我是可以称为富人。不过，我们之所以生活得好，那全托上帝赐福。我的丈夫堂佩德罗眼光准，看中堂娜普鲁登西娅，她有一片朝街开的钟表店，备有钟表修理的部件，很赚钱。”

“那他给你留下了好多的钱？”

“一本五千小杜罗的当铺存折。”

“五千小杜罗……”奥雷阿嘘了一下。

“那是一种在那个年代使用的钱。”

“可是现在我身无分文，”堂娜普鲁登西娅说道。

“您别担心，我不会向您要的，”奥雷阿说道。

“如果我像您想象的那么有钱，我就会过另一种生活，我可以肯定。我会吃好东西。”

堂娜普鲁登西娅在说到自己的经历时，非常伤感。她走进自己的房间，在房间的一只大箱子里翻了一阵之后，取出了一枚用德国金子制的上面镶嵌珍珠母的勋章和一些很长的耳环，她说是钻石的。她总是吻着那枚勋章，接着，她又说：

“当时的时代啊！那个时代啊！吃得多好呀！一块鸡胸脯肉花两个比塞塔，橄榄油只要五雷阿尔。”

“你没有亲戚？”玛丽娅问道。

“我有两个外甥，他们住在巴拉哈斯，有时来看看我，他们要我给他们一些钱。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相信我有金子和美酒。”

“那你卖糖果够维持生活吗？”奥雷阿问道。

“最容易挣钱的是卖香烟和面包。一包理想牌香烟我可以赚三比塞塔，一根长条面包卖一比塞塔，有几天我能卖掉四包香烟，六根长条面包。”

“您知道这是一种做生意的买卖吗？”奥雷阿深表佩服地问道。

有几次，也是在洗刷盆盆罐罐的时候，这几个妇女开始争吵，吵到最后总是提高嗓门说话。奥雷阿说堂娜普鲁登西娅不好，编造一些使另一个转租住房的人发怒的事情，用那个女人说过或者已经不再说的话来使玛丽娅头脑发烫，玛丽娅插嘴后，与这个或者那个女人争吵。

“玛丽娅太太，您知道吗？奥雷阿说，您和自己的丈夫吵嘴，你丈夫一旦闻到女人裤子的气味就忘了打架。”

然后，堂娜普鲁登西娅走进自己的房间，安排好第二天售货摊的货物，算好她的帐。接着，她就躺到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

华金从机器上抬起目光，向组成厂房的金属架的锯齿看了一眼。阳光透过绿色玻璃，在厂房地面上留下许多方块形的光斑。

有一会儿，他就听到了工作时发出的闹声。可以听到工具的撞击声，马达运转时发出的深沉而又断然有力的声音；还可以听到监工的命令声，工人的歌声和小车的走动声。

华金在工厂的大厂房工作。这个厂有五十台各种大小的车床，二十台铣床，十台自动刨床，十台机械锯床，还有钻床，绕线机，发动机测试台。有木工、电工、装配工、制图员、一个化学家，两个工程师和五个技术员。工厂设有管理部，经理办公室。有两辆带有气体发生器的莱兰卡车，一辆福特的小型运货车和四个驾驶员。五百个工人中，有男人、妇女和小孩。

“好啦，看看是否可以别唱了。唱歌是被禁止的，”工头对妇女们大声说。“别给我放屁了，”他对学徒工说道。

妇女们停止了唱歌，工头在她们中间来回走动，查看她们的工作。

“他们还不准唱歌。如果我们整天都理睬他们，那么我们就等于为四个臭杜罗而送命了，”华金身旁的那个车工说道。

这个人没有说话，他把双手拿着的方形铁条放进车床的万用盘。他把工具放在旋转塔上，经过无数次运转，把铁条弄短了。

铁屑像起塞钻那样扭转着，随着机床轴的运转节奏声而旋转。

“恩里克，把尺给我。”

“做人不可以偷懒，”恩里克说着，将尺子递给了华金，“人用计件工作来挣日工资的，在一天工作时间内他不想知道什么。”

“你还住在奥古斯托家吗？”华金问自己的同事。

“我还住在那儿，不过，我继续住下去实在感到难为情。奥古斯托是个好同事。他把我带到这儿，可是像我们这么多人住一个房子实在是非常挤的。”

两个工人不说话了，华金又用尺量了一下加工的部件。

“还差五厘米，”华金说道。

工头从他的桌子边喊道：

“塞莱斯蒂诺，塞莱斯蒂诺，你的妻子来电话找你。”

塞莱斯蒂诺和安东尼奥在华金的车床附近锯几块木板。塞莱斯蒂诺是木匠，安东尼奥是他的帮手。塞莱斯蒂诺是一个好像有三十岁模样的男子，他皮肤黝黑，身体有点虚弱。他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三个孩子。他马上要有第四个孩子了。塞莱斯蒂诺从监狱里出来还没有几个月。

“他们指控我帮助叛乱，”恩里克说道。

恩里克是个非常健谈的人，那些学徒工都尊敬他，他吃饭的时候和大家聚在一起，给他们讲讲战争时期的经历。

“我是当骑兵的，就像俄国革命中的布琼尼^①的骑兵一样。”

塞莱斯蒂诺和安东尼奥是表兄弟。安东尼奥总是反复说服他的表兄，带他去给工人们作天主教教会的宣传。

“你，年轻人，你好像在撒谎，你是我的表弟。你是地地道道的老实人。”塞莱斯蒂诺在他表弟给自己看一张天主教徒们发的传单时这样说道。

“这儿可以自由地议论一切。一旦你来了，你就会知道的，”安东尼奥回答说。

“这块骨头让给别的狗去啃吧。我需要挣更多的日工资，不要念这些通告。”

塞莱斯蒂诺听完了电话之后，走向恩里克的车床。

“你见到了我表弟带来的传单了吗？表弟坚持去参加我所不

^① 布琼尼(1883—1973)，苏联元帅。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任骑兵第一军团司令。

知的什么神父和工人的会议。”

“好一个结合，”华金笑道。

“可能很有趣，”恩里克说道。

“是我妻子打来的电话。她说孩子已经好点儿了，”塞莱斯蒂诺说道。

恩里克取出他的烟盒，递香烟给自己的同事们。三个男人慢慢地卷着香烟，自得其乐。

“小心，”华金说，“师傅来了。”

“我知道，你们让他到处乱走，”塞莱斯蒂诺说道。

这位师傅在机器中间慢慢地走动。

“好啊，塞莱斯蒂诺，你讲了半个多小时话。看看你是否一下子就开始工作。”

“你做任何工作都在吸烟。你把这卷烟扔掉，”木匠师傅说道。

塞莱斯蒂诺继续去锯木板了。

“事情进展得如何？”华金对恩里克问道。

“不妙，昨晚听英国广播电台说，德国人已经到了巴黎附近。”

“有人对我说，战争期间法国人对我们很不好。在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拿走了他们喜欢的一切战争物资的同时，法国人把我们置于困境。”

“华金，这是真的。现在法国人正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法国工人没有过错。世界上的工人都像我们一样，为同样的事业而欢乐和高兴，为同样的事业而奋斗。我知道至少有四五个法国人和德国人在乌塞拉战斗中丢了命。意大利人也一样丧命。”

恩里克抽了一口雪茄烟，接着，换了一个工具。

“当人们知道了事物的原因时就不会再有战争了。工人们不需要战争，资本家需要。当我们有的人和他们一样时，我们就既没有和平，也没有欢乐。资本家想从我们这里抢走真理。我有一次听说有个人明白了这些事情，他说：没有任何人有靠别人工作而生活的权利。他说必须为争取工作而斗争，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

“你别那样高声说话，有人会偷听。工头是一个告密者，他很快会去向老板汇报的，”华金看了一下四周后这么说道。

“你说得有理，不过有时我无法控制自己。我的血直往头上冒，我就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

华金和佩雷斯先生说话。因为佩雷斯过来向华金要一把英国人制的扳手。佩雷斯这个人，不管是不是时候，只要别人愿意听，他都会给那人讲自己的身世：

“我没有干什么。我以前是国民教师，在战争的三年里，我还是继续教书，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我从教师中开除了。华金，我没有和任何人过不去。那是千真万确的。”

这个男人爱讲自己身世的怪癖使华金觉得有趣。

“你没有必要在我面前辩解。”

“我已收到我村里那位神父的信；信中说他给我作担保，让我别担心，说他有的是有权势的朋友。”

“他们也许因为你教了不应该教的东西而惩罚你，”华金说道。

“我可以向你起誓，我是根据教学大纲教的。我是根据官方的教学大纲来教读和写的。”

“好了，他们会为你办理的。神父的手已伸向各个方面。”

“我妻子是这么说的，不过，我还不相信这所有的一切。如果

你能知道我多么想到我的学校去那就好了！那是一所共和派建造的漂亮学校。学校有石灰粉刷的白色墙壁，一个供孩子们休息时玩的花园。这个学校叫人看看也喜欢。我每天早晨起床很早，喝一点咖啡和油煎面包，然后下楼直到上午十二点下课为止。接着，中午我睡一会儿午觉，继续给孩子们上课，直到下午五点结束。”

华金耐心地听着他讲自己的经历。眼前这个男人使他感到痛苦。这位教师也沉默无语了。他身体瘦削，弓着背，双臂从身上耷拉下来。华金看着那个人的双眼，那双眼睛仿佛是钉在那张干瘪的面庞上面似的。

“现在我在锻工车间当小工，”那个人抱怨说道。

老教师穿着工作服，袖口用扣子扣在手腕上面，脚上穿着一双麻底的麻鞋。“他要过比有才干的上帝还要饥饿的生活，”华金自言自语道。

“他的工作服好像太大了一点。”有时他们一起到工厂的围墙边去吃饭。老师傅带着一只饭盒，里面装有无花果干、面包和番茄。他吃了面包和无花果后，把番茄切成两半，在上面撒点盐，便慢慢地吃了起来，而且每咬一口都嚼得津津有味。

“我对你说，你看见我再次在学校里的时候，看来我会像撒谎似的，我肯定会不知怎么办的。”

有的时候，华金记得，在工人议论或者为了工作中的某个原因而提出抗议时，教师是不会加以干涉的。他用小眼睛看看四周，让工人立即从工厂的任何角落散去。

“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在理，”有一次教师这样评论道，“不过，我不能参与。这不是说我愿意落后；这一点你们要明白。那是因为我不同意由于讲话让学校把我解雇。他们给我作担保，可能还会到工厂来了解情况。何况我不像你们有技术，我只会教书。

如果他们解雇我，我往哪儿去找工作呢？我每天挣九个本特^①，尽管这点钱派不了什么用处，但这总比饿死要好。”

工厂里的人非常尊重这位老教师。老教师有时以为自己在课堂里，与学徒们聚在一起，给他们讲解西班牙是怎样的国家。

当钟敲下午六点钟时，人们去钟那儿取下班卡。厂房里只留下装配工、做计件工作的妇女和学徒。

机器的声音减少了。太阳的光线几乎穿不过金属架上的玻璃。

“这个扳手怎么样？”仓库负责人对华金说道。

“没什么，这扳手松了。”

“松的是你，你用工具应该再小心点。”

“不是这样，”恩里克及时地递过自己的扳手，“这个扳手已很旧了。”

“扳手既不旧，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是因为华金笨手笨脚的缘故。”

“好吧，别客气了。要是说笨手笨脚，你还胜过我呢，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你可能还在犁地呢。”

华金不喜欢这仓库管理员。仓库管理员仿佛有一种报复心，因为他从头到尾检查着华金交给的所有工具，总是找出其某种毛病来。每次在争吵时，华金总是只有一个想法，希望自己长得更高、更结实，或者至少有一只好的右手：可以朝对方下巴打一拳把他击倒。然而，仓库管理员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巴斯克巨人，华金要打他耳光只不过是一个做了很久的美梦。

华金在喷水池边正洗着脸、梳着头发。喷水池在卸货的院

^① 西班牙的一种硬币。

子旁边。他在工作服外面套上外衣，取走了自己的书，上街去了，这时，当钢板钻眼工的姑娘们也上街去了。

她们在散发着下午热气的空气中慢慢地走着。姑娘们面带笑容在街上戏闹着，她们高兴地在漫长的一个工作日以后看到了太阳，高兴地呼吸着户外的空气。

她们谈论着自己的事情，谈论着自己的爱情。谈论星期天她们将和街区的小伙子去跳舞。

“你看到过我和女负责人在说话吗？”她们中有个人讲道。

“她是一个存心不良的人，”另一个女人回答说。

“我说那些话是因为她现在沾染上的一个怪癖。一有人上厕所去小便，这个心地很坏的人就给你站在门前数几分钟。我对她讲，您什么女友也没有。如果我们去厕所休息，那是由于您在工作中一直压迫我们。”

“你说，”其中有个姑娘对另一个姑娘说道。

“我说，你抛弃了胡利安吗？”

“这我还不知道，”姑娘回答说，“我跟他闹翻了。”

“为什么？”

“星期天他就让我生气，他花很多钱和朋友们去踢足球，到下午七点钟才见到他的人影子。”

在靠近工厂的贫民区，人们趁夕阳还没下山，聚在一起晒太阳。在垃圾堆上，孩子们玩耍着，打着滚。从行驶有轨电车的街再过去一点，是空旷的沙地，那儿有一只狗在吠叫。

“我们走吗？”有个姑娘问道。

“去哪儿？”另一个姑娘反问说。

“我们去哪儿？去马德里。”

“我不去，我要回家去。”

“瞧你有多乖，你总是偎依在你母亲的裙边。”

“我在家里有事要做。”

“你真叫人扫兴，是个乏味的人。”

华金和一个姑娘成对地走了。她叫阿尼塔。

“你今年有多大了？”他问她。

“十七岁。”

姑娘对华金卖弄风情，她画着眼圈和搽着口红。她厚着脸皮笑着。

“我使你有好感吗？”

华金看了一下自己的女友，看了一下姑娘那漂亮的脸庞，这张脸可以使人忘掉她是个瘸子。

“我喜欢像你这样的人。”

“阿尼塔，你和华金在一起要注意。华金有一张不知羞耻的脸，”有一个女友笑着说道。

“恐怕你眼红了吧。所以，你就乱说。”

“可是，你确实必须对胡利安小心点。你们在一起已有好长时间了。你要知道，一个人有了信心，就什么都愿意尝试，”阿尼塔解释说。

阿尼塔抬起头看着太阳。好像想引起华金对她的注意。

“你身边总是带着书本。你可以借一本给我。星期天我过得非常厌烦。”

“你不去任何的地方吗？”

“我到咖啡馆去听音乐。女朋友们去跳《昌盛》舞。我呢，你是知道的，”她说，看了自己的双腿，“我不会跳舞。”

“我将给你一本小说看看。”

“你要给我带本好看的书来。我喜欢看一些结尾是美满的小说书。”

他们来到了电车的站头等车。阿尼塔就住在附近，她顺着

右边的路，走向郊外自己的小屋。

马蒂亚斯在一号月台上徘徊着。那儿有一列火车要进站。从拦住铁路线修车坑的保险杠附近挂着一面金属的小信号旗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他又看了一下车站上的钟，那是晚上九点钟。

“从毕尔巴鄂来的邮车要误点多少时间？”他问道。

“一小时十分钟，”一个在黑板上记录着火车晚到时刻的人回答说。

“也许会早一点，”那个铁路上的职工又说道。

“指望火车准时到达，这是连傻瓜也不会做出来的事。我也是个笨蛋。因为我应该想到先打个电话问问嘛，”一个女人在看了铁路职工在黑板上写下的时刻表之后，高声地说道。

马蒂亚斯又点了一支香烟，重新踱起步来。在他的上衣口袋里装有一份电报。那电报是他在吃饭的时候收到的。电报非常简短，说：“我将乘毕尔巴鄂邮车到达。卢西奥。”

马蒂亚斯心想已有好多年没有见到自己的表兄了。“自一九三五年，他结婚旅行后，没有见过，”他自言自语道。

火车在第三条铁路轨道上吁气，汽缸内的活塞最后一次推了一下连杆。列车的制动鼓冒出浓密的、白得像面粉团一样的蒸汽。

在火车站棚屋再过去一点的地方，可以看到卸货的站台上的灯光。

“我们已熟悉马德里了，”一个刚下火车的士兵说道。

“好事完结。在圣诞节以前我们也看不到热闹了，”另外一个士兵答道。他肩上扛着木箱，拖着皮靴走着。

火车上还下来了一群农民，他们肩上背着包裹，镰刀插在腰带里。

“你听说吗？”他们问马蒂亚斯，“火车为什么要开往巴伦西亚？”

马蒂亚斯又看着车站的时钟，他回答农民时眼睛没有朝下看。

“在中午的时候，你们将要去另一个车站。”

“火车停在那儿？”

马蒂亚斯的目光从钟上挪到了其中一个收割者的脸上。然后打量到他的灯芯绒裤子、胶底凉鞋上。

“在阿托查，可以乘地铁。”

收割者带来了农村的气息。马蒂亚斯看到这些收割者时，希望卢西奥来了以后可以一起回忆过去的岁月。乡村的印象犹如一股沙拉拿风^①出现在他的面前。平坦、干旱的土地向四面八方扩展着，村里有房子、溪水，还有两座几乎没有人过往的石桥。乡村的所有印象是这样：几条积满灰尘的道路，一条公路上，时而有一辆卡车开过，它从来没有在村里停过。群山黑色的山影，有时与秋天的低云混在一起。

他小时候在那些积满灰尘的道路上奔跑。春天在小河里洗澡，河水拍打着卢西奥屋后的墙壁，孩子们光着身子洗澡。

“我们还藏起从胡安大伯那儿偷来的子弹。那个夏天，我们偷子弹想杀死里斯科·德·莫罗的鹰，”他心里想。

那个时候，在马蒂亚斯眼里，卢西奥是做英雄的料子。卢西奥身体强壮，生性野蛮，扔起石头来比村里任何一个小孩都要

^① 沙拉拿风，夏季西班牙在东南海岸的一种东风。

远。上果园的土坯墙像狐狸一样敏捷；游泳时像浪里白条，而且往往知道哪里有蜥蜴的窝。当时，卢西奥有十三四岁，他比马蒂亚斯稍大一点，而且还和一个姑娘接吻。

卢西奥吻一位姑娘的事引起了所有这批孩子的好奇心，其中有个男孩，名叫胡安，那是欧洛希奥大伯的儿子，他问道：

“喂……你要干吗？你说，你说。”

马蒂亚斯记起了往事：他们一起躺在樱桃树的树荫下。肚子里樱桃塞得满满的，谁也不想走动。他们肚子朝天，肩背牢牢地靠在胡安的父亲乱石地上。他们任意想象着做些冒险行动。他们要偷来神父的坐骑，然后在十字交叉的空地上骑着马玩耍。

“洛拉那时正在喂猪。我走近她，我用一只手抓住她，吻了一下，”卢西奥说道。

中午的风几乎没有吹动树叶。她也觉得天热，在樱桃树的另一侧睡觉。

在孩子们的头脑里，卢西奥长高了两拃。那次他吻洛拉确实是一个美好的冒险行动，就像偷神父的马或杀死里斯科的鹰一样。

晚上马蒂亚斯依然很兴奋。表兄弟俩一起睡在粮仓的旧床上，从窗口可以看见教堂的钟和鹳鸟的窝。玉米床垫发出嘎吱响声，一直发到许多响声消失为止。

与胡安想的一样，马蒂亚斯问：

“洛拉在干什么？”

卢西奥想睡觉，没有回答他。他边睡边想着里斯科的鹰，他想，必须弄到支猎枪把鹰杀死。马蒂亚斯半睡着，甚至梦想着第二天早晨跟牧羊人的女儿那个叫洛拉的在一起。

上午九点半，北车站刮着河边过来的潮湿大风，两个铁路士

兵束着腰带，肩带上挂着大刀，与剪月台票的男人说着话。几个搬运夫在餐厅里等着火车的来到。在三等候车室里，有几个农民躺在木板凳上睡觉。一个面色憔悴的妇女在给自己的孩子喂奶。三等候车室的地上，烟蒂和废纸比比皆是。一盏电灯射出暗淡的光。几个铁路职工像幽灵一样，手里提着点亮的信号灯穿过铁路线。提供给养的人和缉私队的士兵在“旅客出口处”打纸牌，心里想着没收一桶桶的油桶和一袋袋的面粉。

是的。我在那时可能是十七岁。或许已是春天，那么就是十八岁。我的父母已不在人世，我在叔叔的桌子边有一席位，晚上与卢西奥同睡在玉米褥子上，做着和洛拉在一起的美梦。

我犁地，给从牧场回来的母牛挤奶。有时觉得好玩，仅仅是好玩，我骑在恩里克叔叔的母马生的小马身上玩得很痛快。

那时，我问洛拉她是否喜欢我。我脸上积满了在野外烧炭沾上的污迹。我还喜欢拥抱她。我吻她，自知这是吻百里香。我在心底里怨恨卢西奥，因为他是第一个吻洛拉。

卢西奥把我带到了城市。在那儿我凭直觉感到生活的节奏不同，他为我赢得了一种比较舒适的生活。在普埃布拉·阿尔塔，时间过得很慢，甚至根本不动，像八月中的小溪流一样缓慢。

“卢西奥，我要去马德里找工作。”

“你别去。你知道在家里总有你吃的食物。”

“可我不能老是这样生活。你的情况不同。你有土地，此外，你还有老人。”

“洛拉说什么啦？”

“她将要离开你了。”

他来到马德里不久，就将洛拉忘了。

卢西奥·马丁坐的是三等车厢。他用贝雷帽遮着脸睡着，双肩靠在车厢门的门框上。

卢西奥睁开眼睛时，首先是摸摸外套，看看钱包是否丢失。然后再看了一下行李架，架上放着公文包和手提箱。他平静地吸了口气，从放在两腿间的柳条篮子里取出点心。

“你们喜欢吃吗？”他对另一些旅客说道。

卢西奥慢慢地吃着，他用折刀将面包切成小片，然后用刀尖挑起面包片送往嘴里。当吃好点心时，他把吃剩的面包和香肠用一片报纸裹了起来，重又塞进了篮里。

火车从一片小树林附近驰过，这片林子一直长到铁路的路基边，车窗好像从所有那些飞逝远离铁路的村庄中逃走。

火车以最缓慢的速度行进，在沿路所有的车站停靠。金属的车棚在夕阳的余辉中闪出光亮。

卢西奥在座位上移动了一下。

“在这种长途旅行中，一个人总是把屁股也坐破了。”其中有位旅客说，可以看出他是想开口和人交谈。

卢西奥看了一下对他说话的那个男人。那男人半躺着，几乎占了两个位子。他是个胖子，衣着不坏，头颈上系着一根领带，上面有珍珠母头像作为装饰。

那位男人的一侧，有两个旅客在低声交谈。和卢西奥坐在一起的还有一对夫妇和一个姑娘。那姑娘把头靠在她母亲的肩上，似乎正在打瞌睡。

戴领带的那个男人也好像睡着了。他张着嘴巴，可以看到他的三颗金牙。他旁边那些人继续在谈话。

“我们作这种旅行糟极了，”他们中有个人这样说道。

“我们旅行不会再有多少时间了，我们一旦把糖解决了，马

上就回村去。吃糖。”

“我们在马德里可能还要逗留几天，”另一个回答说。

“不，我已答应过妻子，最多只待两天。”

“我们一到法国人造的桥边，就把袋子从车窗里扔出去，你们知道，在马德里是要进行搜查的。”

“来得及，火车进站前先要停一会儿。”

卢西奥闭着双眼。两个男人的谈话，声音愈来愈低，只是窃窃私语了。有好长一段时间，大家在打瞌睡，后来人们都醒了，姑娘和她的母亲，还有那位镶有金牙的男人，他们交谈开了。

“可是在毕尔巴鄂，女人能去酒吧间，”那位姑娘说。

“我知道，在法国以及别的国家，妇女非常自由。不过，你们要我给你们讲什么呢？我就不喜欢讲。妇女应该待在家里，”那个旅客说道。

“好家伙，我可不认为去酒吧间是不正派的，”姑娘反驳说。

“先生说得在理。从这里的战争结束以来，我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仿佛人们不再害怕上帝似的。姑娘们要跟男人一样，有几个女人甚至穿长裤子，”那个母亲也插嘴说道。

“你们是毕尔巴鄂人？”这位男人向姑娘的父亲问道。

“对，先生。”

“为了生意上的问题我在毕尔巴鄂待过一次。我是一家非常重要的鞋厂的代表，销售美洲式鞋。”

“朋友，你别在这儿做生意，”坐在他旁边的人说道。

鞋厂代表没有理睬那人的插话。

“毕尔巴鄂是一个生活费用很高的城市，这我还记忆犹新。买几锅咸鳕鱼他们就向我要十杜罗。”

“必须熟悉地点，”那个父亲说道。

姑娘在座位上挺了一下身子。她有一张圆圆的脸，两眼明

亮狡黠，她把双腿伸到对方座位跟前。

“我已对她们说过，我不喜欢我的女孩子单独出去很晚才回来。我对我妻子说过，超过九点那么就请她们别回家。”

“你要注意，你这样说就等于剥夺了女孩子们的自由，有一天你意想不到——因为她们不会醒悟——，你会看到她们像放的风筝一样离去，”有个乘客向他走近笑道。

那个镶金牙的人如果可能的话，真会朝这位乘客的脸上吐一口唾沫。

火车已进入岔道。

“是到了阿维拉吗？”姑娘问道。

坐在车厢过道上的人立起来向窗外望去。天色已暗了下来。

月台的另一侧耸立着棱柱形煤堆。人们可以看见红、绿色的信号灯光。公共厕所的棚屋，积满了肮脏的烟垢。

一个男孩叫卖着热咖啡和圣特雷莎^①的蛋黄点心。

卢西奥把头探出车窗外，姑娘也伸出头去。

“像一块甜瓜，”姑娘看着月亮说道。

在火车站，有一批西班牙长枪党的小伙子，他们排成两列纵队。

“你记得一九三六年以前我们是怎么生活的吗？”母亲对那位旅客说道。

“过屙样的生活！太太，我是这么认为的。”

车站的天棚下七个神学院的学生和陪伴他们的神父在散步。神父不时地查看每日祈祷书，看看车站的屋顶。神学院的学生低声地说话，一些学生笑嘻嘻地推着另一些学生。

① 以西班牙修女及神秘主义作家的名字命名的地名。

两个治安警察肩挎着枪，帽带扣住脖子，站在报亭边。

“在阿维拉的郊区，有一座很大的神学院，至少有一百名学习做神父的人。我见到他们好多次。在下午，他们顺着城墙外的公园散步。”在过道上走动的男人中有一个这么说道。

“在阿维拉我有一位未婚妻；可是小伙子，她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你几乎无法抓住她的手。天黑的时候，出来一支巡警队，他们常追逐谈恋爱的未婚男女，”一个同他一起走动的年轻小伙子答道。

火车站站长为了让火车出站，在月台上奔跑着。他右手拿着一面小红旗，跑到火车头附近挥动着旗。

神学院的学生和神父已经上了火车的第二节车厢。治安警察和西班牙长枪党的成员进了第三节车厢。

卢西奥那节车厢的两个做黑市买卖的人将麻袋藏在自己的座位底下。

“我们真有运气，”其中一个人向卢西奥挤挤眼说。

“我认为做黑市交易是不道德的，”做鞋子生意的那个旅客，为了要惹恼那两个人就这么说道。还可以看到，他讨厌人们拿他的几个女儿开的玩笑。

“你说得对，”开玩笑的人答道。“不过，在村里，一个人再怎么节省也不能维持家庭。我已经想用别的方法来维持生计。”

车厢里一片沉寂。做鞋子生意的旅客，在那人说了话以后，佯装睡着了。

卢西奥重又读一下自己村里神父的信。神父在信里把他介绍给他的一个军人外甥。信是用打字机打成的，而且很短。

亲爱的爱德华多：

现在我把卢西奥·马丁介绍给你，你是否能在所属的部里

给他安排个工作，他在我们解放运动的部队里当过军士长，我当时是个随军神父。他想找个勤务兵或类似的工作。我认为他是有能力做这种工作的。

等待你满足我的请求，因为我对他感兴趣。

紧紧地拥抱你，并祝你家属

幸福！

E·费尔南德斯

七月七日于普埃布拉·阿尔塔

佛朗哥万岁！振兴西班牙！解放年。

卢西奥幻想获得在巴利阿多里德做勤务兵的职位。他想，“其他的人没有自己的战功大都还得到了这个职位。”

因为战争，他跑遍了半个西班牙，但却没有养成在村里生活的习惯。“一个人，”卢西奥自言自语道，“能够赢得比打碎泥块还要容易的方式生活。”

“我将有一套军服和一份好的工资。每年还有一个月的假期，而且当我退休时，还可以领退休金。父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还有一份退休金。”

卢西奥家里的人不喜欢他的这个打算。特别是他父亲很不高兴。收获季节快要开始了，儿子宣布要去马德里寻找工作使他大为恼怒。

“走吧！你们都走吧！丢下土地，让土地休闲着。可是土地是我们大家的根本，是你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的根本。当眼看就要收割的时候，你离开土地，就像是在妻子或母马分娩的时候离开一样。你真该死！”

然而，卢西奥心里想的是，父亲一旦看到他穿着蓝色的军装出现在村里，就会息怒。

对于马蒂亚斯来说，一切事情不期而来。他没有花费许多精力就找到了一个工作，尽管——他已经同老板说过——他只学过耕地和扛东西。可是，能拿到最低的日工资，能在富卡尔大街舶来品商店当营业员，长时间地承受落在他身上的所有工作，他已经感到够了。

马蒂亚斯和另一个营业员睡在商店的地窖里，除了星期天可以休息，其他时间都要上班。

黎明时，他们起得很早。另一个营业员拉蒙掸去架子上的灰尘时，马蒂亚斯洗刷店铺。整天只不过是没完没了的工作，扫地，打包，把订购的货物放进柳条筐里，以及卸麻袋。到了晚上，他们要冲刷店铺，在地上撒上锯末。

在老板的帮助下，马蒂亚斯学会了这一行中的所有诀窍，落下打击的钟锤，用厚纸打包和卖掉坏的货物。

晚饭之后，当老板回家去时，这两个营业员如果不感到累就上街去逛马路。

拉蒙是个言语不多，不善交际的男子。他最喜欢的是去莱昂大街的一家酒馆，默默地直喝到自己醉了罢休。

“你从来不想念家乡吗？”拉蒙对马蒂亚斯问道，“我想，在商店里我从没看到过阳光。你至少可以带着订货筐出去走走。”

有的时候，马蒂亚斯也会唤起怀乡之情。他想起了被冬天寒风刮干净的马路，低低的火和玉米褥子；在教区广场上的礼拜天舞会，在暗处与年轻女人聊天。

他感到最大的忧伤，过一会儿也就没有什么了，尽管他过得非常劳累，但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城里人。故乡的印象慢慢地远离而去，甚至记不得所有人的名字了。于是他就去通宵开的咖啡馆、郊外的舞会，去找妓女。

“干什么？我们今天晚上去看妓女吗？”

“去，”拉蒙说道。

他们一直走到安东·马丁广场。然后点着一支雪茄，透过玻璃窗窥视萨拉戈萨酒吧间的妓女。

“唉！这个长得漂亮。”拉蒙指了一下其中一个在柜台边接客的女人。

“她确实长得漂亮。”

“玩这种女人，你至少得带三个杜罗，而且还要床铺的钱，所以玩一次起码要五个杜罗；一会儿工夫钱就没了。你的钱放在脚底下，你想她，你就单个儿去玩好了。然后，你抬起脚，你就会发现五个杜罗。”

“这个女人名叫安赫拉，我认识她。有时她来店里买东西。”

“我已经记起她了。”

过了没有几天，马蒂亚斯带着积蓄的小费，去萨拉戈萨酒吧间找那个妓女，与她睡觉。直到当时，他还从未和任何女人有过关系。

马蒂亚斯在店里干了一年后，他已变成另一个人了。他买了一件蓝色外套，一件白衬衫。到了休息的星期天，他穿起衬衫和外套，与街区商店的其他卖舶来品的营业员去跳舞。工作的单调和时间的束缚使他受不了。他觉得每天时间过得很慢，活儿很艰苦。有时他和老板争吵。

“为什么你不找别的工作干呢？”一天，有个来店里的年轻女用人对他说道，有时他还和那姑娘一块出去。

“如果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马蒂亚斯答道。

“倘若你能和我家的老爷说说，他在电车公司任职。”

“要是你替我另外找一个工作，我就和你结婚，”他开玩笑说道。

没过多久，他们给马蒂亚斯一个电车驾驶员的位子，他也就经常和那位姑娘出去走走了。他爱上了她，而且两人很快就结了婚。当年就生了华金。

火车到了埃尔·埃斯科里亚尔后，神学院的学生和神父下车了。在比利亚尔瓦，乘警要求旅客出示通行证。

“我没有找到证件，”姑娘的父亲说道。

“你是个冒失鬼，我可以肯定，你把它丢失了，”妻子这样说。

“我既不是冒失鬼，也不是小孩，”丈夫说道。

姑娘立在座位上，在行李架上的一只手提箱中寻找证件。

“证件在这儿，”姑娘说道，她重又坐了下来整了一下裙子。

“孩子，住嘴，”母亲说。

小姑娘没有穿长统袜，脸红了。

所有的人都坐在桌子周围准备吃晚饭。这时，马蒂亚斯向卢西奥询问村里的情况。玛丽娅一边注意听，一边来回准备饭菜。

“晚饭吃什么？”马蒂亚斯对妻子问道。

“吃土豆泥和一些小鱼。”

“你快把晚餐端来，卢西奥很想吃点东西。”

“下午我在火车上吃过一点香肠和面包，”卢西奥回答说。

“那好。你们家里人都好吗？”

“好，老人将去收割庄稼。我来的时候，他有点不开心。”

“可以谈谈我在时的那些人的情况吗？”

“胡安，也就是欧洛希奥大伯的儿子，在夺取奥维多时被人杀害了。你还记得神父堂埃米略吗？他身体是那样的结实，举

止表现像一头野猪。他一得到起义的消息，就在教堂里告诉我们。在夺取市政府大楼后，他和我一起到了前线。”

华金缄口不语，瞧着院里的窗户。

“我获得了军士长军衔，战争既残酷，但又是好事。”

马蒂亚斯在他表兄讲这话的时候，他想起了以往的经历。

“至于洛拉，可以说是你抛弃了她，”卢西奥笑道。“她的丈夫被赤色分子杀害了。我们对弗朗西斯科的事一无所知，他确实是个左派，可是结果成了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

“现在洛拉在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她已带着子女离开了村子。”

华金看了一下他伯伯的脸。

“这儿也发生了事情。安东的父亲，我的朋友被判处死刑。是看门人告发的。”

“你指的是那个做媒人的安东吗？”玛丽娅问道。

“对，昨天他对我说过这件事。”

谈话间断了一会儿；后来，马蒂亚斯重又继续谈下去。

“喂，卢西奥，你能讲讲那个给我作过担保介绍的将军吗？”

“要是有机会，我确实想讲讲。”

“你可以给他讲讲有关我的情况，”马蒂亚斯说。“我什么也不想参与，安心地做我的工作。我不赞成也不反对国民派，也不知道佛朗哥的名字。关于政治，我是一窍不通的。战争爆发以前，同事们对我说，要我加入左派，可总是被我拒绝了。好吧，当叛乱发生时，我必须在人民之家中报名，而且筑战壕。试问，我的过错在哪儿呢？”

卢西奥耸了耸双肩。

“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马蒂亚斯继续说道。

“可是你报了名。”

“对，”马蒂亚斯回答说，仿佛替自己辩解。

这时，玛丽娅已去厨房洗刷盘子。三个男人留在饭厅里谈话。后来，有人叫门，一个转租房子的女人进来了。

“晚上好！”安东尼娅在男人面前走过进入房间时说道。

“我已经给你说过了，这是一位女房客，”马蒂亚斯对自己的表兄说道。

“我已经知道了。”

“你不能理解，”马蒂亚斯继续说。

“我们看到能做的事情了，马蒂亚斯。我理解你的状况；再说，我们是同一血统的人。也许我也会这样，可是我在别的地区。”

马蒂亚斯微微一笑，仿佛感到异常轻松。后来，华金躺下睡觉，兄弟俩继续讲话。

“在我们中间，事情进行得并不很好。我讨厌玛丽娅讨厌透了。现在，你知道吗？她沉溺于喝酒。”

“你允许她喝酒吗？”

“我什么办法都用过了，不止打了她两记耳光。”

“一个妻子必须服从你。如果她不服从你，那整个家就是一座地狱，”卢西奥说道。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马蒂亚斯马上又讲自己的事了。

“你去看望将军时，给我牵根线。”

“这是一封很好的介绍信。是的，先生，一封很好的信，我可以肯定，他将给我一个勤务兵的工作。堂埃米略说他的表兄去部里工作。”

太阳已落下山去。只有一道红霞，染红了山脉连绵的群峰。

凉风掠过公路上空。

三个小伙子坐在小火堆的四周，他们望着埃尔·佩克。埃尔·佩克立着对他们讲话。卢卡斯斜躺着身子，张开嘴听讲。胡安慢慢地嚼着一根果子蒂。佩德罗把双手插在裤子袋里。

埃尔·佩克的手放在领口朝上的外套口袋里，他重复说：

“你认为我现在讲的计划并不好。”

这伙人中没有一个人说话，一片沉寂。大家像死人一样缄口不语。不时可以听到风声和鸟的啼鸣。

“这很好，”埃尔·佩克继续说，“如果你认为有更好的办法，那你现在就说出来；以后再说就没有价值了。”

这时已经没有阳光了。一群鸟儿从一棵树上起飞，飞到了公路的另一边。

四个男人，沉默着，眼睛望向山谷和公路，时常有几辆卡车爬上莱昂内斯的高处。可以看到车子在公路上的大弯道上出现。

“是那辆车吗？”有一个人问卢卡斯。

“不，那辆车不是，那是辆大福特。”

在山谷的深处，公路下面，可以看到几个小村的灯火。

“那是瓜达拉马，”埃尔·佩克用手指着其中一个村庄说。

“这个村好吗？”

“这个村庄像别的任何村庄一样，很美。”

“对于我来说，我最喜欢塞尔塞迪利亚。在塞尔塞迪利亚，一个人可以洗澡，”胡安说道。

“瓜达拉马不坏，那儿有一家卖美酒的小酒馆。多洛雷斯和我来吃过好几次午饭。”

“你们可以在松树间休息休息，是不是？”

“伙计，可以休息。经常呼吸新鲜空气是有好处的，”埃尔·

佩克说。

佩德罗把自己的双手从裤子袋里拿了出来，以便烤火。接着，他便站了起来。

“必须把火扑灭，警察会发现我们的。”

“你把身上的硬家伙拿出来；这些警察在公路上散步。”

“不是取硬家伙，而是要小心提防，”佩德罗说。

“佩德罗说得在理，还是把火灭了的好，”埃尔·佩克说。

“我要吃点心，肚子饿了。”

“小伙子，你什么都不放过。”胡安及时抽出嘴里的果子蒂说。

“我从没有这样饿过，我就什么也不顾的。”佩德罗解释说。

从一个衣服口袋里他取出一把折刀和一个小包包。

“你知道天冷吗？”

“八月份，脸上感到冷。”

“由于我们等了好久，我快伤风了，”卢卡斯说。

“在开始工作之前，总是那么紧张。起初我也感到紧张，现在我可不了。现在我比一个神父喝巧克力饮料还要平静。紧张也没有用，紧张只会碍事，”埃尔·佩克说道。他在火堆上放了许多沙。

“这辆车什么时候能来？”胡安继续斜躺着，嘴里嚼着一根果子蒂。

佩德罗看看他。

“车子会来的。”

夜幕降临了。天空中徐徐升起一轮明月，星星一颗接一颗地闪出光亮。公路上传来了汽车爬上山口的马达声。

“佩克，现在几点钟？”卢卡斯问道。

“大概很晚了，至少有九点了，”胡安喃喃地说。

埃尔·佩克卷起了一点衣服袖口，看了一下手表表盘。那是一块亮晃晃的、刻着罗马数字的手表。

“九点二十分，”佩克说道。

卢卡斯取出一包布比牌的香烟，递过一支烟。

“你想抽烟吗？”

他点起一支卷烟。

“起码到十一点，没有什么事可做。我对你说，佩克，我们很快就回来。我们可以去瓜达拉马喝几杯酒，我们可以在酒馆里待一会。”

“对，我们坐在小酒店里，让警察注意我们。你比一只蚊子还要没头脑，你比肛门口的黑屎还要没见识。警察只要看到你们的脸就不会忘记你们，”佩德罗说道。

“小伙子，你身上放着这样大的硬家伙，”卢卡斯评论说。

“大家伙，你父亲会有的，”佩德罗反驳道。

“卢卡斯，这个按我的办法，你别说了。直到现在，事情进展顺利，不是吗？如果你照我的办，那么事情会继续成功。以往的教训是，要善于把事情安排好，必须有等待时机的头脑。然后迅速地、不露面地把事情办好。可是你不记得那伙人中有你的弟弟在工作。无论是他还是谁离前线只有两个手指的距离。他们在发疯似地干活。这样你就不能工作了，所以他们要抓你们，”埃尔·佩克调解说道。

“喂，胡安，你上衣袋里有没有一瓶白兰地酒？拿过来给我们喝一口暖暖身子是很合适的，”佩德罗说道，这时他已吃完了点心。

胡安低声哼着一支小调。

“你高兴了？”

胡安耸了耸肩。

“西班牙人唱歌时正是他心烦或缺少点什么的时刻，”他说道。

“好吧，把酒瓶拿过去。”

“迟早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破烂的国家，”他评论说。

胡安取出衣袋里的酒瓶。

“这个我们大家都想。据说在美洲可以赚好多钱。”卢卡斯加入了谈话。

“小伙子们，世界各地都是一个样。在美洲也没有用香肠系狗。我看过几本小说书，那儿也有饥饿。”

“他们把我的工作解雇了，”佩德罗说。

“决不会像在西班牙这样过着如此饥饿的生活，即使你找到了工作，报酬也不高。如果报酬不高，你就会过饥饿的生活。”

“我对这个知道一点，所以他们把我解雇了。”

“我认为我会走的。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好牵肠挂肚的。老爹我送他入土了，他在战争结束之前被人杀害了。老太我把她安置在本塔斯。我的弟弟他单个儿会谋生的。”卢卡斯这么说道。

“他们为什么要解雇你呢？”埃尔·佩克问佩德罗。

“因为我和酒吧间的老板吵了一场。老板要我洗刷啤酒酒店的地板，好像我是一个女人一样。”

“出娘胎就是男的。”

“早晨七点钟，我进店下门板，一直要到晚上十二点或一点钟才让我离开。进店和离店时他们只给我一个杜罗，让我喝一杯咖啡。当然，一旦他们不注意时，我就在自己的胸前和背后藏一块夹肉面包和一瓶啤酒，我过着比有才能的上帝还要饥饿的日子。一天，他们发现我正在偷吃，老板用上门板用的杠棒打我的肋骨。我骂他乌龟，并随手抓了一样东西赶过去。这个可恶

的乌龟把我赶走，而且不给我赔偿损失。他想叫自己的堂弟——是个警察——把我抓到警察局去。”

“去他的乌龟王八蛋！”胡安说道。

“‘警察’和老板之间是骨肉关系。”

“全世界都一样，这个我以前已对你们说过。人们在任何地方工作都一无收获。不管怎样，做生意可以对工人们带来好处，如果需要，可以利用‘警察’或上帝帮忙。我宁愿干这种买卖，虽然你要冒险，但你多少有点钱，而且谁也不会来剥削你，”埃尔·佩克插话说。

“在酒吧间工作是低级的，你整天手里托着盘子走来走去，你走起来比磨刀的砂轮后的风还要快。”佩德罗说。

“我的老爹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说一天也不能没有钱。我将进土两拃深了，但是工人们将会觉醒，一切将属于工人。”胡安说道。

埃尔·佩克蹲着，点着了一支雪茄烟。

“上卡车的时候千万小心，我听说，有些卡车上的车厢里带有狗。”

“乌塞拉桥再过去一点，莱加斯比有一个人，当他爬上卡车时，藏在车厢里的人给了他当头一棒，几乎将那个人的右耳朵打了下来。”

“费利佩走了。他的那帮人向车上的那些人发誓，一旦他在市场上露面，他们就扒了他的皮。”

公路上车子继续来来往往。

“你在比利亚尔瓦看见卡车吗？”

“在火车站附近，装着一麻袋一麻袋的糖。汽车司机对酒吧间的老板说，糖是运往瓦利阿多里德的。”

“糖的生意很好。每公斤糖我们可以要五个小杜罗。”

“因为卡车晚了很多，‘斜眼睛’开的那辆货车出现在我们面前。”

“‘斜眼睛’也装着他自己的东西。因为车子确实像指挥的那样，提前来到了，”埃尔·佩克说道。

“我喜欢抓住装咖啡的货车，”胡安说，他把在嘴里咀嚼的果子蒂吐了出来。“我们卖掉二十袋咖啡的钱，可以买一辆小型货车，我们也可以从事收废铜烂铁了。”

“这个主意倒不错，”埃尔·佩克蹲在地上说。

“咖啡生意买卖不是像我们这些不幸的人可以做的。咖啡生意是那种到公路上来不担风险的有钱人做的。”

“我认识一个中尉……”

“酒吧间的埃米略，尽管检察机关的人有时向他罚款，他确实还是在发横财。现在他想进行改革。”

“对检察机关的人来说，真是一桩好买卖。为此，我可以改变检察机关的做法。”

“你和随便哪一位，请注意这一点。他们虽挣不到什么工资，但他们可以看作和那些厨娘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有东西买，可手是脏的。”

“有一天，他们向埃米略罚了两千杜罗。埃米略大叔满不在乎，没有吭声。检察机关的人要罚他五千杜罗，但埃米略对他及时贿赂，结果只罚两千杜罗。”

“我知道有一个人有小汽车和情妇。要做个检察机关的人必须要有高超的本领，必须有一本那么厚的证件，”卢卡斯两手在上衣口袋里掏着想把口袋掏空。“那么厚的证件或者有后台。”

“我认识一个中尉，他去酒吧间……”佩德罗说道。

“可是他们惩罚埃米略，我觉得高兴。埃米略大叔是个吸血鬼，他不怜惜我们，什么都不暴露，”胡安说。

“另外，我认为，我了解我生活中的事情，为此我还曾研究了一阵子。什么是店主？像每个人一样，店主们干的就是向别人抢钱。而那些正在工作的人却不能谋生，我们是不是这样？”

“那是确实无疑的，”卢卡斯插嘴说。

“为了让有些人有钱，那就需要让一些人没有钱。那些有钱人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可不是只有像塞涅卡^①那样的人才能够明白。他们的钱是从别人的劳动中取得的。一个店主用这种办法挣钱，算不了什么。还有的人挣钱更容易，更隐蔽。人家并不向他们罚款，”埃尔·佩克强调说。

“我说的是，有一天有人将把我投进‘监狱’，可是我却得到了享乐。那边每个妇女都有！”

“在这种钟声的伴奏下，今天不倒下的女人明天也会倒下，”胡安笑道，同时，他把口袋里的钱弄得丁当作响。

“罪过不是我们的。卢卡斯，你说，如果你有家，而且填饱肚子，袋里有五个杜罗，那你会不会去玩女人呢？”

大家都沉默不语了。公路上没有开过任何卡车。铺上沥青的公路，像蛇一样，在月光下银光闪闪。群星在天空的高处时明时暗。

他们继续沉默着，抽着香烟。

“不，我不会去玩女人。”

“我因吃了一块夹肉面包，他们就把我解雇了。”

大家重又沉默了。但佩德罗手里拿了瓶白兰地酒转向卢卡斯。

“你在吉尔洛查那个地方待了好久吗？”

① 塞涅卡(约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新斯多葛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卢卡斯在回答之前，喝了一口酒。然后用手背把嘴唇边的酒擦干。

“自从他们杀害了老人起，他已待了六个月。”

“看看你是否能一下子讲完所受的苦难。我们可不是出殡的修女。讲话的声音低一点。”

卢卡斯压低嗓音讲。

“我出生在一个村里，战争爆发时，我们撤离了。”

佩德罗感到很冷，两条腿直发抖。他把衣领朝上翻起，取过卢卡斯手中的酒瓶。

“喝点白兰地就好了，”他说道。

“起初，我弟弟和我生活非常艰难。我们东奔西闯，在莱加斯比的市场上行窃。我们吃的是卷心菜，睡在比利亚维德附近的一个机枪掩体里面。在莱加斯比我认识了埃尔·佩克，现在情况好转了。埃尔·佩克是一个非常机智的叔叔。他家境也很好，甚至已上过学。”

天已开始下雨了。带有青松、湿草香味的风，使树冠像波涛般摆动。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我们要准备一下，”埃尔·佩克说道。“卡车不会耽误很久。为了不让人发现，我们要把麻袋搬到公路的高处。在十二点钟，‘斜眼睛’将开着货车来到，我们和他一起去。要是运气好，明天我们将大张旗鼓地庆祝一番。卢卡斯，嗯？明天你会有很多钞票，你就可以和哈伊的胖女人睡觉了。”

“我不知道，我几乎更喜欢瘦的女人。”

“明天你看好。一个人喝上一杯，就会觉得一切都不错。再没有什么像在一个善良的姑娘身旁喝酒那么好的了。你别担心喝醉。”

“我们将大张旗鼓地庆祝。”

“我们将买一些漂亮的衣服。在这种时刻，衣着漂亮是件极其重要的事。一个人衣着漂亮，别人就待他好，而且也不会问他什么。你系着领带去警察局和不系领带去情况就不一样。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看你 and 对待你。我们还必须买几顶帽子，”埃尔·佩克说道。

“‘赤色分子是不戴帽子的。简单一点，买六顶帽子。’”佩德罗说着笑了起来。

“你笑得对。可这通知是很有意义的。”

佩德罗对戴帽子的事感到高兴。当然有很多人戴帽子，甚至工人都戴。这好像是个社会集体现象，一种传染病，希望表面上能不分阶级。

“对，你说得在理；我感到高兴，”佩德罗说道。埃尔·佩克重又看了一下手表。

“那是一辆大福特牌车，卢卡斯，你别搞错了，”他说。

“哪一次我搞错过？”卢卡斯反驳说，心里有点不耐烦。

“没有，可是……你过来，你站在那块石头上，他们看不见你。当看见卡车在山口出现时，你就吹口哨。”

那辆旧福特牌车在许多袋糖的重压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货物一直装到车顶。麻袋遮没了汽车司机的驾驶室。汽车沿着一条长长的斜坡行进，爬上了斜坡。马达内装的水沸腾了，白色的汽雾从蒸汽喷汽孔口直冲天空。

司机使变速箱发出嘎嘎的声音，第三档、第二档、第一档开足马力。

“已经透不过气来了，”司机对他的助手说道。

卡车的车灯亮着，照亮了公路两旁白色的树。

卢卡斯躺在石头上，他感到汽车的嘎吱的声音。接着，在公路弯曲的地方，出现了车灯射出两道光芒。卢卡斯取出衣袋里的手帕。卡车已经很近了，在公路那个大弯的中心。对于他，已不容怀疑，那就是停在比利亚尔瓦的酒店门口的福特牌卡车。

卢卡斯紧张得喉咙感到极其难受。全身上的神经都感到害怕。他一点也不觉得冷。汗珠从前额上滚下来；他用手帕将汗珠擦干。

然后，他把指头塞进嘴里，吹起了口哨。

胡安，埃尔·佩克，还有佩德罗在一些石块의 遮掩下一起趴在公路旁的排水沟里。

埃尔·佩克一听到卢卡斯发出的暗号声就说：

“佩德罗，你上去，你和我两人上去。你要当心，麻袋卸下时，别让它发出响声，动手时，什么也不要说。必须干得非常迅速。一过前面的路标，我们就跳上去。胡安和卢卡斯把麻袋拖到这儿。”

“同意。”

他们继续蹲着，卡车的灯光更加强烈了。

“他没有放松警惕，”卢卡斯说道。车子一直开到他们这儿。

“你上去再看一下，别让‘警察’破坏我们的活动。然后你再来帮助胡安。”

“运气来了，”卢卡斯说道。

福特牌卡车开过前面的界标，埃尔·佩克和佩德罗立起身子，跑了起来，很快就赶上了车子。佩德罗用双手紧紧抓住车斗后面的插销，同时继续奔跑，埃尔·佩克从侧面爬上车去。佩德罗一跃，就上了麻袋堆的顶端。他握住其中一个袋子的口颈，抓住袋子的两只角，把它一直拉到自己的腰部，然后从汽车的左侧推下去。埃尔·佩克扔下第三个麻袋，小伙子们相互也不看。他

们都不妨碍对方的工作，他们悄悄地继续卸着车上的货物。

埃尔·佩克把另一个麻袋扔到公路上。胡安和卢卡斯把麻袋拖到公路旁的排水沟里。同时，埃尔·佩克向佩德罗发出叫他跳下卡车的信号。跳车之前，他重又向排水沟看了一下。胡安和卢卡斯拖着最后一个麻袋。他还向驾驶室的小窗户看了一下，可以看到司机和他的助手的背影。

佩德罗在跳下车之前又扔下一个麻袋。埃尔·佩克已经跳下，眼看他快摔倒了，但他马上立起身子。

“他们甚至还不知道，”佩德罗高声说，可是没有人回答他。

埃尔·佩克倒在排水沟中，给自己的踝节部按摩。卢卡斯又一次擦干从前额上淌下的汗水。胡安数着麻袋。

“十一袋，干得好，”他评论说。

卡车依然是跛行而进，声音愈来愈远，已经到了莱昂内斯的高处附近。

“一切进展顺利。”

胡安卷起一支香烟，低声地哼起他们在火堆旁唱的那支歌曲。

“‘斜眼睛’将快到了。现在是十二点差十分。”埃尔·佩克看了一下手表说道。

他们躺下等待。天已经不下雨了。

安东住在三楼，朝街的风子里。从他家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对面沿街房屋的屋顶，看到一条很长的大街；大街的尽头是毕尔巴鄂的街心花园附近。

安东的母亲坐在窗边的石凳子上做针线活。她是个心情十分开朗的女人，总是唱着歌。他的父亲在办公室里当会计，是一

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黝黑的脸，高高的个子，长得非常结实。眼神热情真诚。

父亲下班回来，经常和孩子们聊天。安东有一个比自己更年轻的妹妹。

“学校里怎么样？”

安东拿分数给父亲看。

“数学五分，这个分数不好。孩子，你必须抓紧学。劳动人民的子女必须做好准备。有朝一日我们自己手中掌握领导权，那时我们要有自己的人会开机器、画设计图、造房子、搞经济。”

“那你呢？”父亲问女儿。

女儿也拿分数给父亲看。

“等你长大成人，你也必须参加工作。一个女人只需要学习做家务和结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妇女将必须做男人们的工作，学习一种行业。”

有时，在星期天早晨，父亲带着孩子们到马德里郊外去散步。孩子们绝不会放弃与自己的父亲散步，而去获得世界上任何东西的。

战争结束不久，有一天，一个警察在安东的家叫开门。他们进行搜查，发现了一些书籍。

“那是些经济方面的书，”父亲说道。

“这儿有恩格斯像，”其中有个警察回答说。

搜查之后，他们把父亲带走了。

“没有什么事，”分别时父亲说道。

母亲已不到阳台上来唱歌了。有时候可以看到她在排队买面包；一些妇女向她打听丈夫的情况。

“您知道一点吧？”

“星期四我去波尔连尔看他。他很好。”

“什么时候对他进行审判?”

“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有个表兄,”另外有个妇女说,“他被关了五个月也没有对他判决。”

“告发他什么?”另外一个女邻居问。

“战争期间,我的巴勃罗曾是个中尉,”母亲回答说。

几天之后,华金在楼梯上遇见安东。

“那天我对你说过,他们已抛弃了‘拉佩帕’^①。告发你父亲的是门房那个婊子养的家伙。我来收拾他们。简直是太气人了。”

“你认为是要把他……”华金不敢问安东是否他们要枪杀他父亲。

“我不相信;可能给他判三十年。”

华金向他的朋友告别。坐电梯上楼时看了一下门房的脸。门房坐在楼梯平台的摇椅上。他穿着一条军裤,皮裹腿紧绑着腿肚子,上身穿着夏令时的衬衫,用一块纸板拍嗒拍嗒地扇风。

华金记起了父亲对门房的恐惧。马蒂亚斯为了让他高兴,去门房间领东西时,总是给他一点小费。说实在,不只是马蒂亚斯一个人怕他。大部分住在这儿的邻居都怕他,他们默默地承受着恐惧。

早晨,当卢西奥去厨房间洗脸时,马蒂亚斯碰到了他。

“晚上睡得好吗?”

“很好。”

“床上没有不习惯的地方吧?”

“表弟,我告诉你,一张床上睡两个人是挤了一点。当然华金

① 西班牙语“拉佩帕”(la Pepa)有“羞耻”的意思。

像个木头人似的，当我躺下时，他还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没有听见你。你很晚才回来的吧？”

“大概是午夜两点钟。”

卢西奥拧干毛巾在自己脸上使劲地擦了几下。他走近厨房里的窗户，通过窗户看看那一小方块的天空。

“今天天气一定非常热。”

马蒂亚斯等卢西奥洗脸。

“给你毛巾，”卢西奥拧干毛巾后说道。

马蒂亚斯把头低到水池龙头冲落的水下，水有点冷。

“水凉不？”马蒂亚斯指着水对他表兄说道。

卢西奥返回餐厅把衣服穿好。玛丽娅为两个男人准备早餐。

“不是喝咖啡，而是喝麦芽酒，”她说道。

“你甭担心，现在我将从那儿得到东西。”

马蒂亚斯赶紧吃了早餐。在餐厅的另一侧，紧闭的门后面，可以听到奥雷阿的酣睡声。

“华金呢？”卢西奥问玛丽娅。

“他醒得很早，因为他八点钟上班。”

马蒂亚斯含着满嘴饭菜，问：

“你今天上哪儿？”

“到部里去找将军。”

“你要我陪你去吗？”

“随你的便，不过，你要知道你要等待。在这种地方，一个人知道何时进去，但不知道何时可以离开。”

“这对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什么要做。”

卖糖的女人在自己的房间里走动，可以听到她提高嗓门的话声。从别的地方传来了谈话的声音。

他们进入地铁。马蒂亚斯坚持要卢西奥推荐介绍。

“你别忘记给我牵牵线。”

“你也真笨。我已对你说过，如有机会，我一定向将军讲你的事情。”

到达索尔时他们下车了。

“你坐在酒吧间等我。”

“我在莱万特等你。”

“好吧。”

马蒂亚斯走进咖啡馆。那儿几乎没有人。靠近朝空地开的三扇玻璃窗放着几张桌子，桌子旁边有几个人在看报。大厅的尽头，有六个挺漂亮的妓女在喝着咖啡加牛奶当早餐。

马蒂亚斯靠在椅子上，往窗外看了一下。广场另一侧的楼房已被盖上了阳光。一座座平顶屋的屋顶形成Z字形，在那上面可以隐约看到一块天空。“莱安德罗因为有自己的表兄的介绍信，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块空地。他的表兄是个班长。卢西奥曾是个军士长。再说，他给将军捎来了一封信，我可以肯定，如果他和将军说说，将军会给我安排的。”

窗户的另一侧，车辆继续来来往往。一个流动商贩在叫卖自己的商品，他的脖子前面用几根皮带挂着一个盒子。

“有什么消息？你争取到吗？”

卢西奥点点头。脸上显出高兴的神态。

“你说起我吗？”

“对。”

“怎么样？”

“我也有话跟你说。”

“讲吧。”

“你瞧，我上去，将信递交给一位女秘书，她是一位极其漂

亮、全身梳妆打扮过的女人。她把信交给了将军并且很快就叫我进去。将军非常友好地接见了，甚至让我坐下。我对他说，我的将军，请你尽可能帮忙。当时，将军拿起电话，叫一位大概是非常重要的先生。那位先生说：好的，他们能给我一个职位。后来，我们谈论了战争和村子的情况。因为将军有一次路过那儿。”

“谈起我的事吗？”

“我谈起你的名字和你的地址。他说几天之内，你就要到电车公司去，问题可能已经解决。”

他们立在广场中心，阳光洒在他们头上；咖啡馆的窗玻璃闪闪发亮。广场上挤满了人；阳光照着整个广场。热气，使马路成为更好的朋友，它把许多的嘈杂声变成只有一个声音，使马蒂亚斯相信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好事。

“我们不能待在这儿，我们会热得难受，”卢西奥说。

他们保持沉默，眼睛望着远处。马蒂亚斯考虑自己的工作，考虑将要挣到的钱，等待终于结束了。

卢西奥想着村子，想着在朋友们面前身着制服自鸣得意的时候。

“表兄，昨晚睡得好吗？你没指望我……”

“表弟，首先，当你去村子时，我相信堂埃米利亚诺一定会妒忌。马德里是一个充满妓女的城市，”卢西奥说完笑了起来。

“是的，从战争结束以来便是这样。”

天空蔚蓝无比，空气中散发着汽油和发热的沥青气味。小汽车上带着如驼峰一样的煤气发生器，使得阿尔卡拉大街处处烟雾弥漫。

“为什么你要和她结婚？”

马蒂亚斯耸耸肩。

“你是个心肠很软的人。如果你想从女人那儿得到点什么，你必须对她们狠一点，”卢西奥说道。

马蒂亚斯走下楼梯，在两层之间的楼梯平台上点着了一支香烟，烟是他在关上门以后卷好的。然后，马蒂亚斯整了一下制服。

“怎么！他们终于给你工作了吗？”安东尼娅问道。姑娘和她的姨妈上楼回家去吃饭。

“是的，卢西奥给我找了一个人推荐我，他已经走了。”他故意提高嗓门说，让门房的妻子听见。

马蒂亚斯重又整了一下制服。接着上街后，便大步流星地走了。

上楼到家时，安东尼娅进了女商贩的房间。

堂娜普鲁登西娅在自己的房间里，呼吸急促，心里难过。

“你好吗？”安东尼娅问那个女人，她躺在床上。

“要不是我胸口痛，我的身体是很好的。”

“你找医生看了吗？”

“没有，孩子。那些医生只知道开很贵的药。他们会让我在床上躺着；这种棉被止咳糖浆对付伤风更有效果。”

堂娜普鲁登西娅翻了个身，面对墙壁，不说话了。安东尼娅等那个女人再说几句。然而她所能听到的只是院子里的嘈杂声和邻居的说话声。堂娜普鲁登西娅没有说话，嘴里喘着气。

他们坐在工厂墙脚下的荫凉处，就在一堆废钢铁附近。工人们三五成群，在草地上躺着，坐着或立着。他们有三百多人。

姑娘们挤坐在一起，在她们的周围总是有些青年男工纠缠

着她们。在装货的平地上，徒工们玩着足球；在皮制的球的后面奔跑，试试自己的体力。徒工是第一批吃完饭的人。也许他们的身体需要这种活动。

在工厂墙壁投下的几道阴影再过去一点，阳光洒在装货的平地上和小街上，要进厂的几辆卡车，正爬上这条小街。

城市远远地出现在修道院的洼地后面道路的尽头。工厂墙壁的另一侧，是一片贫民区。那些棚屋几乎一直延伸到了电车行驶的大街。

华金坐着休息，背靠着土坯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奥古斯托和恩里克，他们俩也是背靠着土坯墙坐着。

学校的教师和塞莱斯蒂诺的周围，围着四五个徒工，他们在把饭盒收拾干净。

“老师，请你再讲一遍。我也喜欢学习，”塞莱斯蒂诺说道。

教师在围墙上靠靠稳，嗓音又高又响亮地继续说：

“你们将看到，一八七三年二月十一日国民议会宣布了一个共和国，它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比第二共和国的执政时间还要少。第一个共和国的总统是菲格拉斯^①，是个卡泰罗尼亚人。”

“我在平民墓地见过他的坟墓，”塞莱斯蒂诺打断他的话说，“卡斯特拉尔^②也埋在那儿。”

“还有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③，”其中有个徒工说。

① 埃斯塔尼斯劳·菲格拉斯-莫拉加斯（1819—1882），西班牙律师、政治家。一八七三年任西班牙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② 埃米略·卡斯特拉尔·伊·里波尔（1832—1899），西班牙临时总统（1873—1874）。

③ 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1850—1925），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劳工总会的创建人。

“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有胡子，据说他是一个非常关心工人的人，”另一个徒工补充说道。

“五月一日人们给他献鲜花。我和我父亲见到过这种情形，但我们没有进去。警察也在那儿，据说他们会把人抓走。我们从围墙上将花儿扔给他。”第一个说话的徒工说道。

恩里克吃着夹沙丁鱼的面包。他喜欢把沙丁鱼夹在面包中吃。

“好吧，”华金从陶制水罐中喝了一口水后说，“至少在这儿可以喘口气；在厂房里没有人能歇一下。”

“昨天我想到一件事，”恩里克开始说道。“我认为如果我们去见厂长，可能会得到一点东西。现在他们正为工作担心，一定会重视我们的。”

“你说得有理，”奥古斯托说道，他正在削甘薯皮，就没有继续说下去。

另外一些男人，满脸是机器的油垢，他们默默地抽着香烟。他们知道重新上班的汽笛很快就要响了，所以他们在耐心地休息着。

“以前我参与这种纠纷。现在我对你们说，我和这无关，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其中有个工人说道，他是个铣工，名叫洛佩斯。

“如果我们提出餐厅的事，我们是可以争取到的。”奥古斯托削完甘薯皮，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奥古斯托向洛佩斯转过身去。

“洛佩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看到有什么危险？我不相信这会禁止我们要求他们给我们餐厅；这个要求没有什么不好。”

“说得好，奥古斯托，”恩里克插话道。

“奥古斯托说的是真话，”又有个男人说。

“我不这么看。我已有过教训。你提要求，然后他们让你承担后果，”洛佩斯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这时，大家沉默不语了。洛佩斯已站起身，望着城市。他的双眼凝视着工厂旁边的不毛之地，用砖坯砌成的棚屋。

“一些人这么说，还有些人那么说。不过，我说，抗议了马上就会受罚，这就够了，”有一个木工说道。

“没有办法，”有一个铣工说，“如果他们缺少做工的人，那是另一回事；可是每个岗位至少有十人在等待就业。”

“费尔南德斯说的是真话。我是从村里来的，我不想知道什么。那里也发生同样的事。现在是收割时期，对整个收割工作我们农村中的人是够多的了；可是加利西亚人来了，我们就有了双倍的人。于是，如果你想工作，那你就不能只想着吃饭，还得想点儿别的。”

“这样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如果我们为这么一点小事就半途而废，那么当需要为重大事情提出要求时，我就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了。”

“在工厂里有许多人生活得好。他们可能使我们处境窘迫，”洛佩斯补充说道。

“小伙子，那是神父的一种见解。这儿我们有很多人，而且我们相互不认识。我们只知道我们是同志、是工人。可能你和我为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挣得更多的钱而发生争吵。可是大家不能挣更多的钱，你懂吗？到头来，你和我必须取得一致意见，我们有同样问题，必须讲这些问题。我认为，撇开餐厅的事不谈，如果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些东西。这就是我的想法，”恩里克结束道。

“我也是这个意思，”华金说道。

男人们重又沉默了。可以听到远处修道院的钟声。

在围墙的另一个拐角，有几个姑娘在晒太阳。

“你是个笨伯，”其中有个姑娘对一个年轻的车工说道。

“也许是。”

“你生气吗？”

“是的。”

“那你就不该再犯傻了。”

郊区刮来的风是热烘烘的，大地仿佛在燃烧。

“有人结婚了，对吗？”她问。

“对，可是我们连死的地方都没有。每天挣三杜罗，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有的人结婚，几乎什么也没有。我们有床上用品。我母亲给我们一条褥子和一张床；有些人结婚的东西还要少。”

“有些人的东西还要多一点。”

“你瞧这个，恐怕你又犯傻了。”

车工取出烟盒，卷了一支香烟。

“已是进去的时候了，”他说道。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她坚持问道。

“如果你母亲给我们房间，你爱什么时候，我们就什么时候结婚。”

金属板切割女工高兴得喘不过气来了。

“好极了，”她说道。

接着，她呆呆地看着挂在天空中的一片珍珠母云彩。

“好吧，老师，你喝一口葡萄酒，”塞莱斯蒂诺说。

“你知道我几乎不会喝酒。”

“那么你们不拒绝喝酒吧？”塞莱斯蒂诺与徒工开玩笑说道。

“塞莱斯蒂诺先生，你是一位伟大的叔叔，”其中有一个小家伙说。

“正如你们所说的那样，未来的教育将出自工厂。必须把工作和教育结合起来。”

“老师，你听好了，我希望你教我一点几何学和图画。像我这样一个男人，以木工为业，就是缺少几何学。”

男人们都笑了起来；然后站起身，拍了一下裤子。

“小伙子，”他们对安东尼奥说，“总会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你带一伙人走门串户。”

汽笛又一次响了。它那刺耳的声音像狗叫似的在原野上传播开来。

“你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奥古斯托说。

“会有事做的，一当拨旺火，砂锅就沸腾了，”恩里克站起身，用右臂抚摩了一下他朋友的双肩。

工人们重又回到了工厂。他们步伐徐缓。阳光依然照在郊区的高峰上。郊区的孩子在垃圾堆上寻找小煤块，他们为几块大一点的煤块在争夺。

这时汽笛声已经不再响了。

公园里十分安静，只听到风的瑟瑟吹拂声。太阳躲到了树的背后，天空的云彩燃烧得像血一样红。

在水晶宫台阶的四周，坐着几对恋人。大地的热气徐徐上升，那些“好哭的人①”的影子斜躺在池塘的水中。

树木被一阵阵风轻轻地吹得左右摇晃，以一块块光线和阴影的斑纹覆盖着大地。最后的一道阳光在安东尼娅的裙子上留下一圈黄色。

“这个地方挺美，”姑娘说道。

“你喜欢，我就高兴。”

有好一阵他们沉默不语。路易斯斜靠在安东尼娅身上抽着香烟。对于她来说，那几乎是一种幸福。在手心、手臂上，她感到血液在流动。她闭着双眼。甚至连热气她也觉得是个好东西，能促使她感到幸福。

“路易斯，大概是傍晚了吧；天有点暗下来了。”

另外一对恋人已经走了，他们在公园的阴影中消失，脚步声被风的沙沙声淹没了。

“它像镜子那样平静，”路易斯指着池水说道。

安东尼娅不停地抚摩着小伙子的脑袋，她的双手仿佛在颤抖。

“不，现在才九点钟，”路易斯看着手表说道。

“我们还可以再待一会儿；今天我的姨妈十点钟回家。”

池塘边的花园，处处可以见到杂草丛生。池水轻轻地舔着水晶宫的台阶。

“那边有人来了。”

“大概是一对恋人。”

“他们也可能是工人。有很多人在公园里工作。”

“或许是看门人。”

“或许是看门人，”安东尼娅笑着重复道。

① 系指垂柳的柳枝。西班牙语“llorones”除了有“好哭的人”意思外，尚有“柳枝”等含义。

靠近水边的石头堆间，青蛙开始唱歌了，它们跳进水里，然后露出头来继续欢唱。

“叫得真和谐！这些青蛙比我还要开心。”

路易斯看了一下姑娘的面庞，把手放在姑娘的脖子上温柔地紧紧接着。

“你有点不高兴吗？”

她转过头，眼睛和脸色显得严肃。

“总是这样，总是吵嘴。家里的房东打他的妻子，我姨妈和我的心情很不好受，有时我感到很厌倦，仿佛我活了一百年。”

两个人沉默不语了。路易斯继续抚摩姑娘。手在姑娘的肩背上、腰部滑行。安东尼娅把自己的头放在路易斯的肩上。他吻她的嘴、眼睛和眉毛。安东尼娅厚厚的嘴唇呈红色，像嫁接的橘子。路易斯这时不想占有她。他倒不如说像有点感到满足。

“路易斯，你知道我很喜欢你吗？如果不是为了你，有时想想活着真没有意思。”

路易斯点燃一支香烟，从树冠上方可以看到阿尔卡拉大街的灯辉。

“你不感到我们离那些人很远吗？有时我是这样想的。看到过往的人那样神气犹如没有发生什么，好像他们不是人似的。我看到他们从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商行出来，带着得意的神气走进酒吧间。我听说那些先生去理发馆作为消遣。他们不害怕，不感到饥饿，有一个舒适的家庭。他们对发生的事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或者根本不想知道，对于他们来说，好和坏只有一个上帝。他们从不知道什么，什么都不是它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它们和他们的高兴同骗人的东西结合起来。有几天，我讨厌去上班，讨厌看到他们那些高兴的脸。想一想他们在一个下午花去的钱，我要挣一年，我觉得不愉快。”

当她把头从路易斯的肩上抬起来的时候，她显得非常平静。

“原谅我，我需要轻松一下。”

路易斯感觉迟钝。“如果我处在她的处境，我也会这样想。”他心里自言自语道。

“来，吻我一下。今天我需要你，”安东尼娅喃喃说道。

他们俩分开后，重又坐在台阶上。

“不会有人看见我们，真的吗？”

“不会，亲爱的，没有任何人。”

“我不喜欢有人看见我们。”

“我也不喜欢。他们不懂。你知道大学系里那个同学说的事情吗？他说有人用西装坎肩口袋、用黑皮精装的书把道德和真理带走了，”路易斯说着笑了。

月亮映照在水中，柳树的枝条在池塘上空摆动。

“她好像是不穿衣服的，”安东尼娅望着水中的月亮说道。她站起身来，她的侧影靠在树上。接着，她整了整裙子和上衣。

路易斯望着她的胸脯。

“我们走吗？已经很晚了。”

“你想抽支烟吗？”

“好吧。”

路易斯点着了一支香烟。在火柴光中可以看到姑娘的脸。

“你不该有一点口红，”她说道，微微一笑。

“不。”

“你给我梳一下好吗？我的头发一定很乱了。”

“你这样好，很美。”

他梳着头发，嘴里叼着一支卷烟微笑着。烟雾刺激了她的双眼，她不得不将眼睛闭起来。烟雾在空中萦绕，犹如白色的起

塞钻。

他们开始走了，去寻找公路。路易斯搂住姑娘的腰。那些沙石铺成的路在晚上好像显得窄小了。树木和树荫挤在了一起，封闭了道路。

“我们从哪个门出去？我们可以去独立大街，然后在银行乘地铁。”

“我认为很好。”

他们慢慢地走着，两人沉默不语。安东尼娅宁愿缄口不说，她不想说话，紧贴着路易斯，给他一封从自己热乎乎的身上取出来的信。

他们来到一个大池塘边，在小船和树冠上方耸立着阿方索十二世的雕像。

“改天我们一定要来划船。”

路易斯想起了自己的双手，想起最近一次划船他手上生了老茧。

“最好坐载有小孩和大人的小轮船。”

“你是个能干的人，就不坐那种船。”

他们继续顺着通向公园大门的林荫大道走去。

“这是白睡莲，”路易斯指着小喷水池里的花说道。

“噢，”安东尼娅说。接着，她看了一下大门。“喂，路易斯，没有任何人；公园门紧闭着。现在是几点了？”

他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

“你别担心，现在是九点二十分。另一个门敞开着，有几个晚上我从前面经过，那个门开着。你不记得我们从电影院回家的那个晚上吗？”

“记得。”

他们开始走得快一点了，从有照明的花园空地前面穿过去。

另外有几对男女也朝着同一个门走去。

“你看见吗？有很多人。我不知道公园的门为什么关得这么早。我知道在巴黎，公园没有栅栏，而且总是敞开着。”

“那是在巴黎。”

“好像散步或者谈恋爱都是禁止的，我不知道是谁这么干的，”路易斯补充道。

在公园大门口，有两对恋人和门房发生争吵。安东尼娅和路易斯走到那儿。

“好家伙！又是一对，”看门人说道，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们。安东尼娅感到有些紧张和脸红。

“先生们……先生们，难道你们不识字么？这个公园九点关门。”

看门人从口袋掏出一些文件。门旁的一根柱子上有一张通告：

本公园九点关门。

安东尼娅瞧着栅栏的另一侧。她想很快出去，摆脱这一切。

路易斯结结巴巴地进行辩解。

“我们待得晚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公园的关门时间。”

“朋友，那么手表呢？这儿未婚的成对男女不能待，要干这种事别的地方有的是。”

安东尼娅越来越陷入羞愧之中，门房使她觉得自己有点过失。她站在路易斯的背后避开了那看门人的目光。现在怎么办呢？“可能在报纸上把我们揭出来。在理发店里有人说他们追捕那些待在暗处的未婚男女。”

“路易斯，你什么也别说了，恐怕以后他们会到你家来的，”安

东尼娅低声说道。

路易斯握住她的手，用力把它抓紧。

“你听着，我们……”

“好吧，你别在我面前神气活现。只缺这个。给我看看证件，”看门人提出要求说。

他掏出自己大学生的学生证，并把它交给了看门人。

“路易斯·加西亚，法学院学生，”看门人念道。

路易斯是二年级的专业生。有时候他和自己年级的同学就自由、爱情、政治的许多问题进行讨论。这时，值班的看门人要求看其他的几对恋人的证件。路易斯记起了讨论，听到别人讲的话，在报刊上看到的文章，电台的广播以及所有夏季的教书^①。“有些未婚男女伤风败俗。经常可以发现他们以一种值得怀疑的态度在深更半夜时转悠。现在是当局出来制止那些扰乱本城秩序的人的过分胡作非为的时候了。”

“今年在沙滩上不允许进行阳光浴。离开浴室时必须穿上宽便服。如果警察发现你没穿便服，他们可以处理你；向你罚款十杜罗并把事情登在报上。”

“在西班牙只有触犯了命令，违反了第六条诫律^②才算犯罪。”

“为了对付肉体的诱惑——魔鬼总是在肉体背后窥视——穿苦行衣是个好习惯。苦行衣是苦修或禁欲的工具。通常是电镀的金属丝做成的、有或大或小的网眼，还有尖刺，他们可以用来对付肉体、根据禁欲者的意愿来扎小腿、大腿或手臂。他们还

① 教书，主教致辖区教徒的信。

② 违犯第六条诫律系指淫荡。

有使用打结的绳子的。他们不在任何商店中花费钱财，而只是在修道院里自己动手制作。”

“我只有笔记本里的白纸，”有个姑娘说道，她在自己的手提包中乱翻着。

看门人把学生证还给路易斯。

“这一次罚你们五个比塞塔，”看门人说道。

路易斯二话没说就付了钱。在上衣口袋里他还保存着一张公债券。

“我去给你们开门。”

这对未婚夫妻默默地上了大街。他们一穿过栅栏就神经质地笑了。

“你把那张公债券给我，我将把它作为纪念物保存，”安东尼娅说道。

那些亮着车灯的汽车穿过了阿尔卡拉大街。

下午，堂娜普鲁登西娅去世了。那天，华金回家时发现门厅有一扇门关着。

他打开套间的房门。过道上的灯光亮着，堂娜普鲁登西娅的房间完全敞开着。在卧室的进口处，两个男人靠在墙上。华金认出他们是卖糖女人的侄子，他们站着聊天，嘴里抽着香烟。华金向他们表示哀悼。他们大概在家里已待了好久，因为过道的地上扔满了烟蒂，而且周围空气非常稀薄。

两位堂兄弟的妻子坐在第一排的椅子上，椅子靠近死者的遗体，遗体放在地板上铺的一条毯子上。奥雷阿和她的外甥女坐在两位夫人后面。在过道上有三四个邻居站着，他们背靠着

墙壁。

“她是那么自然，”有个邻居说道。

“她的神态和她在货摊上时一样。但不管怎样，她刚死去不久。”

说最后那句话的那个女人摇了摇头。

“一天，我和堂娜普鲁登西娅谈话。她对我说：她曾经有过一种美好的生活。她年轻时，生活过得相当不错。她曾经是那样的坚强有力，请你们注意，可是她的身体有病痛。后来我又去看她。我问她，‘为什么你不找医生？’她说‘我会好起来的，我没有钱买药。上帝会按照他的意愿安排的。’”

“就在昨天，我还对她说，认为她不会那样快就去世，尽管她自己预料到会发生的事情。玛丽娅太太把情况告诉我。‘我非常累，就像人家毒打了我一顿，我感到我好像活了好长时间。你看到，我丈夫死了，把我单个儿留在这里。我的大限已经到了，我不知道在这儿干些什么，我吃得不好，而且还得像母骡那样干活。我相信上帝知道怎样安排我，最好，让我能休息。’”华金的继母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带来了一股煎沙丁鱼的热油气味。

“我们不是外人，”一个女邻居回答说。

“在墓穴中大家都是一个样，”另一个女邻居叹息道。

过道的尽头是餐厅，马蒂亚斯在那儿看着晚报。

房间里，华金在看那位太太的双手，太太的双手交叉放在腹部，手上盖着一块白色头巾。她的脸上也盖了一块丝头巾，通过丝巾可以看到堂娜普鲁登西娅布满面部的皱纹。

华金看了一下卧室，看了一下坐在第一排的两个女人的脸。她们好像在念念有词地作祈祷。卧室里没有家具，空荡荡的。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走到过道上去了。两个侄子继续谈论自己的事情，女邻居们谈论街上的趣闻，食品的价格、疾病和药品。

“早晨对空肚子来说，最好是喝一杯白葡萄酒。”

“你们看到了多么令人气愤吗？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了。我对那个店老板说：你们是第一批做黑市买卖的人。”

“过错在政府。我丈夫说他们是第一批动手干这种事的人。”

“要我对付做黑市买卖的人，我就枪毙他们，让他们吃四颗子弹。”

“对于妇女来说，这就有问题了。一个女人出去买东西，她不知道能买回什么。一切都很贵。接着，丈夫对吃的东西极为不满。而我呢，我就对他说：你拿个篮子，带五个杜罗看看能买来什么。你瞧，买鹰嘴豆花了十六比塞塔，食油用了五个杜罗。定量供应的面包我们不够吃，还得买两根黑市长面包。你要安置一个家，又要有照明，可是没有你大叔过来帮我的忙。”

“堂娜普鲁登西娅已停止斗争了。”

“对，她安息了。”

华金把书放在衣橱上。这时已是晚上九点钟。夜幕渐渐降到院内。他把头探出窗外，往上瞧了一下。在那一方块天空中他数着星星。十四颗，只有十四颗星。他想了片刻，因为他想知道这十四颗星的名称。

“她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玛丽娅对我说是下午五点。我不在家；我在上日班。”

“他们接受克萨达了吗？”华金问她。

“还没有，不过，他找到了一个代理人的工作。”

马蒂亚斯立起来，朝华金做了个手势，让他到里面一个房间去。房间的窗户敞开着，对面那所房子好像能用手碰到。人们靠在栏杆上。窗下面，在两座房子间的弄堂里，修理车间的工人正在用锤子把几块金属板敲平。

“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孩子，多么卑鄙！他们叫我在晚上干些零碎活儿，”马蒂亚斯对自己的儿子说道。

“那么这个？”

“那是堂娜普鲁登西娅老太的两个侄子。你想，如果我不待在家里，也许他们就会对我们进行抢劫了。据玛丽娅对我说，那两个侄子只是让她赤裸裸地死去，他们把房间里的所有东西，甚至是床铺都拿走了。”

“你怎么能让他们这样呢？”

“你想能怎么样？那是他们的家，那里的东西不是我们的。”

“他们可以在墓地里等候。”

马蒂亚斯对自己的儿子讲了发生的事情。

堂娜普鲁登西娅的东西不多：一张有床垫和被单的木床，几条被子，几件衣服，还有几双旧鞋。在一些椭圆形的卡片纸中插着若干泛黄的相片，一个没有门的衣橱里挂着一件大衣，一件深色的罩袍和三个空衣架。一个放着药瓶的床头柜，几双便鞋，一只手提箱，一个酒精灯和三个瓷盘，两只有柄平底锅，一只煎锅，一个脸盆架和一个挂在墙上的耶稣蒙难像；几包香草豌豆面粉，面包片，一瓶油，一堆土豆。在墙角落里是摆满了糖果，葵瓜子和辣椒的小摊。若干包美国香烟和三夸尔特隆^①烟草专卖局的混合烟，还有些火柴和卷烟纸。

堂兄弟之间相处不好。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妻子去了，把小孩子留在家里。两个侄子和他们的妻子是堂娜普鲁登西娅的全部亲属。不过，贪婪使他们比自己的近亲还要团结。甚至在

^① 夸尔特隆：重量单位，相当于四分之一磅。

那整个肃静的时刻，他们也不对姑妈表示片刻的亲热。他们看着四件家具，心里在列一张清单，房间里有多少东西。

其中有个女人拉开了床头柜的抽屉，看见里面放着几张钞票。

“这儿有钱，”她说道。

他们重又沉默了。大侄子安东尼奥终于高声抱怨说道。

“可怜的姑妈，她已安静地死去了。”

“她不是坏女人，不坏。她有些古怪。不过，谁没有些怪僻呢？”

堂兄弟间的整个谈话犹如是一种协定。现在，作了最初的交谈以后，就比较容易相互理解了。

堂弟曼努埃尔拿定主意说：

“安东尼奥，姑妈的这些东西怎么处理？”

“喂，别转弯抹角。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我们现在就把它分了。你已知道，我住得远，我再来这儿一次不容易。”

“说得好。”

安东尼奥把卧室的门关上了。两个女人打开衣箱，里面塞满了旧衣服。闻到一股樟脑气味。她们取出衣服，把它们扔在地板上。房间内很热，两个男人脱去上衣，把上衣放在死去的女人脚边的床上。

她们从地板上成堆的东西中挑选衣物，两个女人用手估量衣料。

“那几条毯子不错。”

“只是一般的。”

“在家里毯子对我们有用，去年冬天就很冷。”

“我们的房子让潮气弄得糟透了，安东尼奥，对吗？”

“是很糟糕，潮气一直冒到房顶。”

“我要那条蓝色的，”其中一个女人说道，她拿去一条被子。

“那条蓝色的最漂亮；如果你拿走蓝色的，那我就拿走另外两条。”

“这样，我也想调换一下。那条蓝色的给你。再说，那条玫瑰色的最大。”

堂娜普鲁登西娅的衣服是一些陈旧和肥大的衣服。那个卖糖果的女人曾是个高大肥胖的女人，一对松弛的大乳房垂落在肚子上。这两个女人任何一个都没法穿她的衣服。

曼努埃尔的妻子偷偷地笑了。

“哎哟，这是些什么衣服！是一些给发福的女人穿的。”

“最好是把这些衣服按分量卖掉，”曼努埃尔突然产生了这个念头。

堂兄弟之间为了一只衣箱开始争吵起来。那是一只又大又深的箱子，箱子有一个用非常牢的帆布做的盖子，粗大的蓝色条纹有点退色。

“这是一个很好的衣箱，给我非常合适，”安东尼奥说道。

“我们瞧瞧谁能拿到箱子。”

他们说话的声调提高了。两个堂兄弟拿那些耿耿于怀的旧事情相互责备，在这激动的时刻，这些事情立即抖了出来。

“曼努埃尔，我对你说的，你知道吗？你自以为做得聪明，可是依我看，对你毫无用处。”

他们站起身来，像斗鸡一样傲慢，伸出手随时准备搏斗。

“别吵了，你们听着，”其中一个女人说道。

“好，伙计，”曼努埃尔说，“箱子给你们，不过，我要拿走衣柜、手提箱和炉子作为交换条件。同意吗？”

安东尼奥掂量着手提箱，看了一下衣柜。手提箱他已经有了。

“同意。”

曼努埃尔的妻子在争论中插嘴说：

“脸盆架和几只有柄平底锅是归我们的。”

他们有条不紊地分了日常用品，对每一件东西他们都要争执一番，那幅基督蒙难像、那只煎锅，那个床头柜给安东尼奥和他妻子；那张椅子和几包食物给曼努埃尔。

他们分完了东西以后，立到了躺在没有被分掉的被单上的姑妈身旁。后来，他们去和马蒂亚斯谈话。

“我们把这些东西拿走了。还是现在拿好，因为马上会有人来，而且房间里没有空地方。”

“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马蒂亚斯对他们答道。

两个妯娌留在家时，安东尼奥和曼努埃尔去把一切都解决了。他们租了两辆手推车，把各自的那份东西拖走了。

那些衣服和鞋子按斤两卖了五十杜罗。衣服卖得不错，是长袍可以卖得贵一些，不过，那是一些式样过时的衣服，收购的人这样说：

“人们不喜欢这个，甚至在马德里的旧货商场也不收购。我给你们五十杜罗，拿回去还可以使用。”

“好吧，还不如一块石头，”曼努埃尔说。

他们将糖果带给孩子们。把烟放进了自己的衣袋。

“纪念章和那些耳环，我们摸彩。”

“姑妈很看重的物品应该是好东西。”

“最好还是把它们卖掉，”安东尼奥说道。

华金在餐厅的桌子边学习。过道的尽头，堂娜普鲁登西娅的侄子在继续争论。邻居们已回自己的家去了。安东尼奥在她的房间里整理东西。马蒂亚斯想上街去兜一圈。

“我去看克萨达，”华金说道。

玛丽娅待在厨房里，厨房的门紧闭着。

华金将手册又翻过一页。“同步电动机，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同步交流发电机是那些取得电动势的频率并因此能供给电流的机器……”

华金聚精会神地学习了许久。他在脑子里背诵着所有的那些概念。当发现自己的背诵声压倒了过道上窃窃私语的谈话声时，他惊讶了一会儿。在无线电收音机里可以听到军号声。

“已经是十点钟了。收音机正在报告，”华金无意中高声说道。

看门人夫妇的收音机像一只大麻蝇一样从院子里传来嗡嗡的响声。他们把收音机开得很响，要烦扰街坊居民。

“让他们听听这种声音，对他们没什么不合适。在这大楼里还窝藏着许多该死的赤色分子呢，”门房提高嗓门说道，以便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到他的说话。

“在历史面前和平是一种胆小怯懦的安静。倒下去的人的鲜血……”人们继续听着广播员的讲话。

安东尼娅下楼梯的时候，撞见了一个神父。神父抓住楼梯

的扶手往上爬。这是一个肥胖的年过半百的男人。跟在神父的后面上楼的是，是一个年岁不大、剃光头的小男孩。

“晚安！”侍童说道。

“晚安！”安东尼娅回答说。

她想，“他们肯定是去为堂娜普鲁登西娅念悼亡经的。”后来，她在楼梯平台上停下，看了一下神父那黑黑的身影；他撩起黑色的长袍。“别让长袍拖在楼梯上，那楼梯积满了灰尘，”他自言自语说。在黑色长袍的下面可以看到神父穿着的长裤，裤子

也是黑色的。

安东尼娅重又想起那个卖糖果的老太婆。她感到的既不是同情，也不是难过，她感到的或许是一种悲哀。看到死去的女人时，她懂得了在那以前不曾懂得的事情。她不了解那个在自己身旁生活了如此长时间的女人。堂娜普鲁登西娅像任何人一样的经历，有一个像生活本身那样的朴素的、苦难的、甜蜜的经历。她有过孩提和少女的时代，有过一个丈夫，还在礼拜天望过弥撒。在她的记忆中，她有过孤独和放荡。那是一个对生活厌倦、痛苦和凄凉的问题。人生犹如一个污水管，她在水流中被带走了。可是安东尼娅只能记起自己认识的那个女人，如果不是为了和大楼里别的女人吵架，那个女人几乎讲不到两句话。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生活着，会把我们大家都气疯的，”她高声说。神父在梯级上停步休息，转过身来，用奇特的目光看了一下姑娘。

“你说什么？”神父问道。

“不，我没有对你说，”她回答道。

安东尼娅上了大街。瓦斯路灯放出亲切的乳白色的灯光。

路易斯靠在路灯杆上，正在等待她。姑娘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莞尔一笑。

响了三下门铃。华金刚要起身，可是堂娜普鲁登西娅的侄子曼努埃尔已打开了门。

神父和侍童走了进来。那个小孩的左手放在裤子袋里，数着小硬币，自得其乐。

两个侄子停止了说话，看着神父。

“是这儿，对吗？”神父问道。

在家里的人中谁也没有通知神父。对神父的到来，他们呆

若木鸡。其中一个女人，安东尼奥的妻子，走上前去说：

“对，是这里。”

神父走进房间，一个盛满油的碗内长明灯的火焰在跳跃。这碗油放在糖果盒的上面，几乎看不到长明灯的光亮，因为卧室里点着别的灯。

“她要做忏悔，不是真的吧？”

神父的出现使他们感到害怕。他们希望神父做完仪式离去。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没有通知，”安东尼奥说。

神父抬起头，用谴责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他摇了摇头。

“那么说这是第一回做了。不做忏悔……”

仪式有一个默哀的时间，两个侄子既不敢抬头，也不敢说话。侍童，心不在焉，他听着从院子里传来的音乐。

生气的神父有力地说。

“要为死者准备后事，要把灵魂交给上帝，使上帝能饶恕我们的罪过。”

“神父，你听着。这要出点钱吗？”

神父转过身，向着问话的人。

“这是免费的，一切免费。”

然后，生气的神父又转向死者的遗体。他双手捧着一本书，念起那些古老的词句来了。这些挑选出来的词句是专为死者做祷告的。侍童说了声“阿门”，便跟在神父后面走了。

华金在自己坐的位子上一动不动，他听着争吵。

“她是梅塞德斯太太，”玛丽娅说道。“梅塞德斯太太一向做事都很稳妥，她就常去教堂。”

“肯定无疑，”华金回答说，并重新开始学习。“原子核是由积极活动的粒子组成的，每一颗粒子……”

当死者的两个侄子走的时候，华金他们开始吃晚饭了。

“我们明天来出殡，”他们说道。

只有父亲和儿子吃晚饭。玛丽娅已躺下睡了。她在去睡觉以前，同马蒂亚斯说了几句话。

“明天你得给我点钱，”她说道。

“我不知道你要把钱花在什么地方。”

“我看，拿你三个杜罗不是去创造奇迹。”

华金吃过晚饭后，看了一会儿报纸。在报纸的第一版上看到了一篇演说和一张非常熟悉的将军的照片。

他看了有关德国战争的那部分，这是报纸上唯一刊登着的这方面的消息。“我军继续乘胜前进，攻占了敌军阵地。俘虏敌人四万……康文特里和伦敦城市遭受我军飞机轰炸，到处可以看到大片火海……”

战争在激化。德国军队向俄国领土挺进。华金继续很关心地注意着这场战争的进展。他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战争在欧洲蔓延。像许多西班牙人一样，华金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如果德国失去战争，一切都会好转。

“我去睡觉了，”马蒂亚斯说道。

“我也要睡了，明天我必须早起，”华金回答说。

整个房子处于一片黑暗。只有一小点光一直照到过道上，那是堂娜普鲁登西娅房间里点着的灯发出来的。尽管灯光微弱，却让他无法入睡。不时地可以听到下面几层楼邻居的谈话声，胡同里修理车间小汽车的马达的轰轰声和闹钟的响声。

闪耀的灯光继续使他无法入睡。不知道为什么，神父讲的话在他的脑海中翻滚：为死者作好准备，生命并不重要，只是过

渡，所有的穷人和富人在上帝的眼里都是一样的。他不是刚刚才明白。他觉得对另一种生活抱有希望，就是把生活交到宣传听天由命的说教者手中；那些人说所有权是神圣的，而穷人必须低三下四的进入天国。不抱怨，也不嫉妒富人。

他在床上翻了个身，朝着墙蜷缩成一团，试图避开那盏灯的微弱灯光。可是毫无用处。他习惯于右侧身睡觉，这种睡觉习惯胜过做梦。他立起身子。使他高兴的是他脚底下感到了镶嵌砖的凉爽。他走到窗边，抓起一个陶制水罐便喝起水来。水喝下肚去，有一种蛇行似的清凉之感。

他在过道上一直到堂娜普鲁登西娅房门前。接着，他就灭了那盏灯，关上房门。他回到自己的床上，钻进被窝就睡着了。

过了没几天，他们就把属于堂娜普鲁登西娅的房间出租了。他们对新房客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们想有些人是不喜欢在死过人的地方睡觉。

“租金多少？”那个女人问道。

“每月三十杜罗，可以用厨房。”

“那么家具呢？”

“你可以带家具来，”马蒂亚斯回答说。

“墙壁有点脏，你们可以给我粉刷一下吗？”

“可以将房间刷白。”

这个新房客叫艾伊达·洛佩斯，据说从战争开始以来，她就守寡了。那女人看来有四十岁左右。她戴了一副眼镜。

“我的眼睛有五百度近视。镜片比一个杯子底还要厚。”她笑着说道，同时用手绢擦净眼镜。

她还向他们讲自己的经历；她结婚已有七年。

“说准确一点，是七年零三个月。可是先夫被霰弹在这个部位击中身亡，”夫人碰了一下腹部，“所以我已没有男人了。”

这两个人都是塞哥维亚附近同一个村子里的人。

“他是个教堂司事，但在人民之家报了名。他长得非常漂亮，这不是我说的，那是别人说的。他弹吉他和唱霍塔舞曲比任何一个年轻小伙子要好。人们让他做文化民兵，他在战壕中给人家上课。民兵们非常喜欢他。”

“他教会许多人读书、计算，”她继续说道。

艾伊达·洛佩斯坐在椅子边上，双手拿着一只黑色的女用手提包，把它紧紧按在裙子上。她眯缝着双眼，因为她在电灯光下走了好长一段时间，而餐厅里却一片昏暗。

马蒂亚斯点燃了一支香烟。

“他们向我熟悉的一个人开了一枪。那时他正去塞哥维亚这些村子。”

“那儿常有这种事。不过，请你告诉我，有哪一家不死了男人？这一派的或那一派的。我国人民先是有了赤色分子，而且枪毙了十个法西斯分子。法西斯人进来时，为了报复，他们枪杀了我们的男女百余人。他们在卡乌迪略广场列队，被法西斯分子带往墓地。那儿法西斯分子给他们挖了两个坑，同时堂达马索给他们宽恕。对还有一部分人，法西斯分子给他们喝小麦、蓖麻汤。而且他们要从胯下穿过去请求原谅。对那些女人，法西斯分子将她们的头发剪光，可是给她们留下一缕长头发——像母骡的尾巴一样——给她们套上一根有君主国旗帜的套索。她们必须在小营房里报到，然后去打扫城里的大街。两方面都做坏事。”

那位太太沉默不语了。玛丽娅拿着电石灯走进了厨房。

马蒂亚斯抖掉了落在自己膝盖上的灰尘。说：

“你已看到这儿生活要用照明，可能要晚三个小时才有电灯；出现这种情况已不是第一次了。”

玛丽娅回到餐厅。电石灯的火焰映在新来女租房人的镜片上。在电石灯的白光中，那女人的脸色更显得阴沉和痛苦。

“我的胡利安是个最善良的人。我对政治既不接触也不懂，也不想搞懂。可是，我要说的是，先生……如果能更好地把事情分开，那么就会是另一种情况。你说呢？”

她手提包中翻了一下，取出一个装有照片的小皮夹。

“居中的那个人是我的胡利安，”她说道。

他立在一伙农民模样的男人中间。所有的人都穿着一身军服，挽起袖管。在他们的前面有一班握有插着刺刀、枪托支在地上的步枪队。胡利安臂下夹着一本书。从外表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略微发胖、脑袋有点秃的男子。这队民兵的背景是一个山地的乱石岗。

“事情是这样的，”那女人说道。她还保存着许多照片。“他患了坏疽，医生不得不把他的两条腿截掉。我在豪华旅馆的医院里见到了他。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可怜的人已被人做过手术了。他对我说，他的脚趾头上痒……请注意！他没有腿了！听到他这么一说……我放声大哭，顿时哭死了过去。”

马蒂亚斯显出一副暧昧的神态，表示同情。

“这个患坏疽的人的情况非常糟。我认识一个缺了两条腿的人，他坐着一个小车向人乞讨。他对我说，太太，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一百次。”

艾伊达继续讲她的经历。当一切都结束时，他回到了村里。尽管那儿经历了战争，村落却完整如旧。在基地的围墙边，两派之间的冲突已经解决了。

“我仍活在世上感到害怕。再说，我只有一个姐姐了。她与市长的一个佣人成婚，但他们有很多子女，而我成了一个累赘。我有两三个星期不敢走出沿街的大门了。人们给我起了‘红色教堂司事的女人’的绰号。地方上的负责人一个劲地向我追问。上帝知道他问了我多少问题。”

她继续坐在椅子边上。马蒂亚斯显出一副不耐烦的神色，他整了一下制服裤。

“我曾在我姐姐家里住到他们几乎要把我赶走的时候为止。我的姐夫说，你不能在这儿继续待下去了，还说他感到非常遗憾，并要尽可能地帮助我，可是由于我的过失，他们对他看不顺眼，因为自己子女的面包是最神圣的东西。”

艾伊达压低嗓音讲她的经历，她来到马德里在一些先生家里做女佣。

“他们供给我吃饭，星期天给一点点钱。在我认识堂何塞之前，我的生活过得非常之差。”

电石灯又亮了。电石灯的火焰很快就变得昏暗、苍白。马蒂亚斯解释说：

“我们好像住在山洞里，没有光，白天好长时间没有水……而且没有吃，肚子空空，请原谅。”

“在我的村里还是用电石灯、松明照明，”新来的女房客说道。

谈话慢慢结束了。他们也不知道谈些什么，相互看了一下对方的脸。

“就这样吧，你已经知道，你付三十杜罗，这房间就给你留下，你什么时候来住都行。”

“那么粉刷呢？”

“明天她会去通知油漆工的，”马蒂亚斯指着他的妻子说道。

“好吧，那我不再麻烦你们啦，我走了，”新的女房客说。

“改日见，”他们向她道别。

玛丽娅把那位妇女直送到沿街的大门口。然后，她去商店买涂料，并向店里租了一个油漆刷。酒店老板伊拉里奥在楼梯上给她让路。

“我来粉刷房间。不值得花十杜罗去请油漆匠，”玛丽娅对自己的丈夫说道。

过了没有几天，艾伊达太太回到这房子里，带来了家具。她是由一个名叫堂何塞的男人陪着，她介绍说那是自己的朋友。

新租房的女房客在家里几乎没有打扰他们。大部分日子她是关在自己房间里度过的。丝毫听不到她有什么动静和说话声。

安东尼娅与她交了好朋友。安东尼娅一有空闲时间，就去艾伊达的房间做针线活。

在卧室的一面墙上挂着她和胡利安的结婚照片。艾伊达说，那位教堂司事与她的关系很好，尽管现在她有了未婚夫，每天下午接待堂何塞的来访，可她的思想上从来没有产生过摘下照片的念头。

“堂何塞对这些事情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他知道尊重感情。”

她告诉安东尼娅说，堂何塞有一点钱，他想和她结婚。

“在加西亚·莫拉托，他有一个旧衣店。他也是个丧偶的。我们结婚的唯一障碍就是他的那些女儿，看来她们是要插手干涉的。”

她的未婚夫是个细心的人。艾伊达在谈起他的时候总是把他称作堂何塞。他大概有五十岁左右，他不修边幅。因为他从经手买卖的衣服中随便拿一件穿在身上，所以有时候他穿的衣服过于肥大，使他像个小丑；有时候穿的衣服又显得太小，几乎

从来没有合适的。

他有一种很令人喜爱的笑容，而且为人慈爱。他赴约非常准时，每天晚上八点他就来叫门了。

艾伊达在约会以前，把东西收拾一下，用粉扑儿在脸上搽香粉，涂唇膏。每当听见已经听惯了的三下门铃声时，她就从过道上跑过去开门。可是，如果有人赶在前面或者来的不是堂何塞而是别人，那么她的脸上马上会露出某种失望。堂何塞向待在家里的所有人说晚上好。

“尽管堂何塞是个收买破烂的人，但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爱交际的人。他和那些去他店里卖东西的有教养的人打交道已经习惯了，”艾伊达说道。

每天下午他来到时，胳膊下总是夹着一包东西。他笑嘻嘻地取出腋下的东西放在她的房间里。旧货商打开包裹，取出点心。

“今天我带来一点香肠。”他说，或者说，“我带来面包和干酪。”

起初，堂何塞来看望女房客时，他们对马蒂亚斯没有说谢谢他之类的话。马蒂亚斯说，尽管堂何塞文文雅雅，但与其说他是好男人，还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厚脸皮的人。

“这成了一座约会的房子，”他对玛丽娅抱怨说。

可是由于堂何塞来访时，马蒂亚斯几乎从来不在家里。而且堂何塞不时地送他几包香烟。结果他也就习以为常了。

这对未婚夫妇每天下午在卧室里坐在窗户下面吃点心。她坐在椅子上，堂何塞坐在一张扶手有点损坏的椅子上。这张扶手椅是堂何塞赠送的礼品。

“你舒舒服服地休息吧。”堂何塞送扶手椅来时，对她说道。

艾伊达像她的未婚夫一样，焦急不安地等晚上八点钟的到

来。他们边吃点心边谈白天发生的事情。然后，倘若他有精力和情趣，便行云雨之欢。

“你给你的女儿们说过点什么吗？”艾伊达问道。

“没有，我不敢。”

艾伊达沉默了，他继续在讲话。

“因为我要说的是，男人没有一个妻子能干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干。只能像驴一样干活。他挣得的钱被魔鬼拿走了。”

她点头称“是”。堂何塞等艾伊达表示同意，以便好继续讲话。

“在做买卖中，我必须有一个人和我在一起，给我照料家庭。那些女儿不会给我干很多活。一个女儿在上大学，她为了不失体面，从来不在旧衣店停留一会儿。一个小姐已经离开了我；还有一个女儿，我看她是和欧洛希奥逛大街，不助我一臂之力，而且也根本不可能这样做。事实是我不敢对女儿们说我们的事情。怕她们会笑我，我必须给她们一记耳光。一个父亲不知道如何对自己的子女谈论这些事，而且她们确实是一些坏女人。”

艾伊达又点头表示同意。当然她心里明白。他已不是一个小孩，而她想有一个像上帝指挥一样的家，像一位太太那样生活。

“总有一天，你必须说，”她说道。

“对，”堂何塞回答说，但显得没有多大信心。

艾伊达坐在椅子上，闭着双眼。她看见自己在称旧衣服，算帐。她也看到自己在打扫的大房子。自从胡利安去世以来，他享着天国之福，而她在认识堂何塞以前，却一刻也没有好过。

“我看到一双鞋，你穿正合适，这双鞋是半高跟，而且有非常漂亮的图案。补鞋底的前掌还像新的一样。”

有几天晚上，玛丽娅和他们一起吃点心。她在门的周围吃

零食。后来，她作出决定时，便轻轻敲几下门，问是否能进去。问堂何塞一些事情，并且马上考虑对话。

“买卖怎么样？”

“买卖一帆风顺。人要解饥，便会出卖他屋里的家具什物。”

“堂何塞，一切都价格猛涨，”玛丽娅说道。

“不，确实有好多次数我的心被撕碎了，可那是我的生意。”

“这方面每天都有使人痛心的事！”艾伊达抱怨道。

“今天下午，没有去更远的地方，”旧货商回答说，“有一个女人要去出卖结婚戒指，据说这是她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可是看来，她不得不给耶塞丽娅丝送一小包东西去。她的丈夫因政治问题在坐监狱。”

“政治上的事情是坏事情；今天关这些人，明天又关那些人；然而付出代价的人总是穷人，”玛丽娅评论说。

“一向如此，”艾伊达肯定说道。

在政治这个问题上，堂何塞对两个人表示敬佩。

“罗斯福，尽管他患了瘫痪症，但他有好的职位。”

“另一个是墨索里尼。”

“是的，先生，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他现在不像。他在梵蒂冈和这个名叫希特勒的留查尔洛式胡子的小丑之间阿谀奉承。”

“斯大林也有好的职位，传说纷纭。对法国有好感。”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穿过国境。我待在一个叫土伦^①的地方。哎哟，那儿有好多船！显然像是日本舰队……”

旧货商身子靠在扶手椅上。

“在土伦我在码头做卸麻袋工，那种活相当艰苦，可我挣了

^① 法国南部沿海城市。

好多法郎。”

当堂何塞的舌头一开始讲话时，它就会不停地讲。它讲啊，讲啊，甚至唾沫星星从嘴边飞出。

“为什么你不会喝红葡萄酒？玛丽娅太太？我请客。”

玛丽娅给他讲法国以及她在电车上当售票员的事情。堂何塞听得笑了，很开心，并鼓励她再喝一小杯葡萄酒。

“为法国，为很快可以看到从德国人手中得到自由而干杯，”堂何塞举杯说道。

吃过点心之后，这对未婚夫妇就去克维多街心花园的咖啡馆听广播。如果是冬天，他们喝咖啡加牛奶。如果是夏天，他们喝杏仁茶。

玛丽娅非常开心。艾伊达是个善良的女人，而堂何塞是个少有的男子汉。

恩里克和奥古斯托回到自己的家里。在走出工厂时，他们穿过了洛佩斯·德·奥约斯大街。

“等一会儿，”华金向他们喊道。

他们在一个货摊跟前停下脚步买香烟。恩里克要了两支烟，他把一支烟分成对半，然后将其中半支烟递给了奥古斯托。

他们在人行道中间站着，旁边有一块空地。对面的另一条人行道上，工人们拥挤地站在电车站上。奥古斯托卷着一支香烟，用舌尖把卷烟纸的胶纸弄湿。先从中间到一端，然后，细致地从这一头到另一端。最后，他把香烟点着了。

和华金一起来到的有塞莱斯蒂诺和他的堂弟安东尼奥。

“我们去迭戈·德·莱昂大街好吗？”华金问道。

“我们一起去，”奥古斯托回答说。

五个男人便朝街的上头走去。

“恩里克，你说得对。事实是我们几乎要乞讨了。”

“全国都一样，有好多像我们这样的人，”恩里克将拿在手里的烟蒂扔掉。

“我对你们重复一遍，”恩里克补充说，“有许多人的处境像我们一样或者更坏。但这不是抱怨的问题，而是要做挽救工作。”

“餐厅的事进展顺利。老板无可奈何，只好安排我们工作，”华金插嘴说。

“问题是这样明摆着：如果我们十分严肃和坚决地做工作，对一切事情进行认真研究，那么我们就会有很多进展。”

“如果发生像对待费利佩那样的事怎么办？他们将他撵到大街上，现在他在卡斯蒂利亚的一些工程中做短工。以前加班时间，可以挣三十比塞塔，而现在只能挣二十个新比塞塔。费利佩有社会主义思想。”

恩里克重又看了一下安东尼奥，安东尼奥目光向下看街面。

“你的日工资还不够给孩子们买面包吃，你认为是公平合理的吗？当然所有的抗议都不会有结果的。我们要求事故保险，我们得到了。我们要求工厂给我们买工作服，他们拒绝了。关于食堂的要求，有了进展。”

工厂的所有工人都埋怨工作条件差。吃饭的时候，工人们出去，坐在围墙边晒太阳，吃着他们的夹心面包，讨论日工资。妇女们有好几次在讨论中成了主要角色。

“我们像你们那样工作那么多时间，我们很多人都做同样的工作；没有权利让我们少拿工资，”她们说道。

工人们三五成群，窃窃私语。但是几乎从没就如何进行反抗这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不要委员会，”有的人说道。

“委员会会带来许多不幸。他们会拿个什么罪名去把那些人抓起来。他们会说那些人是共产党人。”

“如果发现有人来抓你，你就敏捷地逃跑。你这样给工头们添了麻烦，他们就不会让你挣加班的工钱了。”

他们继续朝街的上方走着，太阳躲到了塞拉诺大街下方的背后。恩里克挽着华金的胳膊。塞莱斯蒂诺、安东尼奥和奥古斯托走在他俩的后面。

“为什么我们一个下午都见不到面？我想单独和你谈谈，”恩里克对华金说道。

“恩里克，你是好样的。餐厅的伙食和福利保险的事我们已经被你争取到了。”

“不，你不要这样认为，我们是为大家争取的，你，奥古斯托，塞莱斯蒂诺……工厂里所有的人。在这些事情上，几乎和所有的事情一样，仅仅一个人的意愿无足轻重；我的意见的价值和你的、奥古斯托或老师的意见的价值一样；没有特别的价值。唯一重要的是必须有个人第一个把它说出来。”

奥古斯托和安东尼奥抽着烟走在后面。塞莱斯蒂诺默默地听他们讲。

“你已经知道我的状况。我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子女。如果我的妻子不挣钱，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孩子们吃了。”

“你瞧，安东尼奥，如果一个人从同伴中分离出来，那就是站到老板一边。尽管他不愿意，实际上就是站到老板一边。把你们想说的都说出来吧，这里不谈政治，只谈为孩子们多争取点面包和食物。我了解你的状况，这不是说你讲的没有一点道理，可是必须永远站在同伴们一边。”

塞莱斯蒂诺在马路边走着，手里摇晃着饭盒。他戴着的贝

雷帽偏向前面，他嘴里哼着一支民间小调。

“在有虔诚的工人们的那个协会里，那些脑袋正在为这个问题发热呢，”他开玩笑道，停住了唱歌。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塞莱斯蒂诺，”安东尼奥的脸变得严肃了。“我不明白你开的玩笑。如果对上帝都没有希望，那么一个人怎么承担起这所有的一切呢？奥古斯托，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不，但是一样的。对于我来说，上帝就在人们中间；我们不能为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没有谁能去做。”

他们在迭戈·德·莱昂的地铁附近停住了脚步。眼前环城林荫道上覆盖着一片金色的地毯。金合欢的落叶在五个男人脚下沙沙作响。

从附近的一个研究室里走出了一群年轻的女工。她们穿着非常贴身的蓝色工作服。塞莱斯蒂诺走近其中的一位姑娘。

“再见，孩子，”塞莱斯蒂诺喊道。

“再见，父亲，祝你一路平安，”她笑着回答他。

姑娘们进入地铁。

“不像和你们睡觉那么好，”塞莱斯蒂诺抓住栏杆，甚至把身体靠向她们，朝这些姑娘行礼。

“你又不是一只公鸡，”姑娘们对他喊道。

华金要在索尔转车。他坐在恩里克旁边，几乎没法说话。因为车厢载满了人，而且在一片牢骚声中是很难听清的。

“我们实在拥挤不堪，”一个妇女说道，“没有权利让我们这样乘车，把我们像装牲口那样对待。”

“你没忘记你以前说过的话吧？”恩里克问华金。

“我想不起对你说过些什么。”

“改天，我们一定要就许多的事情好好谈谈。”

“不必担心，你下午有空时我们就谈。”

“你找个地方。”

“在教堂的花园空地的酒吧间，靠近蜡烛店。”

“我知道，上面有娱乐室。”

“正是这样。你想对我讲什么呢？”

“我们将慢慢地谈，不是你一点都不喜欢的，只是交换看法。”

华金在太阳门转车，去乘往四条路街的车。当他进入家门时，过道上点着灯。一片寂静，院子里往常的那种响声也听不到。厨房里睡着他的继母。餐厅桌子上给他留着晚饭：一盘土豆，两个切开的西红柿。华金坐到桌边便吃了起来；土豆又冷又硬。他看了一下四周的墙壁、餐厅里的家具，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快就感到一种巨大的忧伤。

有几个星期天下午，奥古斯托和他的妻子，还有孩子们一起去看电影时，恩里克留在家里。他惬意地坐在一张靠窗边的椅子上，把自己的两条腿搁在另一张椅子上，看两个小时的书。然后，他出去到马德里城的大街上走走。

有的时候，恩里克搀住奥古斯托的两个小孩子的手，带他们去曼萨纳雷斯河的两岸散步，而孩子的双亲单独出去了。午后半晌，他把孩子们带进酒吧间，给他们要了咖啡加牛奶。

奥古斯托的妻子总是跟他开玩笑。

“你是一个乏味的人，恩里克。你丢下街区最漂亮的姑娘，总是像一个不爱交际的人那样待在家里。那些该受痛苦的少数女人一下子就把你勾引住了，你只落得和最丑陋的女人待在一

起。”

“你把我介绍给谁呢？”恩里克笑着说。

“我不会把你介绍给谁。你自己有眼睛，对吧？我如果是个男人的话，我就不会偷偷避开罗莎。她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善良的姑娘。我知道你喜欢她。有好多次她在我的面前问起过你。”

“她是名门出身，”奥古斯托插话说，“她父亲待在监狱的时候，罗莎给父亲操劳。”

恩里克认识那位姑娘，有时在楼梯上和她聊天。罗莎有一张小孩的脸，眼睛明亮、活泼。有一次他在床上梦见罗莎睡在自己的身旁。

华金和埃尔·佩斯卡从小时候起就相互认识。他们一起在阿尔瓦雷斯·德·卡斯特罗小广场玩斗牛游戏，在基督教义学校里，为了到坎波·德·拉斯·卡拉维拉斯的平整地去玩，他们还一起逃学。

那儿，在圣马丁^①陵墓的围墙边，方圆三公里之内的所有的骗子、投机分子，无赖和妓女时常碰头。失业工人也常去晒太阳。

人们玩打钱游戏，玩希莱伊，玩付双倍钱的七点牌戏，玩七点半牌戏、掷堆、猜双单，玩特林，玩帕斯托斯，玩掷钱，玩击柱戏、打牌、摸彩，玩纸牌，打扑克牌以及玩所有其他被禁止的但在产业工人看来是走运的游戏。

在一幢背向农村、用砖砌成的楼房的正面墙上，用白漆大

^① 圣马丁(1778—1850)，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领袖。

字写着一条广告，广告上说：

蝴蝶一杜罗。

“在那堵围墙边，那些女人气的男人在搞交易，”埃尔·佩斯卡十分肯定地说道。

埃尔·佩斯卡住在阿拉米略胡同。他有几个在农村住惯了的熟人，其中有一个叫拉米罗，靠玩打钱游戏来维持生活。他是击柱和掷圆瓦片游戏的赌头。一场赌博游戏，他可以得到十分钱币。

住在阿拉米略胡同里的一位老大爷是埃尔·佩斯卡的另一个朋友。老大爷走路拄着木头拐杖，拐杖的末端钉了一根针，他用拐杖上的针来拾烟蒂。他在工作中技巧非常熟练。一旦刺住烟蒂时，他就马上把烟头放进系在腰带上的布袋里。傍晚时他回到家里，坐在灯旁，把烟头一个接一个地拆开，把烟丝放进一个金属盒子里。

“每个星期天，在拉斯特罗你可以见到他。”埃尔·佩斯卡对华金说，“因为他去卖烟。”

一天，华金和埃尔·佩斯卡与老大爷相遇了。

“生意好吗，马西亚尔先生？”埃尔·佩斯卡对他问道。

“不好，孩子，不好。香烟很贵，而且人们吸烟时，已不再扔烟蒂，他们把烟蒂保存起来了。”

“那你怎么办呢？”

“我想去何塞·安东尼奥大道，我听说在那儿豪华的酒吧间的门口可以拾到许多金黄色的烟头。”

“可是在那里有许多警察，不让拣烟蒂啊，”华金插话说。

“对，这倒是坏事，”老人最后这么说道。

黄昏时分，从多诺索·科尔特斯、华金·玛丽亚·洛佩斯、布尔沃·廖里略大街到临床医院和维多利亚女王大街的所有城区，许许多多的妓女、同性恋爱者在那地方兜生意。黄昏时分，为街区所有出众姑娘拉皮条的女人德梅特里亚太太也去做生意，她习惯于出售避孕药物。

“生活还可以，如今马德里你可以在每个角落遇见妓女，”埃尔·佩斯卡说道。

两位好朋友在荒废的公墓边走了一圈之后，去圣恩格拉西亚的咖啡馆的台球房寻找安东和埃尔·塔诺。

那是一家幽静的咖啡馆。咖啡馆在底层，里面有大理石制成的小圆桌和成对未婚夫妇。楼上是供打台球和玩牌用的。

下午五点钟，在咖啡馆的底层人就坐满了。成对的未婚夫妇坐着度过傍晚。他们要两杯咖啡，~~好~~有好长一段时间是在谈论房子和钱。接着，他们就沉默无语，觉得枯燥乏味。有些人在圆桌下，用手抚摩对方，表示爱情。

华金从那对未婚夫妇的身上感到一种巨大的忧伤。也许是因为在这么多星期日一直看见他们，熟悉他们的脸容。

“在西班牙，所有的青年男子不可避免地性欲苦恼。妇女们保护自己的贞洁胜过保护自己的生命，”安东说道。

“那是因为贞洁是唯一能开价的东西。我的车间里有一个叫恩里克的人说：在西班牙，人们使妇女铭记，她们唯一的职业就是结婚，”华金插话说。

“我认识一个去鱼店的女人，她说尊严和贞洁是同一码事。我清楚知道，”埃尔·佩斯卡说，“男人可以在任何部位摸她，这没有关系。可是对别的要求就不能谈论了。同时，只要她未损害，她就像处女一样贞洁。”

要到咖啡馆二楼，必须登旋梯上去。旋梯尽头对面是男女厕

所间。

客厅的深处摆着一长排供玩纸牌和多米诺骨牌的桌子。

“我们去下一盘国际象棋好吗？”安东对华金问道。

“别谈国际象棋。如果你喜欢，我们去玩台球，否则，我就‘溜学’，”埃尔·塔诺说道。

“玩台球，”埃尔·佩斯卡说。他也不会下国际象棋。

“鹰嘴豆的生意怎样了，塔诺？”华金问他的朋友说。

塔诺在安查·德·圣贝尔纳多大街的一家乳品商店当营业员，而且已成为他老板的得意门徒。倘若主人放了一叠叠厚厚的称火腿的单据，塔诺就会放两叠纸张粗糙的单据。

“这又不是你的生意。去你的‘火鸡’。”安东笑着说。

当时，塔诺和埃尔·佩斯卡通过一个窗户望着大街，华金为自己的父亲问安东。

“正如我对你说的那样，父亲坐了三十年监狱，他们把父亲带往布尔戈斯。他给我们来了封信，要我们给他捎一条被子去。”

“他身体好吗？”

“受人摆布，你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可是我们请求军事法庭检查。”

“那么你母亲呢？”

“你知道她了解事情的真相。情绪最受到影响的是我的小妹。总有一天他们会因为她的一时冲动来找我们的麻烦。”

“怎么？我们不比赛啦？”塔诺和埃尔·佩斯卡不再看窗外。

“我们来吧。”

安东在打球以前，在自己的台球棍上抹了点白粉。然后，他说：

“你知道吗？昨天在商业区出现一起重大事件。人们喊共

国万岁，是在西班牙大学工会里准备的。”

“在我的厂里出现了一些匿名讽刺传单。”华金说道。

“不，这还在发展。一个女顾客对我的叔叔说，她的丈夫是个军人，”埃尔·佩斯卡议论说。

塔诺向一个卖火柴的人买了一支烟丝金黄色的香烟。他喷吐着烟圈。

“我是一个没有一定观点的、大腹便便的人。我所希望的是让我的店能开门营业。其他的事人家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对于我来说，谁也不会来找我什么麻烦。”

“德国人开始屁股坐不住了。”

“我对你们说，你们不要抱幻想，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都是一个样，都是一路货色。政治家们干的只是两面讨好，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他们将是一些无耻之徒，不过，他们的眼力比这儿到利马还要远。”

人们可以听到球棍击台球的声音，从旋梯间那儿可以听到流行歌曲的声音。

安东连击五次台球。在一个角落里，玩多米诺骨牌的人在互相埋怨。

“如果你不让六个对子给吃掉，这场比赛我们就不会输了。”

埃尔·佩斯卡说要去加拉加斯。

“要溜走，那倒是个好地方。每天可挣二十博利瓦^①。我父亲的弟弟流亡在那个国家，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他说一个人劳动可以维持生活。”

“一个博利瓦相当于两个或两个多杜罗，”安东说道。

塔诺吸了一口烟。

^① 委内瑞拉的货币单位名称。

“得了！”他说，“你们总是谈论西班牙，想离开它。讨厌你们。”

“瞧，塔诺。好多人在看了一下自己的周围，什么也没有找到之后就走了。如果我没有希望，我也会走的，不过，我抱有希望。我相信这儿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不想走，”华金说道。

“你，小伙子，”埃尔·佩斯卡向塔诺走去说道，“你别过来，也不要吓唬人。和你的头头做黑市交易能挣一些杜罗，你就相信自己像骑着母驴一样。可是我的祖国在这儿。”埃尔·佩斯卡抓住睾丸，“我，如果走，那是为了回来。西班牙对我来说是这一个，”他重又抓住了睾丸，并指了一下心口说，“我想看到太阳怎样从阿拉米略胡同升起，想在鱼店里劳动，想和姑娘们谈话……”

塔诺吸了一口烟，烟已烧到他的指头尖，他就把烟蒂扔了。

“不过是浪漫主义，你的想法……”

对华金来说，塔诺有时使他厌烦。

“重要的不是你的想法，我的想法或是埃尔·佩斯卡的想法。重要的是在西班牙发生的事。有那么多的人想离开，说明有点不妙。如果工人走了，那么劳力、财富也就流失了……”华金回过头来看了一下安东。“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安东说道。

“伙伴们，他不是我的圣人，”塔诺回答说。

他们默默地玩着。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只听到枯燥的击球声。

“你们赢了，因为你们击中了‘要害’，”安东开玩笑道。

“安东，你的香烟给我一支。”

“你比一个修士还要要得多，拿吧，”安东向塔诺递去自己的烟盒。

“你知道昨天我看到谁在卡兰萨大街散步吗？”

“谁都知道。”

“住在安东的家的那个女人。她是多么漂亮啊！”塔诺谈论女人时，就像是吃糖水一样不断地舔嘴唇。

“我就喜欢像她那样的女人，富有性感和丰满多姿。”

“她叫弗朗西斯卡，是半个妓女。她和总管办公处的‘头儿’发生关系，这个‘头儿’给她家里塞满了成包的食品。”

“可是昨天她没有和‘头儿’一起走，她和一个来自蓝色师团①的长枪党成员一起散步。”

“她和谁都出去散步，从中得到很多钞票。”

“不过，你有困难时，请不要拒绝我的帮助。”

“是的，如果有，那当然。”

他们重又不说话了。从窗户外传来了街上的嘈杂声。

“为什么我们不去丘埃卡电影院？”

“因为这电影院，售票便宜，看的人总是很多，而且我不想去排在队伍的末尾。昨天我排队买木柴已经受够了。我和母亲一起去，为了帮她拿木柴，我们耐着性子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宁愿和洗染店的姑娘们去跳舞，”安东对华金答道。

他们走上大街已是晚上六点钟。咖啡馆的收音机用以前演奏过的同一首歌曲为他们送别：

请疯狂地，

① 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起，西班牙长枪党人根据佛朗哥的命令，采用统一的制服：蓝色衬衫和红色圆形软帽。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日，佛朗哥师团换下蓝色衬衫和红色圆形软帽，穿上普通的德军服装（但仍保留“蓝色”的名称）进攻苏联。“蓝色师团”在苏联作战时损失惨重。

热情地吻我，
有时这会使我痛哭。

“我们乘地铁还是乘电车？”

“乘电车。”

载满了人的电车，在站头没有停下，司机将车开得更快了，这时，晚钟敲响了。

“我们上车吗？”

“我们上去。”

他们便在车子后面跑了起来。埃尔·佩斯卡抓住了电车集电杆上的绳子，猛地一下子拉下电网上的“莲蓬头^①”。电车在没
有几米远的地方停下，同时售票员重新挂上了集电杆。四个朋友在踏脚板上抓住了车门。

电车像圣诞节的一个老人那样发出低沉的呻吟，乘客像成串的葡萄那样吊在车窗上或者立在车子后部的缓冲装置上。

电车在第一个车站停下。警察们排成一排，叫趴在车窗上的人下车。

“橡胶辛迪加的人已经在那儿了，”塔诺在谈及警察时这样说道。

“你知道就是那橡胶辛迪加的人，因为他们用警棍打你的脊背，”华金对他说道。

电车重新开动了，而且很快就到了四条路街，广场上一片星期日的气氛^②。成群的男女青年在广场中心的圆形建筑物、那只有四个表盘的钟下等候。开往培尼亚·格兰德、富恩卡拉尔、

① 系指电车上的触轮。

和拉·德埃萨·德·拉·比利亚大街的白色电车停在广场的另一侧。在地铁的进口处，有几个妇女在卖棍子面包。买主反复地用手摸着，以便拣些更粗、更细软的棍子面包。其他的一些妇女在卖香烟。

所有的商贩和做黑市买卖的人都好像有一种第六感觉，能知道有卫兵和警察来到。当一个穿军服人在广场出现时，那些妇女就把商品藏在她们的围裙下面。

在布尔沃·穆里略和维多利亚女王大街之间的一段人行道上，人们设了一些摊子。出售的东西有，葵瓜子、杏仁、无花果、荸荠、各种煎饼、烤白薯、角豆面粉饼以及烤干的栗子。

埃尔·佩斯卡买了一个烤白薯，华金买了一百克杏仁，安东和塔诺——他们钱不多——只买了点葵瓜子。

货摊旁边的房子正面墙上贴着大都市电影院和蒙蒂哈电影院的广告。同时还贴着几张政治宣传的标语：

没有一个家没有灯；没有一个西班牙人没有面包。

“我们去哪儿？去富恩卡拉尔吃甜瓜还是到桥下去跳舞？”

“塔诺，你是一个有名的贪吃的人，想的就是吃。我们要么去洗染店那儿的桥边，要么留在这儿。”

他们继续沿着维多利亚女王大街朝前面走去。人们可以听到咖啡馆里收音机的声音，广播员在评述足球交锋的情况。航空体育队在比赛场上获胜，巴塞罗那队和马德里队还是踢成平局。

“下星期天，航空体育队对马德里队的比赛你什么也别管。”
埃尔·佩斯卡说道。

塔诺又赞美起一个丰满的女人来了。他双手叉腰，弯曲着

腰部。

“你在黑暗中走，比杀牛的‘马查基托^①’还要走得风雅。”

他们在圣约瑟医院和圣阿德拉大街再下面一点的地方，走上了另一条路。这条路是通往市郊的一个小街区的。从附近的小吃店里传来了舞曲声。小吃店门口聚着成群的姑娘和小伙子。

走到了马路的尽头时，他们继续在一条用沙子铺成的大街上走着，这条街径通阿马涅尔桥的洼地。

在所有那些棚屋之间耸立着阿马涅尔桥的桥洞。在卡纳利略·德·洛索亚附近的果园里面，有几个男人用大锄头在翻土地。桥边的小酒馆里还没有开始跳舞。小伙子和姑娘们在院子里等候。乐师——一个老手风琴手和两个十二弦琴演奏者——待在院子角落摆着的桌子旁边。他们喝着酒，和主人聊天，他们的乐器挂在椅子背上。

赫苏斯酒店是阿马涅尔足球俱乐部的交际场所。俱乐部会员和支持者到那儿去庆祝这个足球队获胜。酒店四周的墙壁上有足球运动员的照片、旗帜和电影艺术家的照片作装饰。在柜台的架子上陈列着阿马涅尔足球队获得的奖杯和胜利纪念品。

每次跳舞从不缺席的是现代洗染店里的姑娘。姑娘们说，她们非常渴望星期日下午的到来，为了要穿上较新的衣服，一有青年男子或老头儿出现，她们就抓住他，同他跳舞。

姑娘们学会了广告的词句，替她们为之工作的那家洗染店作广告，不时地来一句，不管有用无用，她们集体朗诵这种广告

^① 马查基托(1880—1955)，西班牙斗牛士。

词句：

向污迹开战，
向颜色开战，
现代洗染店，
是最佳洗染店。

当然，最佳的，还是这些姑娘。

她们坐在院子边的金属椅子上，肩背倚在酒店热烘烘的墙上。这时，夕阳的余辉在消逝。从桥洞里可以看到乡间别墅上空有一道红霞。

洗染店的姑娘，看到有四个朋友进来时，有点激动，其中有个姑娘笑着向在她身旁的姑娘转过身去。

“卡门，靠拢一点。你两腿分开，像是马上要拍照似的。”

那一个姑娘拉了一下裙子，把双腿靠拢。还是可以看到她的膝盖，因为她穿了一条时髦的、很短的裙子。

“姑娘们，你们好吗？”

“好，你没看见我们吗？”

埃尔·佩斯卡把上衣擦到腰部，他在洗染店姑娘的前面扭着身子走了几步。埃尔·佩斯卡的裤子臀部有一补钉。

“孩子，来吧。你这样扭动，也不会成为列安·阿尔洛。”

卡门很注意，说“列”这个字时的发音。

“列安，不，而是一个表现挺好的。”

“好吧，不在这儿跳舞吗？”华金问道。

“因为那个管弦乐队不理睬你们……”其中有一个姑娘回答道。

四位朋友向主人打了招呼，进入了酒店；然后，他们用胳膊

肘撑在柜台上。

“拿四瓶红葡萄酒，”安东说道。

“在要狂舞的时候，最好让身子里有点热，然后，你的话就会比一个讲道者说的还要多，”塔诺说道，一口喝尽了他杯中的酒。

在酒店的一个角落里，有几个士兵在打扑克牌。他们在桌子上放了一瓶白葡萄酒，在两次洗牌之间，轮着喝酒。

“我，到了退伍时，我就回村子去。我想偷一个面包和一片肥猪肉，一个劲儿地把它吃进肚去。”

“我也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马德里虽好，但是一个讨厌的地方，口袋里没有两个雷阿尔。谁能向父母要钱呢？他们自己也要过日子。我的老人是个打短工的，我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另一个士兵说道。

华金一面喝酒，一面向门洞里露出的长方形亮光望去。这时开始奏起了音乐。只有姑娘们在跳舞。她们从门前经过时，向他们做出怪相。

“无聊极了，”她们喊道。

酒店主人在院子拐角的井边吊水，他用水浇地，免得让地上扬起灰尘。店主是个结实的男人，长得臂粗背宽。

“他是个拳击家，在瓦斯场地比赛过。”

“没有什么思想。她们全都有着这同一个情人。”

“他是一个‘床垫’，”塔诺说道。

士兵们在继续谈论。

“对于我来说，我的脸只被打过两次，”其中有个士兵说道。

“当时，因为谁也没有自愿去参加，他们把人抓到蓝色师

团。”

塔诺哼起了一支小曲。

“我们能否四人合买一包布比牌香烟？”塔诺向其他几位朋友建议道。

“葡萄酒已经上了你的脸了，一包布比……劣等烟草，会叫你像火烧一样。倒好像我们是没抽过金黄色烟丝的香烟似的。”

姑娘们继续在门前走着，没有小伙子，她们自己跳着舞。

“什么？我们去和那些女人调一会儿情好吗？”埃尔·佩斯卡建议道。

“我们去吧。”

乐师们在弹奏进行曲。华金和安东已经在院子里了。他们把卡门和另一个他们不认识的姑娘分开，刚才她们在一起跳舞。

“喂，”华金对姑娘说。

“喂，”她答道。

“我不认识你，你是第一次来，对吗？”

“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佩比塔。”

“知道了。”

“你是华金，对吗？”

“是的，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已经看到了，我的女友们把你的名字告诉我的。”

“你在洗染店工作？”

“不，我在面包店当售货员。”

“那么好，现在大家都肚子饿，你到街上的小伙子那儿去，那

儿什么也没有，一个姑娘有你喜欢的各种面包，价格低廉。”华金开玩笑说。

“我没有未婚夫。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一家工厂的车工，每天下午去学校读书。”

“啊！”姑娘叫道，“大学生，你们这些流浪汉竟是些大学生。”

“不是什么流浪汉；问题是我们喜欢好人，尤其喜欢像你这样的好人。”华金对她献媚说道。

安东和卡门跳舞，眼睛盯住天空的远处，直到乐曲结束才向下看。

“你跳得比大蒜还要僵直，别看云彩了。你和清白的人在一起别心不在焉！”

“我正在想事情，”小伙子回答说。

“你在想肉色的秘密吗？行了，别想了，给我讲点什么。你注意华金和佩皮塔了吗？他们干的不过是在暗处走路，他们刚刚认识。”

天色渐暗；附近的田野传来了风的声音。晚风吹动了用金属丝吊着的纸铃和中国灯笼。这些金属导线从入口处的小门廊一直挂到酒店的围墙上。

酒店老板点亮了灯。

“你暂时离开一下，去喝点酒。”

埃尔·佩斯卡没有办法。他一抱住一个姑娘就再也无法和她分开了。在他和自己的舞伴之间紧得容放不下一张卷烟纸。

“我只喝三杯红葡萄酒。”

“行，喝三杯红葡萄酒。自从你在鱼店工作，每次给家里带来‘狗鳔’以后，我母亲已经喜欢把它做成菜肴了。”

“姑娘，你不‘俗气’。”

“我‘俗气’……”姑娘快快不乐，“我不知道你们这些蠢货和

酒鬼的事。大家对你们的看法都一样，因为你们是手脚非常利落的人。”

“你别生气，路易西。你知道我喜欢你胜过米饭加牛奶。那是因为和你在一起，我更起劲。”

姑娘离开一点，笑了。

“佩斯卡，”她说，“你是一个厚脸皮的人，你别说你那些不干不净的话了。”

接着她又补充说：

“你请我吃点什么。”

“给你所喜欢的东西，天空。我们去通知另一些人。”

跳舞时，塔诺的舌头发出嗒嗒的响声。

“塔诺在和欧亨尼娅跳舞；她比一只燕子旋转得还要轻快，”华金说道。走过去找他。

“欧亨尼娅正在寻找爱神，她是一个性欲很强的女人。你从来没有和她跳过舞蹈吧？因为她那对乳房像冻儿一样在抖动，”埃尔·佩斯卡说道。

在酒店内，四对男女坐在桌子周围。餐厅空荡荡的，因为人们在跳舞，或者看跳舞。

“请拿一盆凉拌莴苣和一瓶葡萄酒，”塔诺对店主说道。

“加一瓶汽水，”其中有个姑娘喊道。

“色拉里你们喜欢加黄瓜吗？”

“好的。”

“要加绿油橄榄吗？”

“好的。”

“要几只面包？”

安东用眼睛数了一下。

“我们是八个人，有四只长条面包就足够了。”

他向姑娘们转过身。

“你们还要什么？”

他的双手在裤子口袋里数了一下钱，“只有十二个比塞塔，不能再要了，”他心里想。

“一位‘罗尔斯-罗伊斯’^①老板，”欧亨尼娅说道。

木头桌子上堆满了花生果壳。酒店老板没穿短上衣，衬衫的袖子卷起来，脚上穿着一双阿拉贡产的麻鞋，酒店老板用手里拿着的抹布擦着木板桌面，掸去凳子上的灰尘，接着将抹布搭在肩上。

“来一瓶红葡萄酒和一瓶汽水，”他对柜台上的人喊道。

塔诺和他的舞伴低声说话。

“欧亨尼娅，你安静一会儿。你使我感到神经紧张。”

华金，他斟满杯中的酒，酒有一点溢到了桌子台面上。葡萄酒淌开来，流到地上成了鲜红的一滩污痕。

“有趣！有趣！”

卡门把指头在葡萄酒中沾湿，在自己的前额上碰了一下，接着她把其他人的前额也弄湿了。

“愿交好运，”她说道。

吃点心时，他们开着玩笑。华金像说旁白似的问佩比塔：

“你在哪儿工作？”

“在弗朗科斯·罗德里格斯大街，我八点下班。”

“如果你愿意，抽一天我去找你散步，”他补充说。

“面包店是一个漆成黄颜色的房子，靠近海峡。”

① 英国汽车驾驶员、飞行员和汽车制造商罗尔斯(1877—1910)与高级轿车、飞机发动机制造商罗伊斯于一九〇六年联合创办的公司，这是英国制造汽车的垄断组织。

“我已知道你说的地方了。”

他们默默地看着对方的脸。

“有几点啦？”卡门问道。

安东看了一下表说：

“十点十分。”

“星期日的晚上过得多快呀！平日的时间好像永远过不完似的，好像度年那么慢。现在要等待下一个星期了；我对你们说，这种生活让人厌烦。人们在整个星期中都在想节日怎么过……”

佩比塔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星期日的晚上不可避免地过去了。在院子上面的天空中出现了灿灿繁星。

“我们走吗？”

“随你的便。”

酒店老板在桌子边给他们算帐。

“西红柿四个比塞塔，莴苣五个比塞塔，油橄榄五个比塞塔，黄瓜三个比塞塔，面包十二个比塞塔，酒四个比塞塔，汽水三个半比塞塔。”

“我们摊付费用，”安东把他的十二比塞塔放在桌子上面。

“一共是三十六个半比塞塔，”酒店里的男服务员说道。

“你们身边的钱比洗澡的钱还要少，”欧亨尼娅笑道。

他们从酒店出来，向阿尔曼萨大街走去，并从那儿走往四条路街。走在前面的有卡门，佩比塔，安东和华金。欧亨尼娅和塔诺走在后面。埃尔·佩斯卡和路易西仍在跳舞。因为埃尔·佩斯卡遇上了他的一个朋友，那人是个军人，曾在格拉纳达服役。

“那儿情况很不好；每天游击队员进行袭击。”

塔诺和欧亨尼娅落在后面。塔诺搂住姑娘的腰走路，不久他们就消失在一片平整土地的阴影中了。

姑娘们住在布拉沃·穆里略大街，离阿尔瓦拉多的地铁非常近。他们在门厅里分手了。

“华金喜欢你，嗯？”

“哎……”

“华金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

“这倒说的是。他对我说，他要抽一天工夫来找我。安东也是一个好小伙子，”为了让她的女友高兴，佩比塔这么说道。

“可是他比一个卫兵还要严肃。”

在这欢快的时刻，两个女朋友笑了。

“明天见，佩比塔。”

“再见，卡门。”

夜空下闪烁着广告灯发出的亮光。汽车的车灯在石铺的马路上抛出一束束黄色的光。有几户工人家庭从拉德埃萨·德·拉比利亚大街回来。妇女们在商店的橱窗前列着考虑星期一吃的食品。酒店里走出来一群醉汉，其中有几个人的外貌像工人，有几个人的模样像乞丐。有几辆载着青年阵线的长枪党党员的卡车从山里回来。那些长枪党党员唱着爱国歌曲，挥舞着红色的贝雷帽。

“安东，我们怎么办？我们乘地铁还是买两支香烟？我只有一个比塞塔了。”

“我们走回去。夜景很美，而且我想抽支香烟。”

在地铁的门口，他们向坐在最后一级台阶上的女人买了两支烟的烟丝。那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烟纸是他们向从地铁里出来的一个小伙子要的。

“你们想要借火吗？”小伙子向他们递过去。

“不，谢谢，我们有火柴。”

在人行道上，一个醉汉朝他们过来；他唱道：

驼子，
驼子。
穿破鼻子，
被人吊死。

“安东，你注意到这个人吗？他是一个工人。有时我自己问自己，是否我们只是四个人，是否一切只是在我们的中间谈谈。你认为和这样的大叔在一起你能做些什么呢？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

“不，华金。这种人不只是缺少觉悟。事情必须看它的根本。在这个国家他们受到的打击非常沉重。没有人能比工人阶级更明白的了。还有一个等待和做事的问题。人们在做事的时候就不想喝得酩酊大醉。对于男子汉来说就和钢一样，这一点你知道得比我多。有的炼得好，有的炼得差，但所有的都有点用处。”

“对，小伙子，是这样的。不过，我是在把自己活活折磨死。我挣得的钱什么也买不到，我穿的衬衫还是我父亲的旧衣。”

“你认为其他的人不是过和我们一样的生活吗？”

“请原谅，我没有记起你父亲的事了。”

“我父亲说，朝前走两步，往后退一步就能得到一切。”

“总之，来日方长，”华金说道。

“今天晚上你和佩比塔在一起时，情绪很好。”

“她心地很善良，舞也跳得好。”

“对。”

他们穿过赖孟多·费尔南德斯·比利亚维尔德大街。在另一条人行道上，两个警察向他们要证件；然后，警察对他们说，他们可以继续走路。

“我不知道发生的事情，可是已有好几个晚上，在整个马德里他们都要检查证件，尤其是在街区。前几天，我本人就经历这么一件事。我们在学校对面集会，他们让我们解散。”

“真见鬼！惧怕，无非是惧怕。德国人待不住了。他们在俄国前线的战事不妙。”

“在工厂里有人对我说起过这件事。”

“我曾去英国大使馆要过新闻简报。你去可不是玩儿的，”安东说道。

“是的，是有一点你说的消息，大楼的那些看门人，你会发现他们在院子里不再尖声说话了，好像他们把舌头吃了似的。”

华金他们在天使的圣母教堂前面走过。在教堂边的门廊里几个未婚夫妇在相互道别。

“华金，你知道吗？他们叫我停止参加宗教活动。神父忽然想起要问我谁是贝拉基^①。”

“毫无印象。”

“他是异教的主教，后来我在一本书中见到过他的名字。在政治上他们注意我，我一口气向他们讲了长枪党的二十六点^②。”

“不是二十四点？”

“二十六点。”

他们继续默默地走着路。后来，华金在洗涤池龙头的水下

① 贝拉基（约360—约430），古代基督教神学家。

② 长枪党是西班牙的政治集团。一九三三年由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创建，在对反动派党派和革命团体都感到失望的青年中发展党员。一九三四年与另一同类团体合并，发表二十六点宣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德里维拉被共和国处决。一九三七年佛朗哥成为长枪党的领袖，一九七五年佛朗哥死去，一九七七年四月长枪党被正式取缔。

冲了冲凉爽一下。玛丽娅在厨房的炉灶上，给他留下一盆大蒜汤和一堆油煎鳀鱼。他胃口很好地吃了晚饭。吃过饭后，他去找自己父亲的制服，看看是否能找到一支香烟。

再过几个月，华金满二十一周岁时，他必须参军服役。在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兵营的大院里，应征的新兵办理手续整整花费了一个上午。

“把我们派到哪个兵营去？”华金问一个老兵。他邀请老兵在一家酒店喝几杯。

“派到蒙克洛亚兵营。”

酒店里挤满了士兵。有些人在玩纸牌，还有的人支在柜台的台面上饮酒。

“你好吗？”

“兵营总归是兵营，小伙子。你再付一杯酒钱好吗？我身无分文。西班牙给战士的薪金只不过能喝两杯酒或者买一枚邮票。”

“我再给你付一杯酒钱。”

“小伙子，这就好。你在军队里待不了多久，也会有一张像我这样的面孔。你有香烟吗？”

“有。”

“我将对你说的的是一个兵营里的情况。白天你在起床号，训练、吃大锅饭、散步和回营号中度过。然后，你就去睡觉。你必须负责给自己洗衣服，把长统靴、子弹带、武装带擦得亮亮的。首先从班长开始，对军士长、队长、少尉、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上校和将军，你必须敬礼，你也必须学会削土豆的皮、打扫连队营房和院子。打扫连队、厕所，挺起胸膛，立正。你去进行军事训练

时，双手会冻僵。他们会叫你笨蛋直至你掌握合着别人的步伐走路，学会举枪致敬。在餐厅里他们将教给你理论。长官坐在一张桌子后面，你们坐在板凳上。长官像你们一样感到厌倦，不过，他将给你们上课。军士长——我认为“电粪”会对付你们的——将注意听长官所讲的一切，在板凳间走动。如有必要的话，他会用手强迫你们坐着。他们会问你们如何称呼国家元首，教你们陆军部长的名字、团级上校的名字、中校的名字、连长的名字、中尉、军士长的名字。你们将背诵士兵守则，他们将拆卸枪支，让你们认识它的各种部件。一八七〇年产的口径九厘米的毛瑟枪，由枪膛、弹膛、挺锤簧、枪栓……组成。在射击训练中你将可以打十二发子弹。然后，你在院子里向军旗宣誓。所有的军官携带自己的妻子都将待在那儿，随军神父将做一次弥撒，并进行训诫。他们打鼓吹号，你立正；奏起国歌。上校要求你们宣誓，说：新兵，这是你的军旗！你愿意为上帝、为光荣地保卫祖国的旗帜宣誓吗？所有的新兵都会说：我宣誓！在这以前你们将在院子里进行十二次训练，列队从旗帜下穿过，当走到军旗下时，用一只手抓住旗帜——用另一只手拿枪——，吻吻旗帜。尔后，上校重新对你们说：战士们！祖国是母亲，必须像爱护母亲那样爱护祖国，必须准备像对待母亲一样地保护它，服从它。我还要对你们说，因为……这样你才可以在兵营或在监狱开始做警卫员。因为你是战士，可能要求你投身于厨房、连队或牢房。也可能让你去看门，让你剃光头、取消你的休假。如果你的过失是严重的，那就会将你送往军人监狱，或延长服役几个月甚至几年。这要根据情况而定。如果你命运不好，轮到你去演习，那你就学会跳护沟、翻墙壁、在地上卧倒，而且只要一下命令，你就进行射击。用胳膊肘匍匐前进，吃冷的大锅饭。露天就宿，你终于会感到需要兵营了。你将走的路比一个在吉普赛人后面追赶的西班牙宪警走的还要

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认为,你的母亲生下你,就给你穿制服,你就会认为同志们是永恒的朋友,认为你从不认识的人。你就会发现一个长官是世上最重要的人,其重要性胜过你的父亲或母亲。你几乎不能见到这些长官,他们一直待在旗室。此外,如果你与军士长处理好关系,你就能很好地生活。这样,你就继续盲目地服从他,给他递支香烟,面带笑容地向他道谢。随军神父给你们谈论宗教。神父会对你们说,上帝在本质上是三位一体的,服从上级不只是战士的美德,也是基督教徒的美德。每年过复活节,你们领受一次圣餐,他们给你们一张小的纪念神像。圣灵受孕节^①——圣母是陆军的守护神——你将吃非常好的大锅饭和抽雪茄烟。这一天——据说——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不会抓你;如果你待在监狱里,他们将你放出来。守护神节,军官全家都出去,去望弥撒,打球和看电影。你可以痛饮一番——这就是所有的人做的事。在一年里还有四五天可以吃非常好的大锅饭、抽雪茄烟。礼拜天,你们列队去望弥撒。他们会给你们吃好的,还有几个小时的假可请。在星期天,如果你有钱,你可以去逛妓院或者去电影院看第一场电影。你还可以在酒馆里喝几杯,唱一会儿歌。要是你身边没有钱或钱不多,你可以在曼萨纳雷斯河边散步,和一些女招待员跳舞。有的人有幸和她们在一起,还可以有点心吃,并能握她们的手。如果你没有钱,你可以去战士之家玩四子棋^②,而且可以赊杯酒喝。在夏天你会有十五天休假,为了欢度圣诞节前夜,可有六七天休假。就这样生活,一直到准许你退伍。啊!有件事我倒忘了,就是看足球赛或其他活动,你只要买半票就可以了。”

① 十二月八日为圣母马利亚的圣灵受孕节。

② 这种游戏最多可以四个人同时玩,每人四颗同色棋子,棋盘上有许多格,投骰按点走动,最先将棋子移至棋盘中心者为胜。

老兵看着华金，从院子里传来了新兵的说话声。

“你是马德里人吗？”

“是的，”华金回答说。

“农村的人比城里的人更糟。我们是马德里人，从星期六到星期一可以回家。这在军队服役中倒挺有意思。你可以给肚子好好地补一下。”

“我们再喝一杯吗？”华金对老兵提议道。

“喝最后一杯，喝完我们就走。把你们带到兵营里去，军士长又要紧张起来。你已经认识他。我们叫他‘电粪’，他是个猪猡。”

“这个‘电粪’的绰号真奇怪。为什么你们要这么称呼他？”

“因为他是一个脏货，而且常常紧张地抽搐。把酒喝了，我们走吧。我在兵营里会帮助你的。经验十分重要。是一个往上爬的台阶。我叫洛佩斯。”

“我叫华金。”

他们来到院子里，军士长让新兵排成两人一排的纵队，并说了一声出发。战士把手提箱扛在肩上。农村里来的新兵看着房子、电车、小汽车。他们笑着、唱着。

“如果不是因为服兵役，我们什么时候能来马德里看看呢？”其中有个新兵高声说道。

在兵营的门口，有一个士兵从门房警卫室到大门的另一端来回地走动，他肩上荷着枪。值班的军官拄着马刀，眼睛望着公园里的树木。在旗室里，人们玩着骰子。

奥雷阿丢下她染衣服的工作，去托莱多大街的杂碎店做清洁工。新老板有点儿爱上她了。老板叫加西亚，是个加利西亚

人。

加西亚说，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投过希尔·罗夫莱斯^①的票，还和西班牙争取自治权联合会的人去工人居住区作过宣传。

“每张选票我们赠送一条褥子和一个杜罗，”他笑着说道。

内战期间，加西亚曾住在马德里。

“每天晚上我听布尔戈斯的电台，这样我就懂得了佛朗哥进入马德里时钞票的价值。”

在他的营业处悬挂着佛朗哥的像，另一幅是何塞·安东尼奥的像。这两幅像是加西亚后来买的，那时所有的商人似乎展开了一场争斗，要看看谁挂的像大，或者哪一幅像最漂亮。人们说，许多厚颜无耻的人在做出售这种肖像的生意，因为谁也不会反对这样一个意见：有拯救祖国的人的肖像是很好的爱国行为。

加西亚标榜自己是出生在埃尔费罗尔的。倘若有个顾客，一个知道杂碎缺点的内行，到过加利西亚或者和加利西亚人的人们打过交道，加西亚就会放下他手中的工作，在作出回答之前用围裙将自己的双手擦干。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历史，加利西亚人或守夜人或部长们。佛朗哥和我是同乡。”

卖杂碎的人有一个妻子，年纪比他大。她的名字叫堂娜罗萨里奥，身材又矮又胖，脸上长满麻子。

对加西亚来说，他的身体使他要求有比他妻子更诱人的对象。因为，除了少数情况以外，他总是用双手去触摸经常来杂碎店的随便哪个女人。

加西亚还是座落在安东·马丁广场附近一个庄园的庄园

^① 希尔·罗夫莱斯(1908—)：西班牙律师、政治家。一九三三年，西班牙争取自治权联合会的创始人。

主。他想盖一套有四间住房的房子，因此，他要讨好奥雷阿姨妈。在他们神魂颠倒的爱情中，有一次他答应给奥雷阿姨妈一套房子。由于他许下了这个诺言，她在堂娜罗萨里奥不在时就不客气地在店铺后室里接受他的殷勤。

奥雷阿洗刷店门、杂碎店的招牌和柜台的大理石台板，洗刷柜台是最令她感到恶心的事，因为大理石的台板上总是留着血迹、猪肝、肠子、炸鸡杂渗出的油脂以及其他摊在那儿的下水。

她还得洗加西亚使用的围裙。加西亚每个星期中总有一天，不让妻子知道，把围裙交给奥雷阿，围裙里裹着几堆拳头大的羊血，让女仆带回家去。

杂碎店的老板夫妇有一个女儿，她叫米拉格里托斯，女儿与塔萨斯检察院的一个职员结了婚。加西亚遇到有人向他罚款时，他去找自己的女婿，以便撤消这笔罚款。女婿做了他能做的事，加西亚表示感激。他带了几个油煎的羊羔脑子，两三串熏肠去看他。

检察院的职员和米拉格里托斯住在大城市侨民宾馆，宾馆在加斯塔姆比德附近。加西亚每次不得不去给他们送礼物时奥雷阿都不高兴，因为卖杂碎的店主的女儿自吹生活不错。

“我不知道你们在埋怨什么。在西班牙从来没有这样的福利和秩序。”

奥雷阿完全赞同，不过，在私下里却尽说粗话和咒骂。她脾气不好，当她回到家中时，不好的脾气统统发泄在附近的人身上。

“你去找个给面包蘸上油不喜欢把双手放在肮脏的衣服里的小姐！即使你一定会大呕大吐，你还是要洗围裙。就跟我叫奥雷阿一样肯定，你一定得洗，”她用两个手指组成十字发誓说道。

安东尼娅啜泣着，感到非常恶心。打开包裹，把围裙塞进一

个瓦盆里。

“姨妈，我真的不会。你让我做你要我做的任何事都可以，但是别叫我洗围裙。”

奥雷阿以她自己的方式喜爱外甥女。有时，她情绪不错，吃过晚饭以后，她会挽着外甥女的胳膊，带她去阿尔瓦雷斯·德·卡斯特罗街心花园的迪纳沙龙看节目演出。

“好了，走吧。把围裙放下，去做饭吧。你去剁一点儿洋葱，把血放在砂锅里。”

厨房的窗子敞开着，从院子里传来了妇女们忙碌的嘈杂声。从中还可以听到歌声，男人们要食品的呼喊声。

“你拿一个洋葱头放在头上，把洋葱头放在头上，你切洋葱时就不会掉眼泪，”玛丽娅说道。

奥雷阿，一边用大勺搅动着瓦罐里的四季豆，一边对两个妇女讲着从老板女儿家的加斯塔姆比德来时发生的事情。

“在足球场这边再过去一点，那儿正在建造一幢房子。两个男人在奔跑，一些警察在追捕他们。一阵连续的射击，两个男人躲进了建筑工地里。我害怕得要死，胆子很小，不敢走出柱廊。警察叫工人抓住他们，可是，那些泥水匠在脚手架上动也不动。”

马蒂亚斯和华金——因为是星期六，他们正在休假可以会面——在餐厅里等玛丽娅给他们送饭菜来。当听到女房客讲的事情后，他们便走到厨房门口，倚着门。

“他们给抓住了？”华金问道。

“没有，他们没有被抓住。警察爬上楼房，很快就下来，继续朝大学城的平地跑去了。”

“我对那种事情感到害怕。”

“那么有谁不感到害怕呢？”马蒂亚斯反驳道。“莫名其妙地碰上这种事，至少也会不高兴的。”

“你是对我说，”奥雷阿说，“我遇到一场虚惊。”

奥雷阿转过身来对马蒂亚斯说话时，她的右臂撞翻了正在用火烧的瓦罐。

“我的天哪！”她喊道。

瓦罐被打碎了，撒在厨房地上的四季豆在红色的辣椒汤中漂动。

“安东尼娅！玛丽娅！拿一个东西，把四季豆拣起来，你们别呆若木鸡。”

玛丽娅显得十分慌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安东尼娅跪在地上，抓起抹布擦干地板。

“笨蛋，不能用抹布擦！你去拿勺子和砂锅来。你以为我会把落到地上的东西扔掉吗？你这该死的家伙！……直到他们有点肥肉可吃。”

她抬起眼看了一下男人们。

“你们洗手，水在这儿，”她说道。

姨妈和外甥女跪着，从地上拣起食物，一勺一勺地将食品重又放进砂锅里面。

安东尼娅，从地板上看着华金，她又羞愧又愤怒，脸色苍白。华金避开她的目光，他嘀咕着离开了厨房。

“他妈的牛奶！他妈的！……”

从敞开的窗户里，传来了广播员和楼上邻居的说话声。

“阿尔弗雷多，”有一个人说道，“要我给你煎两个鸡蛋呢还是要吃排骨？”

厨房里一片沉寂，好像没有空气，也没有生活。安东尼娅和奥雷阿高举着勺子跪在那儿，目光盯住窗户。

安东尼娅站了起来。那姑娘发出的像刀刃一样尖利的非人惨叫声传到了华金耳边。

“你这个不要脸的该死的家伙！我操你爹！……我操你爹！要是你敢上来，我就给你吃两记耳光，”姑娘继续喊道，马蒂亚斯感到害怕。

“孩子，你不要侮辱他，你这样会使我们不高兴的。目前的状况很不好。”

院子里大部分邻居把头探出窗外，从一个接一个的窗洞里传来了喃喃的细语声。

“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纷纷问道。

“姑娘，你别作声，你大叫大嚷也没有用，”马蒂亚斯说道。

安东尼娅向他转过身去，双手间还握着勺子，眼睛里射出苦恼的目光，她重又大嚷起来。

“你们听着！你，马蒂亚斯先生。你是非常喜欢沉默的人，你只知道与妻子争吵或在足球场上叫喊！在西班牙你只知道这样来对待我们！”

所有的人又沉默不语了。姑娘气恼地吃着她的定量面包，玛丽娅继续在厨房里忙碌。奥雷阿姨妈不敢干预了。她渴望着加西亚将提供给她的那套房子。马蒂亚斯上班去了，他抱怨那些不知道住嘴的女人。艾伊达太太在她自己的房间里用假嗓子唱着歌。

华金坐在餐厅里，一声不吭，可是他的心在哭泣。

几个月以后，套间里的房客继续过着惯常的生活，马蒂亚斯继续与自己的妻子争吵，并威胁要离家出走。华金已是一个老兵。他收到佩皮塔和他的朋友恩里克的来信，恩里克在工厂做工。佩皮塔尽管在几个星期天能见到华金，可她每个星期还是给华金写两封信，讲讲她七天里所做的事情。讲讲有关恩里克

和车间里发生的事情。讲奥古斯托，锯木机碰到了他的手，锯掉了一个指头。安东尼奥尽管追随神父，但他对要求维护权益从不后退一步。在加班时间，他们争取到了更好的待遇。“亲爱的，这里的工作进展顺利。人们摆脱了晕倒病，开始高声说话。你退伍以前，我们将好好地谈谈。你记住，我们还有一次谈话要进行。”

有一天下午，在散步时候，华金向自己的家走去。街上下着大雨。雨水落在人行道的长条边石上飞溅开来。华金的军大衣的领子翻上来，双手插在袋子里。

在餐厅里坐着华金的父亲和另一个男人。华金到家时，那位朋友站起来。

“这不是你的孩子吗？”

“是的，”马蒂亚斯回答说，他瞧着自己的儿子，眼睛里有一种紧张不安的目光。

“他已经长大成人了。”

马蒂亚斯从他坐的椅子上立起来。

“克萨达和我一块去巴塞罗那，”他说道。

玛丽娅待在马蒂亚斯身边。她用焦急的目光望他，等他说话。

“你从这儿走了，可是把我们留在泥坑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男人想做的事，”她说道。

“我认为一个男人有权利过更好的生活。克萨达也丢下他的家。此外，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走，那是因为我要走。”

“对，那是你的借口，是你唯一能找的借口。是你要走。最好是你把一切都一下子说出来，你别再装假了。”

克萨达也站起来，可以看出这种议论使他厌烦。

“玛丽娅太太，这是一种好职业。是去开汽车，”他说道。

“马诺洛，你别插手这件事，”马蒂亚斯说道，“这已使我够讨厌的了，这只不过是挡住我的去路。”

华金脱去军大衣，有意地充当这场争论的局外人。

“父亲，”他说，“克萨达尽管是你的朋友，他对我们的脏抹布是不感兴趣的。”

“孩子，对理解这些事情你还非常年轻。你别犯傻，你别想来评判我。”

“我不是一个来原谅你、给你赦罪的神父。”

马蒂亚斯向自己的妻子转过身去。

“你别担心，我前妻的儿子会养活你的。”

玛丽娅在一个墙角里哭泣。克萨达说了一些笑话，试图缓和一下紧张气氛，但没有一个人发笑。连克萨达本人也没有笑。

华金走近朝院子的窗子，看下雨。

如果马德里皇家足球队不能赢得这场比赛，那么他们想取得联赛的全国冠军看来是非常之难了。从几个星期日之前，这个队就没有打过球迷们希望看到的那种球赛。当十一个运动员出场时，人们用震耳欲聋的呼喊声欢迎这支足球队。

这支皇家足球队的队长选了顺风的场地。二十二名运动员在球场中心踢了一会儿球，直到裁判员发出信号，要他们按各自的位置排好。

华金、安东、埃尔·佩斯卡和塔诺，他们用胳膊肘撑在一根金属栏杆上看这场比赛。

埃尔·佩斯卡在和一个人不认识的人说话。

“要是人们处在伊皮尼亚地位，那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我们看，那位大叔是一个‘笨蛋’，谁也不能去掉我头脑中这

个印象。”

“埃尔·佩斯卡，你听着，我认为你还是去掉一点坏印象。明天他们也不见得会收掉口粮的本子，让马德里皇家队赢！”

“我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可是这位大叔是位‘笨蛋’。”

“对于我来说，足球就是政治，我认为一切都是由上面指挥的。面包和竞技场，华金，”安东说道。

“好家伙，今天是有这么一点味道。”

马德里队的右内锋带球挺进，他独自闯过两三个对手，然后用力踢了一脚，将球踢给了球门的另一个边锋。

第一小组两个足球队的旗帜在风中摆动。风一停止，彩旗就懒洋洋地贴在旗杆上。

“你父亲走了没有，华金？”

“你别跟我谈论他。他去巴塞罗那了，而且既没有写信，也没有寄钱来。”

“他不会寄钱来。你知道这是司空见惯的。”

“是的。可是我家里等着开锅。我厌倦，小伙子，我厌倦。此外，我没有谁可以谈这件事。我都忍受不了了。自从我父亲走了以后，我的继母喝酒比以前更厉害了。房客，所有的房客也各有各的麻烦……”

“安东尼娅也这样吗？”

“安东尼娅没有，你不要认为她做个好人没有功劳。”

边锋夹在两名后卫中间。皇家足球队的内锋用身体做了一个假动作，在闪身躲开守门员以后，把足球踢进了球门。这时，人们挥动手帕。华金回答了安东提出的问题。

“你将去军事大学，你不会知道。可是那个地方唯一的好处是给面包和耳光。”

塔诺和一个女人发生争吵。那女人说塔诺利用地方狭小碰

她。

“太太，你在做梦。我双手放在衣袋里。如果你不想有人挤你的话，你可以待在自己家里嘛。”

“年轻人，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可不是能随便碰我的。你看你的脸皮有多厚。”

塔诺反击了。

“可是太太，别胡说八道，你比报纸还会撒谎。”

周围的人对他那有关报纸的说法都觉得好笑。有人肯定马德里的一家报纸是替德国大使馆服务的。

有一个人满意地搓着双手。他穿着一件有条子的海蓝色衣服，没有将双眼移开足球场。嘴上叼着雪茄烟，他不时地把烟从嘴上挪开，高声说话。

“很好，很好。这好像要进攻了。”

华金想起自己的父亲，想起他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看这种足球比赛。可以肯定，巴塞罗那举行足球赛时，他是一场也不会错过机会去看的。他记得，小时候，父亲带他到卡拉维拉斯运动场去晒太阳，而且观看了业余爱好者们的足球赛。

“因此，我认为我们有欧洲最好的足球队。其他出色的球队中哪儿有像毕尔巴鄂队那样的左右边锋，有像萨拉那样的前锋呢！你倒是说说看。”

穿着海蓝色衣服的男人对安东说。

“……英国足球队员。”

“你别跟我说这些蠢话，这些足球队员已经没有什么可做了。请注意，我要说的是我读过所有的报纸。昨天《进球》报上的一个评论就是这么说的。”

华金看了一下做手势的男人，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一次和恩里克的谈话。

“所有报刊上的文章，甚至讣告都要经过审查。买这一份报和买另一份报都一样，消息出自同一来源。你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足球消息呢？那就是要把人们搞糊涂，这样人们就不会去想别的事情。”

“我肯定，我们有一支好的球队，”华金回答说。他对此深信不疑。

场上休息了。上半场马德里队对塞维里亚以二比一领先。运动场上的商贩高声叫卖商品。

“有汽水吗？”有人喊道。

那个人对着瓶嘴喝汽水，然后让空瓶滚下台阶。

“你批评了所有的警察吗？”

“昨天我是批评过。”

“立——正！”

换岗警察只做了这么一个动作。

“我的中尉，遵你的命，警卫队已整好队伍。”

军官默默凝视着这个场面，他用马刀尖在长统靴上来回拨弄了一下；他右边的靴跟上有一块泥渍。

“你，把上衣拉平；你把帽子戴正；这儿，我们不喜欢楚佬^①。”

他重又看着队伍。

“军士长，队伍整毕。马上经过旗帜。”

军士长转向战士，中尉已经走了。

“喂，小伙子们，在中尉面前要注意，他是个硬骨头。我不喜欢你们飘着头发。”

① 系对马德里言谈中带着随便的下层居民的一种贬称。

警卫队住的是一间黑暗的小屋，一扇装有铁栅栏的窗户朝着院子，靠墙边有两张可折叠的床，每张折叠床有三个床位。华金坐在一张大理石桌子边。他用刺刀尖刮去粘在台板上的干的煎面包片作为消遣。桌边还有两三把椅子。在一个墙角落，枪支架上挂着步枪。华金想，这里当然比别的东西散发出更浓的气味。这种气味可以细细辨别。有被子、长统靴、勤务兵、士兵、大锅饭的气味。那是前一天的气味，另一天的气味和一个新兵的气味。

“班长，”其中有个士兵说，“你为什么不到厨房里去喝一瓶酒？”

“你等一会儿，还要等一会儿才开始喝酒。”

“对你来说，是一会儿，对我来说随便什么时候都是好的。”

华金继续坐在桌子旁边，他已不再用刺刀尖刮台板，这时他正抽着雪茄烟。

班长拿着酒瓶，从厨房回来。

“留一点酒给站岗的人喝。”

酒瓶从这个人的嘴转到另一个人的嘴上。

“昨天我在圣马科斯大街，我羞辱了一下雷米。”

“雷米做‘法国人’。一旦你不注意，他就打断你的骨头。”

“因为听说神父要把你的头发剃了。”

“那么他们干吗给我们一个里面装有预防措施的小口袋。为了去说教吗？”

所有的士兵都笑了起来。军士长站在警卫部队的门口。

“他妈的，你们不要那样吵闹，”军士长探出头喊道。

“我的军士长，你不想喝一点吗？”

“现在不想喝，以后再说。”

华金重新抓起酒瓶，他感到口渴，便喝了一大口酒。

“再喝这样一口，就只剩酒瓶了；华金见他妈的鬼去吧。”

“如果喝完了，就再要一瓶，”华金回答说，然后，他就躺到了一张双层床上。

“我退伍时，我就不回乡下去。”

“你是哪儿人，‘三个月’？”

“我是克伊波·德·利亚诺，海滨沼泽地的人。”

“这地方在哪儿？”

“在塞维利亚。”

“我也是韦尔瓦的安达卢西亚人。人们称我的家乡为阿亚蒙特。”

“那么，几乎是葡萄牙人。”

“没有什么葡萄牙人，是安达卢西亚人。”

“为什么你不想回去呢？我正想溜走。”

“三个月”坐在桌子上，人们叫他“三个月”那是因为他个子长得小。

“对于你，你母亲怀胎三个月生你，这样你的体质很弱，”人们对他这么说道。

“那儿，除了稻米还是稻米。那个岛如果有工作做的话，倒是个好地方；那个地方只有在重播或收割时才有工作。那时成千的人从西班牙各地赶来，有加利西亚人、萨莫拉人、昆卡人，甚至还有巴伦西亚人。他们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就做完了所有的农活。在这个时期必须挣全年吃的粮食。尽管你花了许多心血，但还是不能够得到全年吃的粮食。然后，你就无所事事，这时，少爷们就让你在水洼里打水鸭。以前据我的老人讲，海滨沼泽地原来并不属于什么人。现在，这儿有四户地主，有酿酒的人，还有牧场主。然而那些岛屿确实美丽：主人有马和牛，最有趣的是看牧人头领抽打公牛。稻谷当微风吹动时像海浪一样美。

“你的父母知道你不去吗?”

“他们知道。华金为我写过一封信给他们。我的弟弟给我写了回信。他已经会读书写字了。他说如果可能,就给他们寄一点钱去。他们在那儿,住在小茅屋里,日子难过。”

“那你退伍后去哪儿呢?”

“这我还不知道,如果可能,我就留在这儿。如果不行,那我就和采葡萄的人溜到法国去,”“三个月”答道。

上午平静地过去了。警卫队的战士谈论自己的事情。从铁栅栏窗里传来机械兵的说笑声。他们在打扫院子。军官们在旗室里和警卫队的中尉一起玩骰子。

“我来下赌注,”华金说道。

“他对我什么也没有说,对你呢,‘木尔西亚人’?”

“对我没有说。”

“那么说一个理由也没有啰。”

华金一面重新洗牌,一面看墙上的挂钟;班长也在看钟。

“现在已是换岗的时候了,停止打牌,”班长说道。

他们把枪背上肩,走着整齐的步伐去换岗。

卫兵从警卫室到大门的另一端开始走动,对面的人行道上,公园铁丝网的另一侧,有一群孩子在玩耍,那些看管孩子的年轻女佣人围坐在一起和汽车司机们谈话。

阳光直晒在街道的路面上,戴头盔使卫兵热得直冒汗水。卫兵用一只手擦去了额头的汗水,继续巡逻着。

院子里面,应征的新兵在进行训练。

“向右转,向左转,向右转,向左转。”军士长高声喊道。

这时,敲起了军鼓,吹起了军号。华金无意识地反复哼着进行曲。

“你不吃土豆,不吃;你不吃大米饭。”

大门的另一侧立着一条长长的妇女队伍。她们到了那里，相互打了招呼，她们把罐头放在地上，身子倚在兵营的围墙上。有几个妇女手中还搀扶着小孩。

“老总，今天有什么可吃的？”一个女人摆弄手中的罐头。

“我不知道吃什么，”华金回答说。

女人重又转回到墙壁那儿。

“他不知道吃什么，”她向别的女人说道。

“丘八，”有几个女人对他喊道。

华金看了一下刺刀刀刃。对面人行道上的孩子们上了小汽车，太阳继续落下去。

安东尼娅在马德里市中心一家理发店工作。理发店的主人是一个瘦高个男子，因为他冒充法国人，所以人们叫他‘保尔先生’。理发店老板是个漂亮男子，他总是穿深色衣服，而且在脖子上系真丝领带。

理发店的女总代理人叫欧拉利娅，是一位苗条的高个女人。她专门负责染色和退色的工作。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法语，因为她在法国待了很长一个时期，在奥斯曼大道的一个最有名的理发店里学习技术。

理发店的女佣人半带浪漫主义色彩半带恶意地讲述欧拉利娅的爱情经历。看来，新郎把她带到了巴塞罗那，在骗取了她积蓄的钱之后，就把她丢在拉耶达尼亚^①大道的小旅馆里了。

理发店的姑娘，身上穿着白色工作服，在空闲时，就坐在电话机旁和自己的未婚夫通电话。

冬天的阳光，温暖而又带白色，在理发厅的地板上留下了一块光斑。

① 即现在西班牙的卡塔卢尼亚。

“好了，姑娘们，别打电话了。”

有一位夫人进来了。

“下午好，堂娜卡门。”

“请，请从这儿过。现在我去叫安东尼娅。”

那位夫人走近一张小桌，拿起几本杂志。

“您请坐。”

“我想洗头 and 梳头发。”

安东尼娅将有托盘的带轮桌子推到那位夫人坐的理发椅旁边。然后，她给那位夫人头上擦洗发剂。

“您想把头发往后面梳一点吗，堂娜卡门？”

那女人朝托盘点了一下头。

“怎么，安东尼娅。还跟你的未婚夫在一块儿吗？”

“是的，夫人。”

“是个技工，对吗？”

“不是。”

“我有个印象他是个技工。”

“不，夫人，他正在学习。”

“我肯定有些反对意见。我丈夫说，不知怎么回事。可是一个人一学会计算，他就想进入办事处。人们就到处推荐他。如果你想为你的未婚夫干点什么，那你就对我说好了。”

“路易斯正在学习。”

“学习什么？”

“他想当律师，这关系到房子。”

“当律师？”

堂娜卡门在椅子上支直身子，通过墙上挂的镜子看姑娘的脸。安东尼娅手上满是肥皂泡沫。

“喂……看来你在用发夹。你想给我梳最近的时髦发式

吗？”

旁边的扶手椅上，理发店店主在吃饭。

“这样，一缕头发落在脸上。这是一种新样式，像你这种鹅蛋脸，非常适合梳这种发型。”

“喂，卡门。”其中有个别人跟正在给她梳头发的女人打招呼说道。

“喂，‘母猴’。”

“星期天在佩尔迪塞斯我没有见到你。”

“我没有去。你身体好吗？”

“好的，你知道我见到谁了吗？”

“孩子，我怎么能知道？”

“我见到佩佩·阿尔维拉伊斯了。”

“是大使馆的？”

“是的，他很狡猾。他和一个金发女郎在一起，他非常刁滑，假装心不在焉的样子。”

“像往常一样，我为马鲁哈感到难过……要是我有这样的丈夫……”

“这个姑娘，我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理发店老板说，“安东尼娅，你把烫发钳拿来。我对您说，我不知道姑娘们到哪儿去了。我有四个姑娘，我一不看她们，我就无法找到她们了。”

“我去给堂娜卡门送一本杂志。”

“你们总是有借口。你们挣不到我要给你们的三个杜罗了。”

理发店老板重又转向那两个女人。

“你们都是些忘恩负义的家伙。你们不仅学会了一门手艺，而且还……”

“喂，保尔，巴黎好吗？”

“巴黎、巴黎，像以前一样美好。德国人已经跑了。”

“对于我来说，佩滕^①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有一天我在新闻片中看到的；它是那么的古老和了不起。”

“安东尼娅，你别再给我上洗发剂了。”

“夫人，随你的便。”

“在罗德里格斯家里，他们给我做了一件鸡尾酒会的礼服。衣料是罗缎的，有一些褶子。衣服合身，而且没有后身。”

“安东尼娅，把堂娜卡门带到吹风机边去，你马上来帮堂马努埃尔理发。”

安东尼娅走近大窗户。在树木的那一边，可以看见广场另一侧的楼房。她思念着路易斯；他也许正在家里学习，或者在大学里学习。她跟他约定了晚上八点钟在邮局的拐角处相会。可是时间是过得那么慢，她能数出血液在血管里的搏动的次数。

“准备蜡烛。”

安东尼娅把蜡烛熔化在瓷罐里时，贝拉斯克斯小姐在撩起裙子。

“我们要到外省去初次登台演出《犹徐》，我不喜欢腿上有毛，这样很难看。糟糕的是检查以后，把这个戏弄得支离破碎。我相信拿剪子的人准是神父或修女。他干吗要来改动歌词呢？”

无论是堂马努埃尔还是安东尼娅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动歌词。

“你们想抽卡梅尔牌香烟吗？”

“谢谢，我不抽烟。”

“姑娘，那你呢？”

① 佩滕：危地马拉北部省份。古时当地为马雅帝国中心，现保存有许多马雅城市的遗址，最著名者有蒂卡尔（政府在此建有大公园和旅游设施）和瓦哈克通。

“我会把香烟留给我的未婚夫的。”

“喂，你大腿上长毛吗？我腿上的毛可多极了。”

那个男的按摩师把蜡涂在女艺术家的大腿上。

“把腿上的毛烧掉一点，”按摩师说道。

女艺术家低声地哼着小调：

……他是一个流氓，

从波尔蒂略到阿甘苏埃拉全都遭殃，

因为没有一位姑娘……

当蜡冷却时，按摩师用拇指伸到蜡下面，然后轻轻地拉，把粘在她腿上的一层蜡拉掉。这位女艺术家放下裙子，在镜子前浓妆艳抹。

安东尼娅把她送至门口。然后，她去和女助手和学徒工一起吃夹心面包。

“我愤怒地走了。老师傅惹我恼火；我让他去吃粪。”

“那个老师傅是个乌龟，”有个女学徒说，“你们知道今天他对我讲的事吗？因为他只付给我一个杜罗的工钱，说我正在学习手艺，这已经是付足工钱了。”

“那你就坏一点。”有个女助理对安东尼娅劝道。

安东尼娅到了大街上就像是摆脱了痛苦。她想，在理发店再多待一会儿，她就会大声叫喊，说一些连自己也不明白的话。

她赶紧走路，可是没有任何目标。

她走上了阿托查的大道，走在挽着胳膊走路的未婚男女后面。平静的傍晚降临了。几只鸽子啄着大地女神车子上狮子的花岗岩的鼻子。

她继续在未婚夫妇后面走着。在贝拉斯克斯^①雕像的前面

有几个孩子在做抢角落游戏。一个工人模样的青年男子，手中拿着一个贝雷帽在乞讨。

她走进了公园。以前，她看到一张告示上写着每星期三免费开放。安东尼娅在公园中心林荫道上走了一会儿便来到暖房附近。到了那儿，她觉得累了，便在一张石凳上坐下。

“好吧，我们来瞧瞧，我能干什么呢？我今年二十三岁，不能谋生。我像一只母驴，从早到晚地干活。”她高声说道。接着她看看是否有人听见。

她双手放在短大衣的口袋里，手指碰上了刚才人家给艺术家的那支烟。

她想抽烟，可是没有火柴。她虽然不是一个经常抽烟的人，但偶尔喜欢点一支烟。而现在，在这种时刻她真需要抽支烟。她犹豫了一会儿，终于站起来向坐在旁边凳子上的一对未婚男女借火点烟，他们惊奇地听她的请求。

公园里的树木光秃秃的，一片叶子也没有。树枝刺着天空。安东尼娅看了一下树木；有几棵树上挂着标牌。有一棵树的标牌上写着“假挪威槭”。假挪威槭，她心里重复道，为什么不种真的挪威槭呢？

坐在旁边的那对未婚男女斜着身子接吻，这使她大感兴趣，带来欢乐。但马上她发现自己孑然一身，便想念着路易斯。

冬天的太阳隐没在豪华饭店大楼的背后。只留下一片红色的余辉。安东尼娅看着太阳落山，不知为什么，马上对万物感到一种极大的爱，泪水从她的脸上滚滚而下。

她从凳子上站起身来，附近，内普图诺广场的大钟报了晚上八点钟。

① 贝拉斯克斯(1599—1660)，一译“委拉斯开兹”，西班牙画家。

她快步走着，生活又回到了她的眼里，血液又在她血管里流动。

“喂。”

“喂。”

“你等了很久了吗？”

“不，我刚刚到。”

“我们去哪儿？”

“去你喜欢去的地方，去散步；今天我甚至连五分钱币也没有。”

“路易斯，你知道吗？今天我想钟敲八点比想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更加迫切。”

“是吗？”

“我不知道，不过，今天我想见你，想得发疯了，你不知道我多么想你，心肝。”

“我……”

“从七点起我就兜圈子，为了消磨时光，我去了植物园。”

他们相互握着手，沿着阿尔卡拉大街朝太阳门走去。大街呈斜坡状，汽车川流不息。

“天气冷。”

“有一点冷。”

“我们去哪儿？”

“去你喜欢的地方，散步，我甚至连五分钱也没有。”

“我们去廉价的咖啡馆；我有两个杜罗的小费。”

“你留着吧。”

“用两个杜罗可以买两杯咖啡，还可以给你买几支烟。”

“你还是把钱留着吧，我们去散步。”

“我给你买烟，不会使你感到羞愧吧？”

“不，不会使我感到羞愧的。”

“那么，又为什么呢？”

路易斯像自言自语似的低声回答：

“是的，问题是，我总是缺钱，我的朋友们总是得借钱给我。”

“你发牢骚吗？你至少有家，可以学习，有可靠的饮食……可是你还要什么呢？”

“那么就不要再有自由吗？若不是为了有一天能有自由，生活对我来说会是荒谬的。”

安东尼娅噘起嘴巴，嘴巴噘得老高，显得悲哀，她收去了笑容。

“我没有那样迫切需要自由。自由本身算不了什么。当人们对事物、对需要满怀信心，那么自由也就来到了。”

“一个男人需要的是自由、思想、说话……”

“你可以抱怨，不过，我要说，你吃过夹土豆皮的面包吗？你天天吃草香豌豆粉吗？你去过社会救济所吗？没有，对吧？我对你说，你对一切都感到讨厌。他们想让你在一个墙角落里死去。然而你像畜生那样生活。你知道这个情况吗？都十八岁了，还和母亲住在一个房间里。一个女人，她只是你的姨妈。闻闻你的气息，看你是否背着她吃过什么东西，你就像是犯了罪似的，因为她也感到很饿。要不然，她打量一下你的衣服，看看你是否这几个月来一直是穿这件衣服。如果你回家晚了或者没有回来，那她就会在所有的人面前侮辱你，叫你妓女，而且就会问你和自己的未婚夫干了些什么事……路易斯，是饥饿逼得你丢掉了准则，而且……”

“住嘴！”

“你把我带走吧，去什么地方都行，我会继续干活，让你学习。”

路易斯不知道怎么办。他抚摩着姑娘，顾不得别人看见他们。路易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一个劲儿地吻着她的泪水。

“路易斯，请你原谅，我是一个傻瓜；你别理睬我。把手绢给我。”

她用手绢擦了一下脸，擤了一下鼻涕。

“走吧，我们去咖啡馆，”她笑了笑说道。

路易斯在独自待着时考虑能为安东尼娅做点什么事情。刚才两人分手，在按惯例说再见时，安东尼娅重复了她以前讲过的话。

“路易斯，你把我带走吧。”

他不知道安东尼娅的这番话是否只是使他产生忧伤或者一种无可言状的感情。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神经和血液从来没像当时为了爱和恨而那样紧张和激动。

“安东尼娅的呼喊，”他自言自语道，“就像是忧伤的西班牙的喊叫声，西班牙布满了监狱，到处是枪杀，农民没有土地，工人没有工作，忍饥挨饿。”

路易斯沿着安查·德·圣贝尔纳多大街朝同名的街心花园走去。由于当时用电限制，所以街道一片昏暗。在有些窗户的玻璃上，有点燃着的蜡烛的微弱反光。

路易斯陷在自己的沉思中，没有发现墙边排着一队人，直到撞上一个在责骂自己小孩的女人。

女人转过身来，愤愤地瞪了他一眼。

“兄弟，你的眼睛到哪儿去啦？要是换个别人就……”

“请您原谅。”

这是等待“社会救济”的队伍，它一直排到多洛雷斯的圣母

教堂的栅栏前面。人们耐心地等待分晚餐，他们埋怨食堂的女工，因为她们分得不快。食堂女工将长勺放在锅子里，然后将食物倒进救济事业机构制造的专门的饭盒里。

一个姑娘盛饭，另一个姑娘负责剪享受吃饭权利的卡片。

“今天吃杂饭，”一个妇女说道。

“吃什么杂饭？”另一个女人问道。

“吃土豆、鹰嘴豆、米饭和鳕鱼。”

“如您想得到一张卡片，”一个妇女对另一个女人指出，“首先必须做的是，在阿尔卡迪亚取得一张穷人的证明。倒不是说在救济所里，他们能给很多，而是一个人可以维持生活。小孩子和我一起吃橘子和热菜。我们把面包卖掉。”

妇女们为得到一勺更多的食物发生争吵。她们给食堂里的女工诉说苦难的经历，看看是否能引起这些女工的同情，给她们的饭盒盛得满满的。

路易斯举目看看那个娘们，看看妇女和孩子的长长队伍。那个地方，安东尼娅也去过，像其他女人一样，她也讲述过自己的经历。“你的眼睛到哪儿去啦？”有人对他这么问道。“有时，一个人想把自己的双眼埋进地里，呼喊得让石头也能够听见。不过，安东尼娅说得在理，我是一个纯正的男子汉；一个有一双干净的手、不知饥饿和害怕的男子汉。他既不站在这一边，又不站在那一边。我是路易斯·加西亚，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一个什么都缺的人，他要的只是能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声表达心头体会的自由，他没有足够的钱和未婚妻散步或者购买书籍。也许有一种必要的勇气，有朝一日来对付这艰难的处境，可是……”

他来到了自己家的门厅。那门厅很宽，而且有一个大理石的台阶。前面就是电梯。

“晚安，路易斯少爷，你父亲刚上去不久，”门卫对他说道。

“谢谢，”路易斯回答说。

路易斯的父亲，堂佩德罗·加西亚·布斯塔曼特，中等身材，胖乎乎的，头略微有点秃，是诉讼不多的律师，他的经济状况即使不能算好，也还过得去。

堂娜特雷莎，路易斯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卡斯蒂利亚祖先的家庭。在阿维拉的修女中间受的教育。她的文化相当于一个地方资产阶级妇女的水平；她会绣花，缝衣服，不太感兴趣地弹弹钢琴。她喜欢她所过的那种生活，不想知道那种会打破她日常那平静安宁的生活的事物。

对堂娜特雷莎来说，世人仿佛是不存在的。每天一大早，她去布恩·苏塞索教堂望弥撒。即使是下钉子，她也要去。然后她坐在起居室的窗户边打发日子。她看圣徒的传说，缝一会儿衣服，再通过透明的窗帘，看一下街道。

给这一家干活的女佣佩特拉，已经摆好餐具。她的年龄和女主人一样大，而且她被作为家庭成员来看待。她对路易斯很有好感，借了一笔钱给他，因为这女人有一点小小的积蓄。

每天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堂佩德罗，不管有谁在，他就躲进办公室里，收听英国广播电台播放的战争方面的有关消息。除了当律师以外，他还是一个爱好军事的人。他在一幅用图钉钉在办公室墙上的欧洲地图上看东边前线兵团的位置。

“路易斯，你注意，这个俄国元帅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堂佩德罗指着刚刚钉上地图的小旗说道。“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几乎被占领，柏林也唾手可得了。我要对你说的是，在伏龙芝学院的这种人后面，有许多头脑机灵的人。”

堂佩德罗关掉了收音机，看了一下口袋里的手表。

“时候不早了，我们去吃晚饭，今天我们有客人。”

“谁来啦？”

“你母亲的几个表弟要来。”

“父亲，你听着，战争结束以后，你认为能过什么日子呢？”

“谁都知道。据我听说，许多人相信和盼望世界大战结束后会过另一种日子，我们将重新有共和国，不过……”

应邀前来的客人坐在桌子边。他们是堂娜特雷莎这方面的远房表弟。这些表弟的欢乐样子和有意开的玩笑，使得路易斯更深地陷于自己的烦恼。他想不听他们说话，他整个思想在自己感到的不安中凝住了。他想起安东尼娅，以及她每天晚上吃的面糊。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觉得白面包的味道是苦的。

“那一起诉讼进行得怎么样了？”其中有一个亲戚这样问他。

路易斯没有回答，耸了一下双肩，继续吃晚饭。

“路易斯，你怎么啦？你把舌头也吃了吗？”

“这孩子生性非常古怪，”母亲说道。

“这可对谈恋爱不利，”其中有个表弟笑了。

他只会结结巴巴地说一些愚蠢的理由，心中忍受着一种忧郁的感情。有这些亲戚在场和提问，他感到恼火，这些远房亲戚在他看来，是那樣的陌生，就好像他们来自别的国度，讲一种奇怪的黑话。

然而，当他母亲的几个表弟告别时，他又显出一副对他们的友好表情，穿插讲了几句话。但他心不在焉，他竭力装出笑脸，却没有成功。

“路易斯，你非常没有礼貌。他们都喜欢你，你心里也明白。”

“训得倒厉害，”堂娜特雷莎评论道。

路易斯抬起头，看了一下自己的父亲；想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爱情的悲哀经历。可是当看到父亲时，他知道父亲不会理解他的。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祝愿他们晚安。

路易斯在自己的房间里，流星大步地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他透过隔墙听到了堂娜特雷莎祈祷时的单调的声音。做应答祈祷的是女佣人的声音。

他怎么有足够的力量来娶安东尼娅、用双臂紧紧地拥抱她而得到一种他所缺少的保障呢？他觉得周围的一切，他的房子、父母、隔代遗传的偏见都在反对他，它们用锁链把他拴住，不让他有任何一点小小的活动。他竟成了一个胆小鬼；安东尼娅把爱情完完全全地给了他，他想为她尽力，却又担心没有能力报答她。

因为安东尼娅像是一个很深的水箱，他想潜入水箱喝个够，解除生活中的干渴。

“安东尼娅！安东尼娅！我不知道把你带往何处？”他在黑夜中绝望地叫喊。

“第二经段^①。”可以听出这是堂娜特雷莎的声音。

华金退伍时，又和那些老朋友恢复了关系。兵营已经只是他的一个记忆，一块只不过抹去他两年多人生的海绵。

华金去看望工厂的工程师。这位工程师记起了华金的面孔，没有花更多的手续，就让他担任当初去参军时担任的职务：二级工。

“喂，小伙子，又一次开始工作了。如果你不参与政治，像有些人那样，那你就可以在这儿提级，谋生。为此，你必须听话。如果你不听话，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这儿你将没有什么事可做，”工程师对他说道。

① 系指《玫瑰经》的经段。

伙伴们热情欢迎他。

“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你还带来了壮丁的气息，”他们对他这么说道。

工厂里有许多不认识的人。

“有些老工人到别的地方去了。对塞莱斯蒂诺，有人造舆论坑害他，他现在待在卡拉班切尔。他们让他走了十年了，他的命运掌握在所有的人的手中，”恩里克对华金说。

“你还继续住在奥古斯托家吗？”

“是的，我还住在那儿。孩子们不愿我走，再说奥古斯托和他的妻子，你也知道他们非常客气，他们不愿意，甚至也不想听说这件事。”

“你有了未婚妻了吗？”

“奥古斯托家的一个姑娘。她是做裁缝的，名叫罗莎，我很喜欢和她在一起。我相信我身边有她的一张照片。”

工场里发出嘈杂的响声；龙门吊车在厂房的槽轨上滑行着。

“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听到这悦耳的声音了。工场里的响声好像有点特别，”华金看着吊车说道。他用右臂向开吊车的驾驶员致意。

“喂，佩佩。”

“喂，华金，”那个人从吊车的驾驶室里对华金说道。

“你看，这就是罗莎，”恩里克指着一张照片给他看。

“好极了，看起来，她长得蛮漂亮。”

“我喜欢。”

恩里克重又把照片藏到了皮夹子里。

“你们已经接吻过了吗？华金，我得给你安排另一张车床，”工头说道。然后，他笑着去铣工干活的地方。

“他变化真大，已经不是那样的骨瘦如柴了，”恩里克说道。他已经开动了自己的车床，而华金几乎听不见他说了些什么。

“今天晚上我们在我对你说过的那个酒吧间里见面。我还想起我得好好聊聊，”为了让华金听见，恩里克大声说道。

“要是你愿意，那就在晚上八点钟。我得回家去一趟。”华金说道。

加西亚·莫拉托大街的酒吧间是一个安静的地方。他们约定在那儿会面。晚上那儿坐满了打牌的人，还有几个老太太。她们是在附近的教堂里做完了祷告，去喝咖啡的。在酒吧间底层的里面，有一个可以容纳八张桌子的小客厅。在柜台边，可以看到通往楼上客厅的房间。从那儿，透过窗玻璃，能够看到教堂的街心花园，槐树的绿色树冠和电车的灰色车顶。

柜台上方，挂在墙上的几盏电石灯的灯光亮着。

华金坐在咖啡馆里面的客厅，那儿光线昏暗。白天的光线已在窗框和男服务员的短上衣上消失了。服务员耐心地等待朝街大门的玻璃后的电流的到来。

华金朝大门看着，等候恩里克的来临。他点着一支雪茄烟，双手放在两腿之间。没过多久，他看到恩里克来了，陪他来的还有奥古斯托。

“我在这儿，”华金喊道。

恩里克和奥古斯托在昏暗中摸索了一会儿，寻找着华金。

“喂，”他们说道。

“你迟到了一会儿了，现在已是八点半了，”华金说道。

“你知道，地铁这个时候是怎么开的，”奥古斯托说。

“我们喝点什么？”

“什么都行，喝咖啡吧。”

恩里克叫服务员；这个服务员还继续待在窗边。

“要是你们不在意的话，请稍等片刻，等电灯来了再说。刚才我倒翻了一杯咖啡，”服务员高声回答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客厅里没有别的什么人。

“你想对我说的话你说好了。”

“你将会发现，事情十分简单。”

“那件事我已经讲过了。”

“你看，谁抢走了我们劳动创造的钱？”

“伙计，谁会这样呢，”华金答道，面对自己同事的提问好像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是工厂主，股票。”

“是谁制造这些产品，然后让他们出卖呢？”

“倒好像他们在向我忏悔。请你别嘲弄了，说话要严肃一点，”华金说道。

“我正在严肃地说话，请你回答我。”

“我们，谁会是这样的人呢。”

“那怎么样呢？”

“你是想说，我们做了所有的一切，钱是我们劳动的钱，不是这样吗？”

“华金，这是我想对你讲的话，”恩里克说道。

他们重又沉默了，恩里克和奥古斯托寻找着烟盒。

“你现在怎么办？”奥古斯托向华金问道。

“现在？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已完成了‘服兵役’，以前你不是在学习吗？”

“是的，不过现在要学习是困难的。我父亲走了，而我必须养活自己。我将去做加班工。”

“这是很艰苦的，对吗？”

“伙计，直到你习惯过很苦的生活。”

“可这是庸人自慰，不必习惯那种艰苦的事儿，华金，必须与之斗争，”奥古斯托说道。

“我认为，如果我们以工作提出要求，是可以改善生活要求的。在所有的人中间，我们会相互帮助的。在工厂里可以做事情，我们不缺什么，我们是多数：有五六十个人也就足够了。”

“你看过报纸了没有？俄国人横扫德国，希特勒在柏林自杀了。意大利人已不那么重要了，日本很快要投降。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时机，”奥古斯托说道。

“对，这倒是真话。”

“如此真实，许多人跑到了山上，法国抵抗运动中的西班牙人在十二月粉碎了比利牛斯山的防线。”恩里克点着了一支雪茄烟，烟头上亮着一点红光。

“你不喜欢我们上山吗？”华金笑道。

“不喜欢。我希望你能和我们在一起，”恩里克回答说。

华金在自己的同事的提问下，沉默了片刻。被已烧掉了一大半的烟烫痛了指尖。

“有什么好不喜欢呢？你们总是走在前面，和你们在一起，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们是唯一敢于承担责任的人。”

恩里克和奥古斯托两人都笑了。

“唯一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不，在塞内特人中也有社会主义的同志。”

华金又点着了一支雪茄烟。有一伙人到了，这个小客厅里大概要坐满了。在昏暗的地方，那些未婚男女的话语和手好像显得格外亲热。

悬挂在客厅天花板上的电灯突然亮了。大街上是一片欢呼声，欢快的回声传进了酒吧间。

“灯光，灯光，”人们喊道。

所有的家庭开始有了照明，好像是开始演出节目的舞台的组成部分。

首先是对面楼房的一个窗户里灯光亮了。接着，小杂货店的橱窗、舶来品商店、路灯、所有的阳台上的灯都同时亮了。灯光跳跃着，仿佛是爆竹炸出了火星。

所有的脸上都很快就露出惊喜的神态。小客厅里的人第一次相互看了一下对方。说话也提高了声调，生活开始用正常的脉搏跳动了。

人们拍着手掌叫唤服务员。值夜的人重又说话了，他们的酒瓶上闪着明亮的光。

“要三瓶烧酒，”恩里克要求道。

“马上就来，”服务员回答说。

服务员在桌子中间走动。在酒吧间门口卖香烟的老太婆把自己的商品藏在一只蓝色的袋里。在地铁门口，那些报贩在叫卖当天的第一批晚报。

啤酒非常清凉，喝一大口酒，感到酒从喉咙里下去，那是十分快活的。留在桌上的是有一圈泡沫作装饰的空杯子。

马蒂亚斯自从去巴塞罗那以后，几乎没有他的消息。他只是写来了一张明信片说自己处境不坏，还说他住宿在汽车公司的一个同事家里。他没有寄钱回来，由于华金的工资不够养家，他不反对玛丽娅在雷科莱托斯大街的一家舞厅里当清洁工。

家里很冷。华金和所有的房客都睡着了。在大门的另一侧，玛丽娅想打开门，但双手不灵活，没有摸到锁。过道上的灯已经熄灭，开门的小钥匙落到了地上。

她在地上爬行了一会，摸着瓷砖，希望能找到凉冰冰的钥

匙，她在自己的膝盖四周转着，在那一片黑暗中，她找钥匙找得越来越累。她头晕了，这时她感到双手需要碰到一样东西，这东西要比地板还要硬。她的脸一下子碰到了墙上，把腹部和脸靠在墙上。她手指撑在墙上，慢慢地支起上身。然后，她站了起来，伸出手臂顺墙摸过去直到右手碰到了电灯开关。

玛丽娅不愿发出响声，她试图踮着脚尖走路。到了自己的房间。她从餐厅的沙发床前穿过。华金一直在看着她。

她让卧室的门虚掩着，接着，打开电灯。然后，她像梦游的人那样走到华金的床前。

华金的继母把自己刚脱下的破旧大衣盖在他身上时，小伙子仰卧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有一会儿，他的目光落到她卧室里溢出、照在她手上的一小束光线上。

她看到了华金那慌乱的眼神，华金用极度敌视的目光在看她。她那沉重的、昏昏欲睡的目光，什么表情也没有，也许它们流露出的是疲倦。

“你醒着吗？”她对丈夫前妻的儿子问道。

“把你的大衣拿走！”华金回答说。

“你会感到冷的。”

华金转过脸，对她大声说道。

“你让我安静点，把你的大衣拿走！像每天一样，你已经醉了。”

不，她没有醉。至少她没有完全喝醉。有时，她回家来，粗暴地同在街上碰到的人说话。有时她自言自语，高声说出心里时而出现的奇怪而又苦恼的事情。当悲哀占据她心头的时候，她也想念自己的丈夫、自己丈夫的前妻生的儿子，她想逃到住在法国的姐姐家去。

玛丽娅避开丈夫的前妻生的儿子的话，脸上毫无表情，一个

人待着，与她自己，与酒为她创造的世界在一起。她开始在镜子前脱去衣服。

她躺到床上，用手摸了一下她丈夫留下的空地方。她受不了那种冷冷清清，需要有个男人和她在一起。她想念他，想着怎样继续挣扎下去，身体渐渐感到疲倦了。他为人粗野，净想过好日子，不考虑困难。可是她爱他，为了留住他，她会给予任何东西。

她依旧把手放在床的一边，那儿是马蒂亚斯常睡的地方。她感到痛苦的是，想起了他们在刚结婚时的生活。一些糟糕的事情：饥饿，失业，年成不好的整个后果使他们中间的某样东西永远断裂了。

她发现自己在生活中是个无用的人。华金没有给她应有的重视，而且可以肯定在恨她。她原谅丈夫前妻的儿子，对他来说，生活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她像是一个废物，遭到所有人的唾弃。正因为如此，她酗酒，正因为如此，她才习惯于喝酒，直到喝酒对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了。

玛丽娅感到劳累，非常劳累，她必须给客厅的地板涂蜡，然后把它擦亮。尔后，进行日常工作，她得把隔天的脏玻璃器皿洗擦干净。

在厨房的另一侧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客厅的桌子边坐满了笑容满面的人群，可以看出他们对生活感到满意。

酒吧间的男服务员上身穿着白色的短上衣，这是一种无尾常礼服；下身穿着镶有金银饰带的黑色裤子。活动的场所与其说不大不小，倒不如说是大的。酒吧间里有一个半圆形的柜台，柜台周围摆了一些凳子。

客厅里有三个服务员和三个学徒服务。在柜台上，有一个酒吧间男招待员。厨房的头头名叫德西德里奥，他负责管理两个帮厨的男人和三个洗盆盆罐罐的女人。

客厅的气氛热烈，充满着人们各种声调的说话声，香水味及烟雾。

酒吧间里那张台面包着蓝色金属的桌子边，坐着三男三女。在他们的桌上放着两瓶白葡萄酒，六只红色的玻璃酒杯。还有一盘牡蛎、几小片柠檬，三个男人的面前，各放有一盒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

三位姑娘吃着肥鹅肝和奶酪三明治。她们对这个工作比对三个男人的谈论还要关心。

加西亚是酒吧间的老服务员。他站在桌子前面，微微俯下身子，在存根簿上记下顾客们要的东西。

然后，加西亚直起身子，快步向厨房走去，在与客厅相通的小窗子边喊道：

“德西！来两客美式的，一客火腿，再给三位先生来一客龙虾。”

“好，已经着手做了，”厨师回答说。

加西亚低声地，而且几乎是秘密地对厨房里的那几个女人说话。

“那些人是地地道道的姘妇！她们可不像你们，你们身上的肉还没有一辆自行车的分量重。我给她们服务时，她们真叫我不舒服；她们中的两个女人，可以看到她们很粗的大腿，然而另一个女人，金黄头发的那个，可以在她那大婶穿的袒胸露肩衣服里看到两个乳头。”

玛丽娅正在洗餐具，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对男服务员谈论的那几个女人感到好奇。

“你走开一点，让我看看，”她说道。

从小窗子里，她看到了三号桌子。“那个大概是可以看见其乳头的金黄色头发姑娘，”她心里想。金黄色头发的姑娘挥动着双手向一个认识的男人打招呼。她也看见一个衣着考究的男人，并有了一些年纪，他留有非常整洁的小胡子。那女人的一只手里拿着一只牡蛎。

“她戴着一只手镯，上面有一些如鹰嘴豆大小的挂件，”玛丽娅高声说道。

“喂，让我瞧瞧。”

其中有个女帮厨走到小窗户跟前，从玛丽娅的肩上伸出她的右臂。

“不是为了看这个，”她说道，“那些女人涂脂抹粉，打扮得好看，我喜欢看她们光着身子。”

那个姑娘由于自己讲了这番话发出哈哈的大笑声。加西亚在小窗户的另一端，用自己的右手从窗洞伸进去拧那位姑娘；不过，她给了他一记耳光。

“可是，如果你觉得裤子受不了……我们走，和你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德西德里奥烧好了龙虾，准备了火腿的配搭菜。

“来吧，你别嘲弄了，去干活儿。像你们在窗口看到的那样，给她端去吧。你们知道老板的坏心眼。”

加西亚把菜放在托盘上，把盘子举过肩，回到了三号桌子。

留有漂亮胡子的老头和他的朋友们在聊天。

“有人对我说，你们的事有了惊人的进展，建筑公司的事已经上马了。”

“好家伙，蒂诺，”另一个人答道，“你知道，人们对任何东西

都称之为是一件很好的买卖。”

“我每年有三百万的收益，我就认为很好。”

“人们夸大其辞；你已看到了，我必须和团的汽车保持一致。”

其他人听了这件事都笑了。

“这个胡安乔有事，”在他身旁的那个人说道，他把一只手放在一个姑娘的双膝上。他的手很大，手指短而有毛。食指上戴着一个大戒指。

“谁要一块三明治？”姑娘说道。她手指拿着一块三角面包。

“是什么的？”

“营养丰富，是肥鹅肝和干酪的。”

“你知道你结实吗？”他继续拧着那姑娘的腿。

“给你，宝贝。”

蒂诺，这个留着胡子的人，笑了。

“给结实的，路易莎。”他说道。

在柜台的另一端，有两个男人——从外表上看，他们像是德国人——在等待酒吧间的男招待员为他们调制两杯鸡尾酒。

“要两杯曼哈顿酒，”他们要求道。

“他们是德国人，”有一个男招待员说，“没有办法听懂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只会讲一点点西班牙语。他们很有可能是德国纳粹党分子；据说有许多纳粹党分子在西班牙避难。”

在另一张小桌子上，铺着红色台布，两个未婚男女，握着对方的手，在低声说话。

“你是一个无赖，昨天，我整整等了你一个下午。我待在加维里亚，可是你就没有来。”

“我整个下午是在上数学课。”

“唔，倒好像我会相信你似的；看在你那张漂亮的脸份上我相信你。你可能去打扑克牌戏或者去喝杜松子酒了。”

“你知道我正在拚命学习，这是我的补救办法。爸爸答应过，如果我进入卡米诺斯，他就给我一辆汽车。”

“我，我给你扔掉这不好的名声！”

小伙子用耸肩做了副怪相。

“你听着，亲爱的，你要一辆车篷可卸下的汽车。有一天，我看见一辆——漂亮极了——马达很长，比从这儿到门那儿还要长。车身是樱桃色的。一辆漂亮的汽车。时速至少是一百四十公里。”

姑娘的身子靠在椅子上；脸上泛起笑容，心里想着那樱桃色的汽车。她那温柔的双眼闪出喜悦的光芒。

“如果你是个好人，爱学习，那么我会马上让你吻我。你知道昨天我和谁在加维里亚吗？我和皮卢卡·桑切斯在一起。你还记得她吗？你是一定记得的，”她看到小伙子的脸色，说道，“她是我在法国修女中的一位女同事。她现在有一个未婚夫，是从事建筑的。你听好了，她以前是一个漂亮而又苗条的女人，可现在她成了一个大胖子了。”

在厨房里，工作依然按同一节奏进行着。炊事员和帮厨的娘们看到的是没完没了的堆成山的肮脏器皿。

“卢西，三号桌上那几个人准是大人物，他们挥霍金钱是一种嗜好。加西亚说，留胡子的那个给一个清洗工三个杜罗。我们挣三个杜罗得至少洗上千只酒杯。”

“不，对某些人来说，这就是生活。与此同时，像我们这样缺钱的人民，却是从针孔里看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事情就是如此。富人很少，妓女很多，穷人也很多。”

玛丽娅在女友们的掩饰下，喝着一个顾客剩在杯子里的白葡萄酒。

“这种酒真好闻，对吗？”有个男招待员从窗户里探进头来佯装不知地说道。

“你可以闻到酒味了，每瓶酒要二十杜罗。”男招待员从小窗户的另一侧回答说。

“闻主教的屁比闻酒味好，”德西德里奥说道，他从炉灶那里向玛丽娅看了一眼。

“你这样接连喝下所有酒杯剩下的酒，这会使你喝醉的，”厨师继续说道。

“即使我……”玛丽娅想辩解道。

“你会看到你做的事情，不过，喝这种酒很容易上瘾。”

“玛丽娅，你的丈夫呢？他一直在外地吗？”有个女人问道。

“欧洛希娅，他一直一直在外地；我在等他的信。”

“那么你的房客呢？那个自称是寡妇，可是听说和一个收破烂的人在一起的人怎么样？”

“还住在那儿。他们要结婚了。”

德西德里奥从炉灶那儿转过身来，他是一个粗野的男人，时不时地高声嚷嚷要去解小便，而且要人给他打着灯。

“在灯下度过许多小时的人们小便很急，灯光烫了他们的膀胱，”他说道。

厨房里的人不相信有这样的事；他们把这事归咎炊事员整天喝红葡萄酒加苏打水的缘故。

“喝葡萄酒加苏打水使小便增多；您就是这么回事。”

厨师从灶头转过身来。

“你把寡妇带走吗？那么我，就像谚语所说的那样；

我不会和寡妇结婚，
我真的不会结婚。
因为不把手放在她身上，
死人曾放到她身上。”

厨房里的妇女听了厨师的诗歌，笑弯了腰。

“乌伊……乌伊……死人曾放到了她身上，”她们重复唱道。

客厅里的说话声已平静下来。玛丽娅·梅尔切，这个咖啡馆里的歌舞演员，有节奏地扭动臀部，摆动肩膀，人们在大喊大叫。

柜台边的德国人在继续喝酒；他们坐在可旋转的凳子上，凝视着歌舞演员那挑逗性身段。

三号桌子边有一个姑娘和留有胡子的男人在说话。

“小胖子，为什么我们不乘车到别的地方去喝几杯呢？这个地方非常无聊；如果这些人不愿来，那么我们自个儿去。”

“你稍等一下，亲爱的，我们会去的。现在，我给你去要一点你所喜欢吃的东西。我正在跟费尔南多和胡安谈一笔重要的买卖，你不要让人讨厌，你让我安静点吧。”

他继续与自己的朋友们谈话。

“所以你已知道，我在部里尽快办理进口许可证，从中要花一笔钱财。不过，对于我跟你们讲过的那个朋友，必须让他在这件事上占一部分，而不是独吞。”

“那么你估计要交多少呢？”

“这我不知道，不过，没有一张二十的钞票是不会为这些文件动一个指头的。”

“我觉得二十太多了。”

“是这样。可你知道，总得给大车的轮子涂油啊；如果你不

涂油就不能走。不过，”他笑着说，“你像我一样明白，每吨一万，这价格等于白送，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以二万五千卖掉。”

“给这位朋友二十，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至少在我这方面是这样。不过，今天晚上由你付饭钱，其他……”

“没有什么要说了，因为我们在守则中说的，我把床铺放在妓女上面。”

“好吧，蒂诺，你不是小气鬼，要考虑到胡安乔。我们去那儿吃晚饭。”

“我又不是一条母牛，让你们调遣。”

普伊格是咖啡馆里穿号衣的看门人。餐厅里的男招待员告诉他三号桌子上的客人手里拿着钱。所以，他看到他们出去的时候，腰比往常弯得更低，马上跑去打开停在对面人行道边的小汽车的门。

姑娘们走在男人们的前面。

“我对你们说，这大人物是一个小气鬼。为了吃一顿晚餐和乘汽车逛游，他变得像一头猪。当然对蒂诺，我是第一次敲他的竹杠。”

厨房里的女工洗完了最后一批器皿，然后，她们走到餐厅里，把椅子放在桌子上，打扫地板。

看门人放下铁栅栏。老板在数盒子里的钱时，店里的职工待在柜台的周围，领取商店每天给他们的报酬。

玛丽娅待在大厅的另一端，把一包厨房里的多余食品放进大衣口袋，那是这一天剩下来，在晚上分给女工们的食品。

“你，你喝里奥哈酒①，对吗？”女工们对她说道。

① 此酒因产于西班牙北部地区的里奥哈而得名。

“对，可这种酒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她答道。

“好了，女人家，你别掩饰了。我们已知道你不会鄙弃葡萄酒的。”

这杯里奥哈酒喝下肚后，她的胃感到不适，也许是最后一杯酒或其他任何别的原因所引起的。这种原因使她的胃受到震动或迫使她打嗝儿。

餐厅里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只有柜台上还点着灯。远处可以听到雷科莱托斯大街上巡夜人的嗓音，用长棍敲击路面的声音。

她们上了大街，夜晚笼罩着乳白色的迷雾；在一块断云后面露出了新月的两个钩尖儿。这时刮来了一丝凉风，稀少的行人赶紧走路。她们把脑袋缩在风雨衣或大衣的衣领里。淅淅沥沥的雨水没有敢弄湿地面。

“明天见，玛丽娅。”

“卢西再见，和你们再见。”

“再见，明天见，”女友们回答说。

玛丽娅走上了每天晚上回家时走的道路。这位卡斯蒂利亚女人走到卡斯特拉尔广场，然后经马丁内斯·坎波斯到教堂的街心花园。

她感到寒栗，胃里很不舒服，她的身子弯得更厉害了，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用手指拨动着袋里的杏仁和花生果；她吃了两个杏仁。

她打开大门，在进屋之前，举目望了一下天空，天空有一颗流星飞过，留下一条亮光。她不加考虑，便高声说道：

“天气真冷，很快就天亮了。过一天，一切又重复一遍。”

过了一会儿，当她关灯时，弹簧锁钥匙落到了地板上。到了第二天，她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结婚宣誓的一天来到了。堂何塞和艾伊达太太坐在教区办公室的接待处，等待教区神父结束宣布他们为夫妻的声明。

堂何塞的证婚人叫弗罗伊兰和弗朗西斯科。弗罗伊兰是一家煤炭店的店主，这煤炭店在堂何塞的旧衣店那条街邻近的两条街的街角上。弗朗西斯科是煤炭店的店员。

在艾伊达方面，证婚的也是堂何塞的两个朋友。一个叫克维多，是咖啡馆的服务员，还有一个叫埃莱乌特里奥，是旧衣店的一位顾客。他从事拣破烂。

教区的办公室是一个小房间，人们进入教堂，它就在内院右侧。办公室里有一个很宽的栅栏窗户，从那儿可以看到花园。在一堵墙壁前，离开墙稍远一点地方，放着两张有玻璃台板的办公桌。桌子上放着一架标有“大陆”字样的打字机，一个银的烟灰缸，一尊基督像和一块黑色油漆台布。

在另一堵墙壁上可以看到挂着一座四周木框上涂上白漆的大钟。还有三只施舍箱，一只箱子是为炼狱中赎罪的鬼魂所设，第二只箱子是为教区的工事捐所设，那第三只箱子是为了一个圣徒的圣坛的装饰所设，这圣徒的名字像有点被抹掉了：他应该是圣安布罗西奥。

在大钟下，有三张座板是硬质纤维板的椅子。

在另一个墙壁上挂着圣母马利亚会的旗帜，还有一个是以罗马教皇的意旨搞的施舍箱，一张圣特雷莎和圣伊莎贝尔·德·乌格里亚平版画。

在通门廊的大门外面，用图钉高高地钉了一块纸牌。那是一个通知，通知说：

教皇圣谕，十二点到下午二点。

艾伊达只望了一下大门。她因本堂神父的迟缓而生气。她把双手放在裙兜里，神经质地扭动着双手。男人们站在窗边，望着花园，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有三个老太太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她们手里捧着弥撒书，仿佛在低声祈祷或考虑神圣而又重要的事情。每过一分钟，她们就发出几声巨大的叹气，同时那么沉痛地说“唉，我的上帝！”这种痛苦不是别的，好像是内心的痛苦或者心灵在痛苦中发出的共鸣。

不管怎样，三个老太太的叹息对最平静的心是一个威胁。

本堂神父堂曼努埃尔，刚刚做完他每天的弥撒。他在圣器室里由教堂司事帮着，很快脱去了主持弥撒时穿的圣衣，司事把神父的帽子递给他。

修女玛丽娅·德·赫苏斯待在门的另一侧，等本堂神父穿戴完毕，以便通知他早餐已准备好。

堂曼努埃尔走到通圣器室的小客厅，心里又一次想着，对一个神父来说，最幸运的是在修女中当教士。在小客厅里，到处可以发现修女们在谨慎小心地用功和忸怩作态。在凸绣台布上，嬷嬷放着塞维利亚的卡尔特会的细瓷盘子。

玛丽娅·德·赫苏斯看着小教堂神父，这个人待在修女中间就像是关在畜栏中的一只雄鸡。在桌上放有李子酱、几片硬面包、一团黄油、水煮过的鸡蛋、美酒及咖啡加炼奶。

在桌子的一角放着一个插有花的玻璃大花瓶。这些花是从修女的花园里剪来的，突出了嬷嬷们卖弄风情的欢乐气氛。墙上，一尊蒙难圣基督像放在铺着一块锯齿形边的精美呢绒的托座上。

圣基督像的眼神使堂曼努埃尔感到痛苦，在开始进餐时，总是要把花瓶放到他和基督的目光之间。

“堂曼努埃尔，有几个未婚男女和几个老太太正在办公室里等你，”教堂司事从门口说道。

小教堂神父匆忙地呷了一小口咖啡。

“这咖啡好像和往日的不一样，味儿比较淡，”神父说道。

“这是几内亚的咖啡，巴西的咖啡刚用完；甚至几天之内，我们不会有这种咖啡，”玛丽娅·德·赫苏斯回答道。

“可以看得出这不是巴西的咖啡。”

“我没有发现，我不是喜欢喝咖啡的人，”修女说道。

“伊波利托，你告诉他们，我马上就去。你可以用主教管区内的表格开始。”

“好吧，堂曼努埃尔。”

堂曼努埃尔吃完早餐，点着了一支雪茄烟，然后，拖着笨重的步子朝本堂神父的办公室走去，继续干这一天的活。

艾伊达和堂何塞坐在一张桌子的对面，在和教堂司事谈话。

双手捧着弥撒书的妇女们看见神父进来，便停止叹息；她们把他围了起来。

“我们是来领食物票证的，”她们说道。

“你们另外抽个时间来。你们知道，领食物票证的事在下午，在做圣罗萨里奥弥撒后才进行，”神父对她们说道。

堂曼努埃尔把雪茄烟放在桌上的烟灰缸里。

“让我们来瞧瞧，”他说，“谁是未婚夫妻？”

在回答之前，堂何塞向艾伊达转过身去。

“她和我。”他低声说道。

神父看了一下教民的脸，作出一副微笑的样子。

“我的天哪！我还以为这些事情只是给青年人办的？不过，目

前我要给一对并不年轻的人办结婚手续……”

四个证人走近桌子，站在那对未婚男女的椅子后面。由于神父不是和他们开玩笑，他们便开始大笑起来。

神父拿起放在烟灰缸上的雪茄烟，重新把它点着了。

“开始吧，伊波利托。”

“你叫什么名字？”

“何塞·克鲁斯·加西亚。”

“籍贯……”

“布尔戈斯省，富恩特塞卡。”

“结过婚没有？”

“鳏夫。”

“多大年龄？”

“到一月将满五十一岁。”

神父给这对未来的夫妻填登记表时，一个侍童从门口喊道：

“堂曼努埃尔，修女安赫拉想见你。”

“我去，”神父说道，他跟在侍童后面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神父再给结婚人登记。

“你叫什么名字？”

“埃莱乌特里奥·鲁伊斯·阿尤卡尔。”

“什么职业？”

“拾破烂。”

“你有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吗？”

“有购粮证。”埃莱乌特里奥说道。

本堂神父重新坐下。

“你们想在何时结婚？”神父问道。

“在有可能的时候，”艾伊达回答说。

“你们等一会儿。我在结婚书上查看一下日期。”

他双手拿着结婚书。神父从黑长袍的一个口袋里取出一副眼镜，把眼镜戴好，他用右手的食指翻着结婚书的页码。

“喂……喂……今天是十七日，对吧？下月十号总可以了吧。”

他合上结婚书，把它放在桌子上。

“你们喜欢怎么举行婚礼？举行婚礼有各种不同的价格，你们看着决定吧。”

“这我可不知道，”未婚夫说道。

“我们有一种婚礼要三千比塞塔……有风琴、有四重奏，有男女合唱，大祭坛上放鲜花，一排排的凳子上放着千日红，从举行婚礼的地方到门口铺上地毯。这是一种很有派头的婚礼。”

“我不知道，我们喜欢……”

“接着，是一千八百比塞塔的婚礼。也一样，不过，在举行婚礼时，用风琴伴奏来代替四重奏和男女合唱。”

堂何塞站立着，他垂下脑袋，只是看着右面的鞋尖。鞋尖上有泥迹。

“我不知道，我们……没有别的再便宜一点的吗？”

本堂神父摘下眼镜，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拿着眼镜；他用左手揉揉眼睛。

“那就是八百比塞塔的，在大祭坛举行，祭坛上放一束花，簧风琴演奏门德尔松^①的进行曲；地毯甚至一直铺到汽车边。”

听了堂曼努埃尔的这些话后，他继续沉默了一会，新郎依然看着鞋尖。

“你瞧，神父……”

“你们想花多少钱？三百？四百？”

① 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

堂何塞没有回答，他通过用左脚鞋尖将右脚鞋尖上的泥迹擦掉了。艾伊达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個地方。四个证人明智地退到窗边，从那儿可以看到花园。

“你们想花最少的钱？你们说说，想花多少或者你们可以花多少。我们可不能整个上午都这样呆着。”本堂神父摆弄了一下眼镜，看看他们。

“请您原谅，神父，”艾伊达说道。

“除了穷人的婚礼以外，两百比塞塔的婚礼是最便宜的了。如果喜欢简陋的结婚仪式，那你们必须带一张证明书来。”

“艾伊达，你看办那种两百比塞塔的婚礼怎么样？”堂何塞问道。

“你说的那种婚礼。”

“就这种，两百比塞塔的婚礼。”他抬起头，眼睛望着神父。

“两百比塞塔的婚礼的仪式不是在大祭坛举行，是在另一个祭坛，而且是在早晨八点钟举行。”

“好的，”艾伊达回答说。

“那么这里已没事了。你们必须来拿结婚的公告去带给主教。别忘了，每天下午你们要在七点钟来。对未婚男女要进行教义问答。”

堂曼努埃尔戴上眼镜。

“这是一种义务，”神父说道，并开始进行别的工作。

堂何塞与艾伊达两人沉默无语，走下通大街的石头台阶。一辆漆着黄色的有轨电车吱吱嘎嘎地发出凄楚的响声。这时袭来一丝寒意，艾伊达翻起了大衣的领子。

“行了，”未婚夫说道。

“对，我们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何塞，我要有家了，多高兴！”

“你感到冷吗，艾伊达？”弗罗伊兰问那个女人。

“是的，有一点冷。”

“御寒的最好办法是用好的杂碎或有辣味的蜗牛下酒，”证婚人说道。

“必须去掉身上的寒冷。”

“你不喜欢吃蜗牛吗？”

“喜欢吃，喜欢吃没有辣椒的蜗牛，”那个女人回答说。

“辣椒的害处是，一个人吃了它后就会感到浑身发痒，”埃莱乌特里奥说。

“因为我喜欢吃辣味蜗牛直到脑袋长癣。可我一点也不痒。酒和蜗牛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礼品，”咖啡馆的服务员说道。

“你们喜欢抽布比牌香烟吗？”

“啊，堂何塞！我不相信你竟抽小姐抽的香烟。”

“我只抽黑色的香烟，不过，在有些场合我喜欢抽金黄色的香烟。”

“我们去哪儿？”

“去圣恩格拉西亚的酒店，我们煤炭店打烊的时候，我就在那儿。”

“堂弗罗伊兰，你的生意进行得怎么样？”艾伊达问道。

“生意一般，顾客不付钱。我有一份欠帐的单子，至少有一公里长。”

“你别埋怨，弗罗伊兰，”埃莱乌特里奥说道。“我知道煤炭工人在煤堆里小便，为的是增加煤的重量，至少我知道有一个工人是这样干的。”

“艾伊达太太，这么说你不喜欢吃蜗牛？”

“我已经对你说过，喜欢的。可是喜欢吃没有辣味的。在我的家乡，蜗牛菜做得很好。首先把它们洗干净，然后放上洋葱、血

肠、辣椒以及少量香肠。”

“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是塞戈维亚的一个村子，新庄的。”

“我是坎蒂帕洛斯人，那儿产香肠，”弗罗伊兰解释说。

克维多咖啡馆的服务员，双手插在裤袋里默默地走了。

“你就这样一声不吭地走了，”弗朗西斯科对他说道。

“我感到冷。”

“这么发疯似的冷天气连上帝也要流清水鼻涕了。天气确实很冷。”

“等到发给我过圣诞节的钱时，我将去买一件风衣，一个人没有一件大衣，那连血也要被冻住了。我会对自己的女人这么说，她也会这么说的。”

“要不，就得去参加慈善团体。堂何塞，是不是？”

他们走进酒店，朝柜台走去。卢西亚诺之家是一个小酒店，酒店的墙壁是用塔拉维拉的镶嵌砖砌成的。

墙上悬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即使唱得不错，也禁止唱歌

堂弗罗伊兰给自己的朋友指了一下屋顶上挂着的鸟笼。

“这是一只很喜欢说话的鹦鹉，它叫帕科，”他说道。

“什么，埃莱乌特里奥？你怎么不拣蜗牛吃？这东西很好吃。”

“我不行，堂何塞，我不行。吃了以后会使我感到发痒的。”

“那么你吃别的东西，”艾伊达插言道。

“我就吃一些油橄榄。”

“你见到神父了吗？神父确实是一个谋求私利的人。”

“堂何塞，他们是活人。总得放明白些，不必绕什么圈子，”埃莱乌特里奥说道。

“他们和军人都是祸害，在这个国家里，没有比神父和军人更坏的了，”弗罗伊兰补充说道。

“没有谁能使他们改正错误的。”

“他们一抓住乳房，就不放开，也不停下来喘一口气。艾伊达，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那个女人作了个动作表示是这么回事，他们是抓住乳房不放的。

他们沉默了，并有好长一段时间，只是吃着蜗牛。埃莱乌特里奥和酒店老板谈论有关面包的问题。

“这面包很白，很软。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

“每根棍子面包，我是花了三个比塞塔买来的，你不相信吧；是给姑娘们的，她们是……每天早晨我从面包房把这些面包取来。像每个人一样，男人也会有他们的魅力。”酒店老板答道。

在埃莱乌特里奥和酒店老板讲话的时候，弗罗伊兰在和艾伊达说话。

“堂何塞对我说过，你在做女老板。”

“是的，先生。”

“住宅是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两个结婚年龄的女儿。”

这时已是上午十一点钟了，每个人都去干自己的事了。弗罗伊兰和弗朗西斯科到煤炭店去了，咖啡馆的服务员克维多去睡觉了，——他上夜班。埃莱乌特里奥和堂何塞，去旧衣店结束一笔纸生意。艾伊达去奥拉维德广场买当天的东西。

“你别忘了，我们要进行教义问答。何塞，是晚上七点，”分别的时候，那个女人说道。

结婚的一天来到了。家里呈现一片繁忙和欢乐，因为那些住在那儿的人应邀参加婚礼，其中包括安东尼娅的弟弟佩德罗。在厨房里忙于洗涤的有奥雷阿和玛丽娅。华金在厕所间挂着的镜子前刮脸。安东尼娅给艾伊达太太梳头，艾伊达太太感到有些紧张，净是问一些有关举行婚礼仪式的事情。

“你不认为我化妆得有点过分吗？你看我要搽胭脂吗？我有点苍白。”

“你化妆得很好，”安东尼娅回答说。

“我觉得我应该把眼镜留在家里。”

佩德罗在餐厅看晨报，在考虑自己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我的姐姐真傻。”天气寒冷，他穿着大衣。

没过多久，出租汽车来接新娘了；堂弗罗伊兰乘着出租小汽车到了。堂弗罗伊兰是男傣相。他穿着一件海蓝色的衣服，在上衣的纽扣眼上插着一朵康乃馨花。尽管时候还很早，只不过是早晨七点半，他却在吸一支金黄色的雪茄烟。

“新娘子好吗？”开门时他只是问了这么一句。

“她马上就来，我正在给她梳头发，马上就好，”安东尼娅从房间里回答道。

“女人啊女人，想的净是衣服和打扮。我的那位女人为了梳妆打扮，早晨六点钟就起床了。”

“你是乘小汽车来的吗？”

“艾伊达太太，车子停在下面。”

弗罗伊兰走到餐厅里。华金已经刮好脸，正在和佩德罗说话。

“怎么？你冷吗？”华金向这位卖炭人打招呼说。

“已等了好长一阵子了。我把风衣留在车子上了，我着了凉；

这房子像个冰窖。我起床后除喝了两小杯白酒，其他什么也没有吃过。”弗罗伊兰回答说。

艾伊达太太已经收拾好了，她离开了自己的房间。她身上穿着黑色的上衣，那衣服臀部窄小，胸部宽阔。在上衣的衣领上露出一一点紧身胸衣的花边。脚上穿着一双高跟鞋。鞋头比较窄一点。头上戴了一顶白色的帽子，帽子下部围一圈蓝色的饰带。

“早上好，堂弗罗伊兰和伙伴。”她说道。

堂弗罗伊兰吸了一口雪茄烟，看了一下新娘。然后立起身，吹了一下口哨，用右手食指和无名指动了一下。

“跟新娘走吧！艾伊达太太，你变得又年轻又漂亮了。”他大声说道。

艾伊达满意地笑了。

“你也很潇洒嘛。”

“和你这样的新娘在一起，谁也不会漂亮的。”

“我们走吧。我们可不想失去进入教堂大门的机会，”奥雷阿插嘴说道。

“有人可以乘车去，车上还有位子，”艾伊达说道。

“让安东尼娅去吧，万一要给新娘下妆。”

“好吧，”姑娘说道。

新娘，男傣相和安东尼娅，顺着卡斯蒂利亚大街的林荫大道兜了一圈，因为这还是比较快的。收买破烂的车子已经载着装满垃圾的麻袋向维克多利亞的得土安驶去。

“你顺着西贝莱斯广场绕一圈，”弗罗伊兰对出租汽车的司机说道。

他们绕过广场，然后，经过雷科莱托斯，朝马丁内斯·坎波斯驶去。

在教堂门口有一伙人在等待新郎新娘的到来。

堂何塞穿着深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衣领上过浆。脖子上系着黑色的领带。他走上前去，打开出租汽车的门，伸过手去扶艾伊达下车。她离开车子，四个人登上台阶，在教堂的门廊下等候，因为早上天气比较冷。

教堂尖塔上的钟已打八点了；神父还没有来。一个摄影师打着镁光。

“请排好队合影，这样，所有的人就都上照了。”

时间在过去，主持婚礼的神父还没有到。一些被邀请来参加婚礼的人通过教堂的一扇边门进到里面。但就在这时，他们从教堂里面出来说，教堂里面与在大街上一样的冷。还说里面也有一批人在等待举行婚礼。

佩德罗，华金，安东尼娅以及还有一些被邀请来的客人走到对面的人行道。

“我们去喝一点暖暖身子，”他们说道。

堂何塞的女儿们也穿过街去了。其中有个女儿，按照自己父亲的建议与欧亨尼奥逛大街的那个，是一个闲荡而又漂亮的女人，她与弗罗伊兰的煤炭店里的小伙子帕科眉来眼去。

“你什么时候结婚？”佩德罗向自己的姐姐问道。

“路易斯想，我们就马上结婚。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他是干什么的？”

“他已经念完法律专业。这我对你说过了，不过，因为你从不回家，所以你不明白。”

“我应该关心你的未婚夫，我有一些细小事情要说，他有工作吗？”

“他们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在一个学校里上几节课。”

佩德罗喝了一口牛奶咖啡。

“学校教师，这是诱饵，”他走向柜台的服务员说道。

然后，他继续和自己的姐姐谈话。

“教师，对于挣钱来说，是一件美差。你知道有这种说法：与其去当小学教师，倒还不如饿死好。生育和车子，安东尼娅，你好好想过没有？”

“想好了。”

“你们没有钱，他们给你们一个三毛币的工作，你们没有比索，你们想得到很多，不是这样吗？”

“有点是这样。”

“伴随你的是面包和洋葱，美好的前景，你应该哭了。出于好奇，请问你们住在哪儿？”佩德罗以讽刺的口气说道。

“我不知道，不过，倘若路易斯愿意，我明天就和他去任何地方。”

“够了……去郊外随便租一间棚屋。”

“佩德罗，这对我无关紧要。我宁可干任何事情，也不愿继续住在家里。我感到，如果我待在那四堵墙中间，我会给闷死的。不过……我要把你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你；至少你以前说过，为了逃离这个地方，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可是，你是一个女人，不会像男人们那样善于钻营。从你说的话来看，路易斯是一个受过教育的青年，和一个女工结婚对他没好处，”佩德罗反驳道。

“不管怎么样，我将跟他走。”

“请告诉我一件事。你跟你未婚夫有事儿了吗？”

“对，我喜欢他，你知道吗？可是，我要和他一起生活，不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我，你明白吗？为了我。即使我们不结婚，我也会走。”

“他使你怀孕了吗？”

“不，不是这个。我求你，你别问我这些事情；我希望你的是，帮助我们。”

“这对你有那么重要吗？”

“你看，这也是我最后的希望。你能帮助我们的，你挣钱，”安东尼娅说道。她抬起头，望着自己的弟弟。

“我确实挣钱。我是一个不要脸皮的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拚命干。我把大人物剩下的面包屑带走。对于我来说是冒险，对于他们，是大发财。可是为了免得挨饿，我会什么事都干，而他们却可以做好生意。”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也没有。你是一个好人。”

“可能是的，”佩德罗回答道。

佩德罗沉默不语。他想起了自己还是他姐姐说的那种好人的时代。他们俩在救济会里吃饭。他在啤酒店挣一个杜罗，干活像牛马一样。当老板辞退他时，他对自己发誓说，无论如何不能再过饥饿的生活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了自己的经历。

他看了一下安东尼娅。一种深深的爱来到他的手中，他抚摩着自己姐姐的脸。

“你们需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

佩德罗取出钱包，从钱包中掏出一把一百比塞塔的钞票。安东尼娅望着佩德罗的手中数着的钱。

“你拿三千比塞塔去吧，我现在身边没带更多的钱。”

“已经够多的了，现在我们不缺这么多钱。”

“行了，你把钱留下。你别舍不得花这钱。”

“佩德罗，你知道吗？有了这钱就可以办一切事情。”

“我当然知道。有了钱一切就好办，所以不要放弃钱。所以我会花尽甚至是最后一分钱。谁知道我明天会怎样呢？如果我

有事情，我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会置我于死地。他们洗手不干了。这样我会对自己说，生命的一日就是生活，就是我将再挣得这么多的钱。”

“谢谢，佩德罗。”

“你别谢我，我感到羞愧。我把钱扔在那里。”

安东尼娅抓住了她弟弟的胳膊。

“我想知道你的地址，以便知道你的消息。路易斯想认识你，我在他面前讲过你。”

“我寄宿在奇科特酒吧间里。要找我，你可以问任何一个人，他们会告诉你的，大家都知道我。”

华金朝他们走来。

“佩德罗，你像成了一个少爷，穿着很讲究。”

“伙计，我的生活过得不错。你呢？”

“这你是可以想象到的，我是靠挣工资生活的。”

“你对这个人的未婚夫了解吗？”佩德罗问道。

“对路易斯吗？了解，他是一个好小伙子，有健康的理想。”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她对我说，她想跟他结婚。”

“对，我已经知道了。他们干得好嘛。”

他们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有一客人来到人群中间通知说，神父已走进教堂了。

“我付了所有的钱，”堂弗罗伊兰说，“因此，我是证婚人。”

新郎新娘从一个边门进到教堂里面，这扇边门是一个侍童负责开的。

“教堂的大门只是在举行收费高的婚礼时才打开，”有个被邀请来参加婚礼的人说道。

教堂砖墙上开的尖穹窿里透进光来，照亮了中殿。那个最

大的祭坛上有米拉格罗莎圣母，她的头周围亮着一圈灯泡，除此以外，其他祭坛上笼罩着一片昏暗。

在旁侧的一个祭坛前的凳子上有一批人在等候着。他们中有一些男人腋下夹着饭盒。妇女们则拿着买东西用的草包。

神父从圣器室出来，他身上穿着十字襟，手中拿着圣杯和圣餐布。后面跟着一个手捧弥撒书的侍童。神父把圣餐布放在祭坛上。

“你们是来举行婚礼的，对吗？请你们到这个祭坛边。”

接着，他向另一群人走去。

“你们是办简单的婚礼吧？那么请你们站在左边。”

一对年轻男女和他们的证婚人从一群人中间走出来。新郎和男候相穿着风衣；新娘和女候相穿着大衣。

神圣的结婚仪式开始了。堂何塞邀请来的客人在圣餐授领处后面一字摆开，举行简单婚礼的人在祭坛的另一端举行婚礼。

艾伊达夫人在地上跪着，她时而想起自己与先夫举行的那次婚礼。那天天气很热。粮食堆在场院里，还没有开始脱粒。那是一个伟大的节日。举行婚礼之后，青年人在大院里跳起了阿加拉多舞^①；古老的文特舞以及塞哥维亚的霍塔舞。还有塞勃雷罗的酒和最近一次屠宰时做的火腿片。在下午，按照古老的习惯，这对刚结婚的夫妇要给套在公牛的轭中，被迫在教堂前的大水池中喝水。胡利安和她在右边拖着犁绳，像执行使命那样，犁出一条很深的沟。年轻人都十分高兴。

神父那种既有力又刺耳的嗓音打破了艾伊达夫人的种种回忆。他念着圣保罗给科林斯人的使徒书。

接着，神父以走来时的那种徐缓的步伐退向圣器室。在唱诗

① 这是一种紧搂着身子跳的舞蹈。

处，几个修女露出了好奇的脑袋。

有几天下午，华金和恩里克、奥古斯托一起去奥古斯托的家里。奥古斯托的妻子埃伦娜以一种亲切的目光看着华金。

“我喜欢华金，他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小伙子，”她说道。

“他已走上了正道，”奥古斯托说道。

三个男人坐在餐厅的桌子旁边，议论着报刊上刊登的和电台广播的新闻。埃伦娜坐在窗边，给孩子们吃饭，并且听着男人们的谈话。

“我没有勇气了。”奥古斯托说道。

“是的，我们有好多人失去了勇气。但另外一些人接上来了，华金便是一例。”

“有一个新铣工，我相信他叫冈萨雷斯。我好几次听说他表现很好，”华金说道。

“你们看人要非常小心。不久，自己会感到遗憾的，”埃伦娜插嘴说道。

“冈萨雷斯说话非常简明扼要。他一切都说得明明白白，”华金继续说道。

“他必须是这样。”

“我记起了塞莱斯蒂诺，记起了他由于宣传被逮捕。”

“他有两个小孩，对吗？”

“他有四个孩子。”

“每当我想起这些事，我就不寒而栗，”埃伦娜望着厨房说道。可以听到孩子们脚步声。

“你们必须做的事是给这个女人募捐。因为你们在厂里有那么多人，每个星期六，你们每个人捐献一点钱就足够了。我认为

这也是一种斗争方式。”

奥古斯托斜靠在椅子上，右手拿着一支香烟。从厨房里传来了开水龙头的声音。

“这些小孩是捣蛋鬼，”埃伦娜说，“我肯定他们在玩自来水。”

她起来去训斥这些小孩子。

“你们弄得像落汤鸡。简直不能不管你们，你们已经是大人了。我稍不注意，你们就玩水，”母亲说道。

恩里克向奥古斯托转过身去。

“不要泄气。一个人有了明确的目标，就要稳步向它迈进，”他说道。

“那是因为一切都进行得很缓慢。”

“必须成为现实主义者，我们比任何人都更要现实。工人阶级还得经历许多困难，会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这种情况不只是在西班牙有，在世界上都有。”

这时已听不到厨房里水龙头的流水声了，可以听到埃伦娜在炉膛里拨动柴火的声音。

“我给你们马上取一点麦芽酒和淡辣肉汤来。”

恩里克继续说：

“我们应该继续走我们自己设计的路。如果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尽他自己的一分责任就足够了。华金，你读过我给你书吗？”

“读过了，但有一点我没有弄懂。”

“我不知道是否能够给你解释清楚。是什么问题？”

“工人实际工资的降低，书中说是起因于农民挣得的很少的日工资。”

“你知道，农民取得肮脏的工资，有些地方，他们每年只劳动

三四个月。因为所有这些人在那儿，压低了其他人的生活水平。看起来这是一个矛盾，可是没有工作的人越多，有工作的人拿的工资越小。正如我对你说的那样……这就像是如果你在工作，身边有两个看热闹的人准备做你这份工作，拿和你同样的日工资，或许更低的工资。老板就再也不给你加工资，你们一向他提抗议，老板就会说那些看热闹的人可以解决问题。这时，你被迫接受老板所说的条件，这倒是真的。”

“那怎么办？”

“这只能进行斗争，去掉那些看热闹的人，要让所有的人都有可靠的工作和好的报酬。因此必须为提高工资而斗争，这不仅对工人是这样，对农民也是一样。”

“要明白这点，也不一定要看这些书，”埃伦娜说道。她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然后，把麦芽酒倒进杯子里。

“这是淡辣肉汤，”她重复道。

“因为正像对你说的那样，”恩里克说。

“他妈的，你们男人只会谈论政治；谈点别的吧，”埃伦娜坐下时说道。男人们沉默了片刻。大街上传来了一辆车子开过的响声，传来了阿托查教堂敲钟的声音。

“八点钟了，我该走了，”华金说道。

“你等一会儿，罗莎马上下来，我们送你到地铁，”恩里克说道。

奥古斯托的几个小孩在餐厅里喧闹起来。埃伦娜和三个男朋友喝着麦芽酒。

“你什么时候把那本书还给我？”恩里克对华金问道。

“过几天，我会把书带来给你的。”

“因为有许多人等着看这本书。”

“你们把书带来带去。总有一天，你们会夹着这倒霉的书被

他们抓住。”

“女人家，我们会注意的，”奥古斯托插嘴说。

“你们有三天会当心的，过后你们就忘了。跟我的父亲犯一样的毛病。‘夫人，这是最后一次，’父亲对我母亲说道。他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月的安静日子，然后，又故态复萌了。”

“尽管她父亲只是工人运动成员，但他完全是一位长辈，”奥古斯托说。

“我父亲对我母亲从不尽到义务。他的那些不卷入纠纷的诺言被风刮走了。他让我们受够了罪。”

有人叫了一会儿门。恩里克出去开门；原来是罗莎到了。

“晚上好，”她向大家打招呼。

“累了吧？”恩里克向自己的未婚妻问道。

“缝了那么多衣服，叫人双眼直冒火星。待会儿我们出去兜一圈，呼吸室外的新鲜空气，让眼睛休息一下。”接着，罗莎便和埃伦娜及孩子们聊起天来。

“喂，埃米林，今天你做什么来着？”

“老师把我叫到黑板跟前，”小孩回答说。

“他习题做得不好，乘法做错了，老师给他吃了零分，”另一个孩子回答说。

“我可不喜欢你告状，”母亲说道。

“要是你成了告状者，我就一拳打破你的鼻子，”奥古斯托对小孩说道。

“罗莎是非常喜欢孩子的，”恩里克说，“我认为，她最喜欢的是手中抱一个小孩。”

“那么，你们结婚以后，你可就要操这份心了。”奥古斯托笑了。“喜欢孩子的女人很快就会怀孕的。”

“要操心的人是罗莎。你们男人去干自己的事，而我们却代

人受过，”埃伦娜对自己的丈夫说道。

“我的未婚妻也喜欢孩子们，”华金说道，他已经站起身，抓起饭盒。

“我走了，”他说。

“我们陪你到地铁，”罗莎说道。

他们上了大街。在阿托查大街有一群人来来往往。到了安东·马丁广场时，他们在地铁边停住脚步。

“你去看佩比塔吗？”罗莎问华金。

“今天不去了，要走到埃斯特雷乔有点晚了。”

“那么明天见。”

“明天见，”华金答道。

罗莎和恩里克沿着河边的道路走了。曼萨纳雷斯河像一条银色的带子。在栏杆边，成对未婚男女在接吻。一阵微风吹动了河边的树木，树叶发出簌簌的响声。

“你在想什么？”

“不想什么。”

“总是在想点东西的。”

“好，我是在想。”

“想什么？”

“我没办法，每当听你谈论政治时，我就害怕。”

“什么也不会发生。”

“我，恩里克，如果事情来得不妙，那我将会有勇气的。”

他们在桥拱处停住脚；恩里克的说话声像河水那样颤动。

“罗莎，”他说。

“我爱你，”她答道，“从头一天起我就爱你。”

天空一片蔚蓝，阳光从高空洒在街区的大街上。人们在加西亚·莫拉托大街上走着。载着人群的有轨电车摇晃着车身，在车轮的吱吱嘎嘎的金属声中前进；把男男女女的人群抛在后面，他们像蚂蚁一样向罗萨斯河走去。

华金和安东默默地走路，目光不时地看着他们眼前一掠而过的那些面孔。他们和一群男人一起走着。

“从三六年以来，我没有投过票，”其中有个男人高声说道。

“必须做什么事呢？我还没有明白，”另一个人说道。

“必须赞成或者反对。”

“赞成或反对什么？”

“你要投赞成票，因为西班牙可能成为一个君主制国家。”

“我不表明态度，是赞同本届政府吗？”

“对了。”

“如果我投反对票呢？”

“那么西班牙就不会成为君主制国家，一切都会照旧。”

“我会继续不表态的。”

“那是很简单的。”

“对于你，事情将会是这样。如果我投反对票，这个政府会维持下去吗？”

“当然啰。”

在矿产学校大楼前面聚集着投票的人群。一些警察沿着大街巡逻。人们背靠着大楼的铁栏杆，在阳光下取暖。

许多人高声评论自己的贫困和担忧。另一些人——还没有填写好选票——在商讨别的事情。

“喂，赞成王国，这不就是让堂胡安来吗？这个人住在葡萄牙，他是阿方索十三世^①的儿子。”

^① 阿方索十三世(1886—1941)，西班牙国王。

有些人出示他们的选票，上面写着一个巨大的“赞成”。那些投反对票的人把选票对折放在口袋里，他们问那些已投过票的人，说坐在桌边的人在把选票放进投票箱之前是否要打开选票。

“他们没有把我的选票打开。”

安东把双手放在上衣的口袋里，眼睛望着大街的一个拐角。大街的尽头可以看到伊莎贝尔二世^①运河的田园。

“你那个在巴塞罗那的父亲说了些什么？”

“你要我讲什么？他说巴塞罗那是个非常大的城市，有许多工厂，还说，如果一个人袋里有钱，那么巴塞罗那是个好地方。”

“巴塞罗那、马德里及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

“他在学习加泰罗尼亚语。”

“我认为很好。他们不学习卡斯蒂利亚语吗？我感到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人们因讲自己的语言而不高兴？因为他们自幼养成这样讲话的习惯，一旦禁止他这样做，他自己也就偏激了。他们不让人用自己的语言写字，也不让人在商店里张贴广告。”

“因为那儿有那个人在。对于我来说他好像是不存在的。”

一个胖女人走到他们跟前，手臂上挂着买东西的篮子；她对华金说：

“年轻人，如果不投票就不给工钱，这是真的吗？”

“听说是这样，”华金回答说。

“因为我丈夫说这是我的想象。”

“因为人们是这么说的。”

“去他的这种讨厌办法。你们真的要投票了吗？请你们给我和我的丈夫保留个位置，我们马上会来的。我去排队买面包。这儿排队，那儿排队，我不知道不需要什么都排队的那一天会不会

① 伊莎贝尔二世（1830—1904），一译“伊莎贝拉二世”，西班牙女王。

来。我可以肯定，我们会过吉卜赛人的驴子那种日子。当它习惯于不吃食的时候，它也就死了。”

那个女人走了，安东向华金转过身去。

“你继续和佩比塔在一起，对吗？”

“是的。”

“我看你对她非常有兴趣。”

“星期天，因为是好天气，我们去索蒙特斯吃了午后点心；她有点害怕。因为有人想在曼萨纳雷斯河中游泳。”

“他们已经给你身上捆了一根绳子，不会给你松开，不让你安静，也不给你饭吃。”

“我喜欢佩比塔。”

“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小伙子，是认真的。”

在他们前面五六个人的位置上，有一个男人和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谈话。那个女人只是一个劲儿地怀念过去。

“你们是否还记得那些荷兰土豆吗？只要剥掉皮……就像面粉一样。放点油和盐，做成色拉同样很好吃。”丈夫点头同意。

“对，先生，是的。这是老早的时候。那时，牛奶是纯牛奶，不像现在那样加别的成份。现在要凭小卡取奶，我有时自己问自己，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奶卡呢？”

那位老妇人沉默了，也许她在想着牛奶是纯牛奶，土豆是荷兰土豆的那个时代。然后，她从地上抬起目光问那个男人：

“你知道为什么要投票？我可不喜欢这些事儿。我认为这些选举只会招来麻烦事。我非常喜欢国王。有一次我在宫里见到过他。”

另外一个人笑了。

“那是因为穷人不会懂得现在这些政策，就是这么一回事。”

女人说道。

一个穿着泥水匠服装的男人已经投好了票。他刚刚从大楼出来，便高声评论。

“他们给了一张纸，一张盖上图章的纸。据说在工作地点领取东西时必须出示这张纸。”

华金和安东卷了一支雪茄烟。

“配给的只够我抽两天，其余的八天我抽黑市烟。”安东说道。

“昨天我看到塔诺，他很顺利。”

“塔诺是一个马屁精。”

“他生活得像上帝一样。”

“像他那样做，我会感到羞耻。当然他非常害怕。他对我说，他把警察带到他的伙伴那儿，那家伙有一百本伪造的配粮卡。”

“去他妈的！”华金笑道，“安东，你星期日干什么事儿？”

“我去监狱探我父亲；星期六我姐姐，母亲和我一起去的。”

“你父亲说些什么呢？”

“他能说些什么呢？从表面看他还好，可是他比一条盲人的狗还要饿。”

“如果我们在外面都过着饥饿生活，那么他在监狱里将会是怎样生活呢？”

“据说，拥护君主制度的人……”安东开始说道。

“瞧，那些人干的事，我是谨慎小心，绝对不干的。”

大家沉默不语了。安东在思念自己的父亲、考虑探监。

在第三节车厢里，所有的乘客很快就建立了一种互爱。大家都在谈论自己囚犯，谈论他们有望很快获释。

“在联合国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

“专政的日子不会太长了。我从可靠方面了解到这件事。”
一个女人说道。

“好几年以前，我就听到这种讲法了。”

“那你是听谁说的呢？”

“听我丈夫说的，”安东的母亲回答说。

“从三七年开始，我有一个弟弟在那儿。我给他带来了一个有香烟和食品的包裹。”

“我没能带包裹来，因为旅行要花许多钱。多亏了雷米厂里的同事，我才能作这次旅行。有几个星期六，他们给我送钱来，”
一个女人说道。

“你别担心，他们很快会把东西分给大家的。他们很有组织性，”安东回答说。

“我对你们说，在联合国议论过政治犯。我是从我国广播电台中听到的。”

“我不相信联合国。大使们撤退了，对吧？大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讲我儿子的情况。我们是农民，什么也没有；既没有母骡、车子，也没有一块可种的耕地。我们迫切需要我们的儿子回来。穷得只剩短裤，我已不能去打短工了。她和我，”老人指了一下他的妻子说，“如果克利斯托瓦尔不马上出狱，那我们只好去要饭了；我们只有这一个儿子，一个能挣钱的独养儿子。现在他二十四岁了。”

安东眯缝着双眼，继续回忆着旅行。眼前出现的是那个狱吏的面孔。他在那儿，待在小窗后面，那儿人们递交着包裹。

“对法夫里西亚诺·洛佩斯来说，他已不缺包裹了。”

“给他换地方了吗？”那女人向狱吏问道。

“他没有换地方，而是他已不需要包裹了。”

那个女人看来很快就明白了。

“你们把他杀了！你们把他杀了！”她喊道。

这是一个喊声，一个民众的呼号；女人的喊声，男人的喊声，声音既响亮又强烈。

被枪杀的人的母亲晕倒了，好像遭到意外事故似地倒在地上。倒在她原来怀里抱着的东西中间。小孩子们被那种叫声吓坏了，紧紧抓住自己母亲的裙子，想躲藏起来。

“他是一个好小伙子。他们因为他的思想把他杀害了；他从不伤害任何人。”

“他们把他活活从家中抓走，现在却把他还给蛆虫。”

“别说了，别说了，瞎嚷嚷是什么也不会得到的。”

这个狱吏是个满口说大话的人，他威胁妇女们说：

“如果不静下来就不让探监。”

后来他们把那个女人带走了，其他犯人的家属来到会见犯人的房间。家属们关心的是挑选一个靠近由密密的铁丝网盖住栏杆的好地方。大家都用指头按在铁丝网的方格上，甚至连透空气的地方都没有了，人们将脸贴在网眼上，双眼紧盯着犯人必须从那儿进来的大门。那儿有看守的脚步声。

马上，出现了没有痛苦感觉的呼喊，有些人的声音显然想盖过别人的声音。

“你变得更胖了。”

“我给你带来一些鸡蛋和一点面包。”

“香烟！你听见吗？要一香一烟。”

“小姑娘很好，小男孩身体有点虚弱，我把他留在你姐姐家里了。”

“你说什么？”

“小姑娘很好。”

“那你呢？”

“好的。”

“你怎么样？”

“不错。”

“好。”

“好。”

“我们大家都好。”

“我将有工作了。”

“在哪儿？”

“在一家工厂。”

“同事们问候你。他们给我旅费，还让我给你买一些东西。”

“请你问他们好。”

“安东，你的学习怎么样？”

“我已通过数学考试。”

“你有女朋友吗？”

“有时我和一个姑娘出去。”

“我由你的律师辩护。我们请求复查。”

“街上的情况怎么样？”

这时传来了看守员的脚步声。一对青年男女相互凝视着，几乎没有说话。后来，那男人握住栅栏叫喊起来。

“玛鲁哈，玛鲁哈，等我一出狱我们就结婚。”

“我像个傻瓜，我有事必须对你说，现在却说不出来。我等了五个月要看你，记住要对你说些什么事情，现在我却说不出来。”

小孩子们有时玩耍，有时靠在铁栅栏上。

“你别哭，胡安尼托。你瞧，他是爸爸，你叫他。”

“帕比托^①，帕比托。”

① 小孩对父亲的一种昵称。

当时，这个男人用手抓着铁丝网哭泣着。

“儿子，对我说话！”

在监狱大门的外面，充满着阳光和叹息的声音。

大街中央，那个被枪杀的犯人的母亲，表情格外突出，又可以听到她那绝望的、嘶哑的呼喊声。两个妇女抓住她的双臂。

“在这个世上，我没有别的儿子了，可我倒愿意让他死掉、被暗杀，也不愿意他像个女人腔的人那样哭。”

轮到华金和安东投票的时候，他们投了反对票。

拉米罗·德拉·奥斯·莫拉塔拉是克鲁萨达的退役军人，以前俄罗斯作战过的退役军人，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他是高个子，背略微有点弯曲，双肩和手臂瘦骨嶙峋。有一张轮廓突出的脸，面色苍白。留着胡子，两边的胡子稍垂在嘴角上，他的鼻子又大又直，眼睛凹陷而且很小。眼睑没有睫毛。

“在伊曼湖，俄国寒冷的冬天把我冻得病倒了，”他说道。

上午，拉米罗在官方的机关里工作，下午他在一家造纸厂里做经纪人。

“在上午我几乎无所事事，下午我要跑遍马德里。上午工作每月给我七百，靠这点钱是无法生活的。”

他出生在巴利阿多里德。一九三六年战争爆发时，在袋里放着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委员会^①的一个证件，开始学习，并对未来有巨大的信念。

现在他有三十三岁。他的妻子布兰卡比丈夫小几岁。女儿

^① 一译“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达”。该组织是由奥内西莫·雷东多和莱德斯马·拉莫斯于西班牙内战初期创立的。

叫阿德莉塔，外貌上长得像她母亲。

“看这个姑娘，她吃饭就像是一个大人，但不长肉。她的胃是那么大，简直像只无底麻袋。所有的东西到了胃里就停止了，天知道吃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不长肉，”布兰卡对自己的丈夫说道。

拉米罗和他的妻子已经去住在一年前艾伊达太太结婚时留下的房子。他们是楼下的酒店老板伊拉里奥介绍来的，看起来拉米罗和他是姨表兄弟。

卧室几乎是一片昏暗。拉米罗走到窗户边，把窗打开。

阳光照进房里，在地板和床铺上投下了光斑的轮廓。空气也进来了；在阳光和新鲜空气中，房间恢复了它那肮脏的本来面貌。

拉米罗在窗台上靠了一会儿，转过身来看了一下阿德莉塔。小姑娘的脸很脏，头发也没有梳，小衣服紧紧地穿在她身上。

“我给她做件大点的，可是小孩的一件衣服比一所学校门上画的蜡笔画还不牢，”母亲对玛丽娅说道。

小姑娘在衣柜下面玩耍，由于她没有穿裤衩，所以屁股露在外面。

布兰卡在煤油炉上烧菜。她也穿着在家里穿的衣服，外貌胖乎乎的，比较好看，但对于一个像拉米罗这样小心谨慎生活的人，这并不是最令人愉快的事。

“什么？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他从窗边问道。

“什么事？”

“你知道，女人家……事情。”

“像以往一样，但一天比一天困难了。你去广场，发现价格上涨。昨天一个雷阿尔，今天十分币……这是最好的情况。”

“小姑娘呢？”

妻子背对窗户；她从烧菜的墙角处转过身来，两处的面颊被炉火的热气弄得通红。手中挥动着漏勺。

“她像天使那样好。她把两个土豆捣碎，放上一个西红柿的汁。很少给人添麻烦。你知道……那个小天使整天被关在房间里。看到这个小可怜我就感到痛苦！她常常咳嗽，准是体质有点不太好。”

“没有什么。”

小姑娘爬到椅子上，在那儿坐下，手中抱着玩具娃娃，望着墙壁。

“你看到了吗，拉米罗？墙上的钟不走了。她抱着玩具娃娃坐着，静静地看啊看。”

布兰卡想着小姑娘，一种极大的痛苦涌上心头。

“必须得带她去看医生。我不知道，可我很少能见到她；她不像所有的孩子那样笑。身体很干瘦，一张烟黄色的脸，昨夜在床上咳得非常厉害。”

“我可没有听到她咳嗽。”

“对于我来说，你们这些男人能够安静，那就是最大的造化了。你们一切都听其自然。我晚上却在考虑我们、女孩、将准备什么饭菜……”

“问题在于你不能带女孩子去散步。你不将孩子带到大街上去。”

“我尽我可能把她带到大街上去的。你要把我留在家里做事情。你到街上去，其他什么也不关心。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就想我把房间和饭菜准备好。你必须做的事是找一幢房子让我们单独住，房子要有光线，而且通风，不要像这幢猪圈一样的房子。这是你必须做的事，而不要和那些同你开会的同事谈论政治浪费时间。你们说，你们不喜欢西班牙，因此你们要斗争。那么就

让我们来瞧瞧事情是否会一下子发生变化。对女人来说，我们不喜欢的是每天的生活。别再谈论政治，争取降低生活物价，给我们房子。”

布兰卡提高说话嗓音。她说最末几句话时，语调很刺耳，以至于使拉米罗情绪更加不好。拉米罗记得单身汉们对此已讨论过多次。布兰卡用这种形式考虑问题，他就很难和她讨论了。

“你的想法跟赤色分子的一样，”她开玩笑说道。

然而，现在他略带怨恨地看看她。

“如果你告诉我哪儿有钱可取，那么我们明天就找一个极其豪华的楼面。”

“要求他们提高你的工资。”

“我工作的地方不会随便增加工资的，因为缺少部长的命令。我看你就是不想想，用我给你的钱，我们得吃、穿和办一切事。你不要说我不工作。我从早到晚在街上跑破了鞋，”拉米罗答道。

“你的女儿都光屁股了，她只有一双小鞋子。你妻子由于没法给小女孩买所需要的一切，都发火了。我的衣服还是奶奶设计它的那年做的，而且今天我们要吃寡妇土豆了。”

“那么，你告诉我能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你能做什么，我知道你必须做，必须带来更多的钱。你的那些朋友的情况不错。看来，费德里科就和你不同。”

“我不会出卖自己，我有我的主意。”

“对，你不会出卖自己。你是一个自己挨饿，也让全家人挨饿的正直的人，一个只有一件衣衫的好人。一个让有钱的人利用的受骗的人，一个至多拿了三枚奖章、还在继续等待仙人掌果实从天落下和银行国有化的人。你们在晚上集会呼吁，你们不喜欢傻瓜国王，你们要公民投票，你们在墙上贴满了标语。”

“你别埋怨，还有比我们更糟的人。”

“还有更糟的吗，拉米罗？”

“对，还有更糟的人。”

“亲爱的，要是这样，那我就搞不懂你们总是说死了上百万人，这又有什么价值呢。你们在射击的时候是非常勇敢的，可是你们对要求提高工资是否也勇敢呢。老是谈那些死人，战前罢工等等。仿佛如果愿意，我们可以一直敌对下去，好像我们西班牙人是分裂的。那么成百万的活人该怎么办呢？”

“布兰卡，我们不要再说了。你在胡说八道的时候说话很伤人。问题是我们正处于困难的时期，不下雨，就不会有收成。你将会看到一切都得到治理，我们会有房子。我确实知道，工会打算通过住房保护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已经在这样做了。”

“我们盼等了好多年了。”

“你还懂一点政治，难道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总得耐心等待，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自由的时代会带来这种转机。”

“我要说的是，必须生活得现实些。我不懂政治，也不懂工会；可是我知道一个女孩需要东西吃，一个家总得像个样子。”

“好吧，你别罗嗦了，给我拿吃的吧。”

布兰卡转向房间的一个角落。用漏勺拨弄着食物。阿德莉塔在椅子下面，拉着母亲的裙子。

拉米罗待在窗边，他在和这位妇女交谈之后感到厌烦。布兰卡低声地嘟哝着。

“你在说什么，笨蛋？你在说什么？”

她也没有转过身来，用一种嘲讽的语调回答。

“我说男人看脚，女人看头。”

“你在跟我要嘴皮子。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都不得安宁。”

“自己的？你要说当房客。”

“这儿可以发号施令的是我。你懂吗？还是你以为，我在用拉丁语说话？”

“你别丢人现眼，拉米罗。就好像你说中国话一样，你吓不倒我。”

阿德莉塔用恐惧的目光望着自己的父母亲，眼睛睁得很大，差一点要哭了。她继续抱着自己母亲的双腿，马上就哭了。

“让那小姑娘别哭了！现在我就缺少这个。”

“你别嚷嚷，她会哭得更厉害。”

“我嚷嚷是因为我想嚷嚷。如果你是一个无用的人，那可不能怪我。”

“亲爱的，”布兰卡对自己的丈夫说，“我来唱一支歌，这对大家会好些。”

阿德莉塔把一根手指放进嘴里，不让打嗝儿。一听到她母亲唱歌，她就做了一个舞蹈动作，嘴边漾起了微笑。母亲目光变得温柔了，一把抓住她的双臂，吻了她。

“喂！你母亲的天使。有谁比我更喜欢你呢？”

她吻遍孩子的全身，像一只雌猫样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后来，她把小女孩放在地板上，把饭菜端上放在靠院子的窗户边的那张下面有烧火盆的桌子。

“行了，拉米罗。你别生气了，我们吃饭吧，时候不早了，你得去上班。”

拉米罗坐在桌边，看着《起来》报的社论。阿德莉塔走到她父亲跟前。

“给我一块土豆行吗？”女儿要求道。

父亲合上报纸，默默地吃了起来。他的火气还没有消掉，不想看他的妻子。

他吃完饭，就去厕所的盥洗池那儿洗脸，梳头。

“今天别等我吃晚饭。我要和一些同事去师部。”他说着就出去了。

“你不吻我一下吗？”布兰卡央求自己的丈夫说。

他吻了一下自己的妻子，还是那样地生气，吻纯粹是一种妥协。

奥雷阿姨妈洗完了厨房里的器皿。她的外甥，佩德罗和姨妈在谈论安东尼娅和路易斯的事儿。

“他们想结婚了，我同意。对安东尼娅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路易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他已念完专业，能够解决任何出现在他面前的难题，”佩德罗对姨妈说道。

也许是因为奥雷阿有点惧怕她的外甥，也许是因为卖下水的生意进行得顺利，事实是她觉得这个消息并不像她预料的那么坏。

“佩德罗对我说过，你想跟你的未婚夫走。”她对外甥女说道。

“是的。”

“你为什么不对我说呢？”

“那是因为你的脾气很大，你不喜欢也不听我的。”

“任何人都说我是一个吃人的妖魔。”

这对未婚男女正在收拾东西。他们有了一个租用的房间，下午安东尼娅下班后，他们就把买来的器皿搬走了。有时，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夜晚的亲切气氛中，他们平静地作爱。

奥雷阿姨妈继续与加西亚搞不正当关系。加西亚已向她暗示过，当他有了一套安东·马丁建造的房间时，他们可以一起度过某个下午。

“我正需要一道能逃走的门，奥雷阿。”

卖猪下水的人已知道，奥雷阿不是一个保持贞洁的女人。在女人的外表上，她有不会引起猜疑的爱情艺术。

布兰卡等奥雷阿结束她的清洁工作，准备开始刷洗地板。这套房间里的三个女人已经约定，她们每个人都要在轮到自己的时候洗刷厨房。

“这个地方的屎比鸡窝的木杆上的还要多，昨天不是轮到玛丽娅太太洗刷吗？”

“是轮到她，不过，你也知道，她喝酒一过头就什么都记不得了。”

“我们准备好了。”

布兰卡跪在一块双层的破布上，用抹布在桌子底下和洗涤槽底下擦着。阿德莉塔在门口望着她的母亲。

“奥雷阿，你听好了，玛丽娅的丈夫呢？”

“他在巴塞罗那；我认为让玛丽娅太太这样，是男人的过失。”

“男人……像我母亲说的，当他感到满意的时候，最好用钩子把他挂在自己的屁股后面。问题在于，对他们来说，我们这些女人是傻瓜，每当他们对我们说两句亲热的话时，我们就会信服。”

“那丈夫是无赖。”

“这个，如果我不能容忍他时，以前我就会让他吃苦头。姑娘，你安静些，别跟大人说话。”

阿德莉塔用提桶里的污水给她的洋娃娃洗脸，双手弄得湿漉漉的，她马上就打喷嚏了。

“这个小姑娘是笨蛋，”布兰卡支起上身，责骂她的小孩。“你别把手放在桶里，你这孩子可别再让我不高兴了。”

布兰卡用围裙擦干了双手，继续洗刷。

“他们什么时候给你一套房间？”

“昨天我和那个我熟悉的人去看房子，差不多了；他们正在建一道隔墙。”

“如果您奥雷阿看到的话，那一定会多么羡慕！我的愿望是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独住的房子！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拉米罗和我在一直艰难地从一间房间搬到另一间房间。”

“可你的丈夫不是西班牙长枪党党员吗？有了介绍信就可以搞到一切。我有个熟悉的女人，她在工会或诸如此类的组织中有一个亲属，是个掌权的。她提出要求后不久，他们就在侨民区，迭戈·德·莱昂给了她一套房间。甚至还有一间有冷水、热水龙头的洗澡间，不会产生……”

“我的拉米罗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傻瓜。我对他说，如果在现实的时刻你不想动用权势，那么你这位退役军人又有什么价值呢？再说你只是要一套房子，又不是作非分之想。我的这个男人的目光最短浅……”

她们沉默不语了。布兰卡考虑的是有房子，在那儿她可以随心所欲走动，她的女儿在至少有两个朝大街的阳台的房间里晒太阳。一套像奥雷阿所说的有一个洗澡间的房子。

“你的外甥女有房子吗？”

“她会有房子的！他们在拉斯文塔斯租了一个房间。”

“当她有了房子后，你会和他们住在一起吗？”

“结婚人想要房子。他们将不会和我住在一起的。”

“这倒是真的。”

她们又不说话了。布兰卡收拾完厨房之后，马上和阿德莉塔一起出去，让这位小姑娘去晒太阳。奥雷阿大婶赴约会去了，在塞万提斯电影院门口她与老板有一个约会。

玛丽娅在自己的房间里想给她住在布尔德奥斯的姐姐写一封信。当她写到自己的丈夫时，她脸上露出了忧伤。她在生活的渴望中还有什么可以满意呢？她怀着这些渴望，如果他这时打开房门，他那双友好的眼睛看看她，那么，她会把一切都忘掉。

她举着笔停了片刻，回忆着往事，回忆起以前他属于她，甚至给她带来无言的快乐的那些夜晚。

在汽车库院子里发出的一声叫喊，把她从回忆中拉了回来。她慢慢地回过神来，一切都回到了眼前艰难困苦的现实之中。她明白自己孤身一人，从透明的薄窗帘中透进来的傍晚，依然是忧伤的。她已不愿多回忆了，不愿去想那种令人心怦怦乱跳的事儿。

她给马蒂亚斯写过几封信，但他没有给她回信。她只是最初这么做，但是是为了指出可以让他安静，只要经常给她寄钱，就够了。所以她感到十分痛苦，而且没有勇气去干点什工作。她发觉一种奇怪的力量把他们两人的生活破坏了，甚至把这种生活碾成了粉末，她想为争取与他重归于好而努力，然而在这种努力中，她懂得这修复关系显然是预先注定要失败的。她爱他，十分爱他。

她继续给自己的姐姐写信。在信中，她把折磨自己的不幸大部分隐瞒了。她只是希望自己能到她姐姐身边有一个落脚之地，有一个可以稍稍休息、并重新为生活而斗争的地方。她还年轻，能够挣得每天的面包。她需要获得护照和旅行的钱。她为办理证件而奔忙，办这些证件不需要她丈夫的同意，因为他们的夫妻关系现在已是无效的了。她在信中说，在内战时期他们在公证人面前结婚，战争一结束，他们不准备在教堂再举行仪式了。

她写完了信，去弗恩卡拉尔大街的邮政分局寄信。尔后，她就去上班了。

早晨的阳光照进了盖满地衣的橡树林，这片树林一直延伸到流着小河的狭窄地方。光秃的田野被冲垮了，泥沙冲到河的两岸，河床的上面。弯曲的河水，蓝而清澈，河水在越过露出水面的大石头和圆卵石时溅起白色的泡沫。有几棵树，长得不太高，它们的根长在石头中间。这些树一直伸展到狭窄的地方，以便看看河水中自己的影子。那些刺菜蓟，穿着武士的服装，立在与河流平行的沙道两侧。一朵白云在早晨的静空中飘荡。鸟儿扑动翅膀去啄托雷洛多内斯镇的打谷场。房子出现在道路的高处，道路向下倾斜直到罗马桥的桥洞。

那儿，再远一点，一群山羊在一只挂着小铃铛的公羊后面走着。这群山羊由一只大猎狗保护，猎狗顺着山坡往上爬，它在一只掉队的小羊羔后面吠叫着，牧羊人在后面，在乱石岗上拄着木棍走着，当猎狗为了追一只逃跑的幼兔或飞着的鹁鸟而离开羊群的时候，他便把弹弓转过来打它。

那是星期天的一个美丽的早晨。郊游者肩挎背包，顺着小镇边上通往罗马桥的小道而下。

华金邀请路易斯和安东尼娅与朋友们一起在山地过星期天。

“安东和卡门，塔诺和欧洛希娅，埃尔·佩斯卡和洗染店的那位姑娘，佩比塔和我，还有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一起去，”华金对他们说道。

于是，他们乘三等平车旅行，呼吸着早晨的新鲜空气。

“佩比塔，你感到累吗？”

姑娘转过身来指着河流，河流像银色带子轻轻地拍打着河的两岸。太阳射出柠檬色的光芒。

“河流，桥，”佩比塔喊道。

“我们到了那儿，桥拱下面有一个可以供洗澡的很好的池塘。”

“你疯了吗？”

“我为你而发疯。”

安东尼娅跑来跑去，路易斯在后面追。她那双草编的便鞋在路上扬起了黄色的尘土；她高兴得脸上泛起绯红的笑容。身上的热血在沸腾。她跑着，仿佛是为了作爱向小伙子挑逗。姑娘多次扭着腰躲开他，好像要嘲弄小伙子的双手，他以为可以抓住她，其实抓了一个空。后来，她已感到快活得透不过气来，便放慢脚步，让路易斯追上她，用双臂亲热地抱住了她。

安东和塔诺走在后面；他们带了一大瓶掺和着汽水的酒。埃尔·佩斯卡在向欧洛希娅挖苦的话，而她毫不害羞，对小伙子讲的话放声哈哈大笑。卡门和洗染店的另一个姑娘在唱《阿斯图里亚斯，可爱的故乡》。

他们站在河流的左岸边，下面就是河水，站在桥洞的阴影下，河床斜坡上的一块花岗岩石板上。

“把酒放在凉爽的地方，”华金说道。

安东和塔诺把酒瓶放在河边斜坡处长出的灯芯草间。华金在埃尔·佩斯卡的帮助下，用几根棍棒和一块毯子搭起了一个凉棚。

姑娘们在收拾好背包之后，到杂草丛生的地方去脱衣服，不让小伙子们看见。

小伙子们已跳入水塘了。水不是很深。他们立在滑溜溜的河床上，呼唤着正赶来的姑娘。他们的声音碰到桥洞的石头时，

汇成了一个好听而完美的回声。小伙子们为了看穿着游泳衣的姑娘等得不耐烦了；任何一个人心里都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来，来。你们快一点，这儿的水可美啦。”

五个女人躲在草木丛生的地方，在灌木的上端，露出了裸着的肩膀。她们等着佩比塔穿上游泳衣，系好脖子上的花结。

“我们走了，你不要扭扭捏捏，”她们说道。

“我出去，感到有点害羞，”洗染店的那个姑娘说道。

“你不要这样傻，我们一块儿出去。”

“你们的体型很丰满，可以自吹。我这双腿很瘦长。”

“你别担心，他们也是瘦骨嶙峋的人。”

“对，可不是一回事儿。”

“我们去吗？”

“去，”洗染店的姑娘下决心道。

她们跑向下坡，笑着并相互推搡。欧洛希娅又笑又奔跑，全身的肉抖动起来。

“您感到冷吗？”

“不。”

“佩比塔，你先钻进水里，”安东尼娅说道。

“我，不想说话，我想想就害怕。”

他们俩坐在河床上一块帽舌形的石头上，佩比塔摇晃着浸在水中的双腿，用脚往华金身上溅水，华金双手抓住石头。

“你往我身上溅水，我把你抛到水里去，”华金说道。

“你不敢这样做。”

“怎么不敢，你现在就看好了。”

华金想爬到石头上来，可是佩比塔站在那儿笑着，并用手臂阻止他。

华金感到有点激动，还是坚持着。他们在岩石的边缘上争

斗了一会儿，结果一起掉进河里。佩比塔是一个游泳能手，用两只有力的手臂把华金拖到水底。河水又冷又像鱼皮那样柔软，像一片温存包住了她的全身。她只是轻轻地抬起头吸了口气，重新潜入水中，在水底寻找华金。

安东尼娅，卡门，欧洛希娅和洗染店的那个叫帕基塔的姑娘，待在河水只齐她们膝盖的那个地方。

“让我们仰卧在水面上，”埃尔·佩斯卡对帕基塔说道。

“瞧，你放开了我。”

“你慢慢躺下，头要放平。”

“这样我会喝水的。”

“你去喝！你低着头，好像出殡一样。”

埃尔·佩斯卡非常得意。姑娘虽然瘦弱，但她也有自己的优点。他拿这位学徒开玩笑，一只手按住她的双腿，还有一只手在她背上移动，使她发痒。

路易斯钻出水面，坐在桥的栏杆附近长着的一棵树上，那儿有大桥投下的阴影。他凝视着河流狭窄的地方河水呈现黄、绿两色。那些蜻蜓在空中展开透明的双翼。在河的对岸，一条大的蜥蜴在晒太阳；它在一块石头上不安定地爬动着，抬起那一个三角形的脑袋。一只雏鹰好像正悬挂在空中。

安东尼娅走到树跟前，路易斯在往树上爬。小伙子依然望着河水清澈的深处。

“你爬到树上干什么？”

“不干什么，看河水呗！”

“下来吃点东西。”

“我几乎不感到饿。”

“来，下来，我们去吃饭。”安东尼娅补充道。“在野外，我吃得很多，我可不喜欢一个干瘪的丈夫；我喜欢你胖乎乎的。”

“好吧，我们去吧。”

他从树上爬了下来。

“你像个小黑人，跳起来像泰山^①。”

这伙朋友坐在凉棚下，姑娘们将毯子在地上摊开，取出盘子和食物。

“华金，我带酒来了。我们一块喝吧。没有比在吃饭前先喝口酒更好的了，”塔诺说道。

欧洛希娅赞美了一阵田野。

“这儿多好哇！有这么美的地方，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一定要住在马德里。”

“为了生活舒适，你不会去找农村，为了生活舒适，必须挣许多钱。”

“那么农民又怎么样呢？”

“你别让我笑歪了嘴。当种石头的农民，——因为在这儿除了石头还是石头——可挣不了钱啊。”

“公路边有一些非常漂亮的瑞士式农舍。”

“那是避暑人的房子，这些人住在马德里，热天季节，他们便来到托雷洛多内斯避暑。”

“我在山地的一个镇上曾生活得很幸福。当然，那是一所有花园的房子，还有抽水马桶。居民感到最麻烦的事是缺少电灯和水，”佩比塔说道。

“住在农村或去农村的人，是用卵石来擦屁股的。”

“有了钱去任何地方都可以过舒适的生活，可是有些人比别人生活更好。我如果有了钱，我就不在这儿避暑，”埃尔·佩斯卡插言道。

① 美国作家巴勒斯(1875--1950)的《人猿泰山》中的人物。

“那么你到什么最值得去的地方去呢？”塔诺问道。

“我和那些法国佬去科斯塔·阿祖尔。”

“我在我母亲的那个镇——阿维拉的一个镇上避暑，”路易斯说道。

“你是有点少爷气派，”欧洛希娅说，“我可不知道避暑的事。在家里，我们在朝大街的门口纳凉，身边放一个陶制大水罐。”

“问题是，有些人过豪华生活的。我是说，在西班牙很不公平，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帕基塔说。

“三年前我去萨拉曼卡的一个镇，我就过得很好。我碰巧遇上了基督节。我跳舞从早一直跳到晚上，而且吃肉和香肠，”卡门说。

“这儿生活过得好的是塔诺；你们看他带来的肉片。”

“他们很乐意给我母亲的儿子花大钱。做生意总得赚钱。如果一个人被投进监狱，他的钱包里塞满了钱，他坐监狱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有财团里的那些人，生活也会发生变化。他们出售阿根廷小麦，大学生们找他们的那个头儿，你们已经看到了，他们让学生住单人房间，里面还放了收音机。许多学生上街去了。小伙子们，必须要有目光，”塔诺用左手的食指指着自己的左眼说道。

“路易斯，这儿你有一个未来的顾客，”华金插言说。

“你是律师？”塔诺问。

“是的。”

“对，”埃尔·佩斯卡说，“你们知道，路易斯是一位没有钱的先生，没有钱的先生，用拉丁语讲就是羸丸。”

卡门吃着油炸鳕鱼丸子。她从一只金属饭盒中拣出鱼丸。

“你们想吃一只吗？那鱼丸非常好吃。”

“是什么做的？”

“用鳕鱼做的。”

“那是因为自从我在鱼铺工作以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有沙丁鱼味道，”埃尔·佩斯卡说道。

“我们谈论什么呢？”欧洛希娅问道。

“咳，你就给我们谈谈你第一个未婚夫的事儿，他怎么做你的未婚夫的，”埃尔·佩斯卡笑道。

“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你的大婶在巴利阿多里德做妓女的事，”欧洛希娅因为小伙子开了个玩笑便很反感地说道。

“请你别生气。”

“你想吃个西红柿吗？”

“好。”

“请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快了，我们已有了房子。”

“我为了有一套房子，我还没有结婚。”

“我可以结婚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常见面，”安东对路易斯和华金说道。“我现在在圣贝尔纳多街的一家酒吧间寄宿。”

“我去安东尼娅家寻她时路过那儿，”路易斯说道，

“店主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比列戈还要慷慨。他叫庞塞。”

“喂，安东，我很乐意去。不过，这个有那么多人去的地方，我去会有很多疑虑的。我记起了厂里一个同事讲过的另一次这样的聚会。人们畅所欲言，议论人类和神圣的事。人们读马克思和列宁的书，讨论所有的一切。可是后来，这伙人与警察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酒吧间成了警察抓人的罗网。”华金评论道。

“喂，老兄，我认为必须做点事情。我们已是处在一九五一年的人了。”

“对，必须做事情。可是正如塔诺所说的，要有目光。你不能

像游艺会上那些只看门襟的纸糊的巨人模型那样。”

那是炎热的午睡时刻。蝉儿在歌唱，河水仿佛流得更缓慢了。河中泛起鲜红色的反射光。三个蚂蚁群在吃剩的食物上来回爬动，在沙堆上画出了三条黑色的平行线。

安东尼娅和路易斯躺在凉棚下，肚子朝天，他们的脑袋靠在小伙子用自己的长裤做成的枕头上。他们俩沉浸在午后深沉的平静之中，甚至蝉儿的烦闹歌声也不能破坏这种平静。这样，耀眼的阳光使他们闭上了双眼，直到他们两人睡着为止。姑娘梦见了一个美妙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每天的现实毫无关系。

华金和佩比塔在河边坐着。在他们附近，其他朋友在做罚物游戏。

“华金，天好热呀，”佩比塔说道。

“是的，要非常注意强烈的日照。”

“明天你将会看到我们都脱一层皮。”

“你像螃蟹一样。你尽晒太阳。”

“你知道，我们姑娘喜欢让皮肤变得黝黑。再说，我这是第一天这样晒太阳。以后，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晒太阳，不会有什么事。”

“我不会自以为了不起，拿我的皮肤开玩笑。”

“因为你是男人。如果你不是男人，我们可能早见面了。”

“你不要这样认为，男人也会自以为了不起的。”

“你没有发现自己，总是不修边幅的，你的裤子上从来没有裤线。你是一个亚当^①。”

“盖有葡萄藤叶还是没有葡萄藤叶的？”

① 亚当：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类始祖”。

“你不是傻瓜，有叶子的，”她笑道。

“你喜欢在背上涂搅拌好的油脂吗？你会感到很凉爽。”

“谁现在起来拌油？我有点懒……”

“喂，你起来。我给你油脂，我们去爬前面那座小山。”

华金站了起来，他想拉姑娘起来。

“佩比塔，你别磨蹭。”

姑娘终于支起身子。想到要爬山，她很高兴。姑娘用手掸掉了粘在腿上的湿土。

“你屁股上有沙土，”华金提醒她。

他把油倒在一个盘里，加了一点水，用佩比塔从地上拣起来的棒搅动液体。

“你皮肤痛吗？”

“今天不痛，可是明天会痛的。”

“现在你穿我的衬衫，把头巾遮在头上。”

佩比塔收拾了一下，头发上披了一块红色的头巾，显得格外妖艳。华金的衬衫穿在她身上显得有点肥大。衬衫的下摆落到离膝窝上面一拃的地方。这样穿，好像姑娘身上只穿着这件衣服。华金很高兴，对她穿的衣服看了好一阵子。佩比塔显得体态优雅，细长的双腿被太阳晒得有点红色，在白色的衬衫和红色的头巾的映衬下显得分外好看。

“你吻我一下，你失去了接吻机会，”埃尔·佩斯卡对欧洛希娅说道。

“如果塔诺喜欢，我们可以陪你们，”欧洛希娅对他们说道。

“我不想跑来跑去。我倒很乐意呆在长颈大肚瓶附近；我喜欢不时地摸摸酒瓶的底部，”塔诺回答说。

埃尔·佩斯卡用不怀好意的声音劝他们不要多吃河对面的黑莓：

“你们别贪吃黑莓，黑莓会使佩比塔的肚子大起来的。”

“有这么回事，倒要十分注意，”塔诺笑道。

“你会失掉接吻机会的，你吻我一下吧，”埃尔·佩斯卡继续央求欧洛希娅。

他们跑着到了涉渡口，在罗马桥过去约几百米的地方，他们踩着露出水面的石块穿过小河。

石壁非常光滑，但是有一些裂开的地方，可以用手抓住。他们慢慢地上了山顶，从那儿看到了一大片土地。他们转过身来看留在下面的人，这些人正在洗澡。当听到佩比塔和华金的叫喊后，他们挥动了一下双手。

断壁的另一侧是不很陡的斜坡，斜坡和平地相接，生长着黑莓。

他们在那儿待了好一阵子。嘴里充满了黑莓的血红的酸甜的汁液。

很快，不知为什么，他们相互久久地凝视着。华金好像感到皮下的情火在烧灼着自己，他急于求爱，把双手放在姑娘的肩上。他吻着她的脖子，十分温柔地解开她的衬衫。

佩比塔的心既兴奋又惊恐地跳动着。她的乳房胀着求欢，像鸽子一样抖动着。当她脱光衣服时，她感到有一阵微风袭来，她把身子挨近男人，华金以一种火热的情爱把她占有了。一阵甜蜜而又强烈的快感，使她睁大的双眼充满好奇和恐惧。她没有听华金那些亲热的话语，也没听懂他低声说的话。就这样，他们慢慢地、明智地在那一小块长着黑莓的正方形绿草地上确立了爱情。

下午在高耸在地平线上的山丘中消逝了，远足者赶紧收拾帆布背包，因为通往托雷洛多内斯火车站的路又长又陡峭。

“离火车出站还有二十分钟，”路易斯提醒说。

在道路的高处，他们不再看峭壁了。在低洼的暗处，蟋蟀开始唱歌了。河流隐约可见。

在山坡上有另一队远足者在爬坡。他们中有的唱着歌，有的笑着，还有的只是默默地走着。

他们在火车上找到一个有空位子的地方。当火车鸣长笛出发时，他们感到有点凄楚，但马上就唱起了歌，凄楚的感觉消逝了。

“我们改天再来。”

安东坐在车窗边数着飞快掠过的电线杆。他感到累了，便去看与铁路平行的公路上行驶的汽车的车灯。

拉斯·罗萨斯。拉斯·马塔斯。

华金和佩比塔相互久久地对视着，他们的双手相互紧握着。

“佩比塔，我爱你。”

“我也爱你。”

埃尔·普兰蒂奥。波苏埃洛。阿拉瓦加。

“马德里！那儿是马德里！”

所有的人都拥向车厢窗口。远处，在火车的照明下，可以看到马德里城微弱的灯光。不久以前，人们就开始限制用电了。

马德里。从得土安到大学城。由那儿到此站，拉斯因胡利亚斯，到莱加斯比，莱加斯比到巴列卡斯，巴列卡斯到圣帕斯库亚尔，圣帕斯库亚尔到查马丁。有一根苦难的绞索套着这座城市。

主教菜园的粪坑。实习医院的棚屋。圣马丁坟墓的墓穴。

比利亚苗圃的洞穴。埃斯特雷马杜拉林荫路上的茅屋和曼萨纳雷斯河。拉维加-维斯蒂利亚斯山坡上的猪圈。圣洛伦索圣体会的邻地。耶塞里亚斯,莱加斯比的陋屋,乔佩拉的林荫路,征服者海梅大街。马塔德罗斯街区。莱加斯比的垃圾堆。乌塞拉—比利亚维德,奥尔卡西塔斯街区。中国和日本式的阴沟。恩特雷维亚斯,比尼亚·金塔纳,塞罗·内格罗和拉普拉塔街区。赖孟多大叔的井,阿雷内尔的高地。堂尼亚·卡尔洛塔的平整土地。埃斯科尔多博士的棚屋。阿夫罗涅加尔的茅屋,埃利帕和“未经许可的”街区。阿尔穆德纳的圣母围墙。拉斯拉塔斯街区,维卡尔瓦罗高路和拉斯文塔斯高地。圣帕斯库亚尔街区。“空中脊梁”。“兴奋”街区的小洞和毛拉将军长街。还有其他没有名字的马德里城郊区。

然而,人们继续来到城里。这些人是哈恩的农民,人们根据他们的说话方式称他们为“打呼噜”的人。昆卡的临时工,有“运气”的人。托莱多的“笨蛋”,索里亚人和曼恰人。

他们采用所有力所能及的手段来到马德里。有些人骑驴子来,还有些坐车或步行而来。最多的是坐三等火车来的。

他们来到城里,带来的用具又少,又简陋、破烂,而且是被抛弃的东西。他们来寻找做临时工。这种临时工能使他们摆脱挨饿的卖苦力的人的困境。他们是满怀希望、仇恨、疑惧、隔代遗传的偏见和改善人生条件的无法遏制的向往而来的。

“该轮到你走了,华金。”

“对不起,我在想另一件事。”

“想什么?”拉米罗问道。

“没有什么,有一天我经过巴列卡斯,一个同事和我去赖孟多大叔的井那儿。那个地方是那么大,简直像一个省城,那儿的哈恩人比在哈恩的更多。”

“所有的安达卢西亚人都是些‘不值钱’的人，”拉米罗断定说，“一个人住在巴列卡斯要非常小心。你知道，那个地方人们称之为无自由区。”

“我知道，这一点连小俄国也懂。”

华金为了威胁对方王车易位的兵，移动了白色象。拉米罗用他的车迎战。

“请告诉我，你在俄国待过？”

“是的。”

“在那儿好吗？”

“嗯，不错。我开始时非常开心，后来可不是这样了。”

“那儿女人的情况怎么样？”

“尽管德国女人更好，那几个波兰女人对我们也好。大家知道那儿没有不奔忙的男人。”

“赖孟多大叔的井那儿来的人是可怕的。”

“像每个人一样，他们在城里要待下去。但愿他们不是来夺走我们生活在这儿的人吃的面包的。”

“可是穷人会干什么呢？所有的土地从一开始就被分成小方块，掌握在不种地的人的手里。那么穷人怎么办呢？在广场上等待人家雇他们做临时合同工和偷橄榄解饥吗？”

“你不要这样悲观，华金。”

“为什么不呢，嗯？为什么拉马诺·内格拉出生在安达卢西亚？为什么农民要移居呢？那是因为缺少工作，由于饥饿的缘故。我们以前过饥饿的生活，现在我们仍然在过饥饿的生活，因为这才是永恒的历史。可你曾有过饥饿同时又害怕的感觉吗？你可有过警察敲你邻居的房子，虽然与你无关，你还是害怕的感觉吗？我可以讲一个工厂的同事、一个来自哈恩的小工的事情……”

“战争期间，我……”

“在战争，战争时期，那指的是一九三六年的大战争，这已成为历史了。我认为你们坚持要我们经常记住的这场战争。对于我来说，我对战争的事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现在的事，我们怎么生活。但这并不等于我对你所说的那场战争感到害怕。我也不害怕饥饿。对一个什么也没有的、无足轻重的人来说，他可以忍受下去。”

华金沉默了片刻；他看了一下棋盘板，将骑马的小兵往前移。

“你将会知道，这就是我对你讲的工厂的一个小工的事儿。那一整片土地是单一种植的。在哈恩人们种植橄榄，就像在帕尔多人们只种植橡树子一样。看来，全村只有三家是有钱人家，宪警队维持治安。在村里住着一人，是一个卑鄙的家伙，你我可以朝它小便。这个人是一个不合时宜出生的人，既然母亲流血生下了他，人们也就得感激她。在那爱他、给他钱花的三户人家的同意下，他成了主人。他引起了那样的恐惧，以致你都会嘲笑盖世太保了。在那儿，付给短工们全省最低的工资。也就是说付这点工资已足够了。那儿，女仆们在主人的桌上摆午饭或涂上油的面包。当有工作时，他们就从早到晚地工作，没有工作时，他们就乘警察背过身去时偷橄榄，要么在广场上边晒太阳边嚼甘草，甜草或当地所叫的一个什么名称。既没有医生，房子里也没有阳光和水。没有学校。神父尽管有时可以讲一点什么，但不敢，因为上帝在主人的桌子边吃饭。几天以前，”华金继续说，“一个小牧羊人上吊了，因为他去一个橄榄园偷橄榄，不幸被那个家伙发现了。他在偷橄榄的时候，山羊闯入一块播种地，吃掉了价值二十杜罗的种子。那个家伙，就是我对你说那个卑鄙的家伙，无意中说出，在小牧羊人偷橄榄的时候就揍他。小孩吓坏了，逃进了山里。三天之后，人们发现他吊在一棵橄榄树上。他

是由于害怕而自杀的。”

华金讲完了他的故事，两个男人沉默无语。最后，拉米罗打破沉默，问华金。

“对那个家伙怎么处理呢？”

“对那个家伙，什么也没有处理。那个小孩是自杀的，谁有罪过呢？他们说，谁也没有罪过。”

拉米罗把车移到了象的对角线上，以此来对付白兵的进攻。

门铃响了，华金起来开门。

“下午好！”华金说道。

“喂，华金。拉米罗在家吗？”布兰卡问道。

“我们在餐厅里玩国际象棋。”

阿德莉塔在过道上跑向她的父亲。拉米罗将小女孩悬空举起。

“我累垮了，”那女人说道。

“你坐一会儿。”

“我奔走了整整一个下午。抱了这个小女孩抱得手臂都酸了。”

“医生说什么来着？”

“小女孩需要空气和阳光。哈蒙医生说给小孩喝一点富含维生素的青菜汤。”布兰卡解释说。

“作这次旅行不需要干粮，我这样说，我不是医生。”

“这是你找的借口，这个家正在把我们的孩子杀死，她会生大病的。我不能每时每刻都带她到街上去。”

“这个房子是不怎么好，可是你，布兰卡，你脸色不错啊，”拉米罗回答说。

“那是胭脂。我吃那点东西，既长不了肉，也不会让脸色变红。”

“我们没法去找别的房子。哪儿有房子呢？”

“那么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除了那个女孩以外，一切都叫人心里难受，你去找一个挣钱多一点的职业。”

“那些寻找工作的人在街角转悠。你这种想法见鬼去吧。你要我放弃办公室，去要一张社会救济的卡片吗？”

“如果我们这样继续下去，我肯定我们会走这一步的。”

就在同一天上午，拉米罗没有去上工，他在街上转悠，看了几个朋友，打听一下有人是否知道有便宜的房子。朋友们给他看了几套房间，其中有一套房子有五个房间，有浴室和电梯。

“我只有挣来的工资可花。我不能买一套房子，也付不起租金。”

“这些房子便宜。值十五万。”

“房子倒是便宜的，可我付不了那么多钱。”

最后，拉米罗决定与他的上司谈谈。堂赖孟多给了他一张去莫斯卡尔多将军的住宅的介绍信。

“在这人对面有一个我们的好朋友，一个同志，一个好小伙子。他身材长得高高。像我一样，你是个退役军人和第一期的西班牙长枪党党员。我们每个人都在被指定的岗位上和平地执行使命。如果他愿意，他会给你一套房子的，当然我不能对你作什么保证。他许下了许多诺言。”

拉米罗想把早上的会见情况讲给布兰卡听，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万一事情进展不顺利，那么这种失望会是过于残酷的。

布兰卡已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拉米罗重新坐到了椅子上。

“你别结婚，小伙子，你别结婚。女人总是个难题。”

“你知道吗？安东尼娅早上走了。”

“不知道。我知道她要走；但没有想到会走得这样快。她的姨妈，怎么说呢？”

“她也想走。她跟自己的老板走。”

“你可以说，是跟她的情人走。”

“每个人都尽可能找自己的出路。”

阿德莉塔继续在餐厅里玩着用碎布做成的球。

“爸爸，我想吃饭了。”

“是的，宝贝，对。你母亲给你吃饭。华金，以前你对我讲的那些事情，我将会告诉你的。西班牙人经历家庭、市政府和工会。孩子，你别把衣服抛给我，去找你的母亲。家庭、市政府和工会是自然单位，你讲的那些人，我们，通过老板和生产者进行对话……”

“爸爸……”

“狗和猫在同一陶锅里吃食是非常难的。老板去吃他们的东西，咬我们的肉；我们不让他们咬。老板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能调解的。”

“喂，拉米罗，给我五个杜罗；我要去买油。”布兰卡靠在她丈夫的椅子背上。拉米罗一边嘴里咕哝着，一边取出他的钱包。

“看来你的嘴像修士一样，比一个学生小乐队的要求还要多。”

“你知道，办公室给的钱我们在每月十日之前就用完了，剩下的日子靠代售纸张所挣的钱来生活。如果你有钱就给我一点，如果没有，我将会向可靠的人去要。但是不管怎样，你必须在办公室里要求预支。”

“讲完了吗？”

“我提醒你，钱不是口香糖，拉不长的。”

“布兰卡，这个月，我觉得在领工资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多少还一无所知，你身上得留一点钱。”

“催促时间是可怕的，”布兰卡说道，“你站在日历前面像一个笨蛋，好像你看着日历，日子会过得更快一些。你自言自语，这个月有三十一天，可这对你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你不想再看日历，数一下缺几天可以领工资。有时我自言自语，想让光阴流逝是一个人犯下的最大罪过。打发时光会使人变老，等待好事到来，我还没有这个福份。最好还是把心思置于背后，不想什么，可我做不到这一点。”

“在我的厂里，当发生没有什么工资可以领、有预支全日工资时，我们就说，我们挣了‘薄绢纸’。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在信封里工资写在上面，下面是打折扣和预支的金额数。余下的和给你的是一张薄绢纸，当你没有钱可领取时，出纳员给你放上一张这种有波形条纹的纸，”华金回答说。

拉米罗从他的钱包中取出一张比较新的钞票。给自己只留下另一张五个杜罗的钞票，他把钞票对折放在钱包的一个小袋里。他取出钱时，把身子向前倾斜，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妻子发现他保存的另一张钞票。

阿德莉塔在房间里咳嗽。

“那个小姑娘，布兰卡，你去看看那个小姑娘。”

布兰卡已经走进房间去梳头发。听到她丈夫的话，她从卧室的门里探出头来说：

“我已经给她喝了止咳糖浆。”

“拉米罗？”华金站起身来。

“要什么？”

“没什么，尽管你有许多想法，不过我认为你是一个好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只不过是好奇。你对战后出生的人有什么看法？他们是另一种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问你对于那种不了解内战的人有什么看法。你可以肯定，总有一天，他们会要求了解许多事情的。”

拉米罗没有作出回答。他们只是默默地下着国际象棋最后几步棋。

安东尼娅在自己的房间里，把第二天要带走的東西塞进一只手提箱里。东西并不多：有一件冬天穿的针织紧身上衣，两件替换穿的内衣，一件短大衣，两条裙子和两件衬衫；两个活动床上的连接装置，一双新的长统袜和一双穿过的旧袜，两套白色桌布餐巾，一双鞋子，一双家用便鞋和一些别的东西。

奥雷阿姨妈默默地看着她的外甥女。对安东尼娅塞进手提箱内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察看。

“你别搞错，把我的东西也带走了，”她说道。

“姨妈，你别担心。倘若我拿了你的东西，我会还给你的，”安东尼娅回答说。

夜幕降临了。这时正值院子里各家厨房点灯时光，人们发出的惯常的嘈杂声，从敞开的窗户外面传了进来。跟往常一样，女人们唱起了流行歌曲，或者在做饭时听广播电台播放的小说。

可以听到拉米罗企图说服他的妻子去看电影的声音。

“喂，亲爱的，电影都快放映完啦。”

华金和佩比塔在散步，而玛丽娅正在工作。

安东尼娅收拾好了手提箱，直起上身看她的姨妈。

“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相信我没有忘了什么，”她说道。

“没有，你什么也没有忘掉。”

“姨妈，你知道，我心里感到有点痛苦。也许你没有感觉。但确是这样；这儿，在这间陋室中，我们有许多熟悉的东西。”

安东尼娅看了一下四周的墙壁，看到了隔墙上的裂缝，它使她想起一条蛇，记得有几个晚上她被吓得不敢睡觉。她看看炉灶，在灶边煮东西，点火是那样的麻烦。还看看床，冬天她们在床上是那么的寒冷，姨妈和她必须背靠背地蜷缩在一起。她看看衣橱的镜子，每个星期天下午，她都要在镜子前照一下自己，然后与路易斯一块出去。她看看椅子，有好多个下午，她没有未婚夫陪，也没有钱，坐在椅子上边缝衣服，边听院子里某个邻居家的收音机广播。

她听着邻居的说话声，熟悉所有那些女人的洪亮嗓音。她想起了这个时期的朋友华金。想起了玛丽娅太太，尽管她爱喝酒，却是个有自己生活方式的善良女人。想起了艾伊达，她与一个收破烂的人结婚，她与艾伊达谈了不知有多少次。她想起了那几个新房客。安东尼娅看着这些东西和房间里的四壁回想起了一切。

奥雷阿姨妈打开衣橱，取出了一块黄色的丝头巾，一把有手工画的塞维利亚产的扇子，并从钱包中取出一张二十杜罗的钞票。

“拿去吧，这是我的礼物。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你。”

她不能入睡，看着墙壁上那条像蛇的裂缝。奥雷阿姨妈在打瞌睡中叹着粗气。

“姨妈？”

“怎么啦？”

“你醒着吗？我睡不着。”

“你别打扰我，我们明天再说；我累了。”

安东尼娅不知道在想什么。她走了，悲喜交加地走了。

阿德莉塔在电影院里睡着了，她母亲抱着女儿回到家中。他们三人睡一张床，小姑娘睡在角落里，脸朝墙壁，布兰卡睡在中间，而拉米罗睡在床的拐角边。

拉米罗熄了灯。想着他们看过的电影：一个音乐喜剧，有一些姑娘穿着非常轻薄的衣服，做出各种不同的姿态。他便无意识地开始对他妻子作爱。布兰卡醒着，她既没有想电影，也没有和她丈夫欢乐一番。

“小姑娘在，”她说，“我们只有两人在一起时才能干那种事。”

“你觉得如果……”

“拉米罗，明天你必须至少要五百杜罗钱来。”

拉米罗听了这个便很快就泄了气，他侧过身子听着远处的声音睡着了。

恩里克在吃饭的时候，走近华金。

“这个星期六，我们务必在奥古斯托家里开会。”

“有重要事吗？”

“是的，正在准备做一件好事。”

“是什么事情？”

“星期六，我会告诉你的，提前知道不合适。”

“好吧。”

“你别缺席，我们要对你说。”

“你最近给我看的几本书，我将给你带来。”

“不，你什么也不要带。你把这些书藏在家里。”

“发生了什么事？”

“你别担心。对谁都没有严重的事情发生。不过，从今以后，你去奥古斯托家时要小心才是。”

“那座房子被监视起来了吗？”

“没有，不过，你不要多问。星期六我将会给你解释的。”

华金脑子里想着恩里克说的话，可是什么也没有想明白便忘了这次谈话。下午他离开工厂时，去佩比塔家了。

佩比塔住的房子是一种在马德里被称为“走廊”的房子。房子前有一个宽敞的中心院子，院子是长方形的。在院子中央修了一个有四个水龙头的水池，底楼的邻居从那儿取水。

院子的地面铺有石块，这些石块如果说刚开始时是很尖利的，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邻居们的来回踩踏，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光滑了。在石块的连接处，已陆续长出了小草。

“在冬天，你会吓得摔交。在雨季和长青苔期间，没有人从石头上过往；你想摔交那就是一种爱好了，”佩比塔说道。

底层的走廊通到院子。走廊尽头的壁柱是正方形的，并漆成栗色，在柱子上小伙子们刻了对姑娘们表示爱情的词句，也写了下流的话或辱骂邻居的言辞。

门廊下，在每个窗户底下，倚着墙壁放着用石膏制成的石凳，上面铺有白色的瓷砖。那些女邻居坐在凳子上在白天的阳光下缝补衣服，这样可以节省电力。

在公用的洗衣处也盖起了棚屋，在一扇大门后面放着母骡拉的大车。

这儿的住房多半是朝向院子的，有一个门和一个铁栏窗户。在窗口可以看见花盆、放有天竺葵或红色麝香石竹的瓶子，这座房子有三层，沿着走廊有六十个门和朝向小院子的窗户。回廊是这所房子里的人聚在一起闲谈聊天的地方，也是使人一举成名

的地方，人们在这儿公开议论的生活和奇迹已不只是这所破旧大楼里的邻居的，而是周围三个街区的人的。他们讲临时编成的笑话，讲每天晚上听巴黎广播电台或比利牛斯山电台播出的内容。

华金几乎每天下班之后都去找佩比塔。两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到姑娘家的赞同，而且也受到院子里的邻居的赞赏。在大楼里，这种赞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除了别的习俗外，那些邻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养成了一个诱人的习惯：任何青年男女与住在大楼的某个小伙子或姑娘保持爱情关系，他们都要说闲话和背后议论。

有几个下午由于大街上的气温，身体疲劳和缺钱，这对未婚男女呆在家里。华金喜欢靠在木栏杆上听那些在院子的水池边洗衣服的女人说话，或者看她们将洗好的衣服晾在穿过两个相反方向回廊间的空间的绳子上。

未婚姑娘坐在他身旁一张柳条扶手椅上，缝她的嫁装。

佩比塔的父亲，堂卢卡斯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老战士，是一个正式的战斗。他脸庞瘦削，但身上倒还比较胖。他的妻子劳拉说，卢卡斯有许多鸪鸟的特征，脸部瘦削，屁股肥大。

堂卢卡斯总是否定一切。西班牙发生的所有事件中，神父都有罪过。按照他的观点，使我们痛苦的一切不幸中，神父都有罪过。如果天下雨，那些穿黑长袍的人有罪过，不下雨，他们也有罪过。但尽管他反对教会和神父是那么凶猛，他却是一个善良的人。任何人向他提建议，他都能把自己带的面包从胳膊下取出来给别人。当他的女孩出生时，他那颗浪漫主义的心说：

“就叫她阿克拉西娅^①吧。”

^① 在西班牙语中，“阿克拉西娅”(Acracia)意为“无政府主义”。

这位卢卡斯的妻子劳拉，尽管不虔诚，但她却是一个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

“这是习惯造成的，华金，我可以向你保证。像许多西班牙人一样。当劳拉有问题时，她就去教堂，把自己的担忧卸到最结实的肩膀上。能给的东西就跟菩萨给的一样。”堂卢卡斯断言道。

“我做祷告能得到慰藉。”

“那是因为你做最多的祷告，上帝还是没有给你去掉问题，这就像罗锅不能从驼子身上去掉一样。”

然而，妻子丝毫没有理会她丈夫说的那些话，依然去教堂做祷告。甚至在一个月第一个星期五，她在梅迪纳塞利的基督前放了两支点着的蜡烛，再三乞求基督动手换一届政府。因为劳拉在有一件事情上同意自己丈夫的说法：在目前这种政体下，人们生活不下去了。

佩比塔的弟弟马里奥是个结实的青年人，农村的风吹得他皮肤呈松脂色。他在被毁区工作，重建被战争毁坏的家园。

“两年以前，我做敲直钉子的工作，现在我在做搭板模的工作，”马里奥说。

马里奥只是在星期六到星期一在家里过夜。每星期的其余日子他睡在毁坏区搭成的木板棚屋里，在重建家园中，这些棚屋是专供工人睡的。

据马里奥说，许多城镇的重建很便宜。被毁区雇用的大部分劳工是些政治犯，这些政治犯通过这种法律程序进行赎罪。他们像士兵一样，每天挣两个雷阿尔。他们本人的生活全由国家负担。

“他们的处境不妙，可我们也同样。在付了酒吧间一星期的帐目之后，我们的口袋空了，后面几个星期的生活我们就没有着

落了。一个承包人的表弟经营了一个酒吧间，这没有让他花一分钱。劳工和材料是这个承包人送的。承包人用材料和用人是随心所欲的。”

劳工睡的简陋床铺与部队兵营里使用的床是一个样儿。他们有两张小木板凳，两块放在长三脚支架上的大厚板，一块用没有捣碎的细茎针茅充填的床垫。劳工们和衣睡觉。

每星期六下午当马里奥回到马德里时，首先做的事情是交剩余的日工资和要一点热的食物吃吃。华金给马里奥上算术和几何课。

“对我来说，我对有些事情非常缺乏知识；要做一个装配木工，但缺乏计算木头体积的知识，我所知道的是托座、托梁、支柱……”马里奥说道。

阿克拉西娅也一起上课。她想为做办公室的助手而作准备。阿克拉西娅年方十六，有一双大眼睛，一张老是笑嘻嘻的脸。有时，阿克拉西娅的快乐会使她母亲讨厌。

“你头脑不清醒，”她对母亲说道。

当院子里的阳光消逝要到明天再出现时，邻居的那些小孩还是继续欢闹不停，而不去理会他们母亲叫他们上楼的呼喊。孩子们跑着玩“逮人”、“捉迷藏”游戏，做马亚^①游戏。也玩“跳马”游戏。

在傍晚模糊不清的光线下，邻居们都纷纷回家去了。当各家点亮室内的电灯时，院子旁的房子像一只放光的蜂箱。走廊上空荡荡的，孩子们不再在院子里做游戏了。他们上街登上去弗恩卡拉尔城的白色电车的防撞装置。

这时，劳拉太太把他们叫到家里去。佩比塔和华金坐在餐

^① 西班牙阿拉瓦省的小孩做的一种捉迷藏游戏。

厅的小桌子旁。

当华金坐得厌倦时，他便从桌子边站起，到厨房去和佩比塔的母亲攀谈。劳拉太太的瘦削的身体旁边，放着可口的菜肴，可以猜得出这是她做的。华金，为了使她喜欢，帮着做一些零碎的事情，这使得善良的女人非常高兴。她给华金讲了好多在邻居中流传的闲话，还说日子不好过，东西太贵。

他听说楼上过道上十号门的女邻居把厨房的地面租给一个矮小的妓女，因为这是房子里最热的地方。她为内格罗大饭店接客。她每天收一个杜罗。

还听说院子里八号门的女邻居，她的丈夫被关在耶塞里亚斯监狱里，她偷偷摸摸地和时而来搜查的社会政治警察来往。

“我认为这是警察对她们有企图，就像有一天警察抄《工人世界》报社一样，警察是预谋的。”

也听说费莉夫人——再过去两扇门——的情况也一样，她常和助产士来往，为了看看是否能消除两个月前她和自己的丈夫粗心大意造成的后果。

“费莉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都已经长大了。在明白自己母亲怀孕的肚子后，他们几乎不和她说话。我说，不是为了这样。一个人到了某个年龄时就必须注意，要有防范措施，”劳拉太太对华金说道。

大楼里的所有居民对所受的苦难厌烦透了。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苦难一出现时就把它消除。

“你会看到，人们会大打出手的。可是那些男人都是些软弱的人，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呀说。卢卡斯，首先是这种人。”

佩比塔的父亲下班回到家时，从一个衣柜的抽屉中取出一副纸牌，专心和华金打一盘抓四K的牌戏，他们一直打到劳拉太太通知他们吃晚饭。华金已经博得了他未来的岳父的好感。

“你，小伙子，你要是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成员，可能要作许多事情。”

“我对无政府主义不感兴趣。我对社会主义思想感兴趣。在你们的时代，无政府主义和工人运动是很好的。现在是盛行社会主义，你对它感兴趣以后，你也会来参加的。不过，我们大家都在同一条战壕里，”华金回答说。

堂卢卡斯的朋友是隔壁的邻居。是个矮个子男人，秃顶，愁眉苦脸的。他名叫雷米希奥，与佩比塔的父亲一样，曾是一个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

雷米希奥怀念在大街上以杜鲁蒂^①革命风格解决事情的年代。杜鲁蒂是非常激进的分子。

“在一九一九年我们帮助了革命，我们拒绝制造武器反对红军。从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三年，我们在巴塞罗那露了脸。”

有时他说：

“必须摧毁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如何必须消除资产阶级文明。但缺少直接的行动。巴枯宁^②说过，必须为平等，为自由而斗争。”

“那是在抽象中提出问题，那只是抨击其结果，没有抨击其原因，”华金回答说。

雷米希奥先生只是同情地谈论那些穷小子，谈论其他一些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不公正的分配中被剥夺继承财产的人。

他的职业是鞣制山羊皮。

“在马德里没有别人能占他的上风，”卢卡斯谈论他的朋友说道。

① 杜鲁蒂(1898—1936)，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家。

② 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在小桌子周围，当华金和佩比塔谈论成对未婚青年的问题时，两位主张绝对自由的老人断言，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靠世界无政府主义者建立自由的爱情。劳拉太太是一个保守分子，她照看好自己的女儿，对他们说，他们是在用思想和言辞冒犯上帝。这种事两个无政府主义者毫不关心，因为他们根本不理睬卢卡斯妻子讲的那番话。

“至多像最后说的这样，”雷米希奥尽管有信心，但不敢和劳拉辩论，他开始提高嗓门说道。

“这些反对取缔教会的人……总是用自己经历来说话的。”

他们玩着抓四K牌戏。也许因为他们抓到了好牌，或许是命运陪伴着他们。大部分打牌比赛是这对未婚男女赢的，而那两个非常绝望的老人不明白这对年轻人怎么会不算牌便赢了任何一局。

有几个晚上，华金留在佩比塔家里吃晚饭。堂卢卡斯为此显得非常高兴，他看到了与自己未来的女婿讨论西班牙的未来的可能性。这个无政府主义老人对这方面怀有某种乐观主义，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共鸣，他大谈第三国际的人是最有能力领导斗争的世界工人力量。

他对年轻一代提出一些批评。

“年轻工人踢足球踢得晕头转向。在我的车间里他们只会谈论马德里或阿特莱蒂克。我非常生气，我就打他们的后脑勺。”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也有别的青年关心国家大事的，”华金回答说。

“看来他们都是些笨蛋。尽管他们感到脚痛，但不知道他们的鞋子紧在什么地方。”

“不能对所有的人解释国家大事。堂卢卡斯，暗处有困难。”

必须马上学习。”

“这倒是真的。我也懂得人们逃避现实，非常小心。虽然在大街上没有枪声，可是现在的斗争远比我那个时代困难了。那些当警察的人不是非常精明，但他们有经验和手段得到需要的东西。”

华金看着堂卢卡斯的脸。这是从另一代、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男人的眼光来看他。就像看一个正在退出生活、怀着对现实生活的巨大的爱力求接近年轻人的老人。他明白，他尚能理解堂卢卡斯，然而，街坊里正在成长的男人说话就十分肯定了。

在谈到政治问题时，堂卢卡斯就忘了忠告年轻人的那种小心谨慎了。他会兴奋得站起来，为丧失的自由大声疾呼。

“自由！一个男人或一个民族可以原谅给过他饥饿迫害的人，但他决不会忘记践踏过他的尊严的人。”

堂卢卡斯激动起来了，在房间的地板上大步走动，华金竭力让他平静下来。

“对，小伙子，你说得在理。过去的事情，我一说起就会马上发火，可是你说得在理，不能这样说话。但是对于大楼里的邻居来说，没有必要这样担心。甚至对那些住在国外，思想健康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儿，像一个药房，什么都有。有共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别的思想没有。在这座大楼里，大家或多或少都像在牢里过日子一样。”

劳拉太太同情她女儿那张露出厌烦的脸，便找了个借口把华金从她丈夫身边拉走。佩比塔记得她父亲所有的政治论点，所以当她的父亲开始和华金谈话时，她就走到走廊里，把身子靠在栏杆上，在那儿等着她的未婚夫。

华金对劳拉太太的帮助十分感激，他走近栏杆，把自己的脸

靠近佩比塔的脸。他握住她的双手，数着手指，他们望着从院子黑暗天幕上露出的二十颗星星。

“得了！我以为你决不会来。”

“你看我不是来了？”

“一看到你和我父亲在一块儿，我就想走开。有时我想你来只是为了和我父亲说话，而不是和我说话，”佩比塔生气地说道。

对于华金来说，他很感谢自己未婚妻的热情，他笑了。

“你别笑，华金，这完全是真的嘛。”

“因为，你知道。我要让你的父亲不说出嘴里的话是很费劲的，回忆比别的东西更能使他维持生命。他已经是个老人了。”

“那你用什么来维持生命呢？是政治吗？”

“你。你将会看到，一个男人需要有一点信心，对一种思想或一个人有信心。我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思想，还有你。”

“你别下保证，你对我最好不要说得这样肯定。”

“不是这样吗？”

华金斜着头吻了一下她的一边脸颊。她，因脸上留有接吻的热量，她用手捂住被华金吻过的地方。

“你怕什么？”

“没什么……”

他把她抱在怀中要再吻她，但佩比塔挣脱了他的双手。

“会有人看见我们的！如果你喜欢，我们到走廊的角落里去，那儿比较暗。我的几个兄弟和我在孩提时就藏在那儿，玩一些互相吓唬的游戏。”

这个角落在走廊的尽头，在公用水池边。姑娘握住他的手把他带走了。

“走，让我给你带路。”

“喂，佩比。这个地方比地道还要暗。”

“那是因为昨天电灯泡坏了。”

“明白了。”

“华金，你会说这是一句傻话。可我要问你，你为什么不留小胡子？留小胡子你会很漂亮的。”

“我不知道，说实在的，我从来还不曾想过我留胡子。”

佩比塔靠着墙壁。

“对我说，你爱我！”

“你已经知道我是爱你的。”

“那你就对我说，我喜欢你对我这样说嘛。”

“我爱你。”

“说得太平淡，我爱你，我爱你；你给我多讲几句。”

“这是什么声音？”

“你别理会是什么声音，你理会我就行了。”

“这是什么？”

“什么人？”

“响声。”

“我对你说过了，你别理会，这是滴水的声音。”

“好像是别的东西在响。”

“是水。”

“明白了。”

“来，叫我的名字。”

“佩比。”

“你叫得好听一些。”

华金在姑娘的耳际说悄悄话，姑娘闭着双眼。

“你别咬我，以后有人问我那咬出来的印记时，会羞死我的。”

“那你就说是猫咬的。”

“他们就信以为真了。”

“小美人，你真是了不起。”

“喂，你留小胡子了。”

“听你的便。”

堂卢卡斯的房门开着，在走廊上投下一块长方形的黄色的亮光。可以听到阿克拉西娅在问华金和佩比塔的声音。

“他们不会看见我们吧？”

“不会的，从那儿看不见我们。不过，我们得去那儿，如果我母亲发现我们在这儿，在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她会骂我的。”

阿克拉西娅听到这对未婚男女故意高声说的话时，便在走廊上走过来。

“喂，姐夫。”

“喂，小家伙。”

“还叫小家伙，小家伙，我已经十六岁啦。”

“成一个妇女了，”华金笑了。

阿克拉西娅看了一下他们的脸，她感到好奇，希望能从华金和她姐姐的脸上看到爱情方面的事情。她姐姐移开了目光，因为从远足那天两个年轻情人第一次相互表示爱情以来，她一直感到奇怪，其他人竟一直没有发现他们俩已发生过的关系。

小妹子仿佛在反复考虑一件事情，她站在走廊上，华金的身边。

“喂，”姑娘以一副富于幻想神情望着院子上空的星星，“世界……男人……你相信上帝吗？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

“我相信生活。”

“我也不相信上帝。”

整个院子里的灯都亮着，可以听到收音机中的音乐，不想

躺下睡觉的小孩的喊声，院子的水池中四个水龙头的水声。可以听到赶车人将骡子关进栏里的吆喝声、骡子的嘶叫声。还可以听到大楼里六十户人家的门窗后面发出的对拮据的、紧张的、痛苦的生活的许多议论声。

“现在已是十一点钟，我该走了。”

“你别走，华金；你再待一会儿。”

阿克拉西娅已进屋去吃晚饭了。

“已经晚了，我到克维多大街有好长一段路程。”

“你还不能走，再待一会儿。你走了，我又只剩下一个人了，我要等到下一次见到你才能自在。”

他们俩默默地再一次看着那天上的二十颗星星。

他们又一次道别。华金打开屋子的大门，与她家的人说再见。

“再见，堂卢卡斯和你的全家。”

“孩子，明天见。”

“再见，”阿克拉西娅说道。

“再见。”

在门厅里华金与三号门的妓女遇上了，只见那女人一副愁容。

星期六傍晚，华金按照原来与恩里克约定的，去奥古斯托家。

那是一个初春的温和的傍晚。太阳徐徐沉落，余辉沐浴着城市的街道。在酒店门口，男人们喝着酒，谈论着他们的事情，玩着四人一组的纸牌。

华金离开地铁之后，又走了好一阵子的路，才到了奥古斯托

的家。奥古斯托家的楼梯却寂静无声，几乎听不到街上的闹声。在靠楼梯的一堵墙壁上，孩子们用木炭画了若干乱七八糟的画；也画了一些巨大的畸形怪状的性行为图。

他敲了一下门。

“是谁呀？”从屋里传来了艾伦娜的问话声。

“是我，华金。”

“请进，”她说道，“他们正在等你呢。”

奥古斯托和恩里克，坐在桌子边谈话。再往前一点，在寝室的门边，罗莎在听。

看到华金进来时，恩里克起来给他拉了一把椅子。

“你就在桌子边坐吧。”

“我能料到你要讲必须进行罢工的重要性，”恩里克对奥古斯托说道。

恩里克重又坐下。

“这是一个好主意。”

“尤其要讲清楚。”

“是关于什么的？”华金问道。

“我们要举行一次罢工。为此，我才通知你来，”恩里克回答说。

“你认为能成功吗？”罗莎说道，她穿过餐厅立到恩里克椅子背的后面。

“我不知道，不过一定要力求成功。”

“罢什么工？”华金问道。

“运输罢工、地铁罢工、电车罢工。”

“公共汽车也要罢工，”奥古斯托补充道。

“罢工的客观条件是成熟的，人们讨厌物价上涨和不加工资。”恩里克答道。

“罢工多长时间?”

“罢工二十四小时,华金。”

“罢工时间不算太长。”

“此外,要考虑到意外的因素。不要忘记几年来在马德里也没有发生任何的抗议。一次运输工人罢工遭到了突然镇压。”

这时,可以听到厨房炉灶内木炭的劈啪声,夜色缓慢地降临到窗户的另一边。

“你们中有人想吃一点面包和干酪吗?”

“你不要问谁想吃,你去拿来就是了嘛,”奥古斯托对妻子说道。

“我去准备,埃伦娜,”罗莎说。

“既不是你,华金,”恩里克沉思说,“既不是你,也不仅仅只是我们。人们将经历正在发生新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共产党员组织人们的时刻到了,尽管警察仍继续干他们的的事情,但这所有的一切正在慢慢地变得放松了。人们在利用警察,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政治可以反对。他们已没有别的制度可以保存现存的这些东西。甚至连可靠的部队也已不是完全和他们站在一起。”

“那我们能干什么呢?”华金问道。

“对工厂的罢工气氛作好准备。”

“这不会费很多力气的。”

“你别这么认为,大部分工人将赞成罢工,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们想的是一回事,干的又是一回事。要靠我们是否了解清楚他们的疑虑所在。”

“冈萨雷斯参加吗?”华金问奥古斯托。

“参加。”

“他马上就来,”恩里克补充说道。

恩里克看了一下罗莎，姑娘保持沉默。罗莎在桌子上放一长条面包和一块干酪，她把干酪分成小块，然后走到窗边透过窗玻璃往外看。从那扇窗里只能看到大街的一小部分，从那儿过去一百多米远，就是通阿托查的街口，对着一所医学院的大门。

“吃干酪时你们想喝点酒吗？”埃伦娜在桌上放了一瓶酒。

“酒总是来得及时，吃干酪太粘，”奥古斯托回答说。

“事情几乎全都准备好了，”恩里克继续说道，“十五天内，大家将知道这个日子；从今以后坚持，必须对所有的人说，让他们都知道这件事。”

“是什么日子？”罗莎从窗边问道。

“日子还没有决定。这样他们就不会采取措施。”

“对人们的要求不会太多吧？人们还有些害怕。”

“必须向所有的人说明要步行去，不会发生什么的。如果你步行去，那么没有谁会要你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

罗莎在窗边，想着从她认识恩里克以来所经历过的时光。从初次认识那个时候起，有许多事情对她来说已发生了变化。生活已没有孤独的感觉，日子更短、更容易忍受了。对于她，恩里克的希望在她胸中燃烧，就像心里有一个夏日的太阳。有时她把这感觉说出来：

“我喜欢像你一样满怀希望和兴奋看待事物。我在你身边时，我觉得一切都比较容易。当我只有一个人时，我愿意和你一样想，可是我不能做到。所有这些年来，我的心中都在研究我的整个人生，我几乎没有信念，我想具有你的那种信念。”

“你不要认为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不过，当我考虑未来、我们的前途、考虑我们将会有的孩子们的生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心里就有一样东西像所有男人有的那样，鼓励我继续生活

下去。”

“请讲给我听！你把事情告诉我！”

罗莎把目光从大街上转过来。有人在按门铃，是冈萨雷斯到了。

“你好，”他说，“我是按时到的吗？”

“当然按时啰。”

“你们谈吧。”

“我已经给你谈过这件事。”

“是的。”

“我们在准备工厂罢工的事。”

“我可以和铣工说说，你们知道，我能影响他们。这些铣工和我一样，都是社会主义者。”

“这倒不坏。”

“我认为，”华金说，“在工厂首先是要散发一些传单。”

“在厂里吗？”

“不需要，贴在我们去吃饭的围墙上。那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传单。我们也可以看到。事后，既不会引起怀疑，我们又好讲话。”

“这是危险的，华金，”埃伦娜说道。

“你害怕？”奥古斯托问自己的妻子。罗莎重又从窗边转过身来，全神贯注地听他们的谈话。

“我害怕！”女人回答说。

奥古斯托从椅子上立起身来，把酒杯放在桌子上，用手臂搂住他妻子的脖子。

“你别担心。”

“要是我不担心，那又有谁会担心呢？”

“你不要以为我喜欢担风险。”

“我猜想你们在考虑利与弊。”

“我正是为华金说的事情而来的，”冈萨雷斯说道。

“害怕是我们能遇到的最坏的事。他们正是利用我们的害怕控制住我们，”恩里克回答说。

“你说得对，可是埃伦娜也有说害怕的理由。多年来，她一直过着害怕的生活。她不能一下子消除害怕，保持这样冷静，”罗莎对恩里克说道。

“我知道你们不会干出傻瓜和疯子干的事情来。你们会三思而行的。可是你们要再思。我知道再思的结果会同我劝你们的一样。为了我们大家的事，你们会好好考虑的。”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讽刺传单？”冈萨雷斯问。

“我还不知道，不过，不会很晚。”

“缺钱，我们可以在工厂要。”

“星期六，我们可以向可信赖的人要钱。”

“必须找一个地方把传单藏好，”恩里克说。

“华金，传单藏在你家里怎么样？”

“不好。你知道我有房客。我对你说过有个长枪党成员。”

“你对我说，他是一个好人。”

“对，他不会说什么。”

“最好是华金不要把传单带走，”奥古斯托说道。

“拉米罗是一个好人，他有我们同样的问题。”

“最好是你不要把传单拿走。”

男人们保持沉默。华金心不在焉，吃着一块干酪。在走廊上可以听到有两人在说话的声音。

“他们是邻居，”埃伦娜说道。

“你小孩子呢？”罗莎问道。

“今天下午，吃过饭后，我把小孩子带到住在附近的我的堂

弟家去了，小孩子待在这儿，听大人谈论某些事情是不合适的。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不懂事，不想让他们管闲事。”

“现在他们吃得怎么样？”

“他们挺能吃，我能给他们吃的东西不多。”

几个男人重又谈话了。

“我们拿到传单后该怎么办？”

“可以把传单藏在我的家里，”铣工冈萨雷斯说。

“我不知道。”

“放在我家里好，我从来没有发生过麻烦事。”

“你家不合适。工厂里一出现传单，他们就会怀疑我们。必须有安全可靠的房子才好。”

“谁能藏这些传单？”

“必须是非常可靠的人。”

“还必须是看来与厂里没有关系的。”

“我来保存传单，”罗莎说，她开始把桌子上的杯子撤到厨房里去。

“恩里克，你看行吗？”奥古斯托问道。

“由罗莎决定。”

“我可以把传单藏在我的房间里。我的房间里谁也不会进去。”

“如果罗莎来保管传单，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过几天，我们再開一次会。”

“在哪儿？”

“在这儿，没有别的地方，”奥古斯托说道。

“可以在一家酒吧间开。”

“在酒吧间不行。”

“这儿。”

“好吧。”

“再见，”冈萨雷斯紧握两个女人的手说道。

“这次会议，你们什么也不知道，你们也不曾到任何地方去过。下班时，我们也没见过面。你们懂吗？”恩里克说。

“懂了，你别担心，”冈萨雷斯答道。

“你们一个一个地出去，时间拉开一些。”

“对，这样好。在这个房子里有许多爱说闲话的人。”

冈萨雷斯走了片刻之后，华金走了。不久，奥古斯托的几个孩子到了。

“你们在叔叔家里过得怎么样？”母亲对他们问道。

“叔叔带我们看电影去了，”大孩子回答说。

“我们看见一个打枪的美国人，”另一个小孩说。

“我让他们去吃饭和睡觉，”埃伦娜说。她去厨房，跟在她后面的是奥古斯托和两个小孩。恩里克和罗莎留在餐厅里。

“你在想什么？”

“在想你，你保管传单的事使我感到高兴。”

“我也感到害怕，恩里克。”

“你别傻了，不会有什么的。”

“你带我去兜一圈，我需要呼吸一下空气。”

“听你的便。”

“埃伦娜，我们走了，”罗莎喊道。

“愿你们玩得开心，”她回答说。

他们俩沿着街区的大街转了一圈，两人在人行道上，身子挨得很紧地走着，几乎不看一下过路人。新月的尖角朝着下面，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

华金和佩比塔两人相互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就分手了。

“明天你来吗？”佩比塔问道。

“来，要稍晚一点；但是我会来的。”

乳白色的月光洒落在布拉沃·穆里略的屋顶上。天空显得很脏，犹如被烟熏过一般。一个自行车队朝四条路街方向驶去。他们成对而行，并时常回过头来说话。

华金到了门厅时遇到了安东。

“有什么消息？”华金问他的朋友。

“没有什么，”安东愉快地回答。

“我见到你很高兴。”

“伙计，你不是很愉快……”

“有新消息吗？”

“你已经知道罢工的事了吗？”

“知道。”

“所有的人都知道罢工这件事。”

安东一只脚踏在门厅入口的台阶上，另一只脚立在大街上。

“请抽支烟。”

“谢谢。”

华金取出打火机。

“你有一个好的打火机。”

“是龙松牌的，我过生日时，佩比塔送给我的礼品。”

他们俩点了烟，在门厅只能听到在伊拉里奥酒店里喝酒的男人们的说话声。

“你来吗？”安东问道。

“你去哪儿？”

“如果你来，去散步。”

“我不能去。”

“你得做事？放到明天做吧。”

“我和一个朋友约好了。”

“你让那个朋友等一下，我们去喝几杯啤酒。”

“是一个同事，我们要做几件事情。”华金说。

“我明白，是传单的事吧？”

华金没有回答。有一个邻居进了门厅，这个男人腋下夹了一份报纸。

“晚上好，”邻居向他们两位朋友问好。

“晚上好，”华金他们回答说。

门厅的走廊尽头传来了电梯门的响声。然后，发出电动机的隆隆声音。

“这个邻居也在搞阴谋，”安东说，“他住在我隔壁，每天晚上我听他在拨弄收音机。”

“几天以前我就听到了坏消息。”

“有干扰。”

“我上去了。我还没有吃过晚饭，”华金说道。

“你家的情况如何？”

“平静。自从安东尼娅离开以后奥雷阿也走了。现在只剩下拉米罗了，但也不会长久。他们很快会给他一套房间的。”

“你高兴吗？”

“伙计，当然高兴。”

“他们走了后，这套房间就是你的了。”

“对，就是我的了。”

“好了，你不要这样急匆匆，连在伊拉里奥酒店里喝一杯啤酒都来不及。”

“只是喝一杯，我就上去。”

进入酒店要推开玻璃门，走上一个台阶。店里的柜台分两部分。柜台上有一半放着锌板，四周柜壁铺着瓷砖，上面装有啤酒龙头、放着开胃的炖菜。还有半个柜台比较小，是木头制的，给拿着长颈大肚瓶和其他瓶子来的顾客打酒。

“我在车间里看见过一小张传单，我可以对你发誓，”有一个站在柜台边的男人说道。当发现有两个朋友进来时，那男人就闭口不说了。

“闭上嘴，有摩尔人在这儿，”其中有个朋友笑道。

“他们是可信赖的人。”酒店老板说。

“得了吧。”

他们走近卖酒的柜台。

“星期天我们一块儿出去，”安东向华金建议说。

“等这一切都过去后再说，”华金回答说。接着，他问，“现在几点钟了？”

“我没有戴手表。”

“一个人没有手表是不行的，没有手表，一个人就不知道生活的时光。我必须买一只手表。”

“从丹吉尔^①带来的手表价格便宜。”

“现在是十点十分，”酒店老板说道；他从柜台的对面看了一下挂在架子上一个瓶颈上的手表。

“我得上去了，安东。”

“你把啤酒喝完。”

华金喝了杯子里剩下的酒。

“据我看来，他们很可能需要你。我将要和我的妹妹去看电影。我好久没有带她去了。”

^① 摩洛哥北部濒直布罗陀海峡的城市。

“电影什么时候开始放映?”

“十点三刻放映,但我想看新闻片。”

“愿你们看得愉快。”

“愿你有好运。”

华金走上了楼梯,打开了他家的门。拉米罗的房间门敞开着,华金向他家里的人道晚安。他们坐在装有火盆的桌子周围。

“和未婚妻在一起,对吧?”布兰卡说。

“我们在别墅牧场散步,她身体很好,”华金回答说。

“你现在一个人玩,如果你和姑娘出去,你要知道她会像一只飞鸽去剧场的顶层楼座看演出。一旦你结了婚、有了孩子,你就不能出门上街了,”拉米罗评说道。

“你也并没有把自己捆绑在床脚上嘛。你在街上待的时间比在家里还要多,”布兰卡对她的丈夫反驳说。

“我在工作。”

“我们去过牧场几次,你还记得吗?”布兰卡说。

“我们去了戈里斯,几所我不知道名字的孤儿学校旁边的一家饮食店。”

“我们还跳了舞,”布兰卡回忆说。

夫妇俩不说话了,好像是走了神似的。

“你们听说电车罢工的事了吗?”华金对他们问道。

“听说了,”拉米罗回答说。“是区里的同事告诉我的,他们已下了叫我们不予理睬,要去坐车的命令。”

“但你不要去坐车,”妻子说道。

“我还不知道我将怎么办。我们以后看吧。另一方面,我认为罢工是愚蠢的,游行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我去吃晚饭,”华金说道。

他走到餐厅里，打开窗户。室外，微弱的白色亮光沐浴着院子。可以听到笑声、谈话声以及门房责骂他妻子的声音。

“他们害怕了。他和还有一些人都害怕了，”华金听到门房的声音，想起了这个人有时为了吓唬院子里的邻居而大叫大嚷。

接着，华金就离开窗户，去小便和梳头发。在厕所门背后，有女人的几件衣服和一条旧裤子在一只钉上挂着。

当他回到餐厅时，看见晚饭摆在桌子上。他的继母放好了餐具。

“你出去吗？”她问华金。

“是的，”他回答说。“今天是星期天。”

“对于我来说，星期天和其他日子都是一个样。星期天唯一的好处是我不必去上班。但虽说是假日，我在家里总有点事情要做。你想吃什么样的鸡蛋？”

华金没有回答。桌子上的大水罐边，汤盆里正冒着热气。玛丽娅坐在桌子另一边，眼睛望着他的盆子。

“你想吃什么样的鸡蛋？”她又问了一遍。

“随你给我怎么做。”

“对我来说，给你做煎鸡蛋和做法国式的都一样。”

“那么就做煎鸡蛋吧。”

吃晚饭期间，玛丽娅不停地埋怨，比平时更消沉。华金看了一下她的脸。他的继母好像更忧郁，情绪更不好了。她继续讲话，语音低沉、单调，也不看别人的脸，仿佛她只是讲给自己听的，至于别人听不听她讲则无关重要。

“我还没有收到我姐姐的回信，”那女人说道。

华金依然是心不在焉，他把面包切成片片，然后，在面包上涂上蛋黄。

“你可以把床搬到奥雷阿的房间里去。一个多星期前他们把

所有的家什都带走了，房间正空着。睡在房间里比睡在餐厅里要好。我马上给你去打扫房间。”

“我会搬床的，”华金回答说，“我明天搬。今天我要出去，而且我也不想搬。”

“随你的便。”

他出门时，已是晚上近十一点钟了。他沿着大街走到克维多的街心花园。在广场的中央有两个警察在小花园的四周溜达。后来他们在一尊雕像边停步，抽着香烟。华金看到了他们的香烟头燃着又熄灭。广场中央一片昏暗，埃洛伊·贡萨洛大街几乎寥无人迹。只是在当铺大楼前面的一张石头凳上，有一个男人在逗一只狗。广场的另一侧，小花园的树木背后，可以看到舞厅里的灯光。华金虽然有一次曾想进去看看，但他只是在外面看看那个舞厅。塔诺对舞厅很了解。他对华金说过，在拉斯帕尔梅拉斯可以玩得痛快。如果你在跳舞以后使一个妓女对你有了好感，那么，你出五个杜罗就可以和她睡觉。出五个杜罗和一张床的价钱。“你去诺维西亚多，一张床就要十六个比塞塔；而且不是张好床，不过，对于一个寻欢作乐的人来说，这也就足够了。”

华金靠在一家小医院的栅栏上，不时地望着当铺大楼的钟。要是不干事，也许连一分钟都感到很难度过。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眼睛看了一下对面人行道上的咖啡馆的窗户。通过有点模糊的窗玻璃，可以看到里面的客厅，桌子靠墙排着，因为是星期六之夜，所以咖啡馆里坐满了人，服务员手里拿着托盘，从柜台到桌子边来回走动。

华金重又看了一下钟，发亮的钟盘突出了钟点的黑色数字。他感到不大耐烦，并且有点紧张。他吐掉了香烟，双手插入裤子的口袋里。他看到广场中央的警察依旧不动地立在那儿站岗。他又想起了曾听说过多次的话：“进行地下宣传，至少坐六年监

狱。不过，关监狱是次要的事，最糟的是多次审讯。我认识一个人，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们就打他的胃部。”

远处教堂的一只钟已报十一点半了。接着，另一个广场的教堂套钟响了。又敲了一次钟。这时，当铺的钟楼马上报时了。“完了，他不来了。但是，他必须来。明天必须在工厂里散发传单。他们会查获他身上的小包裹吗？”华金又看了一下那两个警察；他们穿过街心花园，朝弗恩卡拉尔大街走去；警察的脚步声在深夜的沉寂中响着，这种沉寂只是时而有汽车开过时才被打破。

对面人行道上的咖啡馆的门打开了，屋里冲出一道亮光，传来一阵欢闹和笑声。那些妓女走出咖啡馆，开始在广场上兜圈子。她们相互开玩笑，因为行人很少。坐在石凳子上休息的那个男人的狗在狂吠，那个人站起来，扔石块让它跟在妓女后面跑。

华金听到钟敲一刻的一下钟声。有个妓女开始打他的主意。那是一个难看的、忧郁的姑娘。她低声哼着一首流行歌曲，扭动着屁股。

“咳，你给我一支烟好吗？”她说，并向华金走去。

华金，没有注意这一切，漫不经心地看看她。他看到眼前那个女人的那张疲倦、痛苦和涂着脂粉的脸。她以一种职业性的目光久久地望着华金。这时警察又回到了广场；他们以沉重、乏味的脚步踩着地面。

“我只有黑色的烟，”华金回答说。

狗又一次地叫着。当铺的钟敲午夜十二点了。两个警察在他们附近停住。华金从姑娘的肩上看了他们一眼。一种害怕的感觉沿着脊柱袭来，就像是有一只冰冷的手放在他的背上一样。他点着了一支香烟。害怕和颤抖逐渐消失了。“他们不会想到什么，他们不可能想到一个和妓女厮混的男人正在等待一包传单。”

他向妓女转过身去。

“我没有带钱来。”

“今天是星期六，你会领到日工资的。”

午夜十二点一刻。警察穿过去到另一条人行道上，他们在广场的周围转圈巡夜了。接着，他们就在舞厅门口停下。

“我们不去玩一会儿？”

“不，我没有钱。”

过了一会儿，恩里克来了。所有的钟一个接一个地报了十二点半。

“出事了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

“你晚了很久，晚了一个多小时。”

“你不得不等，来了一些颜料壁画家，”恩里克指了一下袋里的几包传单说道。

“我们去哪儿散发传单？”

“去奥拉维德大街，”恩里克回答说。

他们就这样上路了。

吃饭的时候，像往常一样，所有的工人聚集在工厂的围墙边。

冈萨雷斯被一批铣工围着，他摆动着双手；一只手里拿着一张纸。

“我同意这张纸上说的话；我觉得还少了一点。”

“是的，说实在的，纸上说的要求并不多，”这群人里有一个说道。

“我们应该走来。就像胡安说的那样，传单上说的要求并不

过分。就是一天，只有一天，我们走着去上班。”

“请劳罗谈谈意见，”其中有一个铣工指着一个老人，这位老人用卷烟纸簿上的纸边剔牙齿。

“你们已知道我的意见。政治的东西我并不认为是好的。政治是搞政治的人的一种交易。不过，你们这一次可以相信我，如果需要，我可以走一天，走一个星期。”

“再说，你不去反对工厂。老板没有什么可说的。”

老铣工说完话之后，离开了这群人，去坐在围墙边晒太阳，继续用卷烟纸在嘴里剔牙齿。

华金走在姑娘们中间，姑娘们非常激动。

“瞧，”其中有个姑娘说，“华金说的非常有理。我父亲也是这样的意见。罢工的那一天，谁都不应该乘电车。”

“我的未婚夫工作的地方也散发了传单。他给了我一张。”

“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约定会面，大家一起来，”另一个姑娘建议说。

“你不要以为罢工像是和未婚夫去远足。”

“你们不能做朋友，”另一个姑娘笑道。

“因为我会做别人做的事。如果我看到别人走着去，那我也会走着来。倘若别人乘车，那我也乘车。我可不想引人注目。一个姑娘在生活中的麻烦已够受了，何必还要去找更多的麻烦呢，”还有一个姑娘这么说道。

“维森特大街往哪儿走？人们往那儿去，”阿尼塔开玩笑说，她是一位脸上有红斑的裁剪师。

“我们妇女必须参加这些事情，这也关系到我们的利益。在许多事情上我们遇到的问题比男人还要多。”

“必须步行来，”华金说道。

几个学徒工停止玩足球了，他们把围墙边拣来的传单放进

口袋里。有些人张着嘴巴听这几个工人说话。别的人也在纷纷地谈自己的看法。

“我父亲把一张传单带回家来了。”

“今天早晨，我在地铁口看见一堆传单，可我不敢去拾传单，因为那些‘格里斯’^①在那儿。”

有一个小工说：

“你们知道我是哈恩人，没有职业。我从家乡来还不到六个月。我会收割、脱粒，干农村里的任何劳动都能争第一名。在村里我度过了整个童年，在那儿成了青年并结了婚。我在十七岁以前，还从没有过一双长统皮靴，那时我还只有穿土制的系带凉鞋或便鞋。后来我也几乎从来没有穿长统皮靴，怕穿坏了。过节的时候我才穿长统靴子。”

“你的处境这么糟？”华金问道。

“比糟还要糟。也许你们会不相信，我毫不费力就出来了。一个人放弃熟悉的事物会感到害怕。我没有工作，在城里，只有做临时工的那点儿本领，不能干什么。”

“可你来了。”

“我能干什么呢？一个人智力低下，要学会他需要的东西。我，除了不能生活以外，我来还因为在那么小的村里富人们瞧不起的那些人会受到猜疑。一天，我打了一个人两记耳光，他们就不再雇用我干任何活了。被我打耳光的人没活可干，别人也没活可干。”

“你步行来吗？”

“我步行，”小工说道。

① 西班牙文中的“格里斯”(gris)意为“灰色”。此处是对穿灰制服的警察的一种蔑称。

“我还要考虑考虑，”另一个男人说道。

“没有什么可考虑了，要么去，要么不去。”

“你别解释了。古铁雷斯这么说是有他的道理的，”恩里克说道。

“我是来工厂找工程师的。如果堂佩德罗知道了，恐怕他至少会斥责我，不让我干包工。倘若取消我的包工，那我们家就无法生活了。我有一个妻子和三个还不能挣钱的小孩。”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由，”另一个男人说道。

“如果我们大家罢工，工程师就不会采取措施反对谁，如果我们两三个人罢工，他就会采取措施。这取决于我们，不是取决于工程师，”恩里克说道。

“既然我们大家罢工，我也罢工。我可不喜欢找一个车皮把同事运走。”

“进行罢工不只是因为抗议电车涨价，也抗议其他的事情，”其中有一个青年装配工说道。

“何塞说得对，要抗议更多的事情，”那个以前是农民的人说。

在工厂围墙的另一端，工人们正躺在地上，看着一直延伸到邻近的修道院的围墙那儿的田野。

奥古斯托手中拿着一个酒瓶。那是奥尔梅迪利亚交给他的。

“你们有什么意见？”他问道。

男人们沉默了一会儿。有的人用一块面包心把饭盒弄干净；还有的人在抽烟。

“请把酒瓶递过来。”

“拿住，不过，你没有多少时间好喝，我们有好多人要喝，”奥古斯托回答说。

“我认为……好，你要说的是一件蠢事。”

“你把它说出来，不要把它放在肚里，否则你会噎住的。”

“我说，我们并不会有很多损失。”

“要看情况，”其中一个男人说道，他跪坐着摆动双手说。“我说要看情况而定。我是欧洛希奥，大家都认识我，而且你们也都知道我的想法。在所有的问题上我都是第一个敢于冒风险的。不过，这一次我说要看情况而定。如果事情准备得好，而且我说的准备好不是指我们厂的工人，而是指马德里所有的工人都要准备好，这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搞得不好，那就是另一码事了，是后退一步，如果我们搞得不好，那他们就会对我们严加管束。”

“你所讲的搞得不好，不会发生，它总是前进一步，”奥古斯托说道。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事先就认为事情搞不好。在一次联合抵制或一次罢工中，工人不能采取守势。尽管这是第一次危险的尝试，也会是向前迈一步的。”

“用这种方法看，事情就清楚了，”电工这样承认说。

“工程师对我们说，如果包工能提前完成，那么大家就能拿到一笔生产奖金。可是我们大家还在盼这笔奖金。”

“奖金不会有了，奖金抛到野外去了。”那个男人开始笑了起来。

“女人已放弃了用奖金去买东西的想法。放弃给孩子买一张床和两条被子。”

“生产奖金是空想。”

“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同意走着来，”一个见习技工说道。

“请安东尼奥说几句。”

“他在装糊涂。”

安东尼奥站起身，看了一下面前的同事们。

“我，”他说，“尽管有些同事笑我去望弥撒，但在这些事情上我的想法和大家一样。如果要求给我们加工资缺少的是抗议，那我就第一个提出抗议。如果为了抗议生活费上涨需要在一天或一年内不乘电车，那我就不乘车子，并坚持到底。我认为这件事不需要讨论这么久，像传单上讲的那样，把这非常简单的事情交给我们吧。”

“讲得好，安东尼奥，”奥古斯托说道。

“同意这样干。”

“同意。”

工厂的汽笛响了，叫工人回去上班。他们成群结队地去了，边走边热烈地讨论。当进入厂房时，他们一个一个接受钳签到卡。

罢工那天早晨，华金为了去工厂，起床比平常要早。

还不很强的阳光洒在大街上。四条路街和得土安街的工人手中拿着饭盒，一队接着一队，慢慢地，像是不急的样子，顺着布拉沃·穆里略和加西亚·莫拉托大街向前进。这是缓慢的、有把握的进军。队伍充满着喃喃细语声、欢笑声，亲切的问候声。他们昂着头，笑容满面，马德里的工人在前进。

建筑工地的临时工、工厂和车间里的工人、办公室里的职员、商店里的营业员和大部分城市居民在城市的各条街上走着。

在市郊，警察骑着马，手中拿着马刀在巡逻。在广场和大街上大部分是工人队伍的人流，卡车满载穿制服的警察，以防发生意外事变。

在巴列卡斯、莱加斯比和城市的其他地点，工人人口的稠密程度到了饱和状态。那儿受到警察的特别监视。在电车站，地

铁的入口处，武装警察拿着步枪和冲锋枪监视着罢工者的行动。但是罢工的劳动者在街上的游行是平静的，没有发生一点引起武装警察干涉的意外事故。

电车开着空车，最多有某个卫兵或警察乘坐，司机和售票员在满意地微笑，但没有说一句话。当车子在车站停下时，它重新离去，没有任何人上车。

华金、奥古斯托、恩里克在迭戈·德·莱昂街心花园见面，这是昨晚他们商量好的。在那儿还有冈萨雷斯和工厂里的其他同事。

“在三孔桥上挂着一面共和国的旗帜。是昨晚挂的。这是一个邻居告诉我的，邻居说，警察通宵在街区巡逻。他们拘留了一些年轻人，”一个住在巴列卡斯的工人说。

“确实没有给他们滑过去，”另一个工人说道。

“时候还很早。我们可以到卡塔赫纳大街的酒店去喝几杯。”

“你们知道离工厂还有一段距离吗？一个人由于一向是乘车去的，所以无法估计距离。”

“从我家这儿去确实有一段路程，至少有七公里，”那个巴列卡斯人说道。

“那么请注意罗德里戈，他住在波苏埃洛。”

他们成群结队穿过龙达林荫大道进入墨西哥大街。这时还不到早晨七点半。收拾破烂的车子停在柱廊边，人行道的边石上堆放着一袋袋垃圾。

他们在墨西哥大街的拐角处转弯，进入加塔赫纳大街。电车继续开着空车。

“今天电车公司连买棒糖的钱也挣不到了，”卢卡斯笑道。

在加塔赫纳大街的尽头，有一家酒店。一个男人在卸店门门板，同时有一个伙计在店门前的一块人行道上扫地。

华金和其他同事推门，进入酒店。他们一进店门就看到了柜台。柜台上并排放着细口瓶的酒，听装黄瓜和辣椒。店内地方比较窄小，它弯过来成一个“L”^①字母形。桌子是木头做的，又脏，靠墙壁放着，使柜台和桌子之间有一条通道。

在柜台前面，有一个瘦小的男人，身穿蓝色的上衣和灯芯绒的裤子，呷着放在面前的酒杯里的酒。

“我们喝什么酒？”奥古斯托问道。

“喝几杯烧酒，”那个安达卢西亚人说道。

“曼努埃尔！”酒店老板对那个正在扫人行道的伙计说。

“干吗？”小伙子回答道。

“去擦一下桌子，”酒店主人说道。

他们在桌边坐下，酒店的伙计将酒杯放在桌上。

“喂，醒醒了！”安达卢西亚人对坐在身旁的同事喊道，他正把前额支在双手上睡觉。

“那是因为昨晚我没有睡觉。我和妻子去看电影了，后来她又坚持参加联欢会；我整整一夜没有合过眼。”

“他妈的，埃莱乌特里奥，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喜欢忙忙碌碌，”安达卢西亚人回答说。

埃莱乌特里奥端着烧酒杯，好像醒了。他没有说话，凝视着装饰墙壁的斗牛广告。

“这位利斯卡诺甚至连理想也没有。”

“谁？”安达卢西亚人问道。

“利斯卡诺，这个斗牛士，”埃莱乌特里奥指着广告说道。

“你听着，费奥。因为我们正在罢工，你得不到好处，”奥古斯托对一个同事说道。

^① “L”是西班牙语字母中的第十三个大写字母。

“我只能喝两杯，我喝不了那么多。”

“你很喜欢喝普里维酒。”

“只不过刚开始喝时有点喜欢而已。”

在柜台边喝酒的男人又要了杯酒，他依然背对着工厂的工人喝酒。

“喂，卢米，”他对酒店老板说，“今天，你可以和所有步行的人去做生意了。”

酒店老板咕哝了一句作为回答。酒店的伙计把锯屑倒在墙角落里，然后，再去扫地。

“埃尔·佩佩是一个胆小鬼。我告诉你们，昨天他还在说，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以前他是一个多嘴的人，他一再说我们没有男人气。”

“他的父亲才不会有男人气呢。”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奥古斯托说道。

“一个男人的责任是要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为自己的劳动者的尊严而斗争，”恩里克解释说。“抵制、罢工是阶级觉悟的最大标志。”

“有许多人总是在骗人，说他们要比别人有能耐，总是很神气，但在动真格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就泄气了，”华金插言说。

“那是确实无疑的，他们是些牡蛎，”安达卢西亚人说道。

“我们可以走了吗？”埃莱乌特里奥建议道，他已完全醒了。

“走之前，喝最后一杯酒，让这些坏蛋激怒和完蛋。这一巡酒由我来付帐。”奥古斯托说道。

他们喝过酒之后上了大街，这一队伍慢慢壮大了，厂里的其他工人向他们走来。

“有什么消息，佩里科？”

“你走着瞧吧。”

“你说什么，欧蒂基奥？”

“没什么，一个人不是为了这些纠缠不清的事。”

“你的身体还挺硬朗的。”

“你别不相信。我已是六十四岁的人了。风湿病使我的四肢变成残废了。”

“过一天是一天，欧蒂基奥。”

姑娘们挽着手臂，玩着堵大街的游戏，她们唱着：

堵住大街，
谁也不让过。
请我的祖母，
吃着李子过。

到了工厂时，工人们挤在厂门口进行评论。姑娘好像是主要角色，因为她们情绪最激昂。

“老板来了。”

“从我进厂以来，从未见过老板起床那么早。”

“他会带一点儿奶来。”

“笑声传遍街区。有时他使一些人发笑，有时他又使另一些人发笑。”

“我们将笑到最后。”

这时，工人已进入厂内，他们一看到老板或工程师出现，就吹口哨或大声说话。

“你们上班没有迟到，我已知道了，”老板对恩里克说，“此外，对今天迟到的或偷懒的人，我要把这部分人报给工会处理。”

在厂房的空气中飘荡着车工的回答。老板和技术工人正在

经理办公室开会。

“你们将会看到，我们有自己的、真正的工会，”恩里克望着同事们说道。

下午，华金和佩比塔去看安东尼娅的新房子。

“进去，你们不要待在门口，”路易斯说道。

“你们好吗？”

“我们还可以。”

房子大门的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左右两侧可以看见进入房间的门，其中有个房门口，有一个妇女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做针线活。

“是几个朋友，堂娜埃米利亚娜，”安东尼娅对那个女人说道。“他们是来看望我们的。”

“很高兴见到你们，”那女人说道。她抬起眼睛看了一下刚到几个人。

“这幢房子很大，”佩比塔评论道。

“像这么大的房子已经不造了，”那个女人答道。

“你说得在理。”

“去我们房间吗？”路易斯建议说。

“随你的便。”

“再见，堂娜埃米利亚娜，”安东尼娅说道。

在走廊上，华金指着那个女人住的房间。

“你们和她相处得好吗？”华金问道。

“到现在为止相处很好。她什么也不参与。当然我们没有发生争吵。我们总是待在卧室里，”路易斯回答说。

他们走进房间，下午的阳光从阳台上照进来。

“这是一个漂亮的房间。”

“不坏。”

“你说这房间漂亮那是你想得漂亮。”

“你们有很多家具吧？”

“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些。”

“床，书橱，装有火盆的桌子以及堂娜埃米利亚娜借给我们的两张椅子。”

“你们缺一个衣橱，”佩比塔说道。

“确实只是缺一个衣橱，”路易斯说道。

“当路易斯领到应得的译文稿酬后，我们就去买一个衣橱。现在我们把衣服放在这几块木板上，不过，衣服有好多地方皱了。”

“安东尼娅的本事不小，是她做了一个放衣服的台子。她买了一些放烟的盒子，把台子做好了，”路易斯说道。

“你们坐在椅子上，我们只有这两张椅子，”安东尼娅笑着说。

“那么你们呢？”

“我们坐在床上。”

两个姑娘依旧站着，轻声说着女人们的事儿。华金和路易斯坐在椅子上。

“你们在哪儿工作？”华金对他问道。

“我是在一个著名的律师那儿当见习律师，只是在上午去上班。他每月付给我一千。这是一种如粪土的工作，但我没有找到别的工作。”

“是的，好的工作不多。”

“在下午我在一所学校上课。我去上三个小时课，他们给我八百。我还搞一些翻译。就这样和那样工作，我们还算生活得

过去。”

“你们坐下，”华金对两个姑娘说道。

“现在我们坐下，”安东尼娅回答。她指着家里的衣服给佩比塔看。

“你使我很羡慕。你已经是个结了婚的太太。”

“你也会这样的。”

“你没有喜？”

“有了，”安东尼娅回答。

“什么时候生？”

“我怀孕有三个月了，大概是在十月或十一月份生。”安东尼娅回答，扳手指算着到小孩分娩还有几个月。

“你们高兴吗？”

“我相信我们都很高兴。”

安东尼娅一结婚生活就完全变了。忧伤只是一种痛苦的回忆，那是她以前必须尝的酸果。她感到过去自己仅仅作为幻想所想过东西正在变成现实。她现已怀孕，她的脸，她的精神极其振奋。有时她把双手放在肚子上，想摸一下肚内生长的生命。因为一个这样想的女人应该像耕地的农民一样：开一条沟准备播种。

“路易斯像一个疯子，只是一个劲儿地谈论我们将要有的儿子。”

“你的公公婆婆喜欢吗？”

“他们不怎么喜欢我。他们希望路易斯和一个有地位的姑娘结婚。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不喜欢我。他们从不喜欢到这儿来。”

“当你给他们生了孙子，他们会喜欢的。”

“我希望这样，但他们是否会喜欢呢？我们不需要他们喜

欢。”

“路易斯对此是怎么说的呢？”

“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是他的父母。我不喜欢他谈这件事，他会感到伤心的。”

从窗户里传来了街上小贩的声音，房子的走廊上响起了女主人的脚步声。

“罢工进行得顺利吗？”

“至少在这个街区是顺利的。当我从小吃部回来时，所有的人都是走着来的。今天下午的情况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上过街。”

“比你指望的要好，对吧？”

“我原来就指望罢工会像先前那样顺利。”

“因为男人……”

安东尼娅停住和佩比塔的轻声说话，问两个男人是否想喝一杯麦芽酒。

“在这个家里没法喝咖啡。咖啡对于我们来说是昂贵的食品。”

“听你的便，不过，你别为我麻烦，”华金说道。

“也别为我麻烦，”佩比塔补充说。

“一点也不麻烦，”安东尼娅答道。

“我来帮你忙。”佩比塔说。

两个男人在继续说话。

“你给小伙子上课呢还是给姑娘上课？”

“给小伙子和姑娘上课，但是分开上的。”

“那为什么？”

“那是因为学校里禁止男女同学混杂在一起。需要严格执行。”

“我认为这是一种愚蠢行为。”

“对，可是你又怎么样呢。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你知道军队的命令，指挥官尽管指挥不好，但他还是个指挥官。”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华金站起来看摆在书架上的书籍。

“你喜欢马查多^①？”路易斯问道。

“对。”

“你拿在手里的诗集，是在阿根廷出版的。”

安东尼娅和佩比塔在桌子上上了点心。

“你们决定什么时候成婚？”

“还要过一阵子。等有了房子后再说，”佩比塔指着华金说道。

“那么还要有一段时间罗。”

“算了吧，你那些希望。”佩比塔显出一副不悦的神情。“我不想给自己穿圣徒衣服。”

“对于我们，并没有过得像想象当中那么差，谁不冒险，谁就不能穿越大海，”安东尼娅说道，同时，在一片面包上涂人造黄油。

“是的，可这是进退两难的。你们也知道，”华金回答说，“贫家多烦恼。”

“哎，老兄。我一切都是现成的，你别不相信，我是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再说，我家的人会帮助我们。”

“佩比塔，你父亲是一个伟大人物。可是，本来就应付不过来，偏偏又加上额外负担。你家不富裕，缺衣少吃。”

“那么玛丽娅呢？家里其他的人呢？”安东尼娅问华金。

① 系指马查多兄弟：曼努埃尔·马查多(1874—1947)和安东尼奥·马查多(1875—1939)，兄弟俩均为西班牙诗人和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

“像往常一样，玛丽娅因为喝酒比挪亚神父更糟了。阿德莉塔，这位西班牙长枪党党员的千金，已经入学了，她像鹦鹉那样能说会道。她很喜欢我。”

华金继续说道。

“奥雷阿的情况怎么样？”

“我对我姨妈的情况一点都不清楚，已经有一个时期了。有一天，她和我弟弟来看望我们。她很激动，脸上长满了小疙瘩。在我看来，”安东尼娅说，“她那个卖杂碎的男朋友不是个天主教徒，他患有性病。”

“患梅毒病，”路易斯说。

“明白了。”

“佩德罗仍旧老样子，他忙于做生意。一天，他被关进了监狱。我的弟弟使我很伤心，他是一个好人。”

安东尼娅从床上立起来，撤走了咖啡杯子，把杯子放在地板上的打字机旁。然后，她打开了朝着马路的阳台。

“你们看过外面的景色吗？阳台下是阿夫罗尼加尔街，从这儿，马路逐渐向前伸往巴拉哈斯。这儿最糟的是交通。甚至使你养成习惯在晚上不能入睡。白天这儿是非常有趣的，你探出头去，可以看到新村和卡尼列哈斯载满人的电车……也可以看到去基地的灵车。”

“你们看到了吧，我有最风趣的妻子，”路易斯笑道。

“……星期天，当有斗牛时，斗牛场上就人山人海，从这儿就可以听到人们的欢呼声、喊叫声和乐队的‘琼琼’声。我准是个笨蛋，可是我在看见长矛手坐着敞篷双轮马车来到时和听到斗牛场的呼喊声时，心里就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感觉。我要是个男人，我就喜欢去斗它一次牛。你们要知道，我还从没去看过斗牛呢。我认为，我小时候，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小城去参加一次

聚会……”

安东尼娅不说话了，目光落到了大街上。路易斯点着了一支香烟。

“是的，这个街区很有意思。它有许多小酒店，那些从墓地回来的人在那儿停留，喝几杯酒。这个街区有“**芽儿**①”，收百分之三十利息的放债人，斗牛场门廊下的妓女和吉卜赛人，看上去比场地上的蚂蚁还要多。这个街区到处是石头建筑物，贫民窟，人们可以在里面玩向青蛙模型口中投钱的游戏的酒店，打靶场，有摸彩处，你在那儿什么也摸不到；还有煎饼摊，谁也不知道那些煎饼是用何物做的。街区那些擦皮鞋的人，坐在摊子旁晒着太阳，盼望着度过一天。为了发财，我们甚至还有为旅游者办的一所斗牛学校，”路易斯又笑了。

他们在阳台上待了好一阵子，望着一群群回家去的男男女女。有几辆电车载的人比早晨还要多一些。它们在摇摇晃晃地爬上文塔斯陡坡。

“我们该走了吧，华金？”佩比塔说道。

“是的，我们要走好长一段路程。”

“你们可以常来看看。”

“我们将会随时来的。”

这是黄昏神奇的时刻，在这个时光，昏暗成了恋人谈情说爱的帮手。

“看到他们这样结婚，我很羡慕，”佩比塔喃喃说道。

“我们的结婚将会来到。时光会不知不觉地过去。”

“我们已度过了未婚夫妻的时光……”

这一对未婚夫妻相互挽着手臂，他们的爱在围绕文塔斯斗

① 系指开车子的人。

牛场的环形路上，忧伤地离去了。

拉米罗下班时已是晚上七点钟了。他沿着宽敞的大理石楼梯，左手扶着涂有金属的扶手，急匆匆地从五层楼上下来。他上了大街，停下来看了看天空。太阳在公主林荫大道的房顶上落下。太阳门上的落日余辉照在房子的墙壁上，在玻璃窗上反射出橙黄的色彩。

尽管白天相当炎热，可在傍晚就下了点儿雨，空气稍稍有点潮湿，西班牙广场周围的树木上，叶子也变得湿漉漉的了。

拉米罗的右手放在裤子口袋里拨弄着一小堆硬币。他拭摸着一串钥匙。

这时又下起雨来了，那是一阵绵绵细雨。天空中好像用圆规画出了一条虹。拉米罗望着天空，想起了小孩子唱的下雨歌：“东边日出，西边雨，架起上帝一彩虹”。

多好啊！拉米罗说道。但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在高声说话，便朝四周看看，看是否有人注意他，把他当成疯子。一套房子。有一套房子让自己的女儿可以在过道上跑来跑去，这多么美啊！能够维持一个家庭，而且从不考虑到了月底缺钱的事儿。“没有一个家庭没有灯光，没有一个西班牙人没有面包。”会更好一点吗？可是最近这些话对他来说却毫无意义。以前有一个时期，为了这些话他迫使自己的一些对他无用的战壕里战斗。

“真像粪便，我又开枪射击，”一天他对华金说道。

拉米罗取出硬币付地铁钱时，手又碰到了房间的钥匙，他忘掉了一切，只想着他对妻子说他们已有了房间钥匙时她的喜悦。他只想回到家里，把他所有的兴奋告诉布兰卡。

布兰卡坐在床上，在给自己的女儿讲课。拉米罗一进门就

脱去上衣，来到床头边听小姑娘念书。

“今天天气多好！”他评论道。

“你有房子的消息吗？”

“他们给了我钥匙。”

“钥匙在哪儿？”

“在口袋里。”

布兰卡从床上站起来。

“给我瞧瞧。”

“拿去吧。”

“我们已有房子，房子……你是满口说房子、房子，拉米罗多高兴啊！可把我想坏了！”

“我们得收拾一下东西，准备搬家。”

“一会儿就可以准备好的。”

“房子很大，必须买一些家具才好。虽说不是一个宫殿，但
有三个房间和一个浴室。”

“浴室！可以泡在水里，又能给小姑娘洗澡，多高兴啊。”

“必须买一些东西。”

“今天你已经把好多东西卖掉了。”

“一般的東西。几盒打字机色带和几叠信封。”

“我不知道……不过有一套房子使我感到更兴奋了。在自己的房子里，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情。”

布兰卡沉默了一会儿。

“有阳光吗？”

“阳光能照进来，而且可以看到河流。”

“爸爸，是曼萨纳雷斯吗？”

“对，孩子。”

“这小姑娘非常机灵。你知道她今天早晨问我的事情吗？她

说如果玛丽娅没有丈夫，那就永远不会看见她和某个男人在一起，”布兰卡说道。

“是的，”拉米罗望着他的女儿说道，“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他们握着手沉默不语。这时已近黄昏，月光送走白天的日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幸福的傍晚。

“我们付了多少钱？”

“你看，在办公室你要了五百比塞塔，商店里二百，还有付你衣服的分期付款的钱。这样五百、二百加一百五十比塞塔，我们总共付了八百五十比塞塔。”

“几乎是一个月上旬在办公室工作的工钱。我们花了很多钱。”

对布兰卡来说，结婚初期拉米罗就向她要花钱的帐目，使她感到难过。可是现在她伸手去拿铅笔，却一下子成了她的负担。

“我对你说，钱币丁当一响，就花掉了嘛。”

“这倒是真的，可我们花钱远比我挣的钱多了。”

“不是因为我乱花钱，也不是我穿巴黎的时装。你听好了，随你怎么说，我是一个挥霍的女人。”

“你并不挥霍，不过我们不应该入不敷出。再说，我们还有新的花费，要买一些家具。”

“为了省些钱，我在广场转了有二十圈之多，但我没有能创造出奇迹来。”

“我们可以吃晚饭了吗？我饿极了。这个很好闻，”拉米罗指着汽油炉上冒热气的陶锅说道。然后，他起来将一把勺子放进锅里。

“这些蚕豆很好吃，你做得很好。”

“你有了钱，你就会看到我给你准备的食物。”

“臭钱。”

“臭钱，是的。可我们如果稍许再多一点……”

“我听说，美国人要来把这提高一些，他们帮了德国人的大忙。”

“我们以前不是反对美国佬吗？对于我来说，政治真叫人弄不懂。战争结束时，报纸只是大谈美国人。”

“倘若是为了做好事……”

“他们不会给西班牙带来什么，他们只是抢走东西。好像这儿我们全是些傻瓜……”

他们又沉默了。院子已是黑洞洞的，天空布满了星星。

“我们需要搬房子用的钱。我将向头头要求预付一笔款子。”

“房租钱要多少？”

“五十杜罗，在这种年代是便宜的。在五十年以后，房子将是我们的。”

“五十年以后，我们早就入土了，”布兰卡说道。“如果我还活着，那至少要活八十岁了。”

“为了小姑娘。”

“对。”

布兰卡着手在平底锅里煎一个鸡蛋。

“你知道我买几只蛋花了多少钱吗？每打鸡蛋要二十五比塞塔。请注意，要二十五比塞塔。五个杜罗。难道不是太丢人了吗？”

拉米罗做了一个不置可否的手势。

“看来，我对你讲的事你觉得无关紧要。”

“不，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很高兴。”

“你说得在理，我也很高兴。”

在拉米罗的目光下，对布兰卡来说，这是一个幸福的傍晚。
确实是这样。

那个男人朝后面一靠。

“这么说你就是恩里克啰，”他说道。

恩里克仍然沉默无语。他还是闭口不谈。

那个男人坐在桌子跟前，目光朝着站在门口的那个人，他向恩里克瞥了一下。

“你们抄过他的家吗？”他问道。

“家里什么也没有。”

“他和谁住在一起？”

“和他厂里的一个同事，一个名叫奥古斯托的人住在一起，据说那是他的转租房间。”

“那个奥古斯托对他说过些什么吗？”

“什么也没有说过，他不了解恩里克的活动。”

“明白了。”

“我们可以查阅档案。”

“什么？”

“没什么，既不是指这个人也不是指那个叫奥古斯托的人。”

“好吧。”坐在椅子上的那个男人朝恩里克走去。“我不来问你什么，你得告诉我所有的一切。你可以开始讲了。”

“讲什么？”恩里克回答说。

警察重又看了他一下。然后，身子朝前，打开办公桌的一只抽屉。

“你认识这个吗？”

“认识。”

“你在哪儿看到过。”

“在工厂，在整个马德里看到过。”

“是你带去的吗？”

“不是。”

“那么是谁把传单带进工厂的？”

“我不知道。”

“你拿来的传单是在哪儿发现的？”

“在工厂的围墙边。”

“请注意，这样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了。你这样对我们两人都不利。对于我，因为你不说，我就不能下去吃饭，对于你，你最终总要讲点什么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了。”

恩里克抬起两眼。那房间很小，是正方形的。靠墙边有一个柜子和一个卡片箱。在警察的桌子上有一盏点着的灯。墙上挂着两幅肖像。

“冈萨雷斯，”那男人呼唤着，并没有抬起头。“你把所看到的一切都带来。”

另一个警察走上前来，他几乎没有声音，把一个小包裹放在办公桌上。

“这是全部的吗？”

“这只是在我们抄家时，在桌上发现的唯一的小包裹。”

“这是你的吗？”警察问恩里克。

“是的，先生，”他回答说。

警察解开了包裹，而且很快地看了放在包裹里的东西。

“你叫什么名字？”警察用问刚才那个男人那样的声音问道。

“我叫恩里克。”

那个男人于是拣起所有的东西重新把包裹包好。

“你叫恩里克·加西亚，”警察把话指明说道。

接着，警察好像是生气了，他一个劲地摇晃着恩里克。

恩里克抬起目光，正好和警察的目光相遇。从他的双眼中流露出一道奇特的、坚定的闪光。

“我们全都知道了。在工厂我们有人给我们讲述厂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你是那些鼓动工人闹事的人之一。我们知道你散发传单。有人把这件事统统都告诉我们了。”

恩里克依然保持沉默，他望着对方的脸。

“是谁对你说散发传单的？你从哪里取来传单？是谁帮助你的？如果你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那你就不会有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不幸。”

恩里克没有说话，身子也丝毫不动。

“这是那些不喜欢说话的人之一，”警察对那个站在门口的男人说道。

那一个人笑了。他手中拿着带镣铐的钥匙，他只是把它套在食指上旋转。

警察重新走到他的办公桌子边坐下，并点燃了一支香烟，对恩里克重新进行审讯。接着，他取过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几行字。

“把他带到楼下去。一个小时后再把他给我带上来。”警察说道，同时摆了一下双手。“你可以给他吃点苦头，但不要给我搞得太过分了。”

恩里克站了起来。

“你和我还可以慢慢谈。你对传单什么都不知道，这我是不会相信的，”警察说道。

后来，警察靠在椅子上，一边继续抽着香烟，一边看着刚不久前写的那张纸。

奥古斯托在出门的时候把情况告诉了华金。

“昨晚警察去家里找恩里克了。”

“我知道了。”

“他们一起来看我们是不妥的。工厂里大概有了叛徒，告密者。”

“可是他们对他没有什么证据。你对我说过的事情，他们没掌握他什么情况。”

“是的，但为了防备万一，我们要谨慎从事才好。”

“恩里克宁可让他们砸烂，也不会开口。”

“现在他必须挺住。你别回家了。”

“你去通知冈萨雷斯了吗？你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人说过吗？”

“已经通知过了。”

“那么罗莎呢？”

“正像你所预料的那样。尽管她是位姑娘，但她有胆量，也没有哭泣。”

“那是她故作镇静。”

“我是这样认为的。”

“埃伦娜呢？”

“她因警察去找我而感到害怕。”

“如果有什么事，你就通知一声，”华金说道。

“眼前，我们要像不认识一样。再过一阵，我去你家。必须尽可能不接触。”

“好的。”

“你知道，这些是职务上的麻烦……”奥古斯托笑了。

他们离开了工厂，各人取道走了。

华金到家的时候遇见了拉米罗。

“我有房子了。”

“这使我高兴，”华金回答说。

“后天，我们要走了。”

华金没有回答。他在考虑奥古斯托对他说的事情。“他们哪怕把恩里克砸烂，他也什么都不会说出来。再说，他们不能证明传单上的话是他说的。可有人说是他说的。”这时好像有一阵颤栗传遍了他的脊背。“究竟谁是叛徒呢？”他细细想了一下厂里所有的人。“不，他们都是同志，他们中不可能有人当告密者。可是，不管怎样，总有个人说了些什么。”他重又想起了所有的同事，他们每个人的脸，一张张地从他的回忆中掠过。“卢卡斯不会的，他曾待过监狱。劳罗也不会做告密者，他曾是共产党员。安达卢西亚人，不会。奥尔梅迪利亚，尽管他没有政治思想，但他是个好同志。但总有一人是告密者。安东尼奥没有这个能耐。几个姑娘虽然话讲得很多，但没有能力干这种事情的；再则，她们什么也不了解。安赫尔由于害怕卷入纠葛，不可能去说。埃尔·费奥要对付妓女也足够他受了，而且他非常赞赏恩里克。罗德里格斯，这个汽车车身制造工，他不喜欢谈论这种事情。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埃莱乌特里奥住在一个小茅屋里，他爱发牢骚，也不可能是个告密者。洛佩斯也不会做告密者，他也被关押过。可是一定是有人做了告密者。当然最好是警察乱打一气，看看是否搞出点名堂来。他们会要求报告最知名的人的地址，而恩里克总是露面……因为工人不可能成为告密者。在西班牙一个工人与警察打交道受够了罪。那个告密者定是个情报员。他一定要问当会计的朋友，是否看见有某个警察来访。冈萨雷斯说，他们看了许多工厂，问罢工的事情，那天有多少人没有去上工，

有谁散发传单……一定会是这么回事，我要把这告诉奥古斯托。我认为是因为谈……必须使一定会谈论的这些事情尽量少谈。俗语说，言多必失。当然，要发动罢工总要抛头露面的。恩里克必须露面。不过，现在会变得更容易，道路更熟悉了。”

“我们后天走了，”拉米罗重复道。

“我很为布兰卡和小姑娘高兴，”华金说道。

后来，当他们进入家门时，华金到自己的房间里，从床下取出一包宣传品，那是他藏在自己床底下的。

“我要把它交给佩比塔，让她替我保存，”他高声说道，情绪显得激动。

玛丽娅收到了她姐姐的来信以后不久，就在她工作的地方提出辞职，并安心准备旅行。她用法国给她寄来的钱办好了护照和出国签证。

她买了一件黑色衣服，还买了一些衣物。她尽可能地忘掉喝酒，她的食欲也有了好转。她期望在剩下的较短时间里能恢复疲劳，能比现在再胖一些。

她像傻瓜一样，忙于做旅行的准备。东奔西走地花钱买所有那些总是缺少的小东西。

在家里只有华金和她两人。西班牙长枪党党员和他们的家属在一个月前就走了。玛丽娅和她前夫的关系已相当缓和了。

“是华金吗？”玛丽娅说。

“你想干吗？”

“我信收到了。”

“什么信？”华金问道，他并没有从正在看着的报纸版面上抬

起目光来。

“我在法国的姐姐写来的信。”

“她在信中说了些什么？”

“要我去。”

华金台上了报纸。玛丽娅继续说道：

“我去我姐姐的家。”

“那么路费呢？”

“她给我寄来了汇款。”

一片沉默。华金的目光望着远处出神，消失在对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中。玛丽娅初来家里的时候，她那张笑脸，她和父亲开玩笑，两人的争吵，所有这一切都在他一瞬间的回忆中过去了。

“你什么时候动身？”

“我还不知道，在这几天以后。我还要给你父亲写信。”

玛丽娅不再说什么，她继续干自己的活儿。

这个女人可能有许多缺点，但她的心并不坏。所以，她一旦发现有一点钱，就会把钱给能全心待她并能喜欢她的小伙子。她这样做，也许是因为她缺少爱抚或谅解，她想趁还待在家里的时候，用钱买家里人总是拒绝她的那种友谊。在任何情况下，玛丽娅对华金总是非常真诚的。

她对马蒂亚斯的爱慢慢地消逝了，只是零零碎碎地重新回忆起来。特别是有几个晚上重新回忆起来，她的情绪把她带到原始的、不可避免的状态中去，使她无法平静下来。她想念马蒂亚斯的方式，不像在想念一个曾经属于她的男人；她没有发现，自己那种有关男人的想法，只不过是她渴望创造出和富有幻想的人的旧情的结果。

然而，尽管她已决定离开，她一有了钱和手续完备的证件，便重又给马蒂亚斯写信，这也许是为了最后一次获得满足。她

希望他会给她写回信，并且来马德里与她道别。甚至，她会在信封里塞进几百比塞塔，以免旅行因为缺少钱用而引起不便。

有好几天，她举止不稳，充满激情，好像没有一点忧愁，只是盼望出发的时刻到来。可她心里却更加盼望她男人的回信。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的期待又一次得到了巨大的痛苦。她想，幸好，她对他的要求并不多，只是想最后一次与他见见面。

她问华金。

“你认为他会来信吗？”

“我认为会来信的，我可以肯定他会来的，你别担心。”

华金为了免得给她不必要的伤害，所以才这样撒谎的。

她一直等到出发那一天，那一天她的心又忧伤地怦怦跳着。尽管那一天天气晴朗，可她却全身感到冬天一样的寒冷。

她整个上午在收拾东西。她已装好了两只手提箱。一只是皮箱，栗子色的，从结婚前一直保存到现在，还有一只是绿色的纸板箱。

可是，当结束手中的活儿时，还只是下午五点钟，她想上街，安静地在大街上散散步。她从塞阿·贝尔穆德斯到蒙克洛亚广场毫无目标地走着。在那儿，她停步看看公园里的树木以及河对岸的平原。

然后，她徐缓地回到街区。

她在伊拉里奥的酒店门前站住，向他辞别。酒店老板斟满两杯里奥哈的葡萄酒。

“为了你的健康，请你光临。”

他们默默地喝酒。伊拉里奥并不是善于说道别的话的人。他只是重新斟满酒杯，要玛丽娅给他看一下护照。

他高声地念着护照。

“这张护照对下述地区有效

丹吉尔和欧洲

(除俄国及其卫星国之外)”

“法国是个好地方。那儿产美味可口的葡萄酒；波尔多红酒，布尔戈尼红葡萄酒……”伊拉里奥评论说。

“好吧，我走了。”

“喝最后一杯，玛丽娅太太。”

伊拉里奥重新倒满了酒杯。

“为了你的健康！”他又干了一杯。

“我该走了。”

“你感到忧伤吗？”

“有一点。”

“这我可以理解。”

伊拉里奥的双眼睁得像两只圆圆的木桶。他紧握住她的手。

“玛丽娅太太，祝你幸运。”

“我也祝你幸运。”

玛丽娅走了，酒店老板留下来冲洗酒杯。

不一会儿，华金回到了家里。

“你已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么我们下楼去。地铁现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有了，最好还是早点走。”

“我们乘出租汽车去。”

“随你的便。”

小汽车从圣贝尔纳多大街走。玛丽娅和她丈夫前妻的儿子

从车窗里凝视大街，在第十电影院的售票窗口，人们挤成一团。

“放映什么电影？”玛丽娅问道。

“我看像是放映《第三个男人》。”

“那个乐曲是无线电收音机放出来的吗？”

“是的，那乐曲叫《莫扎特咖啡馆》。”

“是一部好电影吧？”

“不坏，是讲青霉素黑市买卖的人。”

“我曾想去看这部影片。我有好多年没去看电影了。你父亲走以前，我和他去看过一次电影。”

出租汽车在格兰维亚的拐弯处刹车停住，交通灯亮了红灯。

“华金，你想做什么？”

“我还没有考虑过，我将在一家酒店吃饭。”

小汽车又开了。

“你有女朋友了，是吗？”

“是的。”

“她好吗？”

“我喜欢她。如果你愿意，我给你看一张她的照片。”

“我很乐意认识她。”

玛丽娅用双手拿住照片，她看照片看了许久。

“是个漂亮的姑娘，”她说道。

接着，她就靠在座位上。

“你和她结婚吧，你们已有了房子。”

两人沉默了下来。一到车站，华金就把两只手提箱扛到了火车上，把它们放在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

“你的座位靠窗口，这样你可以看看外面，散散心，”华金

说道。

“你认为你父亲会来吗？”

华金撒谎说：

“还有半个小时，他会来的。”

“我已问过了，巴塞罗那的火车在上午到达。”

“可能他不想回家。”

“可能。”

“我们去散步吗？”

“去散步。”

车站的钟点缓慢地走着。大的指针一分一分地跳着。华金抬起头看看钟，看指针是怎么跳的。

他们走到了报亭，看看杂志的封面打发时光。

“你想买一本在旅途中看看吗？”

“一本有‘圣徒’的。”

“这本有许多照片。”

“还有二十分钟。”

“是的。”

“我知道，他不会来了。”

在京城卖巧克力糖果和冰棍的人一边推着车子一边叫卖他们的东西。扩音机中报告列车从第一道路轨进站。等候火车到来的乘客赶紧跑向进口的月台。铁路上的服务员乘着芬威克车子，熟练地避开成群的乘客。

玛丽娅上了列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她望着两条铁路间的长长过道，留心看是否有马蒂亚斯的人影出现。华金站在车窗下面，注意着时钟。

“快了，还差三分钟，”他说道。

“他不会来了。”

“不会来了。”

“华金，我……”

“你说，玛丽娅。”

“没什么，你告诉你父亲，我将等着他。”

“好的，玛丽娅。”

乘客和送行的人最为关心的是时钟指向列车出发的时刻。人们已不再交谈，他们只是相互看着。

火车头紧挨月台冒出一团蒸汽，那是一股圆圆的浓雾，它徐徐上升，碰到了玻璃的遮棚。

火车鸣了汽笛，连杆缓慢地动了。

火车又鸣了一下汽笛。

“你可以走了。”

“是的。”

“华金，再见，请多保重。”

“玛丽娅再见，永别了。”

“再见。”

旅客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挥动着手帕，说再见。站在那里的人摆动双手送别他们。

华金对玛丽娅说着再见，直至火车第一次拐弯。

玛丽娅坐在她的位子上。她露出茫然的眼神，想起了那些细小的、而且几乎是无关重要的往事。

罗莎自从知道恩里克被捕的消息后，她一刻也没有好好地休息过。她像有一种痛苦的感觉在主宰着她。她无法理解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房子、街道、朋友，这一切好像是一种阴谋，使她不愿去回忆。人们笑、唱或者只是谈论日常的小问题，她都觉

得讨厌。对于她来说，恩里克就是一切，“恩里克说……恩里克想……”她还认为所有的人，甚至他的同事，都不记得恩里克，他们都胆小，没有充分地谈论他，他们心里只有自己，把他忘掉了。

“他被大家戏弄了，”有一次她这么说道。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她不能忘却的是恩里克的声音，以及他的双手。她时常记起他们一起在大街上走，寻找河边的黄昏。河水看来很平静，几乎没有声音，好像不在流动一样。恩里克坐在混凝土的岸边，讲着自己的经历，谈论勤奋、希望、爱情和自由。他说：“这一切都得好好考虑。”他解释一些事情，她并非都能理解，不过，她明白这些都关系到过美好的生活的打算和希望。他们两人坐在一起，挨得很紧，望着河流，望着河边生长的野草。傍晚时分，树木像是充满了话语，发出细小的响声。河水像一块钢片，在河边栏杆下的深处闪闪发光。

她只要把手伸出来就可以摸到他。现在她想起他，看到他浮现在她的回忆中，她感到一种巨大的喜悦，但这种喜悦却带点忧伤。他相信一切，相信生活，相信人。她在他的身边学到了爱。

当他被捕时，她觉得一切都完了。她不能想别的事情，为了能更好地回忆他，她孤独地躲藏起来。可是孤独比忧伤更糟。于是她就去找恩里克的朋友、找同事、找所有认识他的人，以便从他们的嘴上听到与恩里克为之斗争的同样想法。有好几个下午，她下楼到埃伦娜的家中去等候奥古斯托。

“你有什么新消息吗？”她问道。

“没有。”

“他们去工厂要报告了吗？”

“我不知道，如果他们去过工厂，我们会知道的；在办公室，我们有一个同事，他会告诉我们厂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使我感到奇怪的，他们没有到这里来，也没有去我的家。”

“我还在等他们呢。”

“已经过了好多时间了。”

“是的。”

“昨天我去看恩里克，他们已经把他取消隔离了。”

“更糟的是在太阳门的那几天。你从领导机关出来去监狱，那你的不幸就过去了。”

“这个，他对我说过。”

“最糟的是招供。要是一个人招供了，他们就会待他更坏。他们相信一个人知道的比他知道的还要多。他对你说了什么时候判决没有？”

“他什么也不知道。恩里克认为他们要让他坐六年牢。”

“他是一个好同志。工厂里所有的人对他都有很深的感情。那么你呢？身体好吗？”

“你想我会怎么样？让你问的那些东西见鬼去吧。就像如果他们把你抓去，我会怎么样一样。完全垮了，”埃伦娜回答说。

“是的，我们要面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

“但是，他们不会抓你们的，”罗莎回答说。在她的言语中隐藏着一种气愤。

“如果一个人不会耍手腕，他就什么也做不成。”

“这倒是真的。可是总会得到报应的。”

“谁会是这样呢？那些被抓走的人，是从一开始抛头露面的。”

“我们原来很可能是幸运的！”

“恩里克不竭尽全力就不可能是幸运的。不管怎样，悲叹无济于事，重要的是要继续干下去。”

“我同意这个看法。开始我是放声大哭。最后一天，恩里克

给我很多鼓励。他说，我拥抱你们，你们继续斗争下去。”

“重要的是让这件事结束，不要让别人遭到同样的不幸。”

“恩里克没有这样说过，”罗莎回答说。

“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不要让他们把别的人抓走。”奥古斯托重复说，“现在我们已经看清要做的事了。”

罗莎和埃伦娜、奥古斯托说话之后，便上楼到自己的家里，她在窗边待了好长一段时间。大街上依然挤满了说说笑笑的人，他们好像无忧无虑。日子一天天过去，春天过去后夏天就接着来了。一天，大街的树上停满了鸟儿。

“这个必须带给华金，”冈萨雷斯说道。

“多吗？”

“有若干东西，”奥古斯托答道。

“你给他带去？”

“完全可以。”

罗莎坐在阳台上，与埃伦娜的孩子待在一起。她看着大街，看着人们避开太阳、在有树荫的人行道上行走。她转过身来看正在打开包裹的男人。“同恩里克一样，他们同恩里克一样，”她心里自语道。她像有点兴奋，看到同志们，她充满勇气。

“我去，”她说道。

奥古斯托和冈萨雷斯停止拆包裹。

“你去带给他？”

“我有权利，不是吗？让我去送，这种事我也想帮着干一点儿，就像恩里克在，就像是他对我说话。”

他们给了她一包传单，罗莎把传单放进口袋里，用双手抓着它，她一下子平静了，她感到既平静又很有信心，再也不感到孤独和忧伤了。她的生活就在那儿，就在每天的斗争中。生活在所有的那些事情中，生活在那些男人、与恩里克结合在一起的

成千上万的像华金、奥古斯托和冈萨雷斯的男人中间。去干恩里克一直为之斗争的事情。

罗莎上街去寻找华金。胸前的口袋里装着传单。

他们俩看了一下放在椅子上的公文包。在柜台的另一侧，一个男人胳膊肘支在咖啡壶旁边，仿佛在看他们俩。

“我现在把东西给你吗？”

“你等一会儿，”华金说道，他的双眼在看柜台边的男人。

“等一会儿，”他又重复道。

“你看见谁了？”

“酒吧间里的人。”

华金看了一下罗莎的脸。她的双眼又大、又明亮、又清澈。

“恩里克说得在理，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柜台上的人背过身去，收拾咖啡壶的壶口。

“现在你把东西给我，”华金说道。

罗莎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个小包。那是一只女人的挎包，里面有一些小件物品：一支唇膏、一个香粉盒，还有几块手帕。

“这儿有你的东西。”她说道。

华金把小包夹在手里拿着的报纸里。他们俩沉默了一会儿，透过玻璃窗望着大街。在人行道的边石旁有一伙女人在聊天。

“从现在起，由我给你带东西来，每半个月在这个地方，在同一个时刻，”罗莎说道。

“你可知道他们是否跟踪你？”

“我没有发现什么，如果我发现情况，我就不在这里了，”她反驳道。

“我该走了，我去我的老屋。”

“随你的便，如果你愿意我陪你去。你知道，有一个女人在旁边走，可以遮人耳目。”

“我不需要你陪我，我还有许多别的事要做。”

“你现在不住在那儿是真的吗？”

“我不住在那儿。我住在佩比塔家里。我的继母走的时候，他们就硬要我去那儿住。佩比塔的母亲说一直让我住到佩比塔和我结婚为止。她说一个单身汉不会收拾。”

“她说得有理。”

“至少有两个月，我没有去我的旧房子了。”华金说道。

“今天你去哪儿？”

“让我把这东西放在保险的地方之后，我们出去散步。”

罗莎听他说话，像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她在用火柴盒磨光指甲。她记起了恩里克，她对华金和佩比塔去散步心里有点羡慕。

“我们以前也经常散步。恩里克是一个非常喜欢走路的人，”她说道。

“等他出狱，”华金回答说。

“是的，当然。等他出狱以后，我们会去散步的，”她重复道，仿佛在沉思似的。

“我们会见面的。”

“半个月以内。”

“同意。”

“愿你幸运，”姑娘回答说，她指着包包笑了。

罗莎待在咖啡馆的窗户边，瞧着华金腋下夹着小包上街去了。这条大街的尽头有一辆用母骡拉的大车，车轮缓慢地滚动着。可以听到车轮在路面上发出的吱嘎声。沿着大街两边的树木呈现出绿色的树冠，上面覆盖一层薄薄的灰尘。

在大街的拐角处立着一个姑娘。在红色的衣服下可以清楚地看出她身体的线条。她皮肤雪白。华金停了一会儿，点着了一支香烟，姑娘开始走了。她上了人行道，体态轻盈地慢慢走着。他重又看了她一下。那姑娘已穿过了有轨电车的大街，她的衣服在她走的时候飘动着。华金将火柴杆扔在地上，便撒腿向他那旧的街区走去。

华金几乎没有看一下周围的所有大街，没有看他所熟悉的环境，他的心笼罩在一片忧伤之中。当走到那条大街上时，他在那所房子跟前停下，对大街凝视了许久。街上有部分房子是几年前建造的，他小时候曾在那儿玩耍过，那个地方原是田野。华金看了一下房子的窗户，看了一下挤在门厅里的小孩。看了一下伊拉里奥，他正在人行道上滚葡萄酒桶。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好像时间没有流逝似的。

进入住房时，他打开木板窗，拉起大房间的窗帘，让白天的阳光进来。星期六的下午，通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大街上那块偏僻的地方充满着阳光。

他进入一个又一个房间，打开窗户。房子的地板上积了一层灰尘，他闻到了一股滞留、陈腐的气味。他把双手放在餐桌上，用手指在灰尘上写了一个名字。

他开始缓慢地走遍所有的房间，在那些墙壁之间，生活留下了脚印，他心乱意烦，感到无限的孤独。

华金看了一下朝着院子的房间，那是安东尼娅居住过的地方。他记起了隔墙上的那条缝隙，也记起了那一条蛇。卧室很脏，卧室的四面墙上泥灰剥落，油漆也暗淡无光了。

厨房里的瓷砖在劈柴时被弄坏了，有些地方的瓷砖已经残缺了。

他回到了餐厅，把手放在餐桌上，一下子就擦去了盖在桌子上的灰尘。他把罗莎给他的包裹放在桌子上，打开包裹，并开始看一份报纸。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目光。从朝院子的窗外传来了一个女邻居的声音。他听到的是一些和以前一样的话，一样的老问题。

看到那些东西，听到女人的说话声，不由得使他回忆起直至那个下午所经历过的所有岁月。所有的回忆都在那儿，所有那些悲哀的回忆他并不感到亲切，然而，这些回忆迫使他放弃了看报。

他希望佩比塔来临，希望那个姑娘以她的出现打破家中的一切悲哀，希望她笑，她唱歌。

门铃响了。华金从椅子上站起来，跑去开门。这时佩比塔在门口笑了。

他握住佩比塔的一只手，两人便进了屋。

“你在看报？”她说道，向桌子瞥了一眼。“有一天你会像恩里克一样过日子。”

“这一切都很脏，”华金说道，显得有点难为情的样子。

“你别担心，我会收拾的。”

“我不喜欢这座房子，它有一点点什么使我不喜欢。也许是它使我记起那些令人不大高兴的事情。但我可能会愉快地放弃这座房子，就像人们抛弃一种旧思想、一种旧信仰一样把它放弃，”华金说道。

“这是我们唯一的房子。这座房子就像西班牙，又肮脏又难看。但可以收拾。必须改变这所有的一切，必须用丁字镐一直刨到露出地下的红砖来。”

华金默默地听着姑娘讲话。后来，姑娘也不说话了。这时，通过敞开的窗户，从楼下、从大街上传来了生活的喧闹声。

译 后 记

阿曼多·洛佩斯·萨利纳斯(1925—)是西班牙当代的著名作家和欧洲共同体作家协会会员。他与安东尼奥·费雷斯合写了《在乌尔德斯山区行走》(1960);《爱总是需要的》(原名《年复一年》)(1962);与阿方索·格罗索合写《在河的下游》(1966),与哈维尔·阿尔法亚合写《加利西亚地区之行》(1967)。在一九五九年他还发表过一部具有时代社会文学特点的小说《矿山》。此外,他还著有《马德里的姿容》(1965)、幼儿戏剧《神奇的画家》(1967)以及《劳动与文化的力量的结合》。

《爱总是需要的》于一九六二年由法国巴黎伊比利亚鲁埃多出版社出版,并在同年获得了该社颁发的奖金。本书是参加福尔门托尔国际奖最后一轮评选的作品,并被译成法文、罗马尼亚文等文种出版。

本世纪二十年代,西班牙诞生了共产党,广大民众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民决意走共和制道路。阿方索十三世为了保持君主政体,与军事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①联合在一起,出现了国王和军事独裁并存的局面。但是,西班牙人民既反对君主政体,又不赞同军事独裁政府。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迫使里维拉独裁者下台,阿方索十三世流亡国外。一九三一年共和国成立。新共和国带来了民主法制,宣布了土地等方面的重要改革,然而共和国作出的许许多多,

兑现少。起初，一些在政治上遭受迫害的人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可是后来根据“保卫共和国法”却连共和派的人也被关进了监狱。这样，使许多对共和国所抱的希望很快就变成失望。国内的法西斯主义者、教会的头领和地主分子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竭力主张消灭共和国。一部分原来支持共和国的人，由于对共和国的失望也开始向右转。从而就出现了支持共和派和反对共和派的激烈对抗。到一九三六年，也就是共和国成立的第五年，西班牙终于爆发了内战。在德国和意大利当局的武装干涉下，西班牙人民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斗争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共和国失败了。佛朗哥于一九三九年掌握了政权。经过近三年的内战，西班牙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有数百万人被内战夺去了生命，数十万人离开祖国而流亡国外，监狱和集中营中关满了反法西斯的民主战士。西班牙到处是白色恐怖，到处是饥饿与灾荒。更糟的是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佛朗哥政权虽然表面上采取中立态度，但实际上与德国法西斯眉来眼去，表示亲善，并派出所谓的“蓝色师团”去苏联打仗，给德国运去大批粮食和其他战争物资。西班牙人民经历内战之后本来就很贫困，缺衣少吃，加上佛朗哥政权采取反共、反民主的立场和措施，那就更陷入了灾难的深渊。萨利纳斯的《爱总是需要的》正是以这一社会时代背景写成的一部作品。

在《爱总是需要的》这部作品中，萨利纳斯并不十分强调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而是比较注重反映社会的客观现实。作品通过描写共和派军官恩里克的斗争经历，有院子的楼房里居民对门房的监视所表现出的恐惧、愤怒；电车驾驶员马蒂亚斯夫妻间的争吵，卖糖果老太普鲁登西娅的去世及其侄子间哄抢遗物

① 普里莫·德·里维拉(1870—1930)，西班牙将军。

的情景；奥雷阿姨妈及其外甥的苦难遭遇；华金和恩里克等人散发传单、鼓动和组织工人罢工等等，都深刻地反映了西班牙内战后佛朗哥政权的残酷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西班牙人民带来苦难的现实，反映了人民为摆脱苦难而奋起斗争的现实。同时，作为共产党人的现实主义作家萨利纳斯的阶级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他始终站在劳动大众一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十分同情人民群众的苦难。他写待发救济粮和食物时的长长队伍，妓女的痛苦表情，儿子被枪杀后母亲的惨叫声等，都表明了作家对苦难同胞的同情之心。作品中说安东尼娅的呼喊实际上是西班牙的呼喊，很显然，这也是作家本人的呼喊。这种呼喊是在激励人民进行反抗的斗志。

一九三九年佛朗哥上台后，国内建立了一整套的恐怖制度。佛朗哥政权把德国法西斯对付人民、对付民主的一套手法全部搬了过来。“根据一九三九年二月九日关于‘政治责任’的法令，凡从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起直接或间接参加过民主运动的人，都必须接受法院审讯。这个法令是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法律的基础。这项法律宣布凡参加过共产党和任何其他秘密组织(首先是共济会组织)的人犯有罪行。根据这项法律，凡共产党人和共济会会员都得送交由两名军人、两名长枪党人和两名高级官员组成的‘政治责任’特别法庭审讯。法律规定被告人无权聘请辩护律师。惩治办法一般分为四等：徒刑六年；十二年零一天，二十年零一天；死刑。”^①由于当时实行这种所谓的“政治责任”的法令，“……到一九三九年底，在西班牙监狱关押了二十七万一千名政治犯。还有几乎同等数目的犯人被关押在集中营。甚至连德国大使施托雷尔也深信，到一九四〇年底——一九四一年初，在西班牙监狱和集中营关押的‘赤色分子’达一百万到二百万人之多。”^②佛朗哥政权的残酷统治使西班牙的许多优

秀儿女、共产党人被枪杀、逮捕和关押，民主的进步力量受到了严重挫折，人民群众对政府不满，发出呐喊和进行反抗是完全正当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爱总是需要的》描写了战争与独裁政权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作者并没有把正在受苦难的西班牙人写成完全是对前途丧失信心或非常悲观失望的人。相反，作者很注意写人民的坚定信念和乐观态度。罢工以后，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恩里克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和审讯，恩里克在敌人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横眉冷对，与反动派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另外，华金、奥古斯托和罗莎也并不是因为恩里克的被捕而放弃斗争，相反，他们对斗争更充满必胜的信念。

作品中还有机地写了几对恋人的爱情故事，故事写得细腻生动。我们可以看到电车驾驶员马蒂亚斯与妻子玛丽娅之间分离的场景。作品中的马蒂亚斯虽然爱自己的妻子，但他不能容忍妻子和他的争吵，最后导致他一走了之。一般人看来，他似乎对家庭有点不负责任，但他心中也有因失业不能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而说不出的无限痛苦，对于玛丽娅来说，她的感受也同样是痛苦的。玛丽娅虽然对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不满，有酗酒的不良习气，但她心地善良，对儿子华金的生活非常关心和爱护，她还经常给丈夫写信，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与自己重归于好。由于生活所迫，她离开马德里去法国找自己的姐姐。可是当她要起程出国时，她对马德里表现出了依依惜别之情；在火车站，她盼望自己的丈夫来送别，而且还对华金表示，她将等着他的父亲。玛丽娅和马蒂亚斯的爱情是一种不成功的爱情，但在作者

①② 参见苏联伊·米·马依斯基(1884—1975)院士主编的《西班牙史纲》(1918—1972年)中译本第二百七十九页，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版。

笔下，这种爱情又是写得何等的真实可信和意味深长！作者安排马蒂亚斯离家出走、玛丽娅出国找她姐姐，从表面上看，这种不幸的结局是他们夫妻不和造成的，实际上，是作者通过描写这个妻离子散的破碎家庭，对西班牙当时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提出强烈的控诉。此外，作品还写了安东尼娅和路易斯、佩比塔和华金等几对青年人之间的真挚爱情，写得都很成功。作者写出了爱情对年轻人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大学生路易斯爱上了女理发员安东尼娅，尽管路易斯的父母不赞同这门亲事，但他还是冲破家庭的束缚，与安东尼娅结成了夫妻。华金和佩比塔之间的爱情也一样。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华金回到老屋时百感交集，在他感到十分孤独的时候，佩比塔一出现在他面前，他就仿佛见到了太阳，一扫心头阴云，即刻转忧为喜。华金说：“我不喜欢这座房子……我可能会愉快地放弃这座房子，就像人们抛弃一种旧思想、一种旧信仰一样把它放弃。”而佩比塔却说，“这是我们唯一的房子。这座房子就像西班牙，又肮脏又难看。但可以收拾。必须改变这所有的一切，必须用丁字镐一直刨到露出地下的红砖来。”从字面上看，华金和佩比塔说的不一样，其实两人都是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这就是要摒弃过去，创建新的未来。从这对年轻人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西班牙人民虽然经历着内战的创伤和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但是他们对振兴国家、重建家园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和决心，对祖国、对家庭、对生活、对爱情都充满着无限的爱。

译者

1988年8月于上海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爱总是需要的

作者 = (西班牙) 洛佩斯·萨利纳斯著 叶茂根译

页数 = 3 4 1

S S 号 = 1 0 6 5 3 4 9 0

出版日期 = 1 9 9 1 年 0 3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